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杰出的理论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是梅林的主要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里，梅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第一次试写了一部以工人运动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著作，科学地研究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还完全没有探讨过的重要历史阶段。

本书的第一卷包括《导言》和第一部《现代科学共产主义》。作者根据深入透彻的研究，出色地叙述了从19世纪30年代法国七月革命起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止的历史发展，即叙述德国工人运动的前提和开端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的形成。在《导言》中，着重叙述了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在第一部中论述了科学共产主义诞生前的德国经济状况和精神生活，德国工人运动的肇端——流亡者的秘密组织和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及活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德国政治状况及古典哲学的解体，马克思、恩格斯在《莱茵报》、《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论文以及他们的早期著作《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哲学的贫困》等，德国无产阶级开展的各种群众性革命运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流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

动。最后，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明晰地展现了共产主义学说的几个主要形成阶段。

第二卷包括第二部《三月革命及其后果》。论述德国无产阶级在1848—1849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在50年代直到普鲁士宪法纠纷时期的发展。梅林在这里正确地批判了议会主义的局限性，强调战斗决定于群众，而不决定于资产阶级议员的这一认识和教训。在第二部的结尾，梅林对普鲁士的自由主义作了充分的揭露，驳斥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可笑观点，他们认为不必斗争，不必牺牲，只靠一个“进步”君主的帮助就可以掌握政权。

第三卷包括第三部《拉萨尔的鼓动》和第四部《党派的争论》，论述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等。这是有重大错误的部分。还在第二卷中，梅林对于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头子斐迪南·拉萨尔的错误评价，就已经出现（如对拉萨尔在三月革命中的作用估价太高。把拉萨尔的著作，加上一个《科学共产主义的进步》的标题，完全错误地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列起来。），而在这一卷里这类错误则占了大量的篇幅。同时，梅林完全低估了爱森纳赫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意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6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由于梅林对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原则和策略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因而他必不可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爱森纳赫派的正确策略（因为这是反普鲁士的、阶级斗争的策略）。这样他就对德国工人运动史中很长的一个阶段，描绘成一幅不正确的图景。

第四卷包括第五部《党的联合》和第六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叙述1870—189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对于社会民主党在1870年到1871年战争爆发时的态度，对于莱

比锡叛国案，文化斗争和滥设公司的骗局，对于论坛社会主义和恩格斯所著《反杜林论》的意义，都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至于这一卷的主要问题，同样还是对拉萨尔派的许多不恰当的认识，尤其突出的是梅林对于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作了完全错误的论述。

应当指出，梅林在这部书里对于拉萨尔的错误评价，绝不是偶然的。由于梅林自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不彻底，因而他不理解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观点上的原则差别。梅林一方面正确地看到拉萨尔极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看到他的老黑格尔主义；但同时却认为，“拉萨尔是符合《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坚决的共产主义者”，正是他恰当地找到了能够唤醒和组织起德国工人的语言和要求。恩格斯指出：“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9页）可是在梅林看来，拉萨尔是仅次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家。而在某些观点上，梅林甚至赞扬拉萨尔而贬损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梅林还对拉萨尔派的施韦泽、波尔恩等人的某些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行动，进行辩护。

梅林的这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是在1897年到1898年间出版的（分为两卷）。1903年到1904年间出第二版时，除有许多较小的改动以外，梅林还重新作了编排，把全书分为四卷。这第二版就是这部著作的最后版本，后来的新版本都是第二版的翻版，文字上没有变动。这部书共印了十二版，最后一版是1922年出版的。本书系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迪茨出版社刊行的《梅林文集》第一、二卷翻译的。书中的原编者注是指《梅林文集》编者注。

目 次

导 言

第一 章 七月革命和改革法案	5
第二 章 西欧的社会主义	9
一 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学派	9
二 小資产阶级社会主义	17
第三 章 西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22
一 英国的工厂法和工会。宪章运动	22
二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进攻	27

第一部 現代科学共产主义

第一 章 德国状况。封建行会残余	41
一 易北河以东的容克阶级	42
二 城市手工业	46
第二 章 德国状况。资本主义的开端	50
一 西里西亚和薩克森的家庭手工业	52
二 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的大工业	57
第三 章 德国状况。精神生活	62
一 浪漫主义反动派	62
二 古典哲学	65

第四 章 三十年代.....	79
一 七月革命的影响.....	79
二 經濟进步。新文学.....	85
三 哲學和浪漫主义之間的斗争.....	91
第五 章 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	96
一 德国逃亡者的秘密社团.....	96
二 威廉·魏特林.....	105
第六 章 浪漫主义的胜利.....	115
第七 章 古典哲学的解体.....	123
一 布魯諾·鮑威尔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	124
二 德国年鉴。政治抒情詩.....	130
第八 章 《葵荫报》.....	137
第九 章 《德法年鉴》.....	157
一 杂志的創办和停刊.....	157
二 馬克思的論文.....	165
三 恩格斯的論文.....	179
四 《神圣家族》.....	196
第十 章 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09
第十一章 无产阶级运动.....	227
一 在瑞士的革命鼓动.....	227
二 德国的群众性无产阶级.....	242
三 饥餓暴動。西里西亚織工.....	247
第十二章 德国的社会主义.....	255
一 基督教一封建的社会主义.....	258
二 資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264
三 哲學一純文学的社会主义.....	267
四 麦克斯·施蒂納.....	274

五 洛貝爾圖斯的國家社会主义	278
六 社会主义的抒情詩	291
第十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	299
一 恩格斯論英國工人狀況	299
二 馬克思論費爾巴哈	313
三 馬克思反駁蒲魯東	318
第十四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	337
一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343
二 德国工人协会和民主协会	349
三 正义者同盟內的危机	359
第十五章 《共产党宣言》	366
注釋	387
人名索引	408

导 言

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貫穿着一条国际路綫。撇开莱茵和西里西亚无产阶级的个别的突然发动不談，正义者同盟和魏特林的鼓动在实际上和理論上都同西欧的社会主义有联系，同西欧特別是法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联系。前一世紀 40 年代涌现出的资产阶级的、封建的、哲学的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洛貝尔图斯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是一样），都是以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为依据的。后来，《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进行的阶级斗争成为社会主义的基础。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把康德、費希特和黑格尔，而且也把圣西門、傅立叶和歐文当作他們的思想先驅；他們研究过德国的哲学、法国的革命和英国的工业。

50年代的經濟繁荣和政治衰退又一次淹沒了他們所創立的現代科学共产主义。随后，拉薩尔又把它恢复过来，但是在个别观点和要求上，在斗争最激烈的前沿，他的鼓动彷彿是以法国的社会主义为依据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名称上正带有这方面的难以磨灭的最后痕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味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上的差別，这是毫无意义的钻牛角尖的举动；这两个名詞的意义是从历史发展中得来的。根据 40 年代的語言习惯，它們的区别是，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运动，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社会主义想借助有产阶级来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而共产主义则认识到，只有彻底改革这个社会才能肃清这些弊病。当时，法国社会民主党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間吸收党员，在资产阶级

面前代表这两个阶级的共同利益。今天，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实际工作中从无产阶级中汲取力量，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其他阶级相对立，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在理论上则从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性纲领，《共产党宣言》中汲取力量。

要深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反复回顾西欧的社会主义，回顾英国和法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要的。因此为了简明起见，对于德国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诞生以前的历史情况先作一个导言式的简述是适当的。当然，重点只能放在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有过某种影响的那些事实和理论上。

第一章

七月革命和改革法案

16世紀的世界經濟轉折，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18世紀的無數次戰爭把德國拋進了衰敗的深淵。直到19世紀初叶，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還像一個衣衫襤襤的稻草人站在歐洲文明國家之中。統治階級腐朽透頂，被統治階級沒有力量粉碎壓得它們直不起腰的枷鎖。德國市民階級无力完成英國資產階級在其17世紀的革命中，法國資產階級在其18世紀的革命中所完成的事業。直到一個外國侵略者的鐵扫帚開始把封建垃圾從德國的土地上掃走的時候，德國市民階級的優秀人物才在文學和哲學方面創造了一幅資產階級世界的理想圖景。

法國革命磨練出拿破侖軍事獨裁這個武器，用以保卫自己的社會成果。無論是在為了霸占世界市場而同英國進行的鬥爭中，還是在為了粉碎封建主義而同俄國、奧地利、普魯士進行的鬥爭中都是如此。法國革命的巨大成就似乎使它遠遠超過了本來的目的，但是經濟均勢又以不可抗拒的威力再度形成。法國統治世界的夢想如同在東歐還很原始的封建主義面前遭到破滅一樣，在英國工業的優勢力量面前同樣破滅了。在階級本能的促使下，法國資產階級及時地從使它迷惑了一個時期的陶醉狀態中清醒過來。它急

忙自行毀棄了引起妄想的武器，做出獨立自主的样子。与其說拿破侖失敗于英國的黃金和俄國的白雪，不如說他失敗于法國資產階級的背叛。

但是起初法國資產階級並沒有得到叛變的果實。在英國保守派和俄國沙皇的指揮下，歐洲聯軍在萊比錫和滑鐵盧取得了勝利。於是 1814 年亞歷山大皇帝，1815 年威靈頓公爵又恢復了舊波旁王朝。封建主義又一次想在歐洲安家立業。在英國，自从 1815 年頒布谷物法以後，貴族土地所有制同產業資本展开了公開的鬥爭。在法國，在封建社會的地主同資產階級社會的小農之間的鬥爭中隱藏着同樣的矛盾。這在政治上就表現為政府及其黨羽——容克和僧侶同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人民群眾之間的鬥爭。但是在支持資產階級的十分具體的、不斷增長的力量面前，糾集了專制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神聖同盟的旗幟像無形的烟霧那樣消失得無影無踪了。在英國，從 18 世紀最後三十年增長起來的大工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隨着 1815 年，特別是 1825 年的商業危機，大工業進入了它的現代生活的周期性循環中。在法國，復辟的舊波旁王朝企圖毀壞從大革命中產生的、由帝國所鞏固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結果碰得頭破血流。作為隱蔽的外國統治的波旁王朝，不斷刺激着法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使他們感到憤慨。法國資產階級在 1830 年的七月革命中取得了政權；不久以後，英國中等階級也在 1832 年的改革法案中獲得同樣的勝利。在這兩個國家里，資產階級開始從到那時為止同它結成同盟的無產階級手中攫取無產階級在共同勝利中應得的一份果實。

于是在現代工人階級面前展現出一條走向世界歷史性鬥爭的道路。在反抗共同的壓迫者，反抗從過時的生產方式中提出政權要求的後退階級的鬥爭中，共同的利益使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結

合起来。在这个斗争中资产阶级发展了，无产阶级也同样发展了。资产阶级不得不造就无产阶级，因为它只有在这种矛盾中才能产生和存在。无产阶级不成长，资产阶级也不能成长，而且它安安稳稳地监护自己的产儿的时间总是不长的。在历史上资产阶级响亮地欢呼胜利，而听不到劳动阶级的低沉回声的情况还从来没有过。从托马斯·闵采尔到格拉古·巴贝夫，成长中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母体中有规律地躁动着。然而，只要它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它就只能像在梦中一样行动，只能用幻想的武器进行斗争，结果陷入可怕的失望之中。共同敌人的决定性失败断开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最后纽带。1830年前后，西欧的资产阶级一掌握政权，西欧的无产阶级就作为政治反对派锐不可当地发展起来。

这一阶级斗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像过去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那样反对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胜过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时候，前者早就用锋利的武器对付后者了。中世纪的公社就已经造就了多少卓越的人物啊！如罗马的科拉·迪·伦济，巴黎的爱蒂耶纳·马塞耳，根特的雅科布·冯·阿尔特威尔德。16世纪的伟大发现和伟大发明给资产阶级的野心开辟了多么迷人的道路！薄伽丘和拉伯雷乃至莱辛和伏尔泰以多么不朽的笑声吓退了封建主义的阴影！当大工业中的资产阶级发展到顶峰时，虽然它造就了更多的无产者，但是也把他们抛进更深的贫困深渊中，这在世界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越尖锐，这个压迫者同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就好像越没有前途。

不久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就认识到，用人民群众的不断加剧的

貧困來换取社會財富增殖的經濟發展必然導致一切人類文化的沒落。但是他們越是看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他們就越不會想到，這個歷史過程總有一天會從自己內部發生急變。他們認為，挽救和改變是必要的，但是數目增多、力量減弱的受苦群眾決做不到這一點。有產階級本身應該看到，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應該使有產階級相信，社會的禍害是難以忍受的。必須訴諸它們的感情和理智；必須把資產階級社會放到一個新的基礎上，或者至少只保存它光明的一面，取消它陰暗的一面；必須通過小型試驗證明建立新社會的可能性；特別必須消除一切禍害的根源，即尖銳的、而且每天在繼續尖銳化的階級對立。從這種超階級的觀點看來，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似乎是無關緊要的，甚至是有害的事情。所以說它無關緊要，因為它不能取得什麼結果，一旦它觸怒了有產階級，使正要消除的階級對立更加尖銳化，那麼它就成為有害的了。

這樣，在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之間就產生了一個在英國和法國都沒能解決的矛盾。

第二章

西歐的社会主义

在历史上，社会主义走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前面。资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前，必须先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发展阶段，而在达到这样的阶段以前，它必须产生出广大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使整个居民阶层失去自己的财产。19世纪初叶，资本主义大企业中的明智人物就看到了大企业的阴暗的一面，并拟定了一个新社会的计划。这些人就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

一 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学派

他們的共同点是，对于法国革命，对于劳动阶级的一切政治行动都采取敌对态度。这种态度可以从法国革命所造成的局面同在革命中宣布的资产阶级理想——和平、正义与平等——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中得到解释。现在空想社会主义者要想尽善尽美地实现这些理想，他們想改善所有社会成员的状况，首先是最贫困、人数最多的阶级——无产阶级的状况。但是必须选择与革命的道路不同的道路。思想家应该拟定一个新社会的计划并且使统治阶级相信，建立这种社会是必要的。只要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从正在

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看到历史的动力，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只会走这条道路。圣西门向王室呼吁；傅立叶每天期待百万富翁光临，送钱来让他实现他的空想；欧文把自己局限在脱离一切政治活动的和平宣传上。

当然，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般理性，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又都表现为特殊的理性。圣西门是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他研究过当时所有高低不同的生活，他是既超过法国启蒙学派也超过法国浪漫主义的渊博学者。同启蒙运动者相反，他懂得历史的内在联系、中世纪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宗教的活力；同浪漫主义者相反，他反对回到封建和僧侣的统治状态中去。他，旧法兰西的一位贵族宣称，统治权不应归于宗教和军队，而应归于工业和科学；他，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前哨战中的一个优秀工程师，正确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历史的暂时性。

他一生的基本思想是，保证每个人最自由地发挥他的才能。过去，人作为奴隶、农奴、雇佣劳动者被人剥削。现在利用自然、利用地球的时代已经来到了，而且这个工作要团结和联合所有的人来做，因为人人都应该劳动。工业的实质不应该再是对人的剥削，而只应该是人对自然的利用。今后的政府也应该是一个管事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管人的机构。新基督教要改善无产阶级的精神状况和物质状况，它在今世就是所有人的福音，是被旧基督教割裂开来的肉体和精神的统一。在圣西门的天才的预见中，还掺杂着一些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僧侣的观念的糟粕，但是他所播下的种子却使后来的社会主义在各个不同方面取得了成果，而且像从行云中透出星光一样，从他致力的思想世界中不断地射出预言的光芒。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家，傅立叶比圣西门更为卓越。他是一个大商店的店员，他看到在一切政治变革中只有资本在不

断增长。他看到从没收土地、指券^① 經濟、大陆封鎖以及法軍的武器、服装和粮食供应，总之从革命的掌权者及其继承人拿破侖的每一措施中，商业总是获得現金利潤。他把自己最鋒利的箭对准商业这个怪物，对准商业封建制度。但是他也是从大革命的空想的前提出发的。他以法国的唯物主义为依据，认为人类的一切爱好和欲望都是好的，他要把他的新社会建立在合理地滿足这些欲望的基础上。

这个社会是他的一种幻想游戏，要嘲笑它那怪誕的細节是非常容易的。因此傅立叶对現代文明所作的批判也是史无前例的。他以敏銳的觀察力发现了現代文明所不断制造的，但从未克服的矛盾，他首先指出，在現代文明中，貧困是由富裕中产生的。他說，野蛮以簡單的形式所犯下的罪恶，文明都賦之以复杂的、曖昧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他辛辣地諷刺了資产阶级的婚姻，說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話：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他的批判完全是有益的；傅立叶关于消灭城乡对立，关于民族融合、关于劳动不是出于經濟上的必要而是为了使人的本质趋于完善，以及关于人类在其联合与社会化中的巨大进步所說的一些話，永远是有价值的。

尽管这一切都是幻想，可是圣西門和傅立叶仍然是革命的思想家。只是他們的門徒和追随者变成了反动人物。他們几乎全都是有产阶级，特别是在 1825 年圣西門死后，他的信徒很多，他們在七月革命以后頗有声勢地登上了公开的讲台。但是，圣西門主义恰恰在实际革命的試金石上碰得粉碎。曾經領導过反对波旁革命的秘密政治組織的巴札尔想用政治宣傳的办法傳播老师圣西門的

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1790—1796 年)发行的一种紙币，发行后不久即貶值，1797 年廢止。——譯者

学說，并且強使政府接受这种学說。安凡丹同巴札尔不同，他推行学派的僧侶—宗教組織，从粗野的肉欲意义上宣揚恢复肉体。安凡丹出身于一个金融家家庭 本人也在銀行工作，是一个先驅者。他既是一个切实的技术人員，又是一个虛幻的空想家，可是在这种混合的矛盾因素中，却有一种魅力，誘使亨利希·海涅这样的人也参加了他的集團，他胜过了由于大失所望而喪命的巴札尔。

这时一些比較有力的分子退出了这个学派。其中有巴札尔的一个老同志毕舍。他把圣西門主义的宗教部分轉向实用方面。他想利用合作的和平手段 在社會上实现基督教道德的使命；工人應該成立生产合作社，不过其目的不是为使工人成为企业主，而是要把工人阶级从雇佣关系中解放出来。毕舍估計到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意志。他希望，这种团结意志能使第一批卓有成效的合作社把一定份額的純利变作一种不可分的資本，这是无产阶级的不可让渡的财产。它将逐渐使各行各业的工人联合起来。这个建議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但是它在法国工人阶级内部有力地宣傳了合作思想。

安凡丹更快地把圣西門主义拖上了不光彩的沒落道路。1832年6月发生了反对资产阶级新王朝的第一次街垒战。同月，圣西門主义者的空想集團就退隐到乡村中去了。通常对于一个自然的阶级活动不能有絲毫损伤的輕微的司法迫害，就摧毁了圣西門主义。它的个别信徒轉向傅立叶，但是許多清醒过来的空想家都像今天的米凱尔一样，变成了死心塌地的拜金主义的先驅。第二帝国的交易所投机事业，就是打着圣西門主义的旗帜以最丑恶的方式进行的。正如海涅所諷刺的那样，从前的殉道者除了勳章的十字架以外再也不帶十字架了。

1837年，傅立叶同圣西門一样死于貧困中。海涅常常看見他

穿着一件灰色的旧上衣，沿着罗亚尔宫的柱廊走去，口袋里装着沉甸甸的东西，这个口袋里露出半截瓶子，那个口袋里露出一个长面包。傅立叶的聪明而勇敢的門徒是維克多·孔西得朗。同圣西門主义相比，傅立叶主义的傳播范围較小，也沒有那样引人注意，但是存在得比較长久。然而，一方面由于實現老师的空想的小型試驗終归失敗，一方面由于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傅立叶主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歐文同法國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在許多方面好像比較狹隘，但是实际上，他对經濟問題的見解，具有更大的价值。当英國大工业已經改变了資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的时候，法國几乎还等于沒有什么大工业。只是大工业才把資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間的对立，資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間的矛盾推到頂点，但是它也創造了克服对立和矛盾的手段。在實驗中，歐文是从社会革命所由肇源的工厂制度出发的。在要求縮短工时，經常变换劳动項目，以消除分工的不良后果和工人及劳动的不愉快感觉等方面，歐文同傅立叶是一脉相通的，但英國工业的高度发展使他具有更为远大的眼光。傅立叶想在他空想的法倫斯泰爾中对第二代进行教育，这种教育給所有达到一定年龄的儿童把生产劳动同教学和体育鍛炼結合起来，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手段，而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唯一方法，而歐文却看到了大工业已經开始殘酷地剝削童工。

同傅立叶一样，歐文和 18 世紀的法國唯物主义有着根本联系。他认为人是其自然稟賦和周圍环境的产物，英國的产业革命使他有很好的机会证实自己的得意主張。他从 1800 年到 1829 年領導紐拉納克的一个大棉紡厂。这个厂的二千五百名工人原来由于工資低微，劳动时间太长，妇女和儿童受到无限制的剝削而变了

质；他們欠了当地小商人許多債，由于酗酒、纵欲、粗暴和无知而完全墮落下去，但欧文就用这二千五百个工人組成了一个模范新村。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細心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給工人創造够标准的生活条件。他的巨大成就引起全欧洲的注意，各国君主都想分享这位崇高的慈善家的荣誉。俄国皇帝宣称他是欧文的保护人，甚至对于莱茵地区的工业戕害童工的行为不聞不問的懒散的普魯士國王也送給欧文一枚金质奖章和一封恭維信。但是神圣同盟的最狡猾的雇佣文人根茨已經对这种作法作了确切的評价，他恬不知耻地說：我們根本不願意群众富裕和自主。否則我們怎样統治他們呢？

事实上，当欧文决心沿着已經走上的道路繼續前进的时候，他头上的花环很快就枯萎了。他在紐拉納克所取得的成就决不能使他感到滿足。工人仍然是他的“奴隶”，距离他所想像的人类发展的最終目标还很远。可是这二千五百名工人替社会所生产的真实財富同不到半世紀以前六十万人所生产的一样多。欧文自問：这二千五百人消費的东西同六十万人所应消費的东西之間的差数到哪里去了呢？这个問題的答案是很明确的。紐拉納克工厂的所有者除了拿到其投資的百分之五的年利以外，还拿到了六百多万馬克的純利。欧文从这个观点出发达到了社会主义。在欧文看来，使少数人发财致富，使广大群众淪为奴隶的大工业的巨大生产力是新社会的杠杆，在这个社会中生产力是大家的公共財产，只应为大家謀求共同的福利。欧文认为，实证宗教、私有財产和难以离異的婚姻，这“罪惡的三位一体”是現社会的三大障碍。他在同这些障碍进行斗争时，清楚地知道，他付出了一切力量，而实际上他也失去了一切。官場社会把他赶出去，报界使他沒沒无聞，或者像英國資产阶级的主要報紙那样，宣揚他的“可惡的行徑”，“殘忍的行

为”，“极端恐怖的举动”，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初几步并证明建立这种社会的可能性，他做了一些小型试验，在试验中耗尽了他的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试验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这些试验始终证明其发起人具有老练的才干和伟大的眼光。欧文以深刻的专门知识拟定了他的移民区计划，并规定了一切技术上的详情细节。他的劳动市场——用一种以工时为单位的劳动纸币交换劳动产品的设施——是以直接社会化的劳动为前提的，也就是以完全废除资本主义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商品生产为前提的。

在实际方面，欧文是从大工业中得出社会主义结论的，在理论方面，他是从以科学的公正态度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中得出这个结论的。构成这种社会的财富的是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是英法两国的经济学家从17世纪末叶起所要解决的一个谜。李嘉图终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学说，并在他的主要著作中证明这个法则也支配着表面上同它最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同时他又肯定，社会总劳动的产品是在地主（地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这三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因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既然一件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那么一个劳动日的交换价值就应该等于它的产品，换句话说，劳动的工资应该等于劳动的产品。可是现在工人的工资只是从社会劳动的产品中除去地租和利润以后剩下的一部分，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在大工业生产中的生活比劳动阶级过去任何时候的生活更为悲惨。要帮助他们获得他们的权利，就需要使他们得到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

欧文也想利用他的劳动纸币达到这个目的。既然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另一种外在的尺度——货币还有什么用呢？由于一切

别的商品都以这一种商品評定它們的价值，交換价值才有可能成为价格，劳动产品才有可能分为地租、利潤和工資。但是欧文对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內部結構認識得非常清楚，他并不妄想利用他的劳动券来代替貨币，而同时能让商品生产存在下去。如果沒有地租和利潤，那么生产資料的公共所有制就必然代替私人所有制。欧文的劳动市場就要引向这个最終目的。这是一种空想，因为現社会是不会让那些实际上证实它的內在的不合理現象的小实验来革自己的命的。但是欧文沒有犯想用自己的辯子把資本主义社会从泥沼里拖出来的更大錯誤。

很明显，欧文肯定要远比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为接近工人阶级。他不仅在紐拉納克为工人阶级办事，而且当他向他的共同投資人的貪心让步以后，直到 1853 年去世，他仍然同工人一起生活了一个时期。如果要把英国的工厂立法和英国的合作社制度的存在归功于某个人的首創力量的話，那么欧文就是它們的締造者。欧文也在无产阶级中宣傳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論，那时就已經受到此后成了无产阶级利益的先鋒战士們的家常便飯的种种凌辱，从被赶出大厅一直到个人生命受到威胁。但是欧文沒有参加在宪章运动中得到飞快发展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他想首先通过和平宣傳說服有产阶级，而且他不相信在他壯年时期还很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力量。

他的学生沒有超过他。約·弗·布雷曾經說过，他确信統治阶级不可能認識偉大的真理，因此他也就反对工人的政治斗争，他的本家查·布雷认为，宪章运动只不过证明了无产阶级沒有掌管自己事务的能力。他們脑子里所考慮的福音就是他們医治病态社会的唯一处方。欧文的門徒們变成了一个把欧文尊为他們的百言百中的预言家的宗派。宪章主义越向革命的方向发展，欧文主义

者的态度就越溫和。他們所以失去了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同群众的联系，是毫不奇怪的。歐文主义在自助合作社和宗教的自由信仰主义上停滞不前了。

二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展，大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般說來已經是气息奄奄了。资产阶级受到无产阶级的威逼越厉害，就越沒有闲暇和心情去计划和探究无产阶级痛苦得以消除的未来图景。然而就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的不断增长的阶级斗争的压力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发展起来了。

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看来好像是站在工人一边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过渡阶级，在这个阶级中那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减弱。小资产阶级认为自己超出于阶级对立之外，并且反对阶级斗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大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之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想消灭极端資本和雇佣劳动，而是想减弱它们的对抗，把对抗变为和谐。它想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标准来调整現社会的不平等現象。因为它不想建立新的社会，而是想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是同它分不开的），所以它喜欢夸耀自己的“科学”，就像小资产阶级喜欢充作“人民”似的，因为小资产阶级认为，它代表自己的特殊利益时，同时也代表了普遍的利益。

因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决不想站在裁縫和手套工人的思想立场上进行活动。由于所受教育和家庭出身的关系，他們往往居于他們所代表的阶级之上。他們手持锋利的武器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他們用辛辣的批判粉碎了資本主义经济学家

欺人的詭辯。他們所以成为小資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是因为他們的思想不能超越小資产阶级在生活中无法超越的界限。他們要么想建立完美的資产阶级社会，以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在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間實現以这个价值尺度为根据的劳动产品的自由交換；要么就想把現时的生产資料和交換資料重新硬塞进早已被这些資料突破的旧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当小資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停留在現實基础上时，他們认为自己远远超过了大資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其实他們是用反动的空想代替了革命的空想。

这些小資产阶级的空想其根源首先存在于英國，其次存在于法國。1831年，約翰·格雷首先系統地發揮了用劳动时间作为直接的貨币尺度单位的學說。他建議成立一个国家中央銀行，这个銀行有許多进行商品交換的分行，但不是同貨币进行交換而是同体现了劳动时间的票据进行交換。这些計劃存在着内在矛盾，因此在每次实验中都遭到失敗。这个矛盾就是，产品虽然当作商品生产，但却不当作商品交換。歐文的劳动券只不过确认生产者个人参加了共同劳动，并确认他对于决定用于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有权要求他个人的一份；而格雷的劳动券的用途是，作为分散的、独立的生产者交換产品的媒介。这样一来，就无法檢查各个人的特殊劳动是否体现了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只有在商品的貨币形态中，个人劳动才成为一般社会劳动。取消貨币（假設这在資本主义社会是可能的話）并不能把資本主义社会送上小資产阶级的和諧的頂峰，而是把它抛进立即破灭的深淵。商品和貨币就像两极一样是相互从屬的。沒有商品生产也就沒有貨币，而商品生产不停止，貨币也就不可能取消。要想实现这种空想，就一定遭到失敗，虽然如此，它仍然像一根紅綫貫穿在英國，而后貫穿在德国和法國的小資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劳动决定商品价值是产生

資產階級的公平和平等的理想的真实基礎。因此，這些沒有希望的嘗試並沒有停止，人們企圖用取消使資產階級社會賴以存在的條件來清除它的一些弊端。

這種空想產生於英國，而另一種想把母雞再塞進蛋殼里去的小資產階級空想則起源于法國，這是同兩國的經濟發展程度相適應的。小企業的重要性在法國同在英國大不相同。法國手工業的力量大得多，保持的時間也更為長久，因為法國是以奢侈品同英國送到世界市場上去的大量生產的產品和抗衡的。農民階級占法國人口一半以上，而英國農民早就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貪婪的大口吞噬了。法國農民階級的繼續存在，說明法國封建主義延續得更長一些，也說明了英國和法國的經濟學家之間的差別。在英國資本主義在小私有者遭到可怕的毀滅的情況下，輝煌而迅速地勝利前進，而在法國却緩慢得多，遜色得多，而被統治和被壓迫群眾也要痛苦得多。同他們的無窮無盡的痛苦比較起來，即使之毀滅几乎可以算作是一種善舉。因此法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以半喜半悲的心情觀看着這一勝利進軍；他們既頌揚又詛咒勞動的資本主義形式；在認識方面，他們可能沒有英國經濟學家那樣明確，但是在博愛之心方面他們要勝過英國經濟學家。存在于古典經濟學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布阿吉爾貝爾和配第之間的這種差別，在17世紀末葉就已經明顯地顯露出來，同樣，在19世紀初葉最後一批代表人物，李嘉圖和西斯蒙第之間也存在這種差別。

李嘉圖和西斯蒙第分別在1817年和1819年發表了自己的主要著作。在這之間發生了歐洲織造和平以後的第一次商業危機。李嘉圖對待這種情況，如同對待每個富有的民族都能耐心地忍受的困難一樣，很容易就放過去了，就像一個大商人承受了自己海船的風險而並不因此羨慕沒有經受這種風險的窮鄰居一樣。然而西斯

蒙第却认为群众的日益貧困乃是危机的根源。他发现，资产阶级社会把各种所有制同各种劳动分割开了。“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日益狭小，工业也就越是被迫要到国外市场来寻找销路，但那里有更大的革命在等待着它。”西斯蒙第雄辩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竞争，财富分配上的极端不平等，资本和地产的集中，农民和手工业者面临没落以及无产阶级的贫困。他首先说出了这句确切的话：罗马的无产阶级靠社会生活，而现时社会却靠无产阶级生活。

但是西斯蒙第的批评并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他把大工业比作一个不能制约自己招来的神将的魔法师学徒，因此他的主要目标就是限制生产。他反问说：难道财富是一切，而人什么也不是吗？为了人的福利，财富的积累应该有个限度。西斯蒙第是个很有见识的经济学家，不会随随便便地回到封建行会的状态，但是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逻辑却或多或少地把他推回这个方向。在工业方面，国际竞争使手工业的行会制度显然不能存在，他不得不满足于全属一般的改良建议，满足于要求企业主对所雇用的无产者的生活负责，这样就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建立起“某种连带责任”。西斯蒙第假定小企业比大企业优越，自己在农业方面比较有办法，因此他十分关心农村的小企业。法国的小农经过大革命由半农奴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小农参加了共和国和帝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而现在资本主义的高利贷者及其抵押制压迫他们的程度并不低于封建地主及其徭役。但是西斯蒙第想借以保存农民财产的永佃地、世袭地和租地又接触到中世纪的受束缚的财产了。他的学派完全退后到宗法式农业的方向去了。

西斯蒙第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个代表，同时也是小资产阶

級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他在法国領導这一派大約有二十年，后来这个流派中又出現了新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对他们有所了解。

第三章

西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一 英国的工厂法和工会。宪章运动

16世紀初叶，法兰德斯羊手工場手工业的繁荣和羊毛价格的上涨第一次促使英国大地主强占农民的耕地；18世紀末叶，大工业发展了，最后剩下的一部分原来依靠自己一块份地生活的居民——农村家庭紡織工人，因而丧失了自己的财产。机器出現了，筋骨强壮不再必要，于是产生了女工和童工，結果是現代无产阶级开始經受古代奴隶制和中世紀农奴制都从未見过的那种特殊的可怕痛苦。英国仿佛是新建的，平地涌现出大城市，荒蕪的沼澤地帶矗立起人类双手建造的高楼大厦。資本大增，一个接一个地霸占国外市場。与此同时，史无前例的痛苦也就落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头上。

大工业資本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一切使生活有意义的东西。資本家认为工人生活的一天，除去为了使劳动力不致完全报廢所必需的很少几小时休息外，都是劳动時間。在把安息日看作神圣的国家里，工人在星期天也得不到休息，他們也沒有時間履行家庭义务，进行社交活动，充实精神生活。儿童沒有必要的时间发育和

成長，沒有必要時間呼吸新鮮空氣，見到陽光，甚至連匆忙吞下一頓可憐的午餐的必要時間都沒有。不論兒童還是成人，常常只是在勞動中讓人往嘴裡塞一塊食物，因而工人簡直就成了生產工具，人們就像給蒸汽鍋爐加煤、給機器加油一樣，給他們塞食物。恢復生命力的有益睡眠變成了使筋疲力盡的機體复苏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時僵臥。如果說大工業的無產階級由於吸收了農村居民而稍稍推遲了完全惡化時間，那麼這個泉源不久也枯竭了，醫生的報告證明，農村工人壽命短促。英國民族的生命力從根上腐蝕了。

這樣一來，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統治地位也受到威脅。對這種地位的擔心、大地主對工業資本的忌恨，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醫生的警告、好心腸的資產階級分子出于仁慈的同情，像歐文這樣的崇高慈善家的孜孜熱忱，還有個別大廠主的特殊企業利益——所有這一切不同的情況一起發生作用，使有產階級（工廠主集團除外）贊成國家至少對最沒有抵抗能力的工人階層，首先是兒童進行保護。事實上，在1802、1819、1825、1829和1831年都頒布了保護在工廠中勞動的童工的法令。但是這些法令都不過是一紙空文，因為議會不肯不顧工廠主階級的反抗，拿出錢來實施這些法令。結果，資產階級為爭取在法律上保護工人所做的這些努力沒有得到什麼實際成果，主要是對工人起了一些心理作用。從這些努力中無產階級認識到，它所處的無邊無際的貧困境地對於社會的影響是多麼大。

其實，無產階級從沒有完全迷失方向。儘管1799年的禁止結社令以極嚴酷的懲罰手段來對付工人結社，但是它並沒有達到制訂者預期的目的。它使受威脅的工人意識到他們的利益是共同的，甚至在執行得緩和的地方也是如此。而在那些严厉執行的地方（如在工廠工業中）反而激起了強烈的反抗。工人們組成了秘密

团体；参加者都庄严地宣誓忠贞不二。不忠实的分子受到肉体上的惩罚。資本的牺牲者由于被剥夺了人性，作为最后的人类感情的残忍的复仇心占了上風；放火、偷窃、砸毀机器成了普遍現象。工业主义的有見識的代表人物看到，这种状况不能繼續下去；他們认识到，当自己的学說的結論对工人有好处时，不能否定这些結論；由于激进的自由貿易主义者休謨（一个非常实际的、經常运用新武器的鼓动家，受到裁縫师傅普雷斯的支持）的活动，1824年在議會中秘密通过了廢除禁止結社令的議案。

这时在各个劳动部門出現了一些工会联合会（Trade Unions），它們主要是想通过罢工爭取較好的劳动条件。这一來吓得議會在第二年馬上又限制几乎還沒有實現的結社自由，但是这一措施阻止不了工人的思想跃进。工会繼續有力地发展着，它們同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亲密合作，1834年組成了一个直接以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的强大的总工会。由这种胜利而产生的信心，促使工会过急地进行大規模的同盟罢工，結果遭到一系列的慘敗，总工会也宣告解散。但是工会还是抵抗住了这次打击。尽管法令对工会活动极为不利，資本家報紙所控制的輿論也处处作梗，尽管經濟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給它证明它的努力是无用的，无产阶级觉醒了的阶级意識却再也不受任何迷惑了。

資产阶级固然可恨，无产阶级还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它反对王朝和大地主的政治斗争。当时英国工人阶级成熟的程度还不足以組成自己的政党，却已經能够认清反动派压制資产阶级的自由，保持部分由地方貴族、部分由受贿的选民选出的下院，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它同要求以普选权为基础改革議會的資产阶级的小資产阶级激进派結成同盟。首先由于害怕“郎卡郡和約克郡的忧郁的工人群众”，王朝和議會的两院才被迫实行改革。

但是 1832 年的改革法案只保障了中等阶级的选举权，中等阶级在声名狼藉的“最后声明”中拒绝进一步扩大选举权。

改选的议会不久就表现出它是谁的精神产儿。对爱尔兰的强制法令，保障大工业城市的资产阶级对当地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的城市管理新规章，新济贫法及其“巴士底狱”^①（失业者在这里受到的虐待比犯人还厉害），这一切驱使无产阶级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反对派。1833 年的工厂法也起了同样作用。这个工厂法的许多条款都比从前的工厂法还要落后，只有设置工厂视察员这项对工人有利的措施，才起了一些推动作用。而这一措施其实也不过是大工厂主为反对小工厂主才布置的。1835 年，一个工人协会在伦敦集会，拟出一份人民宪章作纲领。这个宪章内容有六点：（1）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选举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议会议员支薪；（4）秘密投票；（5）划分平等的选区；（6）每个选民都有被选举权。要想实现这些要求，就要彻底推翻英国宪法。

宪章运动是现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使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第一次尝试。但它既不是一个纯粹无产阶级的运动，也不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进步分子。它里面搀杂着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成分，而由于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刚刚遭到失败而十分气馁的工会联合会却没有参加宪章运动。此外，宪章运动还参加了贵族同资产阶级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当英国资产阶级力争实现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场”、其他所有国家都成为它的工业品市场和粮食及原料的来源地这一理想的时候，它还没有完全取得政权。妨碍这个理想的首先是谷物法。谷物法提高了面包的价格，因而也提高了

① 新济贫法规定，失业的贫民要进“劳动院”。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痛恨“劳动院”，称它为“穷人的巴士底狱”。——译者

工資，使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地租同資本利潤之間的这种內部冲突对于工人本身只有間接影响。宪章主义者不想維护谷物法，但是他們也知道，自由貿易不会使无产阶级吃到便宜面包。他們在政治方面的目的是实行宪章，在經濟方面的目的是十小时工作制。于是統治阶级正好利用这一点来引誘工人。自由貿易主义者答应他們，谷物法廢除以后就实行十小时工作制，但是后来以布莱特和科布頓为首的一伙人公然背棄了他們的諾言。大地主为了籠絡无产阶级中的比較不成熟的阶层，也打出十小时工作制的旗号，隱藏起他們对于自己的地租受到威胁的怨恨。

这时宪章主义者看透了假朋友。他們支持貴族为十小时工作制进行的鼓动工作，却并不同它合流，当这些为自由貿易的利潤而辩护的反谷物法者一旦宣布千年王国开始的时候，宪章主义者就把他們赶下讲台。但是宪章主义者在議会中沒有自己的代表，他們不得不依靠議会的政党，有时依靠托利党，有时依靠輝格党。1842年工厂主迫使工人举行大罢工，然后又出卖了工人；这次大罢工充分表现了宪章运动的政治性质。几十万工人高呼战斗口号：政治权力是我們的手段，社会福利是我們的目的。但是这时宪章主义由于对社会主义缺乏了解而吃了亏，正如社会主义对宪章主义缺乏了解而吃亏一样。关于道义力量或物质力量的爭論，关于“神圣月”，即总罢工的爭論，关于空想的土地方案（用认购稍有限制的股票的办法购入大量土地）的爭論不断削弱党的內在力量。虽然如此，党的英勇斗争仍然在現代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頁。由于它的团结一致的抵抗，“可耻的策略”失敗了。厂主曾利用这些策略阻碍有专业知识的、无所畏惧的工厂视察員进行工作，并力图再次破坏1833年的工厂法。宪章运动給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一种活跃的精神生活，創造了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这

种文学的形式还不够简洁、精练，但是在思想的有力和内容的深刻方面胜过了同时代上层阶级的精神产品。

宪章运动是这样波澜壮阔，以致对有产阶级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个别激进的厂主站到了战斗的工人一边；从人道主义的托利党员中产生了“青年英国派”，他们想恢复中古封建主义的好的一面，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但却有力地打击了那些骄奢淫逸的富豪。迪斯累里的长篇小说《神巫》，把1842年的罢工写得十分动人，可以说是这一派的最光辉的代表作。才华出众的幽默家，如托马斯·胡德，在他的《衬衣歌》和《叹气桥》中，生动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妇女的无法形容的困苦。在卡莱尔的著作中，宪章运动终于得到了传遍远方的回音。卡莱尔吸取了德国古典作家的思想，从大工业的后果中看到出现了一个新的野蛮时代。他用美妙的文笔描述了大工业的破坏作用，并要求建立劳动组织。

当然，这种文学的最深处都隐藏着一个反动的核心，无产阶级对于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认识得越清楚，这个反动核心就必然越暴露出来。对于贫苦的同情，不管喊声多么响亮，不管带有多么高贵的感情，但它总是一株柔弱的幼苗，在已经燃起的阶级斗争的热流中很快就枯萎了。甚至卡莱尔最后也成了奴隶制的辩护人。

二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进攻

在法国，1791年就颁布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它的借口是人权宣言和害怕行会制再兴，而在英国禁止结社时所用的借口则是挽救社会和害怕可怕的怪物——法国的雅各宾派。但是欺骗海峡两边的工人所用的不同的花言巧语是与经济情况的实际差异相适应的。法国的大工业还没有得到迅速发展，因此也就没有产生

在英國同廢除禁止結社令、成立工会联合会、实施工厂法相結合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統一运动。因此，首先上台的不是工业資产阶级，而是金融資产阶级，即所謂金融貴族，銀行和交易所，大矿山和大森林的所有者。七月王朝是剥削法国国民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紅利是由王室、大臣、議会、二三十万选民和他們的僕从共同分享的。

在欺騙无产阶级方面，法国金融巨子表現得决不比英國工业大亨逊色。他們首先欺騙工人和小資产阶级，取消法兰西共和国，委任路易·菲力浦为他們的剥削勾当的头目，并假装要建立一个有些共和政体措施的王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到資产阶级的新王任命富有的銀行家卡西米尔·佩利埃为总理的时候，很快就表露出来了。佩利埃是資本主义的一个狭隘而阴郁的盲信者，他开始向七月革命的幻想者說明，革命并沒有推翻社会制度，而只是碰了碰政治制度，任何暴动，不管它打的是什么旗号，都是犯罪，任何暴力行为都是目无政府。但是同时这位法国资产者实际上却又采取了所謂目前一切“救国措施”中的主要手段：警察当局用金錢收买一批流浪汉、惯犯、被释放的重劳役犯和諸如此类的坏蛋，叫他們制造暗杀、暴动和阴谋活动事件，以便借机鎮压受騙的群众。在人为的恐怖的影响下，卡西米尔·佩利埃使軟弱的議会取消了人民群众剛剛用自己的鮮血換得的政治权利，在他死后，梯也尔、基佐和类似的蠢貨以毫不逊色的精力繼續这种爱国勾当。在資产阶级王朝建成还不到六年的时期內，史册上就記載了大約三十几次小規模革命，十几次謀杀国王事件，頒布了将近一打的剥夺群众政治权利、首先是出版和結社自由的法令。

这种政策必然激起参加过七月革命的小資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战士的义憤，正因为如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受到表面上的

挫折。由于不能公开活动，被压迫阶级就组织了秘密团体；他們丢开了演說和著述，拿起了匕首和短枪。玩火的警察不止一次地灼伤了自己的手指。甚至在費希用爆炸机暗杀路易·菲力浦这样一种最激烈的行动中，都有一个退职的警探以首領的身份参加。除去警察的小暴动以外，人們还試圖拿起武器推翻由資產階級委派負責国务的貪婪的商人統治。这时候，无产阶级还发展得不够壮大，就退到了由活跃分子继承了大革命的雅各宾派傳統的小資产阶级后面。起初，統治阶级害怕激进的小資产阶级分子甚于反抗政府的工人。

1831年秋天，当里昂饥饿的絲織工人起义时，这一点表現得十分明显。織工們高举黑旗，旗上写着“不是工作以生，就是战斗以死！”的沉痛口号。他們驅逐了駐軍，秩序井然地占領法國的第二大城达数日之久。饥饿者的暴动沒有一定的綱領，不是家庭工业的織工，而是处于四、五万工人同八百个厂主之間，本身是剝削工具的八千到一万个行东，被困苦所逼，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組織了起来，但是他們的組織也仅仅是一个叫做互助社（Mutuelle）的互助团体，这个社的章程禁止談論政治和宗教事务。資產階級政府很快地把起义鎮压下去以后，安心地舒了一口长气說：这是厂主同工人之間的一場簡單的冲突。而在1832年，当举行拉馬克將軍的葬礼时在巴黎爆发的共和派的暴动，使資產階級政府受到的惊吓反倒要大得多。

在这期間，里昂的織工从起义失敗中吸取了教訓。1834年2月，他們企圖在互助社的领导下通过罢工反对繼續降低他們的少得可怜的工資。由于沒有一个广泛的組織，只一个星期就失敗了，正在工人情緒激昂的时候，政府粗暴地剝夺了最后一点結社自由。梯也尔和基佐都沒有佩利埃那种露骨的兽性，但梯也尔用怯懦的

哀吟，基佐用热烈的道德說教弥补了他們的缺陷。他們想先用这种手段对付資產階級共和派，而等到一切結社权利成为泡影的时候，他們也就把像互助社这样的互助团体扼杀了。这个社在一份有二千五百人签名的抗議书中宣称，它过去自願站在政治領域之外，因此不怕政府的任何攻击，但是現在扼杀自由的結社法使它認識到自己錯了，它不受这个剥夺人类尊严的枷鎖的束縛，而要繼續集会，为保卫不可放棄的人权而不惜任何牺牲。它同資產階級共和派秘密团体中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人权社建立了紧密联系。可是在人权社中存在着种种不和現象，領袖之間有小資產階級的猜忌；各种密探也在大显身手。因此政府能够做好对它进行猛烈打击的准备。从 1831 年饥饿者起义以来，里昂就駐有重兵；当 1834 年 4 月 9 日工人群众起义时，軍队在所有重要地点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工人英勇地战斗了五天，直到被軍队空前残酷地鎮压下去为止。在巴黎，共和派在 4 月 13 日才开始发动，第二天就失敗了。在这里軍队的暴行也是数不清的；特兰斯罗朗大街上的血腥屠杀，人們至今記憶犹新。

对被捕者进行的大規模审判完全摧毁了人权社。起义的資產階級組織由于比較著名的領袖在侦查羈押期間逃往外国而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1835 年建立了家族社，后来又建立了四季社的更有才干的人物，特別是巴尔貝斯和布朗基，接替了逃亡者的工作。在这些社团中，几乎完全是无产阶级路綫占主导地位；这条路綫以巴貝夫的學說为重心。邦納罗蒂的巴貝夫密謀史使人对巴貝夫有了一个色彩鮮明的印象。新社团要求进行“社会革命和激进的革命”，“打倒貴族、金融家、銀行家、买办、壟斷资本家、大地主、证券經紀人，一句話、打倒靠人民养肥自己的剥削者”。它們宣称，建立共和国不是目的，而是把不劳动的有产者的财产轉到一无所有的

工人手里的手段。它是共产主义的最簡陋的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以資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平等为基础的。四季社无论在綱領方面还是在策略方面都同巴只夫有联系。據說为了利用出其不意的襲击夺取政权，只要有少数坚定的密謀者就行了。但是当巴尔貝斯和布朗基在 1839 年 5 月 12 日进行这种嘗試时，只取得了一些表面上的成功，而且几个小时后就完全失敗了。

三次失敗削弱了进行革命的政党的力量。从这时起，沒有发生什么反对資产阶级王朝的新起义。但是这个王朝的內部瓦解過程却更快了。不言而喻，七月王朝对于工人阶级沒有絲毫好处；1841 年頒布的、极有限地保护童工的唯一的工厂法也沒有任何实际作用。反而像出口奖励和保护关税一样对工业資产阶级好处很大。然而工业資产阶级越强大，它对于本阶级中占統治地位的部分也越不滿。掌握政权的金融貴族由于本质决定，所关心的主要是窃取現有的东西，而不是生产新財富。它忽視农业、商业、航运、交通运输，因而严重地損害了工业資产阶级的利益。它濫設投机公司，进行毫无良心的賄賂。各种欺騙和掠夺，变成了上层社会的流氓无产阶级。连小資产阶级的正直人士也起来反对它。它的卑劣的外交政策同它卑劣的对內政策是相适应的。在有产阶级內部形成了一个反对它的統治的、不断发展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成分十分复杂，共同的口号是要求进行选举改革，一致主張取消保证金金融貴族独裁統治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严格限制，但在扩大选举权的問題上还有分歧。

这个資产阶级反对派基本上可分三派：其一是王朝派，它想保存資产阶级王朝，只希望让資产阶级各阶层比較平均地参加政权；其二是資产阶级共和派，它认为共和政体是資产阶级共同統治的最可靠保证；还有一派是民主共和派，以建立雅各宾式的小資产阶

級共和国为理想。要建立共和国沒有工人的帮助是办不到的，所以平常同王朝派一样不关心工人利益的資产阶级共和党人不得不多少向无产阶级献献媚。以《国民报》为核心的这一派支援了1840年創刊并宣布毕舍的生产合作社为医治社会弊病的良药的工人報紙《工場報》。

民主共和派在議会中的发言人是賴德律·洛兰，它的机关报是《改革报》，这一派从小資产阶级的观点出发代表一般“人民”反对資产阶级，同工人比較接近。它自称为社会民主派，要求普选权和用合作代替雇佣关系的劳动組織。《改革报》的綱領是：工人有同士兵同样的权利要求国家报答他的恩情，国家應該保证年富力强的健康工人有工作做，扶助并保护年老和体弱的工人。劳动組織和劳动权是这一派的社会政策的目标，路易·勃朗的著作尤其代表了这一派的主張。他把自由競爭叫做毁灭制度，因为它先使无产者破产，后来也使資本家破产。自由競爭通过工厂主毁灭手工业者，通过抵制毁灭农民；它終于导致大資本的壟斷，使在自由競爭下好像應該便宜的商品變得昂貴。国家的任务是建立社会工場，把同行业的工人組織在大合作社之中，用公共財富补助合作社。这种團結一致、互相結合的合作社将逐漸吸收私人工业，从而消除极为有害的竞争。

这些主張的小資产阶级性质是显而易見的。实行起来同把劳动時間当作直接的货币尺度单位的情况相似。在資产阶级社会中，劳动权只有在这个社会所能允許的范围内实现。失业是生产过剩的一种后果，是同已經发展起来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分开的。如果国家让失业的无产者繼續正常生产，剩余产品就会无限增加，并以破产而告終。要实现劳动权就需要有生产工具的公有制。只要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存在一天，劳动权就只有在那种劳动院里才能

實現(英國工人害怕勞動院比害怕苦役所和餓死還要厲害)。同樣，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勞動不能有別的組織形式，而只能以雇佣勞動形式出現，它是資本的前提，只有隨着資本，也就是隨着資產階級社會的消滅才能消滅。自由競爭也完全一樣，在進行交換的商品生產者社會中，自由競爭是社會生產的唯一可能的組織。

但是很明顯，路易·勃朗的主張對法國工人發生了深刻的影响。戰爭危機和由1840年的東方危機引起的政治動盪，在有產階級中掀起了丑惡的投機熱潮，給勞動階級帶來了飢餓和貧困。失業的群眾充斥巴黎街頭，以致必須由軍隊來維持交通。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勞動權和勞動組織的呼聲是對於資本主義的不合理結果的一種強烈抗議。同時，不顧結社的禁令，在裁縫、細木工、壁紙印刷工人，後來也在粗木工中，爆發了大罷工，沒有罷工的行業，如排字工人，用自己節省下來的錢有效地支援受迫害的伙伴，這就證明工人階級已經認識到團結的必要。現代無產階級的特殊的階級利益日益具體地形成，使工人離開唯心主義的平均共產主義範圍越來越遠。他們從經驗得知，分散的起義不能奪得政權。無產階級日益廣泛地提出普選權的要求。

但是階級鬥爭同社會主義還沒有由此結合起來。傅立葉主義者也要求勞動權，却極力反對改革報派^①。維克多·孔西得朗在他的機關報《和平民主日報》^②上宣稱，錯誤僅僅在於政府沒有思想。要是給政府講一講社會學，不經過革命也能實現改革。《改革報》反駁他說，毋寧說錯誤在於支持政府的不是人民，而不過是壟

① 改革報派——此處是指從1843年到1850年在巴黎出版的《改革報》(«La Réforme»)的擁護者，這個報是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派的機關報。——原編者

② 《和平民主日報》——指傅立葉主義者於1843年到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日報«La Démocratie pacifique»。——原編者

斷資本和特权階級；對他們談不到教導，只能粉碎；我們不能要求他們自杀來取得我們的勝利。改革報派當然也對鏟除資產階級社會禍根的一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深惡痛絕，否則他們也就不成其為小資產階級共和派了。賴德律·洛蘭向他的選民聲明，我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主義者。從這種對抗中產生了第一個工人共產主義，並成為一個群眾運動，它的發言人是卡貝。

卡貝既是雅各賓派，也是空想社會主義者。由於他是資產階級共和派的領袖而受到法律迫害，不得不逃往英國。他在英國不是通過實踐，而是通過文獻學習，特別是在托馬斯·莫爾和歐文的影響下建立了共產主義觀點。他的共產主義完全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上的。卡貝根據平等和博愛的原則得出財富必須公有的結論，只有財富公有才能保證所有人享受幸福。同所有空想社會主義者一樣，他想通過和平宣傳實現自己的理想；不同的只是，他要求以民主統治作為必要的過渡時期。他對工人說：首先應該做一個民主主義者和改革者，在要求改革和選舉權的請願書上簽名。毫無疑問，卡貝是一個最膚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他的《伊加利亞旅行記》帶有明顯的小資產階級色調；同聖西門或傅立葉的空想比較起來，這本書就顯得貧乏而怯懦了。然而卡貝這個空想社會主義者是最膚淺的，却也是最有聲望的，因為他終究給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留下了一定的余地。

总的說來，卡貝的功績在於最忠實地表达了法國無產階級在40年代得到發展的階級意識。所以他的著作在工人中流傳極廣，他本人也遭到資產階級世界的普遍憎恨。傅立葉主義者同改革報派一樣嫌惡他；但是他却擊中了他們兩者的要害。在《國民報》中從前與他志同道合的同事誣蔑他，說他是神聖同盟的僕從。盛班尼有一個叫伊斯克羅的神父叫囂用石塊砸死共產主義者。教皇和法

國主教詛咒共產主義，但是卡貝以自己的方式承認基督教。他說：“伊加利亞的共產主義就是耶穌基督所傳的有其原始的純洁性的基督教，因為基督教講的就是博愛、平等、自由、合作和財富公有的原理。”在這一點上，卡貝同解放鬥爭初期喜歡回憶原始基督教的現代無產階級的感受是完全一致的。德薩米打算建立以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為基礎的共產主義，他比卡貝堅決徹底得多，但是對於工人的影響却比卡貝小得多。

一切敵對行為都沒有使卡貝發生動搖，相反地，他由於這些敵對行為而發展到無限自負倒是他的損失。他熱中於使反對他的人們相信，他的空想是可能實現的，却忽略了自己提出的實現這種理想的不可缺少的前提。他企圖在美洲小規模地實現自己的計劃。由於有甘願犧牲的信徒支持，他能够着手進行，可是第一個遠征隊剛一動身，二月革命就爆發了。二月革命以巨大的威勢向法國無產階級指出，用發育不全的共產主義這種兒童玩具來反抗資本主義的强大勢力是一種毫無希望的努力，這是不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伊加利亞移民區也像傅立葉主義者和歐文主義者的類似實驗一樣徹底失敗了，當然，比較起來，伊加利亞移民區的階級意識要強烈得多。卡貝沒有能夠按自己的意志控制住這些移民區。他由於計劃失敗而意志沮喪，1856年死於聖路易。

與卡貝派和改革報派的運動同時，無產階級的秘密團體繼續存在，但是在這些團體中，職業密謀家的地位越來越不重要；在由於形勢而只吸收了一小部分工人的秘密社團中，也越來越需要把無產階級本身組織起來，並使它了解自己的階級利益。

在40年代悶熱的空气中滋生的大量社會主義文獻並沒成為工人階級覺悟的動力，反倒成了一種障礙。這些文獻的根源是對金融貴族的統治的不滿，這是其他一切階級——從封建貴族到產業

无产阶级——所共有的一种情绪。这种不满情绪越加强，共同反对派的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就越被冲淡。一种不明确的社会主义鼓舞有产阶级进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它变得五花八门光怪陆离，阻碍在最进步的工人中已经开始觉醒的阶级意识的有力发展。它几乎在当时所有作家——从贝朗热到拉马丁——中都得到一定强度的反应；它的代表者中最有才华的是那一世纪的最伟大的女作家乔治·桑，而最受欢迎的则是欧仁·苏，欧仁·苏在资产阶级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伤感的悲惨小说吸引了所有的庸俗市民。拉梅耐崛起于天主教世界，他想叫教会领导社会运动，后来，在热情的《信徒之言》和其他著作中宣布人民教士的身份，受到罗马的谴责。虽然如他在《国民报》上所说，他的社会纲领只限于比较公平地分配工资的微末要求，但是他能说善辩，又是个信仰坚定的教徒，对群众也有一定影响。他诽谤说，一切社会主义体系都想把各族人民判处一种空前未有的奴役，它们将把人贬为一种简单的机器，一种工具，使普通人的处境不如黑人，甚至不如牲口。

法国无产阶级最初只能用个别的理论家同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强大影响对抗，这些理论家来自法国无产阶级本身，受到正确的本能的指引，打算用德国哲学的辩证的武器解决现代文明的矛盾。他们是两个排字工人：勒鲁和蒲鲁东。除去圣西门的《新基督教》以外，莱辛的《人类教育》也成了圣西门主义者的经典，勒鲁起初也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不久他就脱离了这个日益腐朽的宗派，深入研究德国哲学，他对德国哲学的理解，比对法国的官方学术要清楚明确得多。只是他认为德国哲学的完成者不是黑格尔或费尔巴哈，而是谢林，他没有很好地掌握德国的辩证法，不能利用它来作为打开历史秘密的钥匙。勒鲁把人类的发展理解为一种经常的进步，理解为向平等的不断接近，一种从家庭、国家、财产的

束縛中日益擴大的解放。但是他沒有研究這些組織從過去到現在的歷史發展過程，而只想消滅它們的壞的一面，促進其好的一面。于是他又掉到空想的泥坑里。

蒲魯東的題為《什麼是財產》的著作影響要深刻得多。這個問題以及他的答案都不是什麼新鮮東西，早在六十年前，布利索就宣稱 財產是贓物。儘管蒲魯東的著作瑕瑜互見，但它起了法國無產階級第一個科學宣言的作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利用私有制運動所產生的財富肯定私有制，而蒲魯東却利用私有制運動所產生的貧困否定了私有制。用官方經濟學自己的矛擊它自己的盾是一個大膽的嘗試，蒲魯東以傲慢的挑戰態度進行了這一嘗試。但是他也粗暴地反對前此的一切社會主義。他同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的是，他不從幻想中消滅財產，而是在財產的內部矛盾的嚴酷現實中論證財產的罪惡；他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不同的是，他不是攻擊財產的個別方面，不是攻擊工廠制度、貨幣、自由競爭，而是攻擊財產本身，而且只攻擊財產。

蒲魯東依靠康德，正如勒魯之依靠謝林。但是他同勒魯一樣，沒有能夠深入到德國哲學的核心。他也認識歷史發展的自然聯繫，同樣希望資產階級社會沒有使它瓦解和革命化的因素。他同反對私有財產一樣反對共產主義，他要求用他所謂的產業代替私有財產和共產主義。他據以區分好壞的正義的理想，他的公平交換的理想，他的無政府、無統治和個人獨立的理想，都取自資產階級社會的思想寶庫，最後仍然回到資產階級社會的老巢。在蒲魯東的第一部著作中已經露頭的缺點和曖昧之處可能加強了它對法國無產階級的影響，因為法國無產階級還持有一些小資產階級的觀點，而且正處在一個為大資本家利益而實行的嚴格的集權統治下喘不過氣來。但是當他硬要在这條道路上繼續前進時，這些

缺点和曖昧之处就必然要使他自己退到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中去。

德国哲学使阶级斗争同社会主义相协调，不是通过蒲鲁东本人而是通过同他的斗争进行的，德国人完成了这一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第一 部

現代科学共产主义

第一章

德国状况。封建行会殘余

1830年，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刚刚从政治的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德国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中，从文学和哲学的高空赢得了充分的荣誉，却从来没有能够用铁拳利刃在地面上进行战斗，这是这个阶级的光荣，也是它的不幸。在德国土地上遍布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数不清的巴士底狱，却没有扫荡这一切的风暴使德国资产阶级能够展翅高飞；只有法国征服者的宝剑才给它开辟了道路。

因此它的社会解放的开端是戕害它的民族生存的異族統治带来的。它必须反对自己的解放者，并且只有为自己的压迫者效力才能做到这一点；它帮助欧洲反动派取得了胜利，却没有分享胜利果实。德意志仍然分裂成三十几个小国，最小的和最大的同样是独立国。德意志邦联是对德国统一的一个諷刺；为举世所不齿的、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邦联議会只完成了充当王侯反对人民的共同獄吏的任务。

严重的失望情緒在德国资产阶级中还引起了一个英勇反抗的尝试。资产阶级中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刚刚凯旋^① 的精力充沛

^① 指德国人民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譯者

的青年在德国高等学校里成立了大学生协会，树起了一面反抗的旗帜。但是这个先锋队团结的人很少，而且它自己也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在大学生协会中，对皇帝和帝国的中世纪的幻想同使复仇者的匕首指向没有信用的王侯及其僕从的、雅各宾党人的愤慨交織在一起。这两者共同体现在大学生协会会员桑特的身上，1819年，他刺死了俄国间谍科采布。这一行动的动机是高尚的，但是却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相反地，早就待机而动的封建专制反动派却对这事特别欢迎。卡尔斯巴德决议发动了对所谓煽动者进行的卑鄙的迫害，摧毁了全德一切正在萌芽的政治生活。

反动派在政治上占了优势，窒息了德国资产阶级，其原因则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未能充分发展。首先给德国清除封建主义的最大垃圾堆的是法国的统治。在莱茵河左岸，封建主义已被完全摧毁。那里贵族被剥夺了特权，封建的和教会的地产转移到农民手中，农民像在法国一样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但是在德国的其他地区，封建垃圾还残存着很大一部分，在北部和东部最为严重。

一 易北河以东的容克阶级

从16世纪起，在霍尔斯坦、梅克伦堡，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诸省，从宗教改革时期的经济变革中形成了骑士劳役租制经济。骑士由军人一变而为商品生产者，但是他依靠封建的权利名义得到了新生。他借助于卖身求荣的法学家从中世纪的领主制经济中找到借口，一方面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把他们的公共财产——森林、渠道和牧场据为已有，以便取得足够的土地，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另一方面限制幸免的农民的所有权，剥夺他们的人

身自由，迫使他們必須毫无抵抗地滿足騎士對他們及其家屬的勞動力的不斷增長的要求。專制的君主國家並不反對這種有幾百年傳統的掠奪行為，它總是（尤其是在普魯士）支持領主反對農民，只有為達到軍事和稅收的政治目的時，它才為了農民同容克階級鬥爭。它的所謂保護農民只限於在一定程度上保存農民階級，並限制對農民的壓榨，使得專制君主也能同封建領主一樣剝削和壓迫農民。

所謂的農民解放並沒有消滅封建狀況。法國農民放火燒毀他們壓迫者的宅邸一事，使得容克地主的頭腦充分清醒過來；在那著名的1789年的八月之夜扫除封建特權時，是法國國民議會的貴族代表領先的。德國農民過於貧困，不能使用同樣徹底的方法；只是有些地方，比如東普魯士和西里西亞農民有一些活動。貴族中比較明智的分子贊成農民解放，却決不是為了農民的利益，而是為了容克階級的利益。他們認識到，徭役農民勞動得不好，也不可靠，他們想通過把徭役農民變成自由却又一無所有的無產者的辦法，以便榨取更多的勞動。第三等級的貴族領袖米拉波不贊成法國國民議會取消封建剝削方法的決議，而普魯士政治家中最開明的人物雪恩，則想恢復農民的人身自由，但不恢復農民對自己土地的自由所有權。容克集團由於階級私欲根深蒂固，連這一點道理也不懂。只有在受到法國軍隊的農家子弟的沉重打擊以後，他們才懂得了一點經濟學的邏輯。

在法國的專制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是德國王侯和容克的一個可敬的老習慣。他們對於拿破崙也盡了阿諛奉承的能事。不過同時他們又認為他出身微賤，又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未竟事業，因而憎恨他，德國個別封建主義深重的地區，這種憎恨表現得最明顯。只是由於農奴不能打敗自由的農民，普魯士才准許農民解放，

并只限于使农民能够进行现代战争，而在其他方面则为封建主义保留一切能够保留的东西。人们给农民以人身自由，并用种种诺言诱惑他们，等到把敌人从德国赶出去后，就调整他们的占有关系。结果是农民阶级所受的欺骗比资产阶级还要厉害。

对于大部分小农，也就是自己没有大车和牲口的农民来说，农民解放是出虎口进狼窝。他们既不能巩固自己的所有权，也不能摆脱封建的租税、勤务、徭役。相反地，他们的人身自由可以满足容克的任何欲望。18世纪的王朝为了限制地主没收农民的土地而作出的若干规定也都取消了。容克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没有车马的农民。他可以“为了补偿似乎存在的占有权”没收农民的耕地，他收买这些土地，或者干脆解除份地租约，或者利用农民的无知，鼓动他们放弃“暂时的”权利。总之，他用极便宜的代价换取农民土地；如果他认为还太多的话，就干脆用暴力或欺骗把农民降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阶级，无产者的自由就是，农民对容克没有任何权利，而容克对农民没有任何义务。1810年的婢僕法甚至在法律上规定无产阶级的这一部分人没有权利。因此有大批农民参加了格罗斯贝伦、邓纳维茨、莱比锡和拿破仑战争的无数次会战。1848年，在容克地主俾斯麦的克尼福夫庄园干重活的雇工，只拿到一点如他自己所说的可怜的实物和微薄的工资（夏天男人是四个格罗申^①，女人是三个格罗申，冬天每人少拿一个格罗申），每年男人却要做一百五十六天，女人要做二十六天无偿劳动；而这竟被俾斯麦公开夸耀说成是理想的状况。

容克地主创造了一个经营大规模农业不可缺少的、对于最彻底的剥削也不反抗的无产阶级以后，就用另一种方式掠夺少数占

① 当时德国通用的一种银币，一个格罗申约合十二分尼（一马克等于一百分尼）。——译者

有产业的农民。这些农民被分成占有权不稳固的——其实是由于容克地主的侵害，才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变得不稳固的——和占有权还稳固的两个部分。人们给占有权不稳固的、有产业的农民都“登了记”；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占有权不稳固的情况把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耕地交给容克地主，以保证他们对自己的土地的自由占有权和解除一切封建负担。还有一大部分这类农民得不到阴险的调整法规^①的保护，与他们的没有产业的伙伴同命运，由容克地主任意摆布。至于那些占有权稳固的、占有产业的农民则被“分离”出来；他们的封建负担可以用货币租和谷物租来抵偿，付出二十五倍的地租就可以完全贖免。

这样一来，从1815年到1848年，在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普鲁士和波森诸省，通过调整只产生了70,582个世袭的土地占有者，其中有两万多个是在波森省，因为政府对于那里反对政府的波兰贵族限制得比较严格。同时有289,652个有产业的农民解除了封建负担。在调整和分离的过程中，除了“改革”本身对农民十分不利以外，到处都袒护容克地主的国家官厅还百般损害农民。整个的解放使农民丧失了1,533,050摩尔根^②的土地，18,544,768塔勒的现金，此外每年还要缴付1,599,992塔勒和260,069雪菲尔^③的谷物。

普鲁士的农民解放是对法国农民从革命中取得的成就的一个绝大讽刺。在莱茵河左岸，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已被推翻，滑铁卢

① 1811年9月14日，由普鲁士首相哈登堡颁布的一项法令，全名是“关于调整地主与农民之间关系的敕令”。——译者

② 从前德国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各地不同，如在萨克森1摩尔根等于2,767平方米。——译者

③ 从前德国的一种容积单位，各地不同，如在萨克森1雪菲尔等于104公升。——译者

战役后虽又一度还魂，也只能說明，它們的末日已經最后确定了。而在易北河东岸，对群众的剥削越便于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用資本主义方式經營國有土地和容克庄园，它們的发展就越順利。这时在法律的保护下，大农业有了可以利用其最后一滴血汗的无产阶级。农民为了摆脱四百年来的压榨，付出了許多金錢和土地，而現在这些东西却被大量用来建立农村的工业：首先是兴建酿酒厂，从此普魯士燒酒开始行銷全德，然后行銷世界各个角落。普魯士酒精工业在毒化群众方面的为害，仅次于英國和印度鴉片工业在毒化中國人民上所取得的效果。但是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的造酒工业并不像他們的军队（更不用說他們的貴族特权了）那样，使他們的統治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普魯士容克一面用种种最新工业（如甜蘿卜糖工业）为自己的权力建造新的堡垒，一面死抱住骯髒的封建特权，如領地警察权、領主裁判权、教会保护权、狩猎权等不放。

这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世界，它的外貌大概就像萊茵区一位詩人所形容的那样：一个小孩，头大如南瓜，滿嘴黃鬍子，一头花白发，双手长又粗，腸短胃口大^①。但是德国資产阶级要不制服几百年来慣于統治的、頑固而执拗的普魯士容克阶级，就不可能取得政权，尤其是这些容克在普魯士军队和官僚机构中磨炼了随时可用的武器以后，資产阶级要做到这一点就更不可能了。

二 城市手工业

农村人口，在普魯士国家占四分之三以上，在德意志邦联中有三分之二强。在城市里，行会手工业虽然已經衰落，却还保持优势地位。1830年的情况同1800年沒有什么不同。行会手工业在这

三十年的前半期所受連年战禍的創傷，在后半期勉强恢复了。除此而外，行会手工业沒有前进一步。它用古老的方式为当地的消費生产，简单、狭隘、偏私，厌恶一切技术进步，它在小城市的狭窄范围内苟延残喘。分散的手工业工場規模很小；行东同帮工的数目差不多相等。每个帮工都希望成为行东；只要一有自由經營的机会馬上就定居下来；社会对立的緊張状态沒有波及到手工业。

但是在帮工中并不像在行东中那样死气沉沉。旧的帮工組織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就解体了，君主的暴力为上升的資本主义的利益而摧毁了殘存的这种組織。在这方面普魯士王国作了先鋒。由于它的推动，1731年頒布了鎮压从前斗志昂揚、頑強不屈的帮工們最后反抗的帝国法令。1733年的普魯士手工业法規規定，对于触犯帝国律条的人施以最严厉的惩罚——监禁、苦役，累犯者处死刑。不消說，在普魯士的国法中也有一項严格的禁止結社令。然而正是这种殘酷的立法使帮工們保持了一种不很明显的阶级意識，一种經常被行会制度和强迫流动激起的不安定、不滿意的情緒。德国的手工业工人在瑞士、英國和法国看到了进步的情况，那里与腐朽的家乡形成鮮明的对比；有許多人留在外国不回來了，有的人回故乡也带来了比較自由的观点。

德国手工业的殘破状况同它的制度遭到破坏的情形是相适应的。早在 18 世紀，开明专制的資本主义政策就伤損、突破和动摇了行会制度；接着拿破侖时代的風暴又从它的头上呼嘯而过，但是只有在这个風暴扫蕩了封建主义的地方，如萊茵普魯士、萊茵巴伐利亚、萊茵黑森，才彻底清除了行会。整个南德意志，行会还占統治地位，在工业已經发展到一个較高阶段的薩克森王国也是这样。

① 这是海涅的詩歌《妖魔》中的几句。——譯者

在旧普魯士諸省，虽然也規定有經營自由，但是它並沒有促进普魯士手工业新的繁荣。四百年来，易北河以东的城市經常受到王侯和容克集团的无情搜刮，以致到处沒有一点活潑的市民精神。

1808 年的城市法規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把城市从官僚和軍人的严格监督下解放出来，把管理自己的財政、濟貧和教育的机构的权力（有时也包括警察权）还給了城市。但是，和耶拿战役以后的所有普魯士改革法案一样，城市法規也是被极端的困难硬挤出來的，所以在滑铁卢战役后，也受到了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的修正。人們尽量剥夺穷人的市民权，把城市机关置于国家官僚机构的恶意监督之下。同时，市民同沒有市民权而只受到保护的居民之間的不幸的区分，造成了一种虽不是法律上的却是事实上的后果，那就是有教养阶层的分子只有在为了买房产而不得不做市民时才做市民。城市市民群众是由在最偏狭固陋状况中成长起来的手工业行东和房主組成的。他們习惯于行会的剥削手段，而把新的城市自由看做是对他們所丧失的經營自由的值得欢迎的补偿。他們心安理得地濫用城市土地，砍伐树林，得寸进尺地扩展自己的花园，直到城墙和城壕消失掉为止。他們甚至瓜分市政府的房子。誰在打靶場上表現出枪法最准，誰就是这个小市民集团的英雄。

在德意志南部，虽然萊茵河右岸的手工业还受着行会的束縛，但是那里的小市民显得比較活跃。拿破侖把美因河彼岸上百个从前直屬帝国的小邦組成一些中等国家，它們的君主害怕受懲，立即灭亡，就尽可能对这位法国保护者尽忠，力求把自己仓促砌成的、还很不稳定的宝座比較牢固地建立在立宪制的基础之上。但是这种立宪制也是不稳固的，除了空談以外沒有什么实际行动。这是个左右为难的窘境。南德意志的君主想用他們的邦議会同奧地利

和普魯士在邦聯議會中的優勢對抗，可是一旦他們的邦議會不那麼服貼，他們又一定可以依靠邦聯議會。南德的立憲政體不能使封建成的、軍國主義的德國發生根本變化，其實它也從來沒有存這種奢望。

在巴登、普法爾茨和維爾騰堡，小市民的政治理想所以占主导地位是由他們的經濟狀況決定的。有時他們也許希望成立共和國，一個農民和市民階級的小小共和國，一個幽靜的世外桃源，沒有歷史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巨大矛盾，富翁不多貧民也很少，到處是小康和中等人家。他們不要君主，不要平民，不要貴族，不要常備軍，可能的話也不要賦稅；他們也不想積極干預歷史生活，沒有外交，沒有大工業，沒有世界貿易。假如德國真的分成許多這樣的幽靜閉塞的共和國，那麼它就會空前徹底地離開大國的行列。

第二章

德国状况。资本主义的开端

在德意志，除了占优势的手工业以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种种形式发展起来。

虽然国内普遍贫困化，但是在古老的商业城市和沿海城市还或多或少地残存着相当数量的资本。到了18世纪，专制政权为了满足宫廷和军队对金钱永不满足的需要，不断增加税收和国债，推行垄断经济、特权经济和保护经济的政策，这一切强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工业家的资本有一部分就是直接从国库中流出来的；米拉波利用萨克森的一亿八千万塔勒的国债，繁荣了这个邦的工场手工业。霍亨索伦王朝的重商政策是人所共知的。普鲁士用赋税——消费税和关税榨取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膏血，把大部分收入交给了军队和容克地主，同时也有一个不小的数目装进了当时兴高采烈地拥护“国家资助”原则的资本家的腰包。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给年轻的资本不断提供新的、把精神和力气化为增殖的剩余价值的群众。严格取消手工业工人星期一的休假，直截了当地缩短教会的节日，都日益加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较小的专制君主把本国人民大批卖给外国进行战争，从而得到无数的金钱。在德意志，离开了鲜血、贫困和耻辱就不可能完成资本的

原始积累。

德国的资本主义仍然远远落后于法国或者英国的资本主义。它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时，利用低工资和卑鄙的经营手段来压倒西方国家的优势。它的广大的基础是家庭手工业，以手工为主的工场手工业以及机器工业比家庭手工业要少得多。

家庭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古老、最落后的形式。它在初期往往给贫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带来一些好处；使它的牺牲者进入舒服的、没有知觉的精神睡眠状态，然后使他们陷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最大的不愉快。家庭手工业一旦被工场手工业或机器工业所压倒，它就只有用极度增加劳动强度的办法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家内劳动者的分散性削弱了他们对资本的抵抗力，由于不断压低工资，他们只好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力所能支的最大限度。妇女和儿童也受到同样的压榨，结果是一家老小很快丧失了健康，过早地死亡。其原因不仅是劳累过度，也由于住所和作坊在一起，在斗室中光线、空气、通风都不足，往往也由于所做的劳动对健康有害；此外还有劳动的不正常、实物工资和高利贷，寄生的中间商人制度以及许多其他的弊端。家内劳动者是所有无产者中最没有希望的阶层，但是他们却最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他们夸耀自己表面上的独立性，他们那轻如鹅毛的产业像一个沉重的铅块，把他们陷入深渊。这种生产方式越是牢固地把农民锁在自己的土地上，把手工业者锁在他们的工具上，家内劳动者就越发要毫无抵抗力地被这种生产方式扔进世界市场的毁灭性机构中。

德国的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由两个方面产生的。一方面，资本渗进了行会的裂缝，把这个腐朽的建筑物爆破，于是个别的手工业者成了家庭手工业的资本家，大部分则成了家庭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国家政权在这方面也乐于加以助力。普鲁士国家法规定

整个行会都要由君主控制；只有国王可以建立新行会，他可以随意使现有的行会开设或关闭。另一方面，资本主要涌向可以不受行会的永远有限制性束缚的农村，涌向已经被容克地主压榨得没有抵抗力的隶农，涌向土地贫瘠而又十分分散的地区的小农，这些小农土地很少，单靠种地不能维持生活，很久以来就从事纺纱、织布、雕刻多少有点艺术性的家具等副业。

所以說，资本主义使家庭手工业的怨声充斥德国欧偷山、里曾山、厄尔士山、費希特尔山、图林格林山、呂恩山、陶努斯山、黑林山和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等处高地和坡地，是符合上述特点的。但是资本主义也不放过平原給它提供的牺牲品，如莱茵河下游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宽广地带也是家庭手工业的基地。

一 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家庭手工业

在德意志东部，西里西亚省和萨克森王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德意志还在最衰弱的时代就把麻织业保存下来，作为几乎唯一的出口工业，从17世纪中叶起，西里西亚就是麻织业的主要基地。当时由于英国和荷兰商人的大量购买，西里西亚的麻织业得到巨大发展；18世纪初，西里西亚有二百八十七个乡镇生产商品麻布。农村家庭工业差不多全是在土地比较贫瘠的村庄中发展起来的，它是建立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

西里西亚在某些方面是易北河东的封建主义的典型地区。1797年，雪恩在这里旅行时，曾对“可怕的”状况表示惊讶。他說，这里的气氛适于世袭关系的存在，在城外只有主人和奴隶；所以没有接二连三地爆发起义，那只能說：一方面地主同佃农之間存在着宗法关系的残余，以致佃农不自觉地比較容易地忍受了如果没有

这种关系就不能忍受的痛苦。另一方面是西里西亚人民由于农奴制、隶属关系、世代的臣民关系，由于纺织业的影响，精神肉体都发育不良。事实上，西里西亚麻纺织业的经营产生于领主统治权。在旧普鲁士的其他省份，手工业被赶出、或者等于被赶出农村的时候，在西里西亚的乡村从奥地利帝国时代以来就有许多手工业工人，而经营权则只有领主才有。弗里德里希国王占领西里西亚以后，曾禁止领主提高营业税和手工业工人税，但是这一次也同过去几次一样，开明专制君主的愿望被封建容克的一致反抗粉碎了。

所有织工，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都得向领主缴纳织工捐。但是自由的织工少得几乎找不着。绝大部分织工都是领主的臣民，除去缴纳织工捐而外，还要承担封建赋税和勤务。领主在把作为商品生产的织布的权利卖给臣民的时候，并不考虑他有设法销售商品的义务。相反地，他把手下纺麻工人作为实物税大批缴来的纱，通过商人卖给织工，向他缴纳捐税的纺织工人就成了他的剩余纱的可靠的买主。万一织工生产的麻布过多，卖不出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同领主无关。他们只能按市场上随便定出的价格，或者按麻布商人认为合适的价格出售。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各不相让地同时剥削织工，可以充分说明西里西亚织工自古以来的人所共知的穷困。

尽管（或者正因为）织工生活困苦，西里西亚麻纺织业还是一直繁荣到18世纪中叶，然后才在同英国和印度的越来越厉害的竞争中被挤垮。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纺纱工人的境况肯定也不好，但是同要白白缴纳计数的或不计数的大量麻纱的封建束缚相比，即使最低微的工资，对于工作的勤快和熟练，对于纺纱过程的技术进步也是一个较好的刺激。在西里西亚甚至还在用手纺锤，而没有纺车。西里西亚的麻纱得到了应有的恶劣评价。此外，领主们还要

进一步影响織工的竞争能力。根据 1773 年英国国会报告，苏格兰的織工一天挣十便士，爱尔兰的織工挣八便士，西里西亚的織工只挣二至六便士。同时，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織工不用向領主繳納織工捐，或者承担封建賦稅和勤务。在景气的时期，他們的工資增加，能够剩下一些錢，在不景气的时期，他們就可以到美洲去。但是西里西亚的織工要离开他的領主的区域却必須付出贖买金，而这种贖买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他的資財所能負担的。这样一来，正如雪恩所說，紡織业对于西里西亚农村居民的精神和肉体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随着工人体格的衰弱，劳动效率也就下降，所以尽管使用种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西里西亚的麻織业仍然越来越抵挡不住英国的竞争。

弗里德里希国王的重商政策的实质决定了不能消除这些弊端。不管它建立多少規章制度，不管怎样通过檢查、剔除次品，以及用苦役、脚镣、头枷和监狱威胁織工等等办法保证商品的质量，只要紡織工人对領主的隶属关系还存在，只要弊病的根源不消除，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这个前提下，弗里德里希不断設法招新織工到自己国家来的做法，也只能增加織工的困苦。他一直忙于招攬工人，甚至发展到往力量較弱的邻国去强夺人口。他发展西里西亚麻織业的措施也是他落后的經濟政策中的最荒誕的部分。

法国革命的遥远的回声震动了西里西亚織工的迟钝的感官。1792 年在那里发生了暴动。他們左肩上披一条口袋，下山来到城里的市場上，用暴力强迫商人廉价出售麻紗，高价收买麻布，这个运动受到农民暴动和布勒斯劳的手工业帮工的暴动的支持。当时普魯士军队正啼笑皆非地开去反对革命的法国，西里西亚的军队被抽調一空，所以惊惶失措的政府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实行野蛮鎮压好，还是采取无济于事的緩和手段好。商人們用比之救濟和酷

刑更为可靠的办法制止了暴动，他們离开了市場，直到織工被饥饿所迫而屈服为止。

西里西亚的家庭手工业者受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样的剝削，所以同农民自由和經營自由同样受到愚弄，是适合普魯士社会改革的难能可貴的一致性的。在西里西亚許多地方严格制止，对于从 1810 年圣馬丁节起农民應該享受的自由产生誤解，王国内閣下了一道命令教导可爱的臣民說，世襲的隶属关系消除了，但是徭役和賦役，货币租和实物租、地租和喂狗的燕麦，鸡捐、鵝捐、蛋捐、扫帚捐、守夜捐、銀捐以及其他捐稅决不隨同取消。同时政府也描繪了一下新的經營自由。哈登堡在容克的压力下宣称，这种自由决不取消織工捐，相反地，織工捐要在法律上肯定下来。而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这种捐稅虽然实际上沒有廢除，但是至少当时的政策是根本不支持这种捐稅的。这时，西里西亚麻織业工人旧日的貧困几乎毫未減輕，英国的竞争又以另一种更为猛烈的打击来威胁他們：这不仅是自由的工人对不自由的工人的斗争，也是机器和手的斗争。西里西亚織工成为——用一位官方通訊員的話說——“几乎是全欧洲最貧困的人民”的时候来到了。

在薩克森王国，资本主义从宗教改革时代开始发展。它的最古老的工場是矿山；“山里的宝藏”很早就成了开采它的矿工詛咒的对象；从 15 世紀起就发生了多次工資斗争，結果都被暴力鎮压下去了，此外工人們为了反对实物工資制也采取了許多措施。随着美洲的金矿和銀矿的发现，薩克森貴金属矿的开采衰落了，但是旧的貿易和运输关系，国家的有利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地下矿藏——鉛、錫、煤使这里不会永远处于經濟衰落的境地。萊比錫博覽会首先是法国的，然后是英国的手工工場商品在东欧的大市場，紡織工业的各个部門达到了高度的繁荣。薩克森的布，勞錫茨的

麻布，福格特兰特的綢洋布，开姆尼茨的棉織品，厄尔士山区的花边行銷到遙远的外国。大陆封锁使薩克森工业得到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开姆尼茨开始发展成为薩克森的曼彻斯特；一个印花布厂雇用一千二百名工人，一个印染厂和棉紡厂雇用三千多工人。从18世紀末叶起，已經开始采用小棉紡机，但是一直到19世紀中叶还有小的机織机。家庭手工业占优势地位，它那低微的工資受到所有其他地方人的反对。馬鈴薯和菊苣湯專門养活厄尔士山区的家庭劳动者；早在1780年，就有一个福格特兰特的医生发表了一篇論述特殊疾病的著作，說明这些病是随着家庭手工业的发展而傳布和增加的。

18世紀，薩克森在經濟上，从而在精神上，是德国最进步的地区。雪恩有一次訪問薩克森时曾写道：薩克森开辟了德国文化的道路，薩克森人民是德意志民族中最有教养、最有学識的一个部分。薩克森有最好的学校，我們的古典文学从这里发展起来。它的政治状况也不一样。在这种經濟基础上，当然不可能建立普魯士式的軍事国家；德累斯頓人对于当时的經濟問題的看法比柏林人进步得多；薩克森的女选帝侯和女君瑪丽亚·安东尼亚企图使老弗里茨放棄他的过时的重商政策，但是沒有成功。萊比錫差不多是一个自由的帝国城市，一般說来，薩克森的城市都享有一定的独立性。尽管这种独立性起初有利于城市貴族集团，但是在平民群众中滋长的不滿情緒里，潛藏着軍棍統治下的普魯士城市完全沒有的一种推動因素。

但是农村的封建主义和城市的行会都沒有消灭。議会制君主国的腐朽形式在19世紀还繼續存在。薩克森是拿破侖的自願的盟友，既不像普魯士那样是拿破侖的敌人，也不像萊茵联盟的其他国家那样是他的創造物；薩克森保存了它的社会結構，沒有受到

法国侵略的有益的推动，而当它在 1813 年的战役中弄得筋疲力尽之后，因为对它的“伟大的同盟者”效忠而受到惩罚，在維也納會議上被分裂的时候，旧的体制也还能繼續存在。

二 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的大工业

德国东部的工业中心还或多或少地处在封建泥沼里。德国西部的工业中心却几乎已达到现代資产阶级社会的水平。萊茵普魯士拥有比西里西亚、甚至薩克森更为发达、种类更繁多的工业。1795 年以来，它制定了法国革命的資产阶级解放的立法，在这方面它也超过了西里西亚和薩克森，具有这个优越性的，在全德只有它同萊茵巴伐利亚和萊茵黑森。这里自古就有德国最好的水道，距海又近，矿藏又丰富，这都促进了自然产生的古老工业的发展，在法国統治下，这些工业都大大繁荣起来。在亚琛、科倫、杜塞尔多夫这三个行政区有各种棉紡、毛紡和絲紡工业，还有附属于这些工业的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也有炼铁业和机器制造业；此外还有采矿业、武器制造和其他的金属工业——可以說，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門都有了。它們給德国空前稠密的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条件。

萊茵省同馬尔克铁矿和煤矿区紧相毗連，从那里部分地滿足了对原料的需要，并和它保持着工业的联系。德国对世界各地的非常广泛的进出口貿易，和世界市場的一切大中心的直接頻繁來往，同这里的工业密切相关。商业和工业的繁荣促进了資本的积累。在城市中，旧的等級解体了，人們重新組成越来越明显地分开的两个阶级：資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农村有了占有土地的自由，占主要地位的是虽然摆脱了封建負担却又日益成为資本的債戶的

小农。资产阶级通过抵押来统治他们，就像它通过工资统治无产阶级，通过竞争统治小资产阶级一样。资产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商业法庭、工厂法庭、陪审法庭和整个实体法的承认和加强。这里是德国唯一的经济发展达到高度水平的地区。

莱茵—威斯特伐里的大工业在逐步发展中提供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一幅复杂多样的图景。在雷姆夏特区还有手工业，资本只想做一个各种商品的出口代办人，但是它的统治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在佐林根区，资本摧毁了行会，并让极为贫困的家庭工业无产阶级为它制造武器，从前这是最著名的、有世界声誉的手工业。在亚琛，资本用雇用郊区廉价劳动力的办法，驯服了行会的织布手工业。在一开始就在商业上组织起来的克雷费尔特的丝纺工业中，家庭织工顽强地要争得手工业行东的名义；他们刻苦地省吃俭用，攒钱买织机，却不知因此被资本的锁链捆得更加结实。但是莱茵的工业也有一个突出的地方，那就是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很早就发展起来了。1783年爱北斐特的一个工厂主用水力发动了德国的第一台机力纺纱机。1826年，佐林根的研磨工反对可怕的实物工资制的斗争，1828年，克雷费尔特的丝纺工人反对大幅度地压低工资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但同时也有大批的工人子女无声无臭地成了机器的牺牲品。

普鲁士政府不自觉地做了一件好事，揭发了触目惊心的情况。1818年，政府偶然得知，一个莱茵的工厂主建立了一所工厂小学，普鲁士早就以特别伪善著称，因此这个做好事的厂主受到王国内阁通令褒奖。在这期间，因为要缉查所谓煽惑分子而对这个学校进行了调查，文化大臣阿尔坦施泰因要求杜塞尔多夫政府向他报告关于这个工厂学校的详细情况。于是真相大白了，原来这位受到褒奖的厂主有两个纺纱厂，在厂里做日工和夜工受剥削的竟

有許多六岁以上的儿童。一个厂里白天有九十六名，夜間有六十五名儿童做工，在另一个厂里，白天有九十五名，夜間有八十名儿童做工。日工劳动达十三小时，夜工十一小时，往往連星期日也要工作。幼齡儿童的日工工資还不到二十分尼，年岁較大的也只有三十分尼，而成年工人做同样的工作可以拿到十个銀格罗申的工資。受到表揚的工厂学校不过是每天給做日工的儿童上一小时課，給夜工的儿童上两小时課。一个負責財政的最高樞密顧問（可惜他的名字沒有傳下来）向柏林報告說，做夜工的儿童外貌健康而活潑，不像柏林人那么面色蒼白；他們做夜工并不十分疲劳，在四分之一哩長的回家的路上还百般淘气呢！白天睡觉同夜間睡觉对身体同样有益。

阿尔坦施泰因对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滿意。他是黑格尔的朋友，他不願意在以实行普遍义务教育制著称的国家里尸位素餐地当文化大臣；他所領導的教育部門在普魯士放任自流的各行政机关中可說是唯一比較出色的部分。但是他的同事，內政大臣舒克曼（阿尔坦施泰因必須同他取得諒解）却认为工厂雇用童工是无可非难的。为了使舒克曼認識到干涉的必要性，阿尔坦施泰因要求萊茵省以及威斯特伐里亚、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薩克森各省政府对工厂中儿童劳动的方式和規模进行調查。虽然有关官厅調查时用的是旧普魯士的不彻底的方式，从来不向工人及其子女了解情况，而只是向厂主，还有医生、教士、教員等詢問一下，但是它們的報告却提供了一幅令人吃惊的图景。

在所有紡織工业部門，以及在針厂、銅器厂、帶扣厂、甲冑厂、壁紙厂、紙厂、陶瓷厂和其他工厂中，成千上万的四岁以上的幼齡儿童干着一些重活，經過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的过度的劳动以后，領取到两三个格罗申的工資，然后（据来自伊塞隆的一

份報告說），他們就在短短的休息時間內喝酒、抽煙、猥亵和賭博。在其他的報告中說：“他們臉色蒼白，眼睛帶血絲而無神，身體浮腫，嘴巴腫脹，嘴唇和鼻翅張着，脖子上有瘰癧，還有惡性皮膚發疹和哮喘病，一眼就可看出，這些不幸的兒童與同一階級的不在工廠里做工的健康兒童迥然不同。他們的道德教育和精神教育也是無人過問的。”甚至在工業還不很發達的地區，如勃蘭登堡和薩克森省，也已出現了這種最悲慘的狀況。路肯瓦爾德的市議會聲稱，在本城織布工場中勞動的兒童道德日益敗壞；在梅爾塞堡區的制釘廠中，童工們從早晨四點鐘一直到晚上六點鐘做拉風箱的重活。

除去阿爾坦施泰因以外，普魯士內閣對這一切態度非常冷淡。1826年，當霍恩少將向國王報告說，工廠區已經不能按分配名額抽出合格新兵的時候，也沒有人關心，而當阿爾坦施泰因再次提起舒克曼注意時，舒克曼以對於普魯士軍事國家的本質有深刻了解的直率口气回答阿爾坦施泰因說，同青少年為了獲得精神修養而投入的勞動比較起來，兒童在工廠中勞動的害處還是較少的。直到萊茵省的一些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工廠主在報紙上發表評論，萊茵省議會要求在法律上調整兒童勞動的時候，政府才在1839年規定了一些對工廠兒童勞動的限制，這些限制雖然沒有實行，但總算有了明文規定。又過了十年，萊茵工人對實物工資制的抗議才引起人們注意。直到經過1848年的有益教訓以後，才頒布了禁止用商品支付工資的制度，並且比較認真地付諸實施。在那以前，普魯士政府對於工人的控訴、萊茵和威斯特伐里亞省議會歷次的申訴，以及一些值得尊敬的工廠主的熱情的鼓動都是以“嚴肅的考慮和巨大的懷疑”來應付的。它所考慮和懷疑的是，對赤貧的、沒有抵抗能力的無產者所施加的可怕罪行是否需要制止；但在實際行動中，它却更加熱衷于用武力鎮壓受虐待的工人階級的一切暴動。

此外，易北河以东的官僚对于莱茵资产阶级的剥削欲望的亲切谅解，是联系普鲁士国家的东部和西部省份的唯一纽带。否则人们就要把莱茵区看作战败了的叛乱者，并且努力继续取消它的进步的法令，把它的文化压低到卡舒布族^①的水平。这个地区的教育和自觉的程度在它对柏林基督教-德意志政府的公开反抗中可以看出，特别是无产阶级对于这个王国政府爱戴的程度是很容易猜想到的。

^① 卡舒布人属西方斯拉夫系，住在波兰北部的滨海区，是古斯拉夫波美拉尼亚人的最后残余。——译者

第三章

德国状况。精神生活

一 浪漫主义反动派

一般說來，新兴的德国资產阶级并不是民族的花朵。它的形成方式和存在条件賦予它一种偏狹和卑劣的意向。它对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野蛮粗暴，而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却阿諛奉承。对德国资產阶级有深刻了解的樞密顧問孔特曾說，普魯士工业的最大缺陷是大多数工厂主都沒有受过什么教育；在柏林最大的工厂主中，有許多人連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正确。18世紀，文学和哲学在教堂、学校以至全国得到发展，这就使經濟和政治落后的德国至少在精神方面达到西方文明国家的水平。这种文学和哲学并非来自正在形成中的中等資产阶级和大資产阶级，而是由小資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小官吏阶层中产生的。

这一偉大的民族遗产到了19世紀20年代就已經所剩无几了。正如东方的封建反动派曾經追随过西方的資产阶级的突进那样，浪漫派也曾追随过古典主义，但是从滑铁卢战役以后，它就日益墮入最淺薄的虛无世界。一会儿洒伤感的眼泪、一会儿使用淫蕩言詞的、毫无价值的多产作家竟被广大群众所喜爱。新时代的

个别先驱者已经出现，但是他们——伊梅尔曼和普拉顿，白尔尼和海涅——都正在同浪漫主义搏斗，还没有完全征服它。

三百年前，语言的改进曾是反动的路德派的最光彩的一面，同这一点相似，浪漫主义特别在语言研究方面结出了科学的果实。但是它在经济、政治、宗教方面则希望回到中世纪，从中世纪社会组织瓦解的历史来看，要复活中世纪势必要违背现实地粉饰封建的剥削方法。同时，浪漫主义国家学说的发言人亚当·弥勒和哈勒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是天赋较厚的法国人博纳德和梅斯特尔的可怜的附和者。在拿破仑的暴力统治下，封建一行会垃圾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除，从而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德国引起某种反应。但是这种经济学的代表者仍然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未出师的学徒。他们没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基础，因此他们根据自己周围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曲解了陌生的现实，他们阐述这个现实的理论也就成为教条的集成。最足以说明德国经济状况的落后性的事实，恐怕就是：德国唯一具有独创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不像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那样从正面，而是从反面反对亚当·斯密的理论，不是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而是从重商主义观点出发。李斯特在科学方面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对实际情况了解很深，他认识到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问题何在；他极力鼓吹德国关税同盟和德国铁路系统。可是各邦分立的政府迫害这个民族的煽动者，资产阶级让它的极有辩才的先驱者挨饿，最后李斯特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在亚当·斯密的德国弟子中，只有亨利希·冯·屠能有独特的见解。他在1826年写了一本《内容严肃的梦想：论劳动者的命运》，却把它锁在自己的不会说话的办公桌里几十年。屠能是一个有科学知识的精明的农庄主，生在弗里德兰，在耶弗尔的自由农民

中长大，后来又在梅克伦堡购置了地产，那里的封建的商品生产使农村无产阶级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个矛盾擦亮了屠能的眼睛，使他看到“国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普通手工劳动者”的痛苦，这些人就是在代议制的国家里也没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同工厂主和农庄主的收入比较起来，他们的工资太低了。屠能比德国其他任何人都早地认识到七月革命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信号。他问道：既然资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那么创造物又怎能压迫创造者呢？劳动者怎能由资本的主人变成资本的奴隶呢？屠能在一种合乎自然的劳动工资的数学公式中找到了这个谜底。他认为这条公式是绝对正确的，甚至让人刻在他的墓碑上。但是这无非是一种烦琐的钻牛角尖的做法。屠能想把农业工人组织起来，不过在他 1850 年去世以前不久，他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尽管他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实际效果表明，这种组织形式给农庄主带来新的利益，给工人带来新的枷锁。

德国的浪漫主义在法学方面表现得比在国家学说方面具有独创性。法的历史学派是德国浪漫主义特有的产物。它想反抗 18 世纪的所谓轻佻精神，而实际上是反抗 18 世纪的革命精神。启蒙运动者的理性法虽然只是资产阶级的理性法，但是它本身还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法的历史学派却割断一切历史发展，把历史形成的东西当作法的基础，只是因为这种东西已经成为历史。因此胡果卫护奴隶制、卫护领主的种种权利和长子继承权。1814 年海德堡的法学教授梯包特看到大批德国青年拿着武器涌向法国，受到很大震动，他为德国人民要求一本普通民法典，这时萨维尼回答他说，时代没有立法的使命。萨维尼的著作成了法的历史学派的纲领：这篇著作对于时代光辉地证实了它的立法使命的法国民法熟视无睹，而力图嘲笑资产阶级的历史形成的法（正如著名的刑法学

家費爾巴哈所說)是理性用理想制造出来的、誕生在云端里的神的儿子，他从历史书中接触过去的时代，大胆地越过現在，跳进还没有創造出来的世紀里。用黑格尔的話來說，这篇著作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最大侮辱。不久就出現了一个年輕的战士，他給法的历史学派打上了一个永久的标记，說这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傳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①

这个年輕的战士，卡尔·馬克思說的是 20 年代的事。当时唯一还有生气的文献領域，哲学領域已經不說德語了^②，因为德語已經不是思想的語言，可以理解的語言变成了不可理解的，所以精神用神秘的語言說話。但是，如果科学共产主义的起源本身不應該永远是个秘密，那就必須比較深入地探討这些神秘語言的意义。

二 古典哲学

一切哲学的基本問題，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之間的爭論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問題，到底思維和精神是第一性的呢，还是存在和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是神創造了世界呢，还是世界本来存在着呢？古代的思想家就研究过这个問題，甚至在中世紀教会的教义中也不是完全沒有談到这个問題。資产阶级时代一开始，经济发展日益迅速，自然科学也取得日益巨大的成就，这时哲学的基本問題又以新的面貌出現了。所以新的唯物主义的故乡是英國，培

① 指馬克思于 1842 年 8 月 9 日发表在《萊茵报》上的論文《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97—106 頁)。

② 在德文里“說德語”(deutsch sprechen)还有“說話率直”的意思，这里可能是双关語。——譯者

根給它开辟了第一条道路。

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精神产物，但是它首先成了反对 17 世纪还在宗教旗帜下战斗的、革命的上升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武器。第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霍布斯是个激烈的专制主义者，不过是资产阶级类型的专制主义者。他不是从一种神的等级制度，不是从一种奉为神圣的王权和类似的封建怪论出发的，而否认人是一个政治动物，一个创造国家的动物。霍布斯声称，人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句话成了说明资产阶级竞争的名言。他断言国家起源于一种契约，这种契约是为了控制人的私欲而订立的，所以应该具有绝对的权力。霍布斯认为世袭君主国是专制国家政权的最好形式，但决不是它的唯一形式。任何教会都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专制的国家有权支配宗教和臣民的一切思想。霍布斯在这一方面走得很远，他甚至承认宗教是对无形力量（不管它们是幻想出来的还是传下来的）的迷信的恐惧心理，而宗教是由国家建立的。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妥协而告终，它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王国。因此英国的唯物主义就从专制的国家形式转为立宪制的国家形式。洛克认为，凡是存在于精神中的，无不先已存在于感觉中；他论证了健全理智的哲学，借此说明哲学要是不同于健全人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把政治同宗教分开，同霍布斯相反，他反对国家有权规定或消灭人的思想，他宣扬资产阶级的宽容。他也把立法权同行政权分开。立法权由选举立法会议的人民所掌握。国王不是位于法律之上，而要受法律约束，如果他滥用权力，就会失去王位。

虽然如此，英国的唯物主义仍然是上层阶级（主要是贵族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秘密，一种秘授的学说。因为英国资产阶级取

得一部分(虽然还是很小的一部分)政权以后,就变得虔誠,非常虔誠了,差不多在皇帝威廉一世以前二百年,它就发现了必須給人民保存宗教这个深刻的真理。到18世紀竟至发展到这种地步,英国的唯物主义者(如哈特萊)在同一本书里,先把人的思維和感受归結为大脑的活动,也就是用唯物主义方式解釋,后来又用神学的方式說明圣经奇迹和死后天国生活的確實性。当时沒有一个唯物主义者可以称得上是无信仰者的領袖。哲学家休謨虽然反对宗教信仰,但是他也反对唯物主义,他认为人的感官不能彻底認識世界。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国家,因而有許多偉大的自然科学家,但是他們——从波义耳和牛頓到达尔文和法拉第——不是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創造力,就是至少认为上帝是个好人。

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的奠基人,休謨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奠基人。17世紀欧洲大陆上的哲学家,如笛卡儿、斯宾諾莎、萊布尼茨大多是著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他們之中唯心和唯物两种世界观保持一定的均势,如笛卡儿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待世上的事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待神的观念,又如斯宾諾莎把实体叫做神,借以說明精神和自然界的本质統一,再如萊布尼茨斷言思維和存在从来就是协调一致的。18世紀初叶法国唯物主义才作为独立的現象发展起来。它继承了洛克所提出的理論,起初它也是一种貴族的学說,但是酝酿革命的资产阶级很快就認識到,这种学說在它反对王朝、貴族和僧侶的斗争中会起什么作用。

18世紀的法国唯物主义不仅否定宗教(至于它的信徒是把人看做机器的无神論者,还是在宇宙中給上帝留下一块安靜的养老地的自然神論者,则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它也深入到法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其中的經驗形成一切感觉和知識的,那么他就只应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幸福和命

运。要使人类社会完善，就必须让这个社会同人的天性完全一致；應該消除人类社会中一切同人的天性相矛盾的东西。法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奠基人爱尔維修在其《論人》一书中认为感性的印象和利己的欲望，享受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他的体系中的主要观点是：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

法国唯物主义者看作人的天性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当时第三等级的政治要求和社会要求；他們认为資产阶级社会的解放就是建立美滿的社会。法国唯物主义成了反对专制、封建和教会专权的法国的有力武器。在文献方面，它在著名的百科全书上登峰造极，在政治方面，它以人权宣言为頂点，最后則发展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类智力平等，关于經驗、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界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巨大意义，关于享受的合理性等等方面，空想社会主义从法国唯物主义的学說中可以汲取而且已經汲取了多少东西是十分明显的。傅立叶和欧文从唯物主义出发，德蘿米也是以唯物主义为依据，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邏輯基础。

法国唯物主义虽然获得許多光輝的成果，但是它的基础还是很不稳固的。自然科学进步很大，然而只有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化学和生物学还处于幼稚状态。人們对于自然的发展，从而对于历史的发展都毫无所知，认为自然界总是循环地运动，人的精神自始就是不变的，有个时期——比如在中世紀——暗淡一些，而现在又追求它天然的权利。唯物主义还没有接触到宇宙之謎的内在联系。于是唯心主义又来解决这个謎。在发生这种事情的国家里，資产阶级已經成熟到能够造就許多聪明的，甚至是天才的人物，但是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用猛烈的冲击摧毁专制主义和封建主

义的腐朽堡垒。

德国哲学是体现了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德国文学的继续。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在莱辛逝世那一年出版的，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就成了一本名著了。我们伟大的哲学家同这个巨大的变革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共同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谈到法国大革命时，经常持兴高采烈的颂扬态度，甚至谈到恐怖统治时代也是这样。但是由于害怕恐怖政策，歌德却写了可怜的《市民将军》，席勒写了许多关于幸福的女神和庸人的神圣制度的坏诗。德国的唯心主义是对英法两国的唯物主义的一个反击，而决不是向后者倒退。康德把发展原则应用于自然界，因而在他最独特的领域上战胜了唯物主义。他用旋转的星云说明太阳和所有行星的起源，从而否定了太阳系固定不变的说法。他在一些通俗的讲义中已经认为人由动物演变而成是不言而喻的。他明确地反对旧唯心主义的学说——由经验和感觉得来的一切认识只不过是简单的假象，而真理只存在于纯粹悟性的观念之中。他反过来讲：来自单纯的悟性的对物的一切认识只不过是简单的假象，而真理只存在于经验之中。

康德的真正活动是以休谟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人的认识能力。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用简单的假定颠倒了全部经验以及所有历史科学和实验科学。这些假定是：我们的概念不以对象为转移，而对象以我们的概念为转移，我们不知道我们之外的物的本来面貌，只知道它们作用于我们的不完善的感官而引起的感觉，整个现象世界，直到人对空间和时间的感性直观只存在于人的表象之中，而物的绝对本质，自在之物隐藏在人的表象后面，在不可探测的黑暗之中。这样一来，一方面思维和存在被调和起来，另一方面它们却彼此分离得更远。康德没有解决宇宙之谜，而认为这个谜是不可

解的。事物中不可能有矛盾，因为一切含有矛盾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思想把我們卷入不可避免的矛盾，即康德著名的二律背反之中，如世界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物质的可分性和不可分性、自由和必然。

康德把客观世界的定在化为人的意識的活动，等于摧毁了客观世界，而費希特则发展并改变了康德的学說，用人的意識重新建造了客观世界。費希特同自然科学是疏远的。在他那里，自我，即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族类的人，是真正的自在之物，人的自我意識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客观世界的創造者。客观世界的定在不是通过純粹的思維形式來說明，而是純粹的思維产生客观世界的定在形式。費希特从純粹思維中引伸出空間和時間、量和質、可能性、現實性、必然性。思維是以內在的必然性完成的独立过程。每个定理都有它的反定理，在更高的統一不断克服这个經常的矛盾的过程中，思想向前发展。这样一来，費希特又把古希腊哲学的辯证法拾起来了。但是他認為客体产生于主体的純粹本性之中，所以精神和自然界是同一个东西，实际上，費希特把自我当作主体—客体。可是謝林和黑格尔一面继承和改变着費希特的理論，一面說：如果主体和客体是同一个东西，那么两者之一都不是事物本身，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既不是思維也不是存在，既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界，而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整个事物无非是貫穿两者，在人的精神中意識到自己的过程。

引誘謝林走进幻想的自然哲学和各种浪漫主义的杂貨鋪的唯一思想仍然是“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最后，他終于停靠在久已淤塞的天启宗教的港口。黑格尔认为絕對理念是整个世界的活的灵魂，虽然他对于絕對理念沒有什么闡述，而且从它的哲学淵源來說，只是斯宾諾莎的实体和費希特的自我意識的更高的統一，但是

黑格尔把絕對理念理解为一种邏輯的和历史的过程。精神，即本来存在的自我有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先是意識，接着是自我意識，然后是考察的和行动的理性，最后是認識自己的、有教养的宗教的精神。在自然界中，精神作为盲目的必然性而活动，而在历史上，它却从粗野状态掙脫出来，达到認識自己的阶段。历史过程只是不知何时何地已經完成的邏輯过程的模写。不管这种观点是怎样模糊，把历史过程解釋成邏輯过程乃是黑格尔首創的功績。康德把发展观点应用于自然界，而黑格尔却把它应用于历史。費希特接触到辯证方法，黑格尔却使它成为一切生命的噴泉。有“有”的概念，也有“无”的概念，并且从两者的斗争中产生了“生成”的高級概念。一切都存在 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經常变化，一切都处在不断产生和不断消灭的过程中。从康德的命題：含有矛盾的一切是不可能的，轉变为黑格尔的命題：矛盾事实上就是世界的推動者——这就完成了德国哲学的辯证运动。

这样就达到了英法两国唯物主义沒能达到的一个目标，因为它对自然界的了解还处在一个比較低的水平上。19世紀下半叶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了巨大进步，这使证明自然界本身的辯证运动成为可能。这时康德所倡导的假說才在达尔文的证明——整个有机的自然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內，都是延續了数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中得到終結。在这方面黑格尔也未能超过由于当时对自然界沒有充分認識而造成的局限性。他还抱着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自然界是在同一个圈子里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它有永恒的天体和各种不变的有机物。英国唯物主义者把这种观点用到历史上，而黑格尔却突破了这种观点。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种不断运动、变化和改造的、从低級上升到高級

的过程。他力图以巨大的精神劳动，在历史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門中通过一切表面的歧途和偶然事件，探索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和逐渐实现的阶段。因为他认为物是概念的模写，所以他对于历史作出非常武断的解释，但是像历史事实这样顽固的事物不是这么容易被概念束缚住的，所以黑格尔也能用天才的眼光看到人类历史的联系。

德国哲学的伟大特点以及它的特殊缺陷都可以从德国特有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得到说明。一方面，这种状况容许人坚定不移地通过严酷的现实追求资产阶级的理想，直到得到最大胆、最圆满的结果为止。康德的最高伦理原则——你应该这样行动！无论在你身上还是在任何别人身上，都要把人类当作目的而不可单纯当作手段使用——，只有在资产阶级还不强大，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发展的国家才可能存在。只有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费希特才能说，任何人都不可为自己使用别人的力量，他才会写出：“人应该劳动，但是不能像一匹役畜那样驮着东西入睡，经过最必要的休息以后又被赶起来驮同样的重担。他应该无忧无虑地、高高兴兴地劳动，并且留有使自己的精神和见�能上升到天国的时间，人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观察天国。”费希特出身于无产阶级，因而在他整个一生中都带有火热的革命思想的痕迹，他谴责进行剥削的封建贵族是愚蠢、无知、怯懦、懒惰和卑鄙的；在他的话里洋溢着法国革命的恐怖政治的气息：法是绝对必需的，谁不通过本身认识法，谁就应该受到强制。费希特正是从他认为不是历史的可怜的德国历史中，推论出德国人的使命，这就是建立一个世界上还从未有过的真正的法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热情地发扬我们在古代世界里看到过的公民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是使大多数人沦为奴隶（古代国家没有奴隶就不能存在）而实现的，而是建立在凡具有人类面貌者一律平

等的基礎上。如果說黑格爾利用辯證方法的純粹思想遊戲終于推翻了天上和地上的一切权威，那麼這種既徹底又空幻的行動只有一個沒有短兵相接的激烈的階級鬥爭的國家才有可能。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的古典哲學家及其思想都住在空中樓閣里。他們的思想离不开他們在專制主義的嚴格監督和正統派的鞭子下喘息的肉體，因此他們的唯心主義受到很大的限制。康德用純粹理性把上帝趕出了宇宙，但是他又從實踐理性的後門把上帝偷偷地帶進來。費希特自於被控是無神論者而打了一場官司，並被趕出耶拿，他這場官司里搖擺不定，在不合時宜的抗拒和不合時宜的退讓之間搖擺不定，而這是一個堅強的人所不會有的；在以後的幾年中，他就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破壞了自己曾經用以消滅人格的上帝的觀念的謹嚴邏輯。黑格爾甚至同三位一體的神進行妥協，他把上帝列在自己的體系之內：上帝單純用思想把現實世界創造為他自己的映像，為他的兒子，並在其中認識自己，把自己作為精神歸於自己。

政治方面比宗教方面問題更多。德國哲學家沒有阿基米德點^①——資產階級社會的概念，而法國唯物主義者就是從這一點出發推翻專制一封建一教堂的國家的。他們所以沒有這個概念，是因為事實本身在德國還不存在，或者還處在可憐的幼稚狀態。他們只知道國家是人類文化的保護者。康德在他著名的永久和平的計劃草案中，一開頭就說：“國家不像它所占有的土地那樣是一種財產。它是一個人類社會，除去這個社會本身，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統治它，支配它。”康德有理由由此得出結論說，國家應該採用共和政體。但是怎樣把國家——專制帝王的財產——變成共和

① 原文是“der Punkt des Archimedes”，可能是指阿基米德螺旋線上的點，借喻發展的起點。——譯者

国呢？康德的答案是，通过人类的道德进步，費希特則說，通过国民教育。不管他們如何淵博而深刻地把握这些思想，他們也只能以此造就出一批无聊的道德說教者和教书匠，却动不了专制国家的一根毫毛，专制国家的代表人就更加疑神疑鬼地蔑視他們，监视他們。

費希特的关于閉关自守的商业国的論文（他曾自称这篇論著是他最好的、考慮成熟的作品）甚至描繪了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国家的理想，以及按照資产阶级理性的严格要求，應該怎样建立这个历史上的国家。1800年，普魯士財政大臣，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信徒司徒恩澤，亲切地接受了費希特献給他的这篇著作。他认为費希特提出了一个国家的理想，每个担任国家行政工作的官員都有义务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努力，尽管这个理想是否能够实现还是一个問題。这时候司徒恩澤可能会想到他的弟弟，三十年前他弟弟在丹麦試图按照資产阶级的理性法整頓封建专制的国家，結果送掉了性命。費希特对資产阶级社会沒有了解；他把自由貿易看做是由“我們的祖先的思想方法”产生的不能持久的傳統；适合于基督教欧洲的中世紀統一的东西，对現代国家已經不适合了。費希特认为限制一定等級的居民从事一定的活动——农业、手工业、商业——是政府的任务，认为現金流出国外是本国人民貧困的原因，这些完全是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的思想。費希特主張禁止到外国旅行，因为无益的好奇心和想把这种好奇心带到国内的消遣的癖好是不能容許的。我們相信，恐怕連老弗里茨听了費希特的这番議論也要反对。

費希特想把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国家彻底改造成为一个和諧的国家，国家保证国民人人有幸福而滿意地生活的天然权利。但是他又把他的理性国家放在这个国家之上，理性国家完全同外国隔

絕，自己有一种特殊貨币，只有科学可以同外国交流，至于它怎样組成一个君主国，这是統治者的秘密。在国家範圍內，这是手段同目的之間的悲剧性冲突，到了費希特的晚年，这个冲突在国际範圍內形成了一出动人的戏剧。他曾經盼望法国軍队，认为它是德国专制君主想用暴力扼杀的自由思想的救星，但是現在他却对德国人民发表热情的演說，号召他們对法軍作战，他死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不抱希望，沒有幻想，清清楚楚地預見到滑铁卢战役后德国将会遭受的一切灾难。

黑格尔也意識到欧洲反动派胜利的意义。他曾經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将产生一个自由民族的时代的先驅，法国人失敗以后，他认为德国人的天然使命、他們恢复独立的主要利益就是：他們可以不受干扰地保存哲学的神圣之火。在柏林任职后，他为了把法作为一种合理的、自我发展的有机体加以論述，写了法哲学，这时他所根据的命題是：凡是現實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东西都是現實的。他的法的国家的理想是 1821 年普魯士国家的反映，正如費希特的閉关自守的商业国是 1800 年普魯士国家的反映一样。不过两者之間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差別，就是黑格尔由于受到卡尔斯巴德決議的压力，很少把自己的原型理想化，而費希特由于受到法国革命的鼓舞把自己的原型大理想化了。黑格尔終于認識了資产阶级社会，但是他对它估价很低。它是国家，但只是外部的国家，是需要和理智的国家，是放蕩和貧困的場所，肉体和道德墮落的場所。但是国家本身是倫理理念的現實，是絕對的理性东西，是絕對的自身目的，因此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做国家的一个成員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这种观点就像手套适合于手那样适合迫害“煽动者”的卡尔斯巴德決議。

根据黑格尔的法哲学，国家永远是君主国。在已經发展了的

理念面前不存在共和国；沒有君主的人民是一群沒有組織的不定形的东西。但是在君主国中，人民这个詞表示那些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国家成員。各等級作为立法的权力位于广大群众之上，这种权力可以規定普遍物，但是它同各等級也沒有很大关系。国家官員有等級會議固然能把事情办得很好，就是沒有等級會議，他們同样能把事情办得很好。国家官員代表第二个权力，即政府，他們是对一切都有深刻了解的真正的政治家。第三个权力是王权，它做出意志的最后决斷，使事情趋于完善，它本身包含着所有三种权力作为一个整体的理想性。同实体性的意志和整体的理想性相一致，王权同不良报刊的要想瓦解一切的、可怜的主观性相比，乃是真正的現實性。报刊代表公共輿論，照黑格尔的說法就是代表現存的矛盾，出版报刊的只是那些不这样做就无法發揮自己的作用的人；黑格尔想完全根据卡尔斯巴德決議的精神給报刊下一道起阻碍和惩罚作用的警察命令。他的法哲学只有一点超出20年代的普魯士，那就是它要求公开审判和成立公开陪审法院。

虽然如此，当时的精神生活还是在它那难以理解的語言中跳动。黑格尔在这本著作中同法的历史学派和浪漫主义国家学說进行的論战充分证明，他不是輕率地頌揚現状或者甚至主張回到中世紀去。他自己的話道破了他为了发现当时的現實中的理性而产生的种种苦恼，他說，在我們这个意見很多，議論紛紛的时代里，一个不懂得为一切（包括最坏的东西）提出充分根据的人，一定还不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因此他也認識到理性的現實性。

理性是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永恒之流。这个过程所創造的东西是現實的、合理的，因为它是必然的；一旦它不再是必然的，它就是不現實的，不合理的了。普魯士君主国是現實的、合理的，因为根据当前的历史条件，它只能是現在这个样子，

不能是別的樣子，因為人民不知道他們需要什麼，所以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人民變成合理的，那麼普魯士君主國必定也會成為一個現實的國家，根據黑格爾的現實國家的定義，必然只在觀念上設立君主，並揚棄君主，使之成為公共福利。

黑格爾本人並沒有誤解他的辯證法的革命性，他甚至害怕他的法哲學會遭到取締。普魯士國家對於所有一切頌揚也不感到十分舒服。它驕傲地倚仗自己的警察棍，並不想用它的理性為它的現實性辯護。甚至感覺遲鈍的國王也看見玫瑰花下有蛇在待機而動，當國王聽到關於他的國家哲學家的學說的模糊報告時，他懷疑地問：可是，如果我不作最後決定，情況又怎樣呢？但是普魯士的官僚對於加在他們頭上的許多榮譽表示感謝，黑格爾的得力門徒給理解力不高的臣民講解老師的意義模糊的論述，他們之中有一個人寫了一部普魯士法學史和國家史，在這部書中證明普魯士國家是一個大堅琴，在上帝的花園里定好琴弦，以便带头奏起世界頌歌，於是這些官僚就更為感激了。黑格爾的哲學雖然有許多可怕的神秘性，還是被宣布為普魯士的國家哲學，在世界歷史的許多諷刺中，這肯定是最可笑的諷刺之一。黑格爾把德國唯心主義的丰富成就綜合成一個龐大的體系，他把我們的古典時代的一切泉源和溪流都引到一個河床中，而這些泉源和溪流在反動的冷空气中全都凍結了。但是那些輕率的傻瓜却認為躲在这个大冰塊後面十分安全，看到大膽的攻擊者從那冰塊的平滑而陡峭的斜坡上滑落就冒冒失失地歡呼起來，却沒有預感到，春天的暴風雨一來，冰塊就要融化，他們自己也會遭到沒頂之災。

黑格爾本人也經受了這些風暴的第一次襲擊。他反對七月革命，咒罵英國的第一個改革法案是對大不列顛宪法的“高貴的內臟”砍了一刀。這時他的聽眾紛紛離開了他，跑到他的學生愛德

华·甘斯那里去，甘斯讲授老师的法哲学，特別強調其革命的一面，并激烈攻击法的历史学派。当时在柏林就有人說，偉大的思想家黑格尔不是由于霍乱，而是由于这一痛苦的經歷而死的。

第四章

三十年代

一 七月革命的影响

七月革命在比利时、意大利、波兰产生了巨大的反应，在德国也引起新的生活。但是并没有促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因为德国还缺乏这种运动所需要的一切经济条件。七月革命震撼了德意志三十多个国家中的一些较小的国家，还推动了一次民族大示威。

这次示威同经过光荣的战斗以后被俄国沙皇打垮的波兰军队的残部有关。波兰逃亡者的送葬行列经过德国成了真正的胜利进军。一切资产阶级阶层都本能地感到，波兰人反对俄国高级专制君主的英勇斗争也就是反对德国低级专制君主的斗争。基于对波兰人的钦佩，从德国小资产阶级中出现了最大的鼓动家——罗伯特·勃鲁姆。与此同时，正在成长中的小容克俾斯麦的头脑里埋下了对波兰人的顽固憎恨，这种憎恨在半个世纪以后通过盲目的暴力政策爆发出来。后来的事实表明，拥护波兰人的行动是十分正确的：普鲁士军队为反对波兰起义，花费了近四千万塔勒的巨款，使专制政权的财政和军事遭到影响深远的打击。

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发动一次民族运动，德国无

产阶级同样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发动一次社会运动。在亚琛和奥伊本，工人被困苦的生活所迫，砸毁了机器和机器厂。商会、工业法庭，甚至行政区政府都能够一定程度上看出骚乱的原因；它们要求廢除实物工资制和禁止任意降低工资。但是柏林当局仍然充耳不闻。当裁缝帮工由于女缝工的可怕竞争而在国王窗外闹事的时候，柏林当局就更加吃惊了；可笑的是，外交大臣在外交急电中抱怨“不久能把全欧洲变成一个大疯人院的那种精神错乱的新症候”，人们感到武装力量没有配置大炮，只用刀剑就把裁缝骚乱镇压下去，是一个光荣的成就。这时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仍然没有动静。

不过德国北部的资产阶级比较活跃。在不伦瑞克，他们把一个可恶的小暴君赶出了国境；在卡塞尔，他们企图用共同摄政的办法多少减弱一个类似的废物的坏作用。比较重要的是，在德国北部的中等国家中，封建垃圾在一定程度上被清除了。在汉诺威是由于哥丁根的大学生掀起一次学潮以及农民表示了严正的态度而做到这一点的，在萨克森主要是由于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发生了暴动，起初这些暴动是为了反对城市当局的专横统治，而当国内普遍发生动乱时，就导致一些改革。总之，北德的运动表现得温和，它所取消的一些弊端也的确是令人不能忍受的，因此邦联议会也就好歹顺从了。

但是邦联议会对南德小资产阶级的骚乱就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南德运动的目的有一部分是为了取消封建的勤务、徭役和负担（如在巴登和黑森），但是主要问题则在于反对可耻的卡尔斯巴德决议，特别是要求扩大邦议会的权限和出版自由；最大胆的人甚至想建立“德意志的统一自由的国家”。这个运动带有十足小资产阶级的性质，除去不少才干外还有许多空谈家，顽强的男儿气概往

往显得非常幼稚，大吵大嚷，正好暴露了而不是掩盖了十分模糊的看法，总之，雷声大，雨点小。运动的中心在巴伐利亚的莱茵普法尔茨，这不仅是因为法国的法律使运动在这里有可能自由活动，也因为当地小农和小资产阶级所受物质贫困压迫十分沉重。他們被巴登、黑森、普鲁士和法国的关税壁垒所封锁，虽然物产丰富却不能销售出去。一索彭^①葡萄酒只卖一个铜币，面包和肉类的价格也很低。农民和手工业者无力缴纳地方税和国税以及抵押利息；城市和乡村都盛行强制拍卖。同时普法尔茨还要向巴伐利亚国库缴纳几百万的余款，它对这个沉重的负担决不会感到愉快，因为普法尔茨在历史、习惯和风俗方面同巴伐利亚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可能对慕尼黑怀着莱茵普鲁士居民对柏林的那种“好感”。

领导普法尔茨的鼓动工作的有几个作家，其中法兰克尼亚人威尔特最有才能也最活跃。他的手摇印刷机被查封以后，他就带着他的报纸从普法尔茨的这个城市跑到那个城市，他确实利用法国的审判程序逃避了巴伐利亚警察的几次迫害。他创立了一个出版协会，目的是“以民主的精神，组织一个德意志国家”，1832年5月27日，他同他的同志发起到汉巴哈宫举行全德人民大会，庆祝“德意志的五月”。德国和波兰的国旗在空中飘扬，两万多人在这里集会，以激动的心情倾听有时非常激烈，但一般都很平和的言论。这个“全德人民大会”给反动派造成实现蓄谋已久的计划的机会；四个星期以后，公布了六项法令，把南德邦议会置于邦联议会的控制之下，并且设置了一个邦联警察委员会监视南德邦议会。

这样一来，南德运动的基础就垮了；它只是还能作最后的挣扎。少数激进分子，主要是大学生，秘密组织起来继续反抗。他們

① 德国液体容量名，约合半公升。——译者

五十多人进攻法兰克福的哨所，以打击邦联議会。但是在这个不成熟的暴动发生之前很久警察就得到了消息，暴动还没有正式开始就悲惨地失败了。奥地利一普魯士反动派毫不怠慢地利用这种輕率的暴动。梅特涅在汉巴哈事件后叫嚷說：“如果很好地利用汉巴哈大会，它可以成为好人的大会，”而这时在柏林的安西隆写道：“如果人們及时利用法兰克福事件，它就可以挽救德国。”野蛮暴行泛濫全国，不受欢迎的书籍受到压制，不受欢迎的報紙遭到禁止，不受欢迎的人被赶出国境或投入监狱，由于莫須有的嫌疑或者一点可笑的原因就遭到残酷的审前羈押，受到刑訊，被指定的法庭判罪，到要塞的地牢或苦役监狱的牢房里去被慢慢地折磨死。

在黑森大公国爆发了最后一次南德运动。1830年，一个无能的君王在这里登上統治宝座，大臣杜梯尔在邦議会提出一項議案，要把新君为了接受崇高使命而借的二百万吉尔登的債款列入国家預算之内。这个要求毫无道理，以致一向非常驯順的邦議会也没有答应。这个小国的七十万居民已經被苛捐杂稅压得够受了，赤貧的农民身受双重负担，特別是上黑森的农民在失去了統治权的貴族的封建压榨下破了产。1830年秋天，上黑森的农民蜂拥而起，成群結队地走过全国各地，在这里搶稅所，在那里燒衙門。杜梯尔由于在邦議会碰了壁，在宮廷里的威信大大降低，这时他认为恢复自己威信的时机到了。他让大公的兄弟担任能征善战的军队的指揮官，这位英雄命令他的龙騎兵在胥德尔村附近砍杀手无寸铁的农民，由于事先沒有劝导农民自行解散回家，因此有些正在用道理劝說起义的农民，使他們相信暴动沒有成功希望的人也被砍伤、砍死。人民把这个事件叫做“胥德尔大屠杀”，它使杜梯尔又成了全权的大臣，但也激起了群众的强烈憤恨。

黑森自由主义者的領袖是布茨巴赫的校長魏迪希，他是基督

教德意志派的大学生协会的老会员，拥护皇帝和帝国，仇恨法国革命，但也是一个有强烈的正义感的性格坚强的人。在邦联议会的暴力政策使公开鼓动成为非法以后，他是留在国内、行动自由的南德运动领导人中唯一没有怯懦地借口合法而退缩的人。他在秘密社团中，在保密的传单上力图发动对杜梯尔的卑劣的专制主义的反抗。1834年元旦前后，格奥尔格·毕希纳参加了他的活动，当时毕希纳还是一个刚二十岁的大学生，在斯特拉斯堡学了两年自然科学。他是一个显著早熟的人物，不仅在宗教方面有自由思想，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政治有清楚的認識，当时德国一些在政治方面有卓越見識的人都不及他。这并不是說，他就是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所謂的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社会主义者；他嘲笑圣西門主义，有一次他在斯特拉斯堡看见过圣西門主义的一个奇怪的样本。他同空想社会主义者完全相反，对法国革命很有了解；他从法国革命中得出的信念是：只有用暴力才能推翻专制政权，但是任何政治革命沒有物质基础，沒有广大群众的必然要求就注定会失败。他在从斯特拉斯堡写給父母的信中說，他决不过問吉森^①的卑劣政治，也不参加幼稚的革命暴动；对于法兰克福起义的牺牲者，他衷心表示惋惜，但是他不了解这些人受了什么东西的迷惑，竟认为德国人民已經准备为爭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由于是黑森的子民，毕希纳在1833年秋天不得不轉到吉森大学读书。他在这个周围沒有什么誘人的景致的小城里，心情非常忧郁；政治形势束缚着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为做一个同流合污的奴隶感到羞耻，为承认一个腐朽的王朝和一种奴顏婢膝的官吏貴族主义而慚愧。大学生协会的活动也使他厌恶。虽然吉森的

^① 吉森是兰河边上的一个城市，位于法兰克福之北，当时是黑森的首府。——譯者

大学生协会一向比較激進，但是它同样不願意拋棄它的彩帶上的浪漫主义的浮华飾品。毕希納企图使大学生协会認識到，参加資产阶级解放斗争是它的义务，但是沒有成功。大学生受幼稚的虛荣心的驅使，不願跟手工业工人同坐一条板凳。毕希納在給他的未婚妻写的信中說：“我的朋友离开了我，我們只能像鸽子似的互相耳語。”但是还是有几个大学生團結在他周围，同他最亲密的是神学系的学生奧古斯特·貝克尔，他是一个聰明人，只是生活非常放蕩。毕希納听貝克尔談到魏迪希的密謀。由于渴望采取革命行动，他力图为秘密鼓动工作扩大地盘，树立更高的目标。关于这一点，他很快就同魏迪希发生了冲突，毕希納写的唯一的傳单《黑森快报》被掌握着奧芬巴赫的秘密印刷所的魏迪希做了惡意的窜改，并且引用聖經的重要章节歪曲了原意。尽管如此，这份傳单仍然迸发着来自偉大的法国革命的烈火的密集火花。傳单的語言沒有当时的自由主义的夸张成分，它簡單明白，由于有成功的对比而显得活潑生动，并且充滿了革命的热情。但是它沒有社会主义的和音。毕希納号召黑森农民像法国农民用无数次的起义迎接1789年那样 摧毀压迫者的堡垒。

傳单沒有产生效果。密謀的自由主义分子认为这个傳单“太激烈，甚至令人不快”，而农民的反抗精神又由于受到杜梯尔的压迫而完全瓦解。他們誠惶誠恐地把夜間塞进他們的門窗的傳单《黑森快板》交给官厅，剩下的一部分也由于告密而落到政府手里。布茨巴赫的一个市民庫尔是个奸細，他在 1833 年 3 月就同杜梯尔以及大公本人訂了密約，但是这个小商人很有耐性，他把密謀者一个一个地慢慢出卖，并且以坐探的身分在他們之中工作。直到 1835 年春天，才开始拉起捕大魚——毕希納和魏迪希——的网。毕希納在达姆斯塔特同父母一起过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規模的秘

密組織，晚上在花园的一間小屋子里开会；毕希納在受到杜梯尔的馬快的层层包围下，写成了他的剧本《丹东之死》，这是一个粗犷有力的作品，各場并不連貫，但充满煽动性的热情，在宏偉的构思中表現了恐怖統治的偉大規模。毕希納在最后关头终于逃脱了，先到斯特拉斯堡，后到苏黎世，1837年2月，他还不到二十四岁，就因发高燒而死于苏黎世。

毕希納死后沒有几天，魏迪希就用可怕的手段自杀了。他沒來得及逃走就被杜梯尔派人逮捕。杜梯尔对一切反动勾当都有經驗，也善于用司法为暴力服务。他把这位崇高的空想家交給了一个經常发酒瘋的酷吏，預审官格奥尔吉。經過无数次的拷問，魏迪希的精神力量被摧毁了。后来他的身体也被牛尾鞭打伤，这时他就選擇了自杀的道路。他用碎玻璃片割斷自己的血管。当这种行为被人发觉时，本来还可以救治，但是格奥尔吉和他的助手却任凭这个不幸的人流血过多而死。杜梯尔奖給这个劊子手一枚勋章，并利用官厅的支持把他选进了議会。这种聞所未聞的罪行激起了被压迫人民的极度憤怒的呼声，血債要用血来还。魏迪希的命运决定了他的一个近亲，当时还是一个十一岁的男孩的未来；这男孩就是威廉·李卜克內西。

二 經濟进步。新文学

19世紀中叶，德国又籠罩着一片墓地的寂靜。但是，当王侯們怀着政治家的滿意心情，注視着他們的爱国行为的这一結果时很少觉察到，他們比所有煽动者都更为有效地断送了上帝賜給他們的光荣。1834年元旦，成立了普魯士—德意志关税同盟，它給德意志國內大約有三千万人口、八千平方哩土地的一个地区带来了貿

易自由，同时作为一个統一的整体同外国进行貿易。一年以后，修筑了紐倫堡到菲尔特的第一条德国铁路。德意志虽然相当迟鈍，却不可遏止地投身子世界交通的巨流中。

关税同盟成立以前的历史，是一个說明經濟发展的必然性如何制服无知的专制者的悲喜剧性的实例。差不多所有欧洲国家都利用关税保护自己的时候，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却暴露在外国的优势竞争之下，特別是國內充斥着由于大陸封锁而长期积存下来的英国商品。下萊茵的工厂主在呈給普魯士国王的一份請願书中訴苦說：“关税壁垒使得我們的工业品不能在欧洲任何市場上出售，而欧洲的所有工业品却在德意志找到一个开放的市場。”因此德国工业沒有國內市場，因为整个德国被无数的关税綫切断，以致在法国人德·普拉特看来，德国人仿佛是一群只能經由柵栏互相来往的囚徒。受到外国人嘲笑的事情，却是德国专制君王的理想。他們的貿易政策和經濟政策都是根据王朝的利益，或者仅仅是由王朝的一些怪論决定的。但是他們都穷，甚至很穷，对黃金的渴望制服了专制独裁的抗拒。1818年，普魯士出于財政的考慮，被迫拆除了國內所有的关税壁垒，而用一条关税界綫把整个国家包围起来，不管在伸展很远的、断断續續的边界上征收关税多么困难。这样一来德意志的一些中小国家（它們差不多全都接触到普魯士的关税界綫）是逃出狼窝又入虎口。即使它們有几分看出，普魯士—德意志关税同盟是普魯士称霸的开端，它們也沒有别的路可走。它們尽力互相抵抗，彼此爭吵，很多年来还找了許許多的借口，但是不断增长的財政困难起了决定作用，終於一个接一个地申請加入了关税同盟。因为所有政府只关心关税的收入，而不关心或者很少关心保护工业，所以税率比大陸上的任何大国都低。大多数工厂主都要求提高关税，但是当大地主由于出口粮食也成了热心

的自由貿易者的时候，工厂主就更加无力同政府对抗了。

年輕的資产阶级是推动铁路建設的力量。德意志缺乏良好的陸路和水路；1831年，普魯士公路还不到一千一百哩。像萊比錫和馬格德堡这样的大商业城市当然知道铁路給它們带来的好处，萊茵和薩克森的工业更懂得这一点。起初专制君主及其臣僕对这件事还十分怀疑。普魯士邮政总局局长納克勒尔（他是“煽动者”的恶毒的迫害者，曾大批侦查信件）就激烈反对这“大受拘束的、从屬性的交通工具”，他的这番話竟博得普魯士国王的諦听，后者认为，如果他同自己的臣民同乘一列火車从柏林到波茨坦去，就会有損他的帝王神权。最多只有王侯中的幻想家，如巴伐利亚国王和普魯士王儲，才对新铁路有一点好感，其实他們对于铁路的巨大經濟意义也毫无所知。专制君主的愚昧无知往往对扩大德国铁路网起了破坏作用，但是不能阻止铁路网的扩大。铁路給各邦分立的偏見的坚固堡垒打开了第一个大缺口。不久卡尔·倍克就用一种值得怀疑的比喻，但頗有預言性地歌頌铁路是各国的新婚的合欢带，是光彩夺目的結婚戒指。铁路开发了德国煤铁的丰富宝藏。它有力地推动了德国大工业，使它开始进入南德，在奧格斯堡、紐倫堡、曼海姆安家落户。机器制造厂迅速发展起来，如柏林的博尔济希工厂和紐倫堡的克拉麦尔一克来特工厂。

但是手工业在德国仍占統治地位。它在30年代的經濟繁榮中经历了最后的全盛时期。有的行业，如制肥皂、制革、做手套、做帽子、制鍋等等由于大工业的竞争受到損失，却也有另一些行业，如机器匠、五金匠、石工恰恰从大工业給他們带来的工作中得到好处。在这方面得失可以相抵。总的說来，手工业是在发展；从事手工业的人数也比人口总数增长得快些，这一点特別表現在最重要的行业——面包工人和屠宰工人上，而在往常，这两种行业是同人口

的增減保持平衡的。但是現在行東和帮工之間的社會对立更加明显了。在 20 年代，手工业的缺口漸漸得到弥补；独立定居（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需要一定的財产；买卖扩大了，但是并沒有增多。一部分帮工不得不放棄有朝一日成为行东的希望。在 18 世紀，如果手工业过多，多余的部分就轉到雇佣军队里去；現在这种情况不存在了，也許換成了另一种形式，但对于参加过 1830 年以后的革命运动的、坚强的社会成員已經沒有什么誘惑力了。政治和社会的苦难迫使他們出国，到英國去，到法國去，到瑞士去。由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个十年中移居到美国去的德国人大大增加，达十五万人以上，而在 20 年代还不到八千人。

自然科学的进步同經濟的发展始終是相輔而行的。其中首先是化学，李比希成了这門学科的天才的先驅者，他在吉森建立了德国高等學校中的第一个實驗室。在柏林，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埃林堡，多韦、两个罗澤、約翰奈斯·弥勒都聚集在亚历山大·馮·洪堡的周圍。在新兴的城市里，人們对于过去在德国大学和文科中学里讲授的历史科学开始厌恶起来；这些城市建立了多学科的技术学校、工业补习学校、商业学校。南德的几个政府采取了一些促進手工业的措施；普魯士为促进工业发展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对大資本有利的。普魯士专制政权不相信工业的革命作用，同时却又本能地把大資本当作一种剝削和压迫的新力量加以欢迎。

这时文学和政治領域上的冰块也开始漂动了。七月革命的熾热气息首先熏灼着死气沉沉的群众。普拉頓用坚强有力的詩句譴責屠杀波兰的劊子手，沙俄的专制君主及其帮凶，彼得堡的皮鞭，柏林的軍刀。而白尔尼和海涅則向德国的专制主义发射猛烈的交叉炮火。他們都到了巴黎，怀着热烈的同情，经历了七月革命的最后的热狂和最初的失望。不久白尔尼就嘲笑君主立宪国是一个有

两个背脊的怪胎，肯定两面都得挨打。他是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犹太区里长大的。在那个自由城市里，它的最伟大的儿子歌德的精神已經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中世纪統治的陈年垃圾而外 現代的政治慘象明显地体现在邦联議会身上，从世界上最髒的犹太人街巷中产生了那个世紀最大的金融王朝，在那里，卑劣的金融寡头善于把无情的压迫和腐朽的庸俗同无限的利欲結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尖銳的对立很早就深深印在白尔尼的脆弱的心上。到了成年时期，他那敏锐的理智还不能消除这些矛盾。他热爱德国，热爱自由，他有力地打击侮蔑自由的人。他曾罵歌德是押韵的奴僕，黑格尔是不押韵的奴僕，但他自己也不能拯救自由。海涅的資质比白尔尼丰厚得多。他出生在工业发达的下萊茵，是青年歌德以后德国最有魅力的詩人，是黑格尔的高才生。当他在赫耳果兰島上听到偉大的七月革命的消息时，他全身是欢悅和歌唱，劍和火焰。他給浪漫主义唱过送終曲，在他的游記中，怀着对拿破崙崇拜的心情，反对普魯士容克的封建野蛮統治，捍卫萊茵区的資产阶级文明；他以天才的理解力把握了法国社会主义的內在实质。他向法国人展示德国哲学的秘密，并且預言了誰也沒有想到的事情——德国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将是我們偉大的哲学家的继承人。

普拉頓、白尔尼、海涅都在外国进行斗争，在德国的书报檢查制度压迫下，他們不能自由而大胆地說話。但是30年代中期，德国国内随着經濟上的变化，在文学的冰层下面也涌現出許多大大小小的泉源。在德国建成第一条铁路的那一年，也出現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作品，如盖尔溫努斯的《德国文学史》，它想利用我們的古典文学給德国資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斗争提供武器。伊梅尔曼的《后裔》，描写了封建主义同工业主义之間的阶级斗争，弗萊里格拉特的第一批詩歌，用热情、絢烂的文笔展现了世界貿易的領域。

蒙特的《圣母》和谷茲科夫的《瓦莉》，都是想走哲学和宗教的弯路得到白尔尼和海涅那样的荣誉，最后还有施特劳斯的《耶稣传》。

但是只有士瓦本的神学家这部看来同当前的斗争相距最远的、精湛的著作起了一种革命作用。盖尔温努斯始终是荒漠中的呼声，因为他自己身上的庸俗气息太重，不能感化别的庸人；他常常错误地理解古典文学，而且根本不懂古典哲学。年轻的弗莱里格拉特生活在政治纯洁的环境中，年岁较大的伊梅尔曼自己承认没有政治才能；他以半是旧普鲁士官吏、半是歌德的后继者的高傲心情，蔑视贵族恢复中世纪的企图、第三等级的金钱、大学生的煽动主义、黑格尔化的大臣；他认为，行东某甲多缴了一个格罗申的税款，或者教授某乙的坏论文登不出去，同他完全没关系。青年德意志分子蒙特、谷茲科夫、劳贝终于患了不彻底性的恶症。他们想恢复这个世俗世界的种种权利，但是正如谷茲科夫责备白尔尼那样，他们又不願把一切事情都让国王去管。这就是說，把馬駕在車子后面，因为当时在德国一切都是专制君王作主；格奥尔格·华希納明确地表示，他不能理解这种不彻底的努力。

事实上，在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品中摇摇晃晃地学走的是北德的自由主义，它是天生的一团混乱，塗着黑格尔的色彩，混和着浪漫主义成分，带有圣西门主义的气息。在蒙特的作品中甚至已经出现了“普鲁士的顶点”；所谓的煽动家劳贝受普鲁士警察大臣的委托到斯特拉斯堡去旅行，以便报道波拿巴主义者的阴谋活动，他还写了一本浅薄的文学史来反对盖尔温努斯，因为他感到盖尔温努斯的“纯理主义”太突出了。谷茲科夫受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的启发写出《瓦莉，怀疑的女性》；这是一本软弱无力的作品，它的怀疑的倾向十分薄弱，因而为50年代柏林学校图书馆里反动的虚无主义所容许，但是它的出版却促使邦联议会禁止了白尔尼、海涅

和青年德意志派的著作。这样一来，白尔尼和海涅更为活跃，青年德意志派却已經病入膏肓。卡尔·谷茲科夫是青年德意志派最有才能、最忠誠的代表者，他在《哈雷年鑑》出版以后認識到，繼續新时代的偉大斗争所需要的武器，并不是他懂得使用的武器。

三 哲學和浪漫主義之間的斗争

大卫·施特劳斯同伊梅尔曼一样（也許比谷茲科夫差些）缺少革命气质。他是土瓦本的一个教师，神学家，与其說是一个小市民还不如說是一个庸人，他专心細致，对于成长中的資本主义的不断增长的利潤需求頗能理解，但是始終反对資产阶级革命，詛咒无产阶级革命。他半是詩人，半是哲学家，先研究謝林的神秘的自然哲学，然后在磁学和梦游病的迷宮里徘徊，直到由于接受了黑格尔的辯证思想，感情同理智的矛盾在他身上得到解决为止。他以辯证思想武装自己，写了对福音书的批判，故意用的是学派的晦澀語言，以便只让官方的博学之士能够理解。

但是他的这本书成了一件划时代的业绩。賴馬魯斯的聖經批判及其有力的证明和平易的結論，曾經推动萊辛的哲学思想去研究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經過深入研究以后，德国的宗教哲学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了归宿，以便把上帝納入历史；把历史归于上帝。这时施特劳斯又用他的聖經批判对驕傲的精神堡垒发起了第一次冲击。18世紀的德国启蒙运动脱离实际的地方，19世紀的德国哲学又把它恢复了。但是施特劳斯的《耶穌傳》到底給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呢？施特劳斯本人也回答不了这个問題，他为这个令人苦恼的謎終身郁郁不乐。但是这个謎决不是不可解的。

七月革命像一道明亮的闪电使人認識到，黑格尔架在永恒的

理性同普魯士的現實之間的橋梁是用蜘蛛網織成的。甘斯轉而反对法的历史学派不过是另一些事件的序幕。如果說沒有別人認識这一点，那么当时已經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政党——封建政党是認識这一点的。它更加专横地树立起浪漫主义国家学的旗帜，亚当·弥勒和哈勒的旗帜；它得到普魯士王儲^①的大力保护，雅尔克、利奥、亨格施坦堡这三个从前的大学生协会會員成了它的天才的代言人；它創立了影响很大的机关报——《福音派教会报》和《政治周刊》。它那强烈的天主教倾向是由它的中世紀的理想，也由法国浪漫主义的决定性影响产生的。在《政治周刊》的报头上印着梅斯特尔的一句話作为題詞，这个刊物的編輯雅尔克公开地轉向天主教會主义，这同亨格施坦堡的教皇正統主义和利奥的历史观点当然是十分接近的。南德的自由主义已被打垮，北德的自由主义还像在梦里活动，結果自然是：浪漫主义的反动首先侵入宗教領域。它使宗教屬於国王和容克。与其說它同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結合在一起，还不如說它同自己的法哲学結合在一起。

对于我們的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說来，福音书的真實性是个已經解决了的問題。黑格尔自己曾經說过，至于單純历史的、有限的、表面的东西，聖經的故事必須和世俗的故事同样看待，普通真实故事的知識同信仰毫无关系。但是反动的浪漫主义是以这些故事的現實性为依据的，它的兴衰視这种現實性为轉移。这里必然发生哲学和浪漫主义之間的最初冲突。施特劳斯贊成对福音书的考察應該交給历史的批判去做。他彻底地进行了这一批判，使人永远也不会再相信福音书的历史真實性。他是黑格尔派，他所用的批判的武器同賴馬魯斯当时所用的根本不同，而他所得到的

① 指当时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之子、1840年即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譯者

結果也完全兩樣。他同黑格爾一樣，認為神的本性同人的本性是一致的。因此，在他看來，福音書雖不是歷史，但也不是創作，而是神話，是民間傳說，是教會無意識創造出來的產品。實際上這一點並沒有說明任何問題，但也許震撼了黑格爾的絕對理念。施特勞斯從實體和自我意識這兩個對立物（絕對理念是它們的更高的統一）中拿出神秘的實體作為教會神話的製造者。可以料到，自我意識不會這樣輕易任人一脚踢開。

根據這兩個觀點，施特勞斯的《耶穌傳》出版後產生的巨大影響就可以理解了。這部著作對國王的事業進行了歼滅性的打擊，它把世界歷史在其中找到歸宿的、黑格爾的絕對理念趕走。黑格爾的老一輩門人還在逐字逐句地閱讀老師的著作，而年輕的黑格爾的學生們却已考慮到，黑格爾哲學的核心不是平靜，而是不安，不是靜止，而是發展，不是體系，而是方法。他們聚集在泰奧多爾·埃希特邁耶爾和阿爾諾德·盧格這兩個年輕學者在1838年創刊的《哈雷年鑑》的旗幟之下。這個刊物的真正靈魂是阿爾諾德·盧格，他是波美拉尼亞人，生於呂根島，是大學生協會的老會員，因而被當作“煽動者”而受到瘋狂迫害，在克普涅克和科爾堡坐了六年的監獄。他具有優秀政論家的許多特性，有哲學修養，勤勉、活躍、有戰鬥性，對反動派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但是，儘管他經常罵這個笨蛋，罵那個傻瓜，而他自己也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一個大吵大嚷、強詞奪理的庸俗人物。由於一場幸運的婚姻，盧格過著舒服的生活，他以哈雷的房主，市議員，仲裁人和衛生委員的身份，甚至以受過迫害的煽動者的身分——如他自己所說，由於他的“種種法律上的糾纏”——對“長耳朵的抑郁不樂的人”宣稱普魯士國家政體是自由和正義的。他創辦《哈雷年鑑》，只是想把新鮮水引到舊文學刊物的泥沼里去；他想同老年黑格爾派的枯燥無味

的机关刊物《柏林年鉴》相对抗，又来介绍生活和科学。他在一次招募旅行中，在德国大学里召集了一批年轻的、但是非常复杂的人物；利奥也曾一度是《哈雷年鉴》的撰稿人。正如卢格自己所说，他的刊物这样快地同浪漫主义发生争吵是“很不对他的心思的”。

反动派本能地感到它的根基正在动摇，并利用野蛮的打击招来了它所畏惧的反抗。1837年秋，鄙夷招募者卢格的、哥丁根大学的教授们在年内就被世袭的国王驱逐出境了^①，因为他们认为荣誉高于职位。但是自由和正义的普鲁士却支持汉诺威王党的暴行，当时冯·罗霍夫大臣说出一句得到广泛流传的话：臣民的智力是有限的，目的是使哥丁根七教授的勇敢行为在普鲁士各城市中博得的喝采声成为笑谈。普鲁士专制王朝虽然具有中世纪浪漫主义的倾向，但是在通婚问题^②上同罗马教廷的意见不一致，而且执行反对天主教主教的宪兵政策，虽不是绝后，却是空前地把教皇全权主义的事情变成资产阶级自由的事情。因此普鲁士的浪漫主义者陷入某种窘境。当利奥听到科伦大主教被捕的消息时，他想像偷偷地打野兔那样，攻击每个黑格尔派分子，于是不管愿不愿意只得写文章反对“汉诺威王党分子”哥列斯，哥列斯曾站在教皇全权主义的立场上对普鲁士国家极尽譏諷之能事。卢格选中了这个时刻从哲学出发对他的朋友利奥进行最彻底的批判，把他的怪论——当然是一车破烂罐子——打得粉碎。这时，在知识、才能乃至粗野

① 1837年哥丁根大学七教授（其中有著名的语言学家、童话搜集者格林兄弟和盖尔维努斯等）为抗议汉诺威国王废除宪法而被撤职，其中有人被驱逐出境。——译者

② 指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通婚。由不同宗教间通婚所生子女的信教问题引起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会的冲突。1837年，科伦大主教因拒绝服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以叛国罪名被捕，冲突就此开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普鲁士政府向教会投降，这一冲突遂宣告结束。——译者

无礼方面都大可同卢格抗衡的利奥就控告黑格尔派危害国家，因为它否认任何人格的上帝，说福音书是神话，反对永生的说法，宣扬唯有今世的宗教，虽然如此，却装出一付基督教党派的样子。从这时起，哲学同浪漫主义之间的斗争公开爆发了。

《哈雷年鉴》仍然是“黑格尔的基督教徒和黑格尔的普鲁士人”。它的理想是普鲁士的官僚和军人国家。卢格由于写了一篇评论海涅的庸俗文章，受到文化部的赞扬。官方的黑格尔派在文化部的大厅里找到它最后的安身之所。但是在王储及其浪漫主义的僕从面前，文化大臣阿尔坦施泰因和他的枢密顾问约翰奈斯·舒尔采太软弱，或者太胆小，除了忧心忡忡地容忍青年黑格尔派以外不敢再有所作为。卢格恳切要求担任一项国家官职，作为对他的成绩的承认，文化大臣和枢密顾问不肯答应。于是《哈雷年鉴》逐渐转向政治反对派。它宣称，普鲁士国家的原则，一切结果都合乎理性的基督教，仍然是真理，但是普鲁士的现状从发展来看是不能持久的，从本质来看是不真实的。这时卢格要想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政治上“彻底追击”浪漫主义，但是这个“不切实际的老太婆”（他对浪漫主义的称呼）却比他下手得早，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登极，《哈雷年鉴》没能击败浪漫主义，自己倒被击败了。

第五章

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

一 德国逃亡者的秘密社团

利奥和卢格，浪漫主义和哲学的两个主要斗士彼此猛烈攻击，同时双方以同样的热情断定，他們对于自己参加大学生协会的往昔始終是忠誠的。就某种意义上說，他們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坚持这一点。在經濟发展的更为强烈的气流中，汇成大学生协会的各种不同的流派必然分离。是的，学府中的大多数叛逆者这样彻底地同統治势力締結了和約，以致从沒有离开过正道的普魯士官僚又義又妒地搖摆着脑袋，想出这句俏皮話——誰也不能像轉变立場的煽动者那样快地飞黄騰达。

由于类似的原因，被反动浪潮冲出德国国境的革命分子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分化。不过外国的自由气氛，已經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以及德国政府的繼續迫害把这种分化的重心推向革命方面，而不是推向反动方面。德国逃亡者在中立的瑞士国土上碰到了同他們一样受过梅特涅及其帮凶迫害的意大利和波兰的难友，在法国，他們接近了社会主义运动。因而德国逃亡者面临一場严格的考驗，看他們身上还有多少偏狹的醉心德国的思想。在他們的两个

組成部分中，手工业工人比大学生較好地經受了这一考驗，在大学生中只有最积极的分子能够越过或多或少褪了色的激进主义得到了发展。

当时巴黎是欧洲革命的首都。1834年，在支持南德反对派报纸的一个公开的人民团体遭到法国政府压制以后，在巴黎成立了德国流亡者的第一个秘密組織，被逐者同盟。根据这个同盟的規章，它的目的是：解放和复兴德国，确立和保持社会和政治的平等、自由、公民道德和民族統一。它像法国的人权社一样，追求民主共和主义的目标，而且也像人权社一样是一个分成許多等級的密謀組織，盟員对秘密的上級必須无条件服从。在同盟的領導人之中有两个从前是大学里的私人讲师：哥丁根大学的泰奧多尔·舒斯特尔和海德尔堡大学的雅科布·費奈迭，后者是科倫人，由于参加汉巴哈大会，在他的故乡的官厅的要求下被捕，可是当他被押往普魯士监狱途經萊茵普法尔茨时，在小城法兰克塔尔被年輕的約翰·菲力浦·貝克尔釋放了。同盟的盟員是几百个手工业工人，其中不仅有定居在巴黎的，而且也有早晚要回到德国去的流动工人。同盟要想同德国取得联系，就正需要保持这种关系，事实上它同許多大城市，如汉諾威、不来梅、柏林、萊比錫、慕尼黑、法兰克福、美因茲都有联系。但是，当1840年警察发觉这个同盟的时候，它已經病入膏肓了。

衰敗的苗头可以一直追索到《被逐者》的头几期，这是个月刊，是同盟的机关刊物，从1834年以来由費奈迭主編。这个杂志的創刊号上登載了白尔尼論拉梅耐剛剛发表的著作《信徒之言》的狂热的文章，白尔尼給自己的評介文章冠上“挽救”这样一个标题，并认为各族人民的繁荣起始于宗教的感情社会主义。拉梅耐（过去他是爭取教皇世界統治权的先鋒战士）用聖經的文体宣揚了这种社会

主义。費奈迭本人也同拉梅耐有思想联系，贊成他的話：任何人都有权利保存他所有的东西，否則人們就不需要占有任何东西了；任何人都有权利通过劳动获得他所沒有的东西，否則貧困就会永远存在下去。虽然这里面并沒有什么高明的哲理，可是后来成了德国式的愚蠢的知名人物的費奈迭当时还是借此發揮了一些有力的言論。他以宣傳饥饿自負，在饥饿的血腥战旗上写着：我們沒有工做，我們沒有飯吃。但是他极力抹杀正在展开的資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他否认，里昂和曼彻斯特的产业工人所受的痛苦是同被压迫者的一般痛苦不同的特殊痛苦。他认为利用救济穷人，保障必需的人，对富人課稅的办法，政治自由也会带来社会平等。自由的国家保证有劳动力并願意劳动的公民能过富足的生活。他把爭論革命胜利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叫做胡鬧。如果一只猛兽闖进了圈牲口的圍籬，在里面胡作非为，那么看牲口的就先把它打死，然后他們再討論怎样用更好的圍籬防止猛兽侵入。

舒斯特尔在《被逐者》第五期上反对这种說法。他說，唯有伪善的阶级利己主义产生对国家的最好制度的不同見解。对于有自然力的人們說来，只有一个社会真理：人类平等，在現在的情况下，达到人类平等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革命。“我們要积极地在这些阶级中普及这种学說，无论は錯誤的認識，或者是頹廢的道德都沒有使这些阶级堕落，只有在它們之中还有蓬勃的朝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它們最切身的利益要求以平等的精神改变我們的国家組織——我說的是劳动阶级；我們要用專門知識闡述这种变革的可能性和它的好处——当然，人們由是就不用担心有党派之分。”舒斯特尔根据历史十分明确地指出，为革命而革命是毫无意义的；自由的法律和制度如果像一套不合身的衣裳，就决不会有什么用处。

舒斯特尔以美利坚合众国为例特別詳細地指出，社会状况支配政治制度，而不是相反。“北美貧民的大幸是，那里的居民疏散地分布在广大的国土上，因此他們之中的绝大部分可以依靠种地为生，这样就可以过着小康的生活，享受到較大的独立。北美积极的农业活动必然影响到城市的工厂工业和手工业。那里的劳动者不多，因此需要增加劳动力，工人的工資提高了，随着工資的提高，工人就得到更多的知識和独立。”由于这些原因，在美国金錢統治的发展也就緩慢了；“但是紐約和費拉德尔菲亞近来的选举活动經常表明，两个由于利益和政治目的不同而成为敌人的阶级在一种民主政体下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斗争的必然結果不是消灭这种政体（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形式上），就是通过社会革命彻底消灭特权阶级。”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状况同欧洲的君主国比較起来“也不是前进了很远”。在这两个地方都是游手好闲的人飽食終日，勤劳干活的人忍饥挨餓，豪富和罪恶下令，貧困和美德服从，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摆脱目前穷困的办法只有社会革命。

然后舒斯特尔还反对費奈迭的药方——对富人課稅以救济穷人。他承认，美国的稅比欧洲少，可是因此稅就分配得比較公平嗎？这些稅绝大部分是間接稅和进口关税，因此穷人的負担比富人重。还没有听说，美国的国家领导人利用稅收为可以促进劳动阶级的福利的、首先需要的和暫时有用的設施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比如：預借不要利息的資本促进劳动阶级的合作組織，利用这种合作組織以及通过由国家为沒有飯吃的劳动者建立工厂的办法，把工人从資本家的魔爪中解放出来，为了照顾孤儿、无法糊口的殘廢和无人照顾的老人設立許多体面的設施。美国政府为了便利国内交通，把国家收入特別用于修筑铁路、运河等等方面，这件事本身是无可非議的，但是很明显，这样以来富人的財富和穷人的貧困都

增加了。“我說，增加了，是因为根据距离縮短，交通加快的程度，人口的密度就要增加，工业的中心就要增多。一种激烈的竞争——企业資本的竞争、劳动力的竞争又恢复了；产品价格下降，但是劳动者的工資也随着下降了。这一切都是社会福利破灭的朕兆。在普遍衰敗之中，只有一样东西不可估量地、貪得无厌地增长着，那就是个別人的財富，是資本。別人的劳动成果归它所有，发展工业，提高技术的利益由它享受，社会的一切善行和一切貢獻的收获也是它的。財富越多，利欲越大，利欲越大，发明的願望也就越热烈；机器出現了，并且代替了人力的劳动；这是饥饿和貧困的一个新的根源，于是就出現了这种情况，在我們的社会状况中，工业和技术上的任何进步都是公民幸福和人类教育過程中的一种后退。”

舒斯特尔从这些前提中得出这一結論：“我国人民，地球上的各族人民如果不把合众国的共和政体的失敗視為前車之鑒，而以打碎国王的枷鎖，听命于商人統治为滿足，那就是对自己的幸福，对人类犯下了一項罪恶。如果人民看清了这一点，那么在下一次革命中就不仅仅要推翻君主，而且要推翻君主政体。君主政体的实质不在于紋章，也不在于王位，而在于特权。而一切特权中的特权乃是財富。倘若革命的利斧砍倒了这个敌人，王权、世襲貴族和驕橫的商人就会随着它一起垮台，正如墙基一坍，墙壁也跟着倒坍一样。倘若斧头沒有把它砍伤，剩下的一切就会按着它的肩膀重新站立起来，一直到一次新的雷火把这新的建筑物彻底粉碎为止。”

費奈选用一般的激烈言詞回答这些雄辯的論述，他的答复只是证明他根本沒有理解舒斯特尔的意見。1835年，他被法国政府驅逐出境，德国手工业工人接到邦联議会叫他們离开巴黎的命令，这些措施的目的当然是进一步把无产阶级分子赶出被逐者同盟。

《被逐者》在一篇匿名发表、但显然又是出自舒斯特尔手笔的論自由的文章中宣称：“是的！我們在朋友和敵人面前高声宣布，我們的意图并不是以那种变换政府和宪法的可怜的滑稽剧为满足，在近代史上，这种变更往往牺牲人民的利益为自己带来好处。我們的目的不在于此，不管怎么样，騙人总不是我們的本性，所以我們从現在起大声說出这个目的。它就是：劳动阶级的彻底的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被逐者同盟的分裂迫在眉睫了。

在这个同盟成立以后不久，在瑞士也成立了德国逃亡者的一个組織。1834年2月，馬志尼曾从瑞士武装侵入薩瓦，得到德国革命者的支持。薩瓦进军失败了，这时馬志尼就組織各族人民的青年欧洲以对抗各国国王的老年欧洲。青年欧洲由青年德意志、青年意大利和青年波兰組成，后来青年法兰西和青年瑞士也参加进来。从馬志尼的最高領導就可以推断，青年欧洲沒有社会主义倾向；在它1834年4月結盟的文书中，把自由、平等、人道称为三个不可侵犯的要素，只有这三个要素可以解决社会問題。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甚至談到私人財产是神圣的。由于同样的理由，青年德意志也同被逐者同盟一样主要是在旅居瑞士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中进行鼓动。瑞士的結社自由和集会自由使它比被逐者同盟在巴黎有較大的活动余地；它的盟員建立了許多公开的教育、閱讀、歌咏、体育协会和其他工人协会，盟員們可以在这些协会中教育德国手工业工人，吸收新盟員。青年德意志分布于伯尔尼、苏黎世、日内瓦，后来也分布于比尔、奏洛士恩、圣加冷、洛桑和其他瑞士城市。

青年德意志同巴黎的同盟有精神上的联系：它也把《被逐者》和拉梅耐的著作当作自己的綱領性文件出售。同时这个組織还培植一种半散文、半詩，半恐怖、半浮夸的文学，用的是大学生协会的

雅各宾派的文体，这一派曾經磨快匕首对付背叛的君王，現在在青年德意志的創始人中有不少代表者。德国手工业工人在伯尔尼附近的斯坦賓茨尼举行的一次集会上，降下了南德王朝的国旗，升起了黑紅黃三色的旗帜，这时南德的王朝就更加害怕了。馬志尼入侵薩瓦已經使梅特涅大吃一惊；他通过邦联議会压迫瑞士議会取消青年德意志成員的避难权。瑞士議会沒有立即答应，于是奥地利和普魯士，还有法国就派密探到瑞士去，其中有一个普魯士大学生萊辛在苏黎世被人刺死，凶手始終沒有抓到。德意志邦联禁止大学生在瑞士大学讀书，禁止手工业工人在瑞士流动，当时以及后来最有效的办法是以貿易封鎖相威胁。瑞士議会終於就范；它通过1834年和1836年的屢次決議把德国革命者驅逐出境，解散德国手工业工人协会。从憎惡的程度上來說，共和国驅逐逃亡者并不亚于君主国迫害“煽动者”；这件事又证明，国家政体的差異不是一个重要的問題。青年德意志只剩下几个殘余分子留在日內瓦州和伏特州，那里的官厅对于抓捕工作比較馬虎一些。

在青年德意志遭到压迫的同时，被逐者同盟也分裂了。比較积极的盟員在舒斯特尔的領導下分化出来，无用的革命把戏使他們感到厌恶，他們把宣傳放于密謀之上。1836年，他們創立了正义者同盟，盟員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并有一个民主的制度。以后选出了領導机构。在盟員中的杰出人物有拿騷的卡尔·沙佩尔，他以前在吉森大学学森林学，参加了襲击法兰克福哨所的行动后逃到瑞士，被赶出瑞士之后在巴黎靠当排字工人維持生活，还有法兰克尼亞人，鞋匠亨利希·鮑威尔和馬格德堡人，裁縫威廉·魏特林。环境迫使同盟差不多仍然是一个密謀社团；正如被逐者同盟以人权社为支柱那样，正义者同盟則以四季社为自己的仗恃。这时在正义者同盟內部产生了摆脱巴貝夫主义的粗糙形式的热烈願

望。1838年魏特林写了《人类的現況及其未來》这一著作，这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告白，形式上受了拉梅耐很大的影响，內容上則受了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强烈影响。盟員們为了傳播魏特林的著作所表現的牺牲精神，证明这些观点已經深入同盟內部。他們为了使这一著作在一份秘密報紙上发表，并印成两千份散布到德国手工业工人中去，忍受了巨大的困难。魏特林也按照空想社会主义的精神，为巴黎的德国裁縫帮工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食堂，給这些人带来很大利益。

四季社在1839年5月12日发动起义遭到惨敗，作为它的德国人分部的正义者同盟也被卷入这一惨敗之中。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鮑威尔被长期拘禁后，离开了法国。他們到了倫敦，同科倫的一个钟表匠約瑟夫·莫尔一起于1840年2月7日建立了一个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它直到今天还存在着。同时他們恢复了正义者同盟，并把它的重心移到倫敦。魏特林在巴黎把分散的分子聚集起来，1840年夏天他短期移居瑞士，1841年春天就长期定居該处，以便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他碰到許多巨大的困难。起初他当然想同青年德意志的殘余分子取得諒解，但是“汉巴哈和斯坦賀茨尼的后裔”对他进行强烈的抵抗。青年德意志派对于共产主义可說是毫无所知。他們在日内瓦的工人教育协会中占統治地位，并把厌恶一切政治活动的會員，特別是瑞士會員从协会中排挤出去。他們決不願意自己受到共产主义者的排挤。魏特林爭取到他們之中的个別人，如格奥尔格·毕希納的朋友奧古斯特·貝克尔，但是他不能把整个工人教育协会都拉到自己这一边来。甚至当他想使协会的大多数人贊同一个公共食堂的計劃时，青年德意志派对他投不信任票，阻碍他当选为主管人，虽然他自己已經提出，如果食堂得不到預期的贏利。

他担任这个职务不取任何报酬。“汉巴哈的政治家們”毫不躊躇地把五个有共产主义嫌疑的會員赶出了协会，并且决定，如果多数人有共产主义思想，那么少数人可以要求占有协会的財产。青年德意志派表現得越胆怯、越頑固，魏特林在这些斗争中就显得更加活跃，更加高兴。他认为、为了看一看年輕的共产主义原則是否适应它的偉大目标，为了使那些战战兢兢的外交官、市当局和市儈也习惯一下共产主义學說的喧囂，就像船戶听慣波濤澎湃的声音一样，这些斗争是必要的。

邦納羅蒂在瑞士流亡期間曾为共产主义爭取了一些伏特州的富人，魏特林似乎得到他們虽然只是秘密的，但較大的支持。后来他由于結識了土瓦本的制革工人西蒙·施米特而得到一个杰出的管理人才。魏特林同施米特一起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正义者同盟，起先盟員遍布瑞士法語区，后来也扩展到瑞士德語区。盟員入盟时必須接受下列信条：“我們劳动者終于不願再为那些游手好閑的人劳动了，我們衣食不足，他們却綽綽有余；我們不願让这些利己主义者把重担放在我們肩上，我們也不再尊重法令，这些法令为了使极少数人发财，成为劳动群众的主人，而把人数最多、最有作为的阶级处于低下、貧困、屈辱和无知的状态。我們要使自己，要使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像我們这样自由地生活，任何人都不比別人受到較好的或較差的照顾，而是大家分担共同的負担、劳累、愉快和享受，也就是过共同生活。”盟員称对方不用客气的称呼“您”而用“你”，并且彼此兄弟相称；他們團結在一起，任何中伤，哪怕其中有一部分是事实也会遭到拒絕，弄得中伤者面紅耳赤，他們生活簡朴，研究和討論一切社会制度，口头宣傳盟的原則，傳播盟的文件，每月交少量的盟費等等。

这个同盟为了也能在像法国和德国这样一些沒有結社自由的

国家里活动，就只能是秘密的。要不是这样 魏特林就同青年德意志派相反，不仅主张团结所有工人，而且也主张公开宣传了。他想把认识最明确的、最积极的共产主义者集中在秘密同盟之内，组成一个核心。然后他们就可以从这个核心出发，领导公开的教育、阅读、歌咏协会和公共食堂。他把协会中的活跃生活看作是政治生活的真正的预备班；他把协会叫做社会的真正的、直接的缩影。盟员们三五成群地在住宅、工场和饭店里集会可能遭到暴力的干涉而归于失败。但是，“人的任何权力也不能阻止善良和真实的宣传，谁也不能制止人们在劳动时、在餐桌边、在他们的卧室内，以及在他们散步时说话。”此外，魏特林还利用报刊进行活动。早在 1841 年 9 月，他就开始编一个月刊，叫《德国青年的呼吁》，它的格言是：反对一切损害整体利益的个人利益，争取整体利益，但不把任何人除外。从 1842 年 1 月起，这个机关刊物改名为《年轻一代》，同年 12 月，魏特林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这本书是他的著作中承上启下的一部主要著作。魏特林之所以得到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理论家这个荣誉主要是依靠这部著作。

二 威廉·魏特林

威廉·魏特林 1808 年生于马格德堡，他是个未婚生子，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学的是裁缝手艺，1828 年到 1835 年在德国流浪。关于他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而且在这很少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关于他的经历的可靠材料。据说他曾通过写讽刺诗参加了 1830 年萨克森的暴动（他在其主要著作中曾批评这次暴动是轻举妄动）；在维也纳，一个年轻的姑娘爱上了他，因而他成了一位大公的情敌，后来就被这位受了骗的大公赶出了维也

納城。30年代中期他到了巴黎，一直待到1841年（其間有一些間斷）。他在正義者同盟中熱情地參加勞動階級的革命鬥爭，同時以旺盛而活躍的精力貪婪地學習法國社會主義的學說。他企圖改造這種學說以適應當前的鬥爭。於是他就成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之間的紐帶。

這種情況同他居於中間的社會地位是相適應的。魏特林已經是一個無產者，但還是一個手工業工人。他屬於不可遏止地淪為無產階級，但也正因為如此還沒有明確的無產階級意識的小資產階級階層。作為一個被壓迫階級的成員，魏特林清楚地認識到，空想社會主義者對於國王和富豪的希望是不會實現的；他沒有完全放棄這種希望，但是他把這種希望看作是決不可靠的事情。由於他出身於小資產階級，所以他不了解無產階級的特殊歷史生活。他的理論基礎仍然是在法國社會主義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的平等；他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是出色的，但他完全站在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道德的立場上。對歷史的理解方面，他甚至遠遠落後於聖西門和傅立葉。他關於私有制關係的產生的假說是站不住腳的，他還贊同啟蒙運動的歷史觀點：世界歷史無非是一大部強盜歷史，不管在什麼時代正直的人永遠受欺騙。

當然他也遠遠地超出這個觀點。魏特林相信社會進步是一條自然規律，他知道，這個規律在今天的社會中也發生作用。同傅立葉一樣，他把人的欲望看作是社會組織的要素，只是他把傅立葉對人的欲望的分類大大簡化了。魏特林認為欲望有三大類：即知識欲、占有欲和享受欲。滿足欲望的能力是適應於欲望的，這種能力的運用就是人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能力是欲望的自然界限。但是為了使整個機體活動起來，大自然把它的一切魅力都放到滿足享受方面。這些魅力刺激感官，產生新的欲望，從新的欲望中產

生了新的能力。人类的进步就是这样发生的。

因此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类欲望和能力永远保持平衡。能力随着欲望增长，欲望也随着能力增长。社会上一切祸害的根源就是用暴力破坏了这种平衡。“从所有人的欲望和能力的自由与和谐中产生出一切好的东西，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压抑和克制这种欲望和能力则产生出一切坏的东西。这短短的一段话包括了一切。”在今天的社会里，为了满足某甲的欲望而抑制某乙的欲望，就造成社会关系中的可恨的不平等的现象。这种不平等现象产生法律、犯罪和惩罚并使其不断增加。不平等现象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占有欲和享受欲占了统治地位，而知识欲却必须屈服于它的两个伙伴的肉体贪欲之下，并为占有和享受的利益而堕落成为荒诞、错误、迷信、欺骗和谎言。

但是知识的力量不会长期受到压制。它用下述办法实现它领导社会的要求：它慢慢地挖垮现社会的基础，出人意外地给进步开辟道路，它把发现和发明当作诱饵扔给占有欲和享受欲。占有和享受的欲望伸手去抓这些发现和发明，却没想到它们这样做正是颠覆自己的统治。魏特林举出的例子是蒸汽力之用于机器，特别是印刷术。他说，印刷术能够收集和保存知识的火花，一直到它有足够的力量战胜个人利益的欲望为止。

可见，魏特林很懂得用他自己的方式运用经济学上的辩证法。只是这种方式是一种无产阶级化了的手工业者的方式，而不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的方式。魏特林决不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而忽视政治自由的意义，他明确要求结社、出版和选举自由。但是最后他发现，在金钱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样做不会获得任何成效。他正是站在空想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在他评论结社自由时，这种立场表现得特别明显。魏特林攻击傅立叶，因

为后者认为，在法倫斯泰爾中除了劳动應該得到报酬而外，資本和才能也應該得到报酬。他譏笑傅立叶主义者妄想引誘有錢人上鉤。他希望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如果这种联合对他來說来有一半是革命宣傳的武器，那么也有一半是共产主义宗派的武器，就像他十分重視公共食堂这一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同时也获得进行統治的能力这一思想在他的头脑里剧烈活动，但是始終沒有十分明确地表露出来。

不过，魏特林虽然还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識，可是他也已經离开了资产阶级的烏托邦主义。他知道，工人阶级不自己解放自己，它就永远得不到解放。在魏特林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傅立叶所期待的乐善好施的百万富翁。当然从魏特林的全部見解来看，这个革命必然以劳动者的日益貧困为基础，而不是以劳动者的日益强大为基础。他想把現存的混乱状态推进到頂点，把劳动阶级扔到无限的貧困境地。他把劳动阶级的絕望看作是革命最有效的动力，他甚至把希望寄托在流氓无产阶级身上，宣揚盜窃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最后手段。

有了这种看法，当然他就要准备一个能够代替已被推翻的旧社会的新社会的計劃。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使欲望和能力自然保持平衡，从而保证知識欲，也就是学識欲对占有欲和享受欲，也就是生产欲和消費欲的管理。是管理而不是統治。“一个完善的社会沒有政府而只有行政管理，沒有法律而只有义务，沒有惩罚而只有治病救人的手段……这里既沒有各种尊榮的称号，也沒有种种奴顏婢膝的形相，既沒有外表的荣誉的标志，也沒有外表的卑賤的标志；这里沒有命令和服从，而只有調整、安排和完成。这里既沒有犯罪也沒有惩罚，而只有人类的毛病和缺点的殘余，这是大自然所加給我們的一些障碍，为的是通过清除这些毛病和缺点激发我們

的体力和智力 使它們成为进步的动力。”人們不是用法律和懲罰来肃清这种殘余，而是用藥剂；魏特林专门写了一章来論述哲学的医学。

魏特林絞尽脑汁想出了将来領導大家庭联盟（这是他对未来的社会的称呼）的新管理机构。担任領導的是一个三人小組或三人委員会，由最偉大的哲学家、同时又是医学、物理学和机械学方面的最偉大的天才組成。其次是中央技工团，它选举三人小組，并管理大家庭联盟的最重要的机关。再其次就是各技工团，它管理大行政区、州、县和小家庭联盟。为了便利和簡化管理，每一个技工团从它里面选出一个工作理事会。中央技工团则选出大工作理事会，它輔佐三人小組作为实际执行的管理人員。各科学院輔佐各技工团，以便在舒适而美好的劳动尚未普及以前，对这些劳动进行管理；从科学院之中选出一个委員会，名为科学院參議会。所有这些領導管理的机构都有一个卫生委員会为輔，这些委員会又都在一个卫生參議会的特別領導之下。卫生參議会同大工作理事会一样，輔助三人小組管理大家庭联盟。

仔細研究这些細节，甚至对它們进行批評都是多余的。空想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的作者为了证明他們的改良主义思想实现的可能性，而用或多或少的技巧鍊炼而成的外部骨架，而在于这些思想本身，在于这些思想探究社会弊害的精确度和深度。对魏特林說来更是如此，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得已的烏托邦主义者。他只能認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消极一面，所以他只得在脑子里虛构出这个革命的积极一面。但是他十分清楚地感觉到，这样做只能提供一种代用品；在《保证》一书的序言中他就說明他的任务是，告訴社会，它在一个坏組織中是什么，在一个好組織中又能够是什么。他提醒人們不要过于重視那些心愛的建設計劃，他认

为，宇宙之間沒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从来没有过一个万古不变的、永远是最好的社会組織。但是以梦想建立科学院參議会和卫生參議会，建立技工团和中央技工团以及最偉大天才的最高三人小組为基础的改良主义思想表明，魏特林清楚地看到統治者的个人利益剝削社会。魏特林說，任何人都不应比政府更穷；只要允許管理公共財产的人占有和掙得特殊的財产，他們就会利用职权損害大家的利益。魏特林的大家庭联盟不是領導人，而是领导能力。工作人員的录用不是通过选举某某人，而是通过选举能力，通过悬題应征、送审选举試驗品的方式来进行，例如：关于有益的科学問題和发明、发现的书面論文，艺术品的样品，建筑、机器、工具以及类似物品的图样、設計。各应征人把他們的作品送交他們想进去工作的那个团体。但是他們的姓名概不公布，只有在試驗合格决定录取时才为人所知。

魏特林沒有只顧人类欲望和能力的和諧而忘了它們的自由。他再一次仿照傅立叶的先例把劳动分为必要的、有益的和舒适的。給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規定出一定的劳动時間，以进行必要劳动和有益劳动，这样他就可以从社会得到必要的和有益的生活必需品。魏特林认识到社会劳动对个人劳动的优越性，他懂得把它們清楚地区分开来。他认为每天劳动六小时就够了。舒适的劳动同必要的和有益的劳动情况不同。因为大自然不强迫任何人享受舒适的物品，所以也不能强迫任何人做舒适的劳动。互相制約的全体的和諧和个人的自由必然要求，让每个人自己决定，他是否想以一定的时间为舒适的享受而劳动，時間的长短按他对于这种享受的欲望多少而定，或者，如果他完全沒有这种欲望，他就可以不为此而劳动。在这一方面，魏特林用一种交易簿来調整生产和消費，交易簿上一边記的是完成的劳动小时，另一边記的是得到的享受，

并且都盖章签字。交易簿是魏特林的得意之作，他曾用生动有力的語句頌揚过交易簿：“它同时是：旅行证、出生证、籍貫证、通行证、艺徒证书、支票、收据、帳簿、日記簿、学校毕业证书、入场券、介紹信、公份册、存款证、月份牌；它是一面个人的一切精神和物质需要的鏡子，是他的一張半身像片，他的履历，总之是一个人的全部形象化的‘我’，一个还从来没有这样表現出来过的‘我’。”在这一欢呼声中，解除了手工业工人由于警察規定的无数证明文件而造成的无穷的煩惱和痛苦。

可是在推翻了旧社会以后，怎样建設新社会呢？由于魏特林在社会上居于中間地位，所以他在这个問題上搖摆不定，同时得出結論說，最值得希望的过渡时期当然是这样：一旦由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有某一个人掌握了政权，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忠于共产主义原則，并把他的幸福、他的荣誉、他的生命都寄托在实现这个原則上。他又談了談这个問題然后用热情的話語結束：“一个新的救世主将要来临，为了实现那第一个救世主的學說。他将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建筑，把泪泉导入遗忘的大海，把大地变成一个乐园。我們准备好，恭恭敬敬地迎接他吧！但是我們从哪些方面来辨认出这位救世主呢？从这些方面：他将是平凡、朴实地走来，傲然地蔑視財神的魔术，并且他的心将为人类的痛苦而敞开。他将从財富的高峰下降到貧困的深淵，混杂在受苦受难和受蔑視的人群之中，他的眼泪将同那些人的眼泪交融在一起……但是不到这个勇敢的事业圓滿地完成，他将絕不把授与他的权力从手里放下。那时候少数人的意志将不再統治社会，統治社会的将是全体人的知識。并且这个最偉大的救世主将会在一种不声不响的谦让中听命于这个新的統治。这将是他的事业的頂点，所有的人将从这一点辨认比第一个救世主更偉大的第二个救世主。”尽管这些偉

大的幻想驕傲地擺脫了傅立叶主义者对富豪的錢袋的期望，但它也回到烏托邦主义之中。

魏特林碰到一些实际上阻碍工人阶级解放的問題时，无产阶级的意識在他身上显得更为活跃。他看穿了爱国的谎言，“它对于进步和自由的最凶恶的公敌來說，是他們的謬論的最后的救急太平鎗，是他們的特权的救生圈”，他把这种谎言扔到他們脚下，“为了站到人类的旗帜下去，在保卫这面旗帜的人的行列中是没有高低、貧富、主人和奴隶之分的。”他用一个問題道出了現代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今天，一个人在一切外国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在所謂的祖国內也毫无所有，这个人对于它能有什么爱呢？”不論是誰，不論是拿破侖、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是尼古拉来行使統治，劳动者不論在这一个統治者或是那一个統治者之下，都同样必須作牛馬。

魏特林对于妇女問題的看法就不是这样无可非难的。他还相信男人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只要大自然还没有創造出奇迹，只要妇女在有益的科学、发明和才能上还没有超过男性，妇女就不能担任新社会的領導职位。但是这也是手工业者的家务在魏特林关于婚姻和愛情的看法上投下的最后一个阴影。除此而外，他对資产阶级婚姻的批判是既尖銳又中肯的。“愛情是一个硬壳果的果仁，婚姻是外壳。金錢制度就是侵入果仁并敗坏它的虫。許許多人啃那苦澀的、坚硬的外壳。从这里你們就可以得到我們今天的婚姻的定义了。”魏特林要求一种自願的、不受任何外力强迫的婚姻的結合。如果夫妇双方不能通过尊重、友誼和愛情的需要而結合在一起，“那末看在上帝份上，还是解除这种关系吧！不要再互相制造第二个、第三个地獄了！”接着他又用十分动人的語句結束了这一章：“拭干你的眼泪吧！可怜的、不幸的、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妇女！想一想，在地球上还有許多的弱者在受苦。总有一天，解放的

金黃色的朝阳也会突然照到你的臉上，为了好从你那湿润的睫毛上把那奴隶的痛苦热泪吻去。那时，你就傲然直视你那暴君吧，因为你不再需要他了，法律也不再保护他了；那时候，可怜的、受騙的、被誘入歧途的妓女，你也会找到一个正直的丈夫，他举足踩碎那一大堆的偏見；那时候，你們这些在錦绣年华里充滿着生命之欢乐的青年男女們，生活吧，相爱吧！那时候，让今天違反自然地被鎖閉在你們胸中，噬蝕着你們的心、削弱着你們的活力的热情一齐都倾泻出来吧，免得它有損社会的和諧和你們的健康。那时候，誰有愛的能力，誰就愛吧。”三岁或六岁以上的儿童的教育由社会負責；这些儿童都参加学习軍，学习一切科学和艺术，习惯于作一切劳动，尤其是最不愉快的劳动；青年的学习應該同社会生产劳动結合在一起。

魏特林嘲笑那种为教会所利用，以对一个不可知的来世的希望使受苦的阶级忘掉今世的痛苦的宗教。他鄙視那种“宗派的杂貨摊”。但是在形式方面他从拉梅耐那里学了很多东西。他相信原始基督教是被压迫阶级的一种革命运动。他坚决主張在共产主义原則容許范围内保护一切别人視為神圣的东西，他在《保证》一书中，对耶稣表示同情，不久以后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地表露出来。

不言而喻，在經濟方面魏特林对工业的批判远远不及商业。他清楚地知道，大工业明显地制造大量的貧困，但是他认为，今天工业赚的錢不如商业那样多。他把商业看做是吸群众骨髓的大水螅，他以最大的憤怒，痛罵金錢与商品的杂貨店。作为德国人，作为普魯士土著，他对头銜的杂貨鋪和軍事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他关于虐待士兵問題所写的一些話今天讀来还是十分新鮮。

魏特林的主要著作剛一出版就引起人們很大的重視，这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在思想方面沒有达到西方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

者那样的高度，但是他冲破了把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同工人阶级隔开的栅栏，就他的热情、他的幻想、他的洞察力来说，他称得起是他们的学生。总的说来，他胜过同时代的卡贝的工人共产主义，当然更胜过许多正开始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而斗争的自由主义者。

最高兴地承认这一点的是本来可以瞧不起魏特林的那些同时代的德国人。当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从一个手工业工人处得到魏特林的著作时叫道：“这个裁缝帮工的思想和精神使我多么惊奇啊！真的，他是他那个阶级的一位预言家。这个手工业工人的热忱、态度、求知欲多么使我惊异！同这个手艺人相比，我们的那些大学生算得上什么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魏特林是唯一做了一些实际工作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梅林引文中缺“资产阶级”一词〕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梅林引文中缺“政治”一词〕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①由于魏特林的著作给人以鲜明的印象，马克思补充说，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必须承认，德国进行社会革命的使命是典型的，而它对于政治革命的无能也是典型的。

德国资产阶级从它那一方面力图证实这种看法。

^① 卡尔·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3页。

第六章

浪漫主义的胜利

正当德国共产主义在瑞士开始成长的时候，浪漫主义在德国本土又一次大获全胜。为了取得这一胜利，它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不久就遭到了彻底覆灭的命运，然而这毕竟是它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第一次进攻的胜利。

普鲁士的王位更替以及随后的 1840 年的战争危机分化了资产阶级自从 30 年代中期以来有了新的发展的力量。民族统一的思想由虚幻的精神生活突然变成了明显的现实。没有什么更浅薄的诗比尼古劳斯·贝克尔针对法国的战争欲望所写的《莱茵歌》产生出更普遍的热情了，这一点充分证明，德国统一问题的沉浮正如诗和散文的沉浮一样。当前的战争危机使人们注意到，德意志邦联对于军事和交通运输事业是多么忽视，同时它也不能很好地代表德国在国外的商业和经济利益。人们普遍要求任命关税同盟领事，成立一个工商业者的关税议会同各政府的关税会议并存。贸易越发展，关税同盟的五种不同的币制，十种不同的尺码，十一种不同的计重标准以及各种各样的运费率就越充分说明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必要性。

这个问题现在同普鲁士的宪法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普鲁

士是关税同盟的首領。在关税同盟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像普鲁士的资产阶级那样没有发言权。曾在亚琛建立大火险公司的莱茵资产阶级的领袖大卫·汉泽曼早在1830年就温和地建議普鲁士国王成立两个議院，一个由限制地主和王室的亲信組成，另一个由繳納大宗稅款的资产者組成。国王沒有采納他这个建議，两三年后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把法国资产阶级的經濟作为一个光輝的榜样，向普鲁士专制政府做了介紹。他要求把节约資本当作国家的主要目的，从而要求削減預算，特別是削減用于军队的非生产开支。他沉痛地訴說，书报檢查制度給上升的资产阶级造成极大的障碍，因为它不仅阻止討論政治問題，而且也阻止討論經濟問題，甚至用最适当、最慎重的方式也不行。这时資本越来越有力地支持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旧要求：出版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議制。

在人民代議制这个問題上，普鲁士专制政权迟迟不前。它撕毀了它在危急的日子里許下的庄严的諾言，但是規定成立一个“人民代議机关”的1815年5月22日的法令像一个可怕的鬼怪站在幕后，是国王的任何命令都不能赶走的。普鲁士专制政权由于种种原因沒有向工商界借款。为了勉强度过財政难关，它在1820年宣布国債的現額永不提高，并同它的債权人約定，沒有国家等級會議的共同保证，不要接受任何新的公債。它不能像欺騙它可爱的臣民那样欺騙它的債权人。

普鲁士国王为了对付臣民，就用省議会来应付1815年的諾言，对各省來說，省議会是一种虛假的代議机构，平均起来，省議会有一半是大地主的代表，城市代表占三分之一，农民代表占六分之一。省議会由国王随意召集。會議是秘密进行的，主持會議的是政府任命的大臣，他有权阻止討論一切不受欢迎的問題。省議会对

于政府的建議只能表示一种参考性的意見；只有在一些地方性的事务上，比如建立感化院、罪犯教养所、火險公司、瘋人院、聾哑学校以及类似事件上有决定权（須經國王批准）。这种被人瞧不起的机构不能向普魯士专制政权的債权人提出保证，因此普魯士的財政处在寸步难行的状态，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和苛捐杂稅来勉强維持，捐稅已經不能再增加了，但是还不能滿足特殊的要求，特別是不能滿足战争的需要。仅仅为了对付波兰起义而进行的备战就使普魯士专制政权受到一次打击，其恶劣后果甚至迫使普魯士軍国主义把現役期改为两年。德国越想摆脱經濟上的落后状态，普魯士的財政状况就越不稳定。特別是由于軍事和經濟上的原因迫切需要扩大普魯士的铁路网。为了其中几条有利可图的铁路，資本需要以保证利息为形式的国家援助，实际上这种保证形式就是一种新的公債，因此需要得到国家等級會議的同意。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登上普魯士的王位的。从他在精神发展方面所受的决定性影响来看，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是他这个人很伶俐，他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他同他的先行者和后继者不同，在郁闷的兵营里不是經常感到愉快的，他不时把窗户打开，吸一口新鮮空气。新王即位的特征是純浪漫主义的言論和行动占多数，半自由主义的言論和行动占少数。問題在于，哪一個战斗的阶级能够战胜这个搖摆不定的人物。

一开始对垒双方就站在极不平等的地位上。正如亚当·斯密的德国盲从者中的佼佼者克劳斯所說：普魯士远非一个专制君主国，而是一个有点隐蔽的貴族統治国家。或者像夏米索那样（他那清楚的法国人的头脑能比土生土长的庸人尖銳地看到他的第二祖国的状况）早在 1826 年就借法国耶穌會員的嘴唱出易北河以东的容克的心里話：国王按照我們的意願办事，他就是絕對的。封建主

义把一切国家权力紧紧地握在手里，资产阶级反对派要想从封建主义手里夺取政权，它就必须是非常团结的、认识明确的、强大的。但是总的说来，它同封建势力相比情况还完全相反。这一点在它的第一次攻击中很快就暴露出来。普鲁士省等级会议为了向新王表示敬意在科尼斯堡^①开会，省议会没有按照传统的习惯请求承认它的特权，而是诚惶诚恐地表示希望国王履行 1815 年的制定宪法的诺言。

在普鲁士王国的易北河以东地区，普鲁士省首先是拥护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从古老的骑士团时代起，普鲁士省就有一定程度的反抗精神，由于在地理上距柏林较远，这种反抗精神始终没有完全消除。这里有比较多的自由农民。康德漫长的一生都在科尼斯堡教学，该省的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把这位大师的言论奉为金科玉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该省所受的痛苦比德国其他地区都重，它所进行的反抗也比其他任何地区激烈。但是它摆脱了法国的束缚，又在俄国政府的更凶恶的压迫下土崩瓦解。在维也纳会议上重新用书面肯定下来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政策的这一可耻的遗产使每个还有一点民族自尊心的德国人警醒起来，而被俄国的国境封锁割断了生命线的普鲁士省更是这样。但泽^②和科尼斯堡是它旧日的贸易繁荣的影子，埃尔宾城^③则完全衰落了。再加上可耻的俘虏交换条约迫使普鲁士把所有俄国逃亡者全部交出。条约规定俄国对普鲁士也有同样的捕捉逃亡者的义务，但是德国的逃亡者越过俄国国境就一个也逃脱不了。俄国政府毫不客气地把走私时被抓住的、或者没有护照越境的普鲁士人统统送到西伯利亚去。沙

① 现名加里宁格勒，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译者

② 现名格但斯克，波兰北部城市。——译者

③ 现名埃尔布隆克，波兰北部城市。——译者

皇带着露骨的嘲笑神气在他的普鲁士总督头上挥舞皮鞭。1809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为了朝见俄国君主而作一次豪华的旅行，不得不动用原定用于缓和困境的公款。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到沙皇尼古拉处作不得不然的即位访问时，沙皇“由于表示庆贺，自动”赦免全部由于偷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普鲁士臣民。普鲁士国王忍受了这种奇耻大辱，为了不断讨好沙皇，把他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当作普鲁士的真正的朋友。

这种无可救药的状况在普鲁士省引起人们极大的愤慨，省长冯·雪恩巧妙地综合了这种愤慨情绪在宣誓仪式上发动了进攻。他那坚强的意志鼓舞了参加大会的人。雪恩是个才华出众、通晓世情的人，他由于在对该省的管理方面做出巨大成绩，而在各阶层的居民中享有威望。但是他能成为普鲁士自由主义的一位受到赞扬的领袖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资产阶级反对派多么缺乏明确的观点。雪恩鄙视在普鲁士国家进行统治的死板僵硬的官僚制度，他把普鲁士军国主义看作是一个很成问题的现象，有一回一个普鲁士省议会的议员穿着军官制服执行职务时，他就明显地表示了这种看法。但是他也憎恨关税同盟，憎恨民族统一，他把使普鲁士溶化于德意志这一要求叫做疯狂的要求。

他很佩服康德，他想用纯粹理性建设国家。不过对他来说，纯粹理性实际上就是一个聪明的容克的理性，他清楚地看到，大地产不能用封建的，而只能用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形式保存了。在所谓解放农民的问题上，他也坚持了这种不利于农民的立场，他在为了证明制定宪法的必要性给国王上的条陈《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中也是代表这种立场。他在这个条陈中说，中等阶级和贵族的情况越来越清楚了。中等阶级因为力图自己组成官吏阶级，所以对于官吏阶级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意见的，没有财产和地产的

因功受封的貴族也是这样，可是独立的人决不能忍受官僚的监督，特别是同官僚对立的、忘不了自己的旧日統治的土地貴族。雪恩的思想距离汉澤曼的自由主义比距离国王的浪漫主义更远，他同国王虽然有过种种齟齬，但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

国王对于普魯士等級會議的請求也沒有見怪。等他回到柏林，又被勃兰登堡馬尔克的封建浪漫主义所包围时，他就明确宣称，他不实施 1815 年的宪法法令。国王格外开恩授权省議会公布它們的記錄，但是不提发言人的姓名。他答应今后每两年召开一次省議会，閉会期間通过省議会选出的委员会采納“它們的建議”。这些不彻底的措施只能造成国家等級會議的假象，为的是比較容易地克服专制政体的財政困难。可是在 1841 年春天召开的省議会沒有开会以前，出現了一种同省議会有关的小册子：《一个东普魯士人回答的四个問題》，小册子上沒有署名，不过它的作者，科尼斯堡的医生約翰·雅科比后来向国王公开了自己的姓名。

《四个問題》同雪恩的条陈在精神上显然有相似之处，但是其中的資产阶级观点却明确得多。当然也是用的純唯心主义的形式。雅科比得出結論說，普魯士人民已經成年了，甚至不共戴天的敌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称赞普魯士及其七个大学，二万零八十五个中小学校以及它的国民軍制度是史无前例的最彻底的国民教育的典范。他想把“忠誠的普魯士省議会的政治行动”翻譯成人民的語言，于是他問：等級會議有什么願望？它有什么权能？它可以决定什么？它还有什么可做的？他以明确的邏輯——不是由于形式适当，而是由于論证有力——指出，官僚制度破坏了城市規程，省議会完全失去作用，不独立的司法进行秘密审訊，大臣們壟斷行政，他們的两个忠实奴僕、警察和书报审查机关監視着不让任何同大臣們的言行不合的意見和活动发生作用，这一切是多么不合独立

自主的市民所提出的依法参加国家事务的要求。他证明 1815 年的宪法法令在法律上继续有效，并在国王拒绝实施之后敦促议会转变态度，过去是乞求恩典，现在是要求一种明确的权利。

雅科比的著作是在莱比锡出版的，它用一个假出版处避开了萨克森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但是这个著作出版以后，就由于普鲁士当局的要求被警察没收了。接着邦联议会宣布它为禁书。国王对这一著作深恶痛绝。当他还不知道作者姓名的时候，他企图从雪恩那里打听作者的姓名，并答应不给作者任何惩罚；可是当雅科比自动向国王说出自己的名字时，国王就写信给雪恩说，他接受这一挑战。他对于这句豪言壮语的理解，无非就是让人把雅科比送上法庭。柏林高等法院的刑事推事团奴颜婢膝地以亵渎国王陛下和其他罪行的罪名判处《四个問題》的作者两年半要塞监禁和剥夺他佩带国徽的权利；可是该法院的上诉推事团在团长格罗耳曼主持下宣布作者无罪。国王对此极为愤怒。他违背法律条文，专横地指示，宣告无罪的判决理由对该犯应该保留，并且故意找年老的格罗耳曼的麻烦，使他去职。格罗耳曼是那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维护普鲁士司法的神话般的荣誉的很少见的法官中的一个。接着一个新的惩罚令打破了法官为了使国法免遭国王任意破坏而设立的一些限制。从这时起，只要法官做出一个不合国王心意的判决，他就要被放逐。

雅科比的著作在省议会中没有得到什么反应。普鲁士等级会议明确地拒绝了科尼斯堡市民根据雅科比的意思向议会提出的请愿。在资产阶级居民中，受到禁止的著作虽然不胫而走，但是很少有人仿效著者的勇敢、坦率的精神。卢格在哈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一份根据《四个問題》写成的、要求颁布宪法的请愿书征集了七十多人的签名，送交梅尔塞堡的萨克森省议会。可是国王的一

个庶出的叔父納茨梅尔上校剛一威胁說簽名者將因叛國罪受審時，其中的十七個人就乘着驛郵車尽快地趕到梅尔塞堡，又把他們的簽名塗掉了。一個醫生認為他不能开业了，因為他簽過名；一個木材商人說，他雖然沒有公家的房子，但是他大概能够得到公家的房子^①；甚至一個食品商人硬說，他所以簽名只是為了把煽動分子引誘出來，好讓國王認清他的敵人。

許多自由主義的庸人就是這樣一批貨色，他們的第一次騷動受到浪漫主義反動派的干涉馬上就无声无息了。

① 所謂“公家的房子”大概是指監獄，也就是說可能要因簽名而被捕的意思。——譯者

第七章

古典哲学的解体

爭取真正的人民代議制的斗争同爭取出版自由的斗争結合在一起。浪漫派的国王对于出版自由也不是毫无理解。經過审查的報紙毫无生气，这同他的活潑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他以一切浪漫主义者所特有的那种自我欺騙認為自己可以容忍自由言論。于是1841年圣诞节內閣下了一道命令，叫官廳放寬書報审查的尺度，这件事虽然不大，但总还值得一提。

像平常一样，家长式的自由主义的这一滴水也消失在真正浪漫主义的大河里了。阿尔坦施泰因死后，艾希霍恩被任命为文化大臣，他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反动派，取消了老王統治时还勉强存在的唯一自由，即大学里的讲課自由。巴伐利亚人尤利烏斯·施塔尔得到了甘斯死后空下来的教授职位，施塔尔是个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企图把基督教—德意志的原則由封建浪漫主义的露骨的粗魯語言翻譯成現代哲学的光輝的語言。接着年老昏憊的謝林应国王的邀請到了柏林，以便用他的天启哲学消灭黑格尔主义。法的历史学派的头子薩維尼則得到了司法大臣的职位，这时他当然要为他本人提供他沒有任何立法使命的适当证明了。

渴望出版自由的专制君主毫无必要地开始压制唯一完成了自

己任务的刊物。1841年5月，国王命令《哈雷年鉴》由萊比錫移至哈雷出版，也就是說在普魯士书报审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否则普魯士就要取締这个刊物。由于这个命令 卢格移居到德累斯頓出版这个杂志，并改名为《德国年鉴》。不言而喻，这个杂志的編者的見解——普魯士是一个自由而公正的国家——越是表露出它的錯誤性，这个杂志的傾向性也就越明显。如果说卢格和施特劳斯賦予《哈雷年鉴》以特色，那么《德国年鉴》就是处在布魯諾·鮑威尔和路德維希·費尔巴哈的精神影响之下。同浪漫主义相比，这是一个进步，但也是古典哲学的解体。

浪漫主义交了好运，促使它进行全力反抗的经济发展自动地歼灭了它最危險的敌人。

一 布魯諾·鮑威尔和路德維希·費尔巴哈

德国資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把它的活动和意图作为世界史的記錄反映在古典哲学中。只要它能够发展它的物质力量，这个記錄就成为一張廢紙。工业越是自由地在工厂的濃烟中展开它的旗帜，哲学的空中樓閣垮得也就越快。

但是資产阶级哲学不可能简单地退化为資产阶级經濟学。它曾經是德国資产阶级的英雄时代，它不能把自己的遗产拍卖給庸俗的金融界，拍卖給銀行和交易所，拍卖給从来没有想占有这份遗产的胸无点墨的工厂主。尽管哲学和資产阶级共同对浪漫主义进行了斗争，可是正是在这个斗争中，两者之間的矛盾必然暴露出来。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这个矛盾經過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矛盾不知不觉地存在着，但是人們还没有认清，第二个时期矛盾已經为人所知，但是还不能解决，第三个时期用哲学在无产阶级身

上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哲学身上找出路的办法克服了这个矛盾。

第一个时期是卢格和施特劳斯的时期。他们以哲学家的身份同浪漫主义进行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终究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斗争的。他们在哲学的废墟上建造自己的小屋，看到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不管它好坏，就认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而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却是第二时期的典型代表。他们从来没有相信资产阶级世界是他们的世界，或者是一个持久不变的世界。后来鲍威尔用一句确切的不恭的话对俾斯麦作了评论：这个人不是创造历史，而是创造插曲。费尔巴哈在谈到“普鲁士的皮鞭”时，经常把它痛骂一顿。但是这两个人从来也不懂得研究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在哲学的废墟间茫然乱跑，无计可施。

同时在他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他们不是肩靠肩而是背靠背地站着。鲍威尔继续纺唯心主义哲学的线，直到这条线在他手里折断为止，而费尔巴哈则公开同唯心主义哲学决裂，并且迈出了最终战胜唯心主义哲学的头几步。

布鲁诺·鲍威尔生于萨克森的一个小公国，就他的整个性格来说，是一个北德意志人。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柏林度过的，可以说是柏林人，他也喜爱“柏林的厚厚的沙土和淡茶以及机智的居民”。在这一方面他同施特劳斯完全相反，施特劳斯讨厌鲍威尔这个人以及他的活动，同样也讨厌北德的生活。施特劳斯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中取出实体，使它成为福音书的创造原则，鲍威尔也从同一个地方，为了同一个目的取出自我意识。施特劳斯的批判虽然大大取消了很多福音故事的历史真实性，但它还是神学的东西，因为归根到底还是同一个问题，即福音书是圣灵口授的，还是基督教团体无意识地创造的。鲍威尔在“实体本身的发展驱使我们去的地方”寻求施特劳斯的“神秘”见解的解答：“而这

种发展则导向理念的普遍性和規定性及理念的現實存在，导向无限的自我意識”。把黑格尔的話譯成德語就是：他指出，福音书是抱着一定的目的从事創作的作家的文学作品。

鮑威尔的这种見解使他失去对福音书作者的一切尊敬，他对神学进行了殊死斗争。自我意識虽然創造了福音书，但是这种自我意識是外来的、自相矛盾的、外在化和異化的自我意識。在鮑威尔 1841 年发表的福音故事批判中，已經存在三十年后在他关于基督教起源史的研究中发展成为独特見解的萌芽。他強調指出，独攬一切权力、一言定生死的羅馬的世界之主，在吹口气就战胜大自然的反抗或者打敗敌人、并已在世間宣称为世界之主和世界审判者的福音史的主身上有了一个敌对的兄弟，但毕竟是一个兄弟。在基督教中精神抽象的吸血鬼吸尽了人的力量和精髓、鮮血和生命，一滴也不留下。疲憊的“我”作为唯一的力量留在毁灭了的世界的廢墟上，但是这个吞食一切的“我”却害怕他自己。他把他的一般的力量当作一种外来的力量同自己对立起来，在这种力量面前，恐惧而顫抖地为自己的存在和幸福而工作，这样他就完成了自己的異化。但是人类是在自己的模写的强制下受教育的，其目的是使人类更彻底地准备自由，如果終于取得自由，就更亲密地拥抱自由。向自己这方面来的、理解自己的、把握着自己的本质的自我意識具有控制自我異化的創造物的力量。这样一来，鮑威尔就不顾一切地取消了神学，而且还不仅仅取消了神学。

无限的自我意識根本是没有界限的。它用批判的武器打倒了一切还限制着它的真正普遍性的“切实的規定性”。自我意識揚棄了社会和国家中一切它能給它們指出界限的制度，这在它的观念中是很显然的。因为自我意識的哲学也是生活在精神的抽象之中，其程度并不亚于基督教。而且它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則的最完

备的表现；批判的批判把一切都化为纯粹精神，对群众极为蔑视，唯心主义的思辨在批判的批判中做出一幅最丑恶的鬼脸。布鲁诺·鲍威尔先在波恩大学任私人讲师，后来被艾希霍恩大臣赶走，移居柏林；他和他的兄弟埃德加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在这里扮演“自由人”的角色，在激烈的言词上“总是走得很远”，并且在哲学领域做着柏林俏皮话譏諷为“Alles Verrungenieren”（使一切都成为不受拘束的人）的事情。

但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立即给他明确指出，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的避难所，最后的合理的支柱。谁不放棄黑格尔哲学，谁也就不能放棄神学。黑格尔的学說（自然界，现实是由观念設定的）只是神学的合理的說明——上帝的自然界，物质的本质是由非物质的本质，即抽象的本质造成的。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間的斗争是黑格尔哲学内部的斗争。两个人越过了黑格尔，各自坚决貫彻絕對理念的一个方面，施特劳斯抓住的是实体 即同人分开的自然界，鲍威尔抓住的是自我意識，即同自然界分开的人。相反地，费尔巴哈則从黑格尔的立場批判整个黑格尔，他把絕對理念化为自然基础上的真实的人。他开辟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过渡阶段。

费尔巴哈同施特劳斯一样是南德人，可是同后者不同的是他有火一般的热情，一种适于混乱的实际生活的斗争天性。他在许多方面使人想起莱辛，他喜欢从莱辛的論文中汲取力量，可惜他在这一点上也同莱辛相似，即德国的恶劣环境决不允許他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他在雷辛山上所受的痛苦多么生动地使人想到莱辛在沃尔芬比特尔城所受的苦难！费尔巴哈的偉大功績是論述基督教本质的著作，它从德意志民族的一切健康的眼睛中驅除了唯心主义的幻影。按照恩格斯的說法，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自体验过的人才能正确理解到。费尔巴哈恢复了实际的人的权利。自然

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自然界就是人赖以生长起来的基础。对人来说，人就是最高的本质。在人和自然界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了；天国的存在物只是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对人来说，人是最高的本质，人对人的爱就是最高法则。费尔巴哈阐明这种思维过程时所用的语言是动人的，甚至有时像涌现着的生活那样十分急促，发出像黑格尔派的雾风吹动枯叶时发出的沙沙声。

费尔巴哈把唯物主义从地上捡起来。由于在德国落后状况还占优势，所以他没有能够解决这个任务，即像康德把唯物主义新得到的内容放进唯心主义那样，把唯心主义新得到的内容放进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培根曾经说过，他不願做一个极端的經驗主义者，像螞蟻一样只知道收集和享受所收集的东西，也不願做一个抽象的唯心論者，像蜘蛛一样自己編織蛛网，而願把这两者結合起来，像蜜蜂一样，从花园和田野的花里采集材料，然后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加工。费尔巴哈也把自己比做蜜蜂，但是他认为蜜蜂是冬天消耗它们夏天的劳动所得，而他在冬天作为思想的人吐出他在夏天作为自然的人咽下去的东西。

自然界的思考的直观是这位学者圍繞旋轉的太阳，由于德国各政府的虚誠主义，他被排斥在高等学校的讲席之外，也没有能够同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保持同步步伐。费尔巴哈感觉到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不足，关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他曾說了一句有特色的話，向后退时，他同它一致，往前进时，他就跟它不同道了。但是，人不仅在自然界生活，而且也在社会中生活，因此唯物主义不仅是自然科学而且也是社会科学，费尔巴哈沒有这种清楚的認識，更不用說充分估价这一事实了。外国的广大世界对他是陌生的，而且他甚至同德国的小世界隔絕开来。对自然的爱使他自愿退居

到一个孤寂的乡村，經受了光荣的貧困。他认为，只有人的理論行为是真正有人性的；他把理論的立場叫做人和世界的和諧的立場。

費尔巴哈在犹太高利貸者的骯髒形式中才認識了社会的實踐。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他分析犹太教是私利的宗教。他写道：“对希腊人說来，自然界是一块金剛石；他怎么也看不够它那奇異的色彩，它那規矩的形式，它那天空一般的清彻性和透明性；他在这块金剛石上看到他純粹的、沒有蒙上任何实际的利己主义灰尘的精神的反映，他在自然界認識了理性和精神——因此对他說来自然界是永恒的。总之，希腊人用热情的矿物学家的眼光觀察自然，而犹太人則用計算自己利益的矿石商人的眼光觀察自然。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他們的特点。他們的原則，他們的上帝是世界的实际原則——利己主义，而且是宗教形式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就是不让自己的僕人遭到毁灭的上帝。利己主义基本上是一神論，因为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自己。利己主义把人召集、集中到自己这方面来，但是它使人在理論上愚昧固陋，因为它对一切不是同自己的利益直接有关的事情毫不关心。”如果說，以色列人贊美自然界的偉大，那只是出于胜利者夸大敌人的强大的打算，为的是贊美自己的荣誉。因为在在他看来，自然界的偉大就是耶和华的偉大，而耶和华的偉大在为以色列實現的奇迹中已經光輝地表現出来了。

鮑威尔也有与此相似的見解。他认为，基督教国家通过一定形式限制了資产阶级社会的利己主义活动，但是犹太人为了剥削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分子就钻到它的空隙里去，他們就像伊壁鳩魯的群神一样，住在世界的中間地帶，不用做一定的工作。在鮑威尔那里，犹太人成了替罪羊，他把物质质量放在这个替罪羊身上，以便絕對的批判，无限的自我意識更純粹地在自己本身旋轉。这个

彻头彻尾的空想家把犹太人問題极端化为純宗教問題。基督徒或犹太人只有战胜他們的宗教才能得到自由。对于基督徒來說，在他們的宗教不可遏止地自我解体的情况下，这一点比較容易做到，而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反对历史进步，在对各族人民的憎恨中建立自己的最冒险和最偏狭的民族生活，他們的宗教是用以滿足自己的肉体的需要的兽性的狡猾和詭計，因此对他们說来，这一点即使不是不可能做到，也是很难做到。只要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他們就不能得到解放，基督教国家更不能解放他們。

鮑威尔和費尔巴哈只是从犹太高利貸者的最初形式，即中世紀的形式中认识資本。他們只是从哲学上接触到資本的残酷的本质，而沒有能够从經濟上理解它，更不用說克服它了。

二 德国年鉴。政治抒情詩

卢格在德累斯頓不久就得到一个經驗，普魯士政府的胳膊很长。书报检查机关对《德国年鉴》的检查越来越严。卢格在他写的信中痛罵这种可恶的状况以及愚蠢的检查官，这人任意窜改著作，抽去其中的精华，犯下了違反精神的真正罪恶。受到这种恭維的是法国革命史的作者瓦克斯穆特教授。他并不是他們那一伙中最坏的一个，他企图使他“尊敬的朋友”卢格同他的紅鉛筆的粗野行为和解，結果沒有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1842 年的《德国年鉴》就以两种形式出版。在德累斯頓是杂志，在瑞士是几本《軼文集》^①。图林根人尤利烏斯·

^① 《德国現代哲学和政論界軼文集》——是卢格 1843 年在瑞士出版的論文集。馬克思在第一卷上发表了論文《評普魯士最近的书报檢查令》，在第二卷上匿名发表了較短的文章《路德是施特勞斯和費尔巴哈的仲裁人》。——原編者

弗呂貝爾在這裡為了領導瑞士的激進黨人，辭去了蘇黎世大學的礦物學教授職。他在蘇黎世和文特士爾創辦了文藝書店，編輯《瑞士共和主義者》給逃避書報檢查的德國人提供一個很受歡迎的避難所。兩卷《軼文集》中有盧格、鮑威爾、費爾巴哈，也有馬克思、摩里茨·弗來舍爾、科本和其他青年黑格爾分子的文章，這些論述政治自由、教育自由、出版自由，論述哲學和神學的文章或者是薩克森書報檢查機關所沒有通過的，或者估計一定要遭到這種命運，而沒有送審的。

盧格想用這幾本論文集狠狠地給那些蠢貨當頭一棒，打得他們不能恢復元氣，毫無疑問這些集子中的文章都有很大的價值。但是不管它們對於反動的浪漫主義的打擊多麼大，它們所討論的哲學還處於混亂境地，距離終結還很遠。只要費爾巴哈的學說客觀上促成了所有宗教解體，鮑威爾就承認他的業績，但是他牢牢抱着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原則，把空想的思維放在實際的存在之上，而費爾巴哈則直率地說，這不是一個進步，因為脫離了人的自我意識無非是黑格爾的沒有現實性的抽象物。

盧格是一個很好的編輯，他懂得像鮑威爾和費爾巴哈這樣一些撰稿人對他有什麼幫助。他認為，費爾巴哈是耶利哥的號角^①，但是鮑威爾也有巨大的熱情、才能和根底。費爾巴哈寫得很少，而且有他自己的特色，而鮑威爾則能寫出種種文章。但是盧格從編輯的角度對這兩個人感到興趣還有其更深的原因。作為一個資產者，他要想越來越徹底地不談理論性的东西，他在筆戰生活中發出的和接受的衝擊使他充分認識到，絕對的批判和無限的自我意識不能根本摧毀非常明顯的浪漫主義。但是這個資產者在費爾巴哈的

① 見《舊約全書約書亞記》第六章。耶和華命以色列人繞耶利哥城，第七日命祭司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牆就塌陷，城被攻占。——譯者

唯物主义中又嗅到一种可怕的力量，他說得很对，費尔巴哈的錯誤是同黑格尔决裂，而沒有从他的发展原則出发糾正他。卢格称贊費尔巴哈，因为他把哲学从基督教的束縛中解放出来，但是卢格又墮入基督教的唯灵論之中，因为他說，誰要是重視活人甚于思想家，他就会尊敬他头上的虱子，并认为他那懶惰的脑袋比亚里斯多德的头脑高明。

卢格在他穿过书报檢查机关的暗礁引进《德国年鉴》的那篇論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文章中也采取了类似的模糊立場。总的說来，这个杂志最后一个年度发表的作品是最好的。上百次的經验证明，而且从那以后上千次的經驗又证明了，一个刊物在激烈斗争中往往办得最好。鮑威尔論犹太人問題的文章是用不可否认的精神写成的。科本在对利奧的法国革命史的长篇批判中，第一次用一种語言正确說明了法国的恐怖时期。年輕的俄国人巴枯宁用尤勒斯·埃呂沙尔特的笔名发表了論德国反动派的处女作。巴枯宁曾在柏林学习黑格尔哲学，这时住在德累斯頓。他着重指出社会革命的地下轰鳴，指出貧穷的阶级，真正的人民开始計算比它力量弱的敌人的人数，开始要求真正完全实现早就得到承认的权利。“在俄国本土，在这无边无际的大雪复盖的国家（我們对这个国家了解很少，而它也許有一个偉大的未来），預告雷雨的阴云正在聚集。哦，空气悶热，它孕育着暴風雨……讓我們信赖主的永恒的精神，这种精神之所以进行破坏和毁灭，只是因为它是一切生活的深不見底的、永远創造的泉源。破坏的欲望同时也是一种創造的欲望。”从这篇論文中发出一种由哀歌和热狂以及貴族的鈍感奇异地混合而成的特殊气息。

卢格以确当的观点批評了黑格尔的法哲学，說它否认了辯证方法。黑格尔的国家是一个不可捉摸不可把握的模糊的东西，一

座空中樓閣。它不比柏拉圖的國家實際；柏拉圖的國家使人想起希臘的國家，而黑格爾的國家則使人想起普魯士國家，但是黑格爾的國家忽視了歷史過程。盧格強調指出，黑格爾不得不順應外來的压力，而在他以前的康德就是这样。黑格爾滿足于專制主義的理性，因為專制主義很有理性，它承認了黑格爾哲學的理性。但是，脫離活生生的歷史，片面地空談理論，把這種立場當作絕對的立場固定起來，這是黑格爾法哲學的一個缺點。在家庭、社會、國家這些永遠明確的東西上，理論雖然可以不顧歷史過程，但是它必須經常區別，它面前是一個邏輯範疇還是歷史範疇。例如國家制度是國家的歷史形式，而黑格爾把世襲君主制、長子繼承權、兩院制等歷史的存在歸之為邏輯的必然性，這是錯誤的。為了使國家具有國家的形式，德國人幾乎完全沒有的那些重大的設施，如國民會議、陪審員、出版自由都是必不可少的。這就表明，盧格在這裡怎樣被資產者的天真的本能所戲弄。這個資產者為了保證他的階級在政府中有足夠的一份，說封建專制的國家是一種歷史範疇，而讓資產階級形式的家庭、社會和國家作為一種邏輯的範疇安安稳穩地存在下去。

在這種激動的哲學的影響下產生的激動的詩同這種哲學是相適應的。新一輩的詩人出現了。在他們的詩歌中響着警鐘的聲音，音韻里夾着兵器的鏗鏘之音。高尚的形式又取得了它的權利，由於形式完美，顯得熱情更足，諷刺更有風趣。《哈雷年鑑》和《德國年鑑》並沒有直接教育這些新詩人。盧格對美學的評價是很片面的。他千百次把朱尼亞斯的信^①作為偉大的藝術作品置於莎士比亞的

① 1769—72年在倫敦《公共廣告商》(Public Advertiser)雜志上用朱尼亞斯的筆名發表的好多封信，无情地攻擊一切國家機構，乃至國王。據研究，其作者為菲力浦·弗朗西斯爵士。盧格曾把這些信譯成德文。——譯者

著作之上，他反对他所謂的海涅的輕佻和放蕩就像反对老黑格尔派的守旧那样不知疲倦，他甚至同丁盖尔施泰特沒有什么关系，虽然这个年輕的黑森人以同时代的詩人都不如他的一种明确性看透了德国的政治社会苦难，并根据守夜人^①所經歷的世道变迁，在一系列的具体形象上体现出来。卢格对于霍夫曼的“非政治性詩歌”的不滿是比較有道理的，这些詩以其淺薄的詼諧过分迎合易于激动的政客的无謂叫嚷。但这也是在这种政治詩中或强或弱地表露出来的哲学斗争的反映。波美拉尼亚人普魯茨是卢格的老朋友和合作者，他在自己的詩里指揮整个的思想队伍，有时用的是笨重的节奏，与其說是一个詩人，还不如說是一个修辞学家。当士瓦本人海尔維格把他的《一个活人的詩》像一道火热的闪电投入德意志世界时，卢格就欢呼着尊他为詩坛领袖。

战斗的时代的苦难和不安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这些詩中发出这样沸腾的和音。这些詩一出版，在全德国受到欢迎，詩人像一个凯旋者从西南边境走到东北边境，經過科倫和杜塞尔多夫到耶拿和魏瑪，萊比錫和德累斯頓，一直到柏林和科尼斯堡。

海尔維格在德累斯頓會見了卢格，他們一起到柏林去旅行。在柏林他們同鮑威尔兄弟及其拥护者发生了激烈的爭論。自由人的苍白的消极性同海尔維格喜欢色彩的詩人本性是不相容的。正准备同現有国家进行实际斗争的卢格不願布魯諾·鮑威尔告訴他“那些最可笑的事情”，比如主張打破国家、私有财产、家庭的观念，不必考慮問題的积极一面。这时海尔維格做了一件被国王召见的蠢事。国玉的侍医瑞士人雪恩來因（瑞士有人托海尔維格向他問好）做了殷勤的介紹人。如果說，詩人在他立即被普魯士政府禁止的

① 指丁盖尔施泰特的詩《一个世界主义的守夜人之歌》。——譯者

詩中向國王發泄怨氣並不困難，那麼這次會見就更簡單了。因為宮廷禮節上寫着，波薩侯爵只能談堂·菲力浦^①問他的話。當時流傳的話是：我愛一個忠實的反對派；我衷心希望您回心轉意，您將會大有作為；我們仍然是正直的敵人——這些話都是國王說的，談論這件事的人沒有提到詩人。於是“Alles Verrungenieren”的激進主義趕忙用尖銳的諷刺對一言不發的詩人進行報復。

海爾維格對這件事非常後悔。他在受到熱情接待的科尼斯堡聽說，普魯士警察在他謁見國王之後匆匆忙忙地取締了他打算在瑞士出版的一份報紙。隨後他寫了一封信給國王，在信中補演了波薩侯爵的悲劇。人們違背他的意願在《萊比錫總匯報》上發表了這封信。不久海爾維格在施泰廷他的朋友普魯茨那裡接到放逐令。凱旋的行列往回走，穿過憲兵的步哨線直到邊境，接着那份剛剛呼救的報紙被釘上了十字架；一片諷刺聲中，甚至也夾雜着弗萊里格拉特的聲音。海涅嘲笑說：酒醉時，何等愜意，覺醒後，景物全非！海爾維格從沒有像浪漫派的國王所預言的那樣回心轉意，但是他妄想舉着飄揚的旗幟走在一群人的前面，而那一群人却露出幸災樂禍的僕從的真正面目，這就永遠折斷了詩人海爾維格的翅膀。

《德國年鑑》隨着它的詩人垮台而垮台了。盧格由於同布魯諾·鮑威爾和自由人集團的衝突而加強了直接攻擊歷史國家的主張。1843年，他的報紙以自由主義的自我批判開始，他這篇文章中說，德國自由主義根本不是一個黨派，而是一種空洞無用的理論，它決不能成為一種實際的存在，因為它不知道它需要什麼。盧格想把自由主義變為具有實際問題的民主。他所說的這些問題是：把教會變為學校，組織吸收一切庶民參加的、真正的國民教育，把

^① 席勒劇本《堂·卡羅斯》中的人物。菲力浦是16世紀西班牙的國王，波薩侯爵是一個渴望自由的空談家。——譯者

軍事完全同它融合起来，让有教养、有組織的人民在公共生活中实行自治，在公共法庭上自己掌管司法。可是德意志諸侯决不让人提出这种要求。薩克森和普魯士，随后邦联議会都禁止《德国年鉴》出版。

可惜《德国年鉴》的垮台也不乏一种滑稽而庸俗的性质。卢格在向薩克森等級會議提出的一份請願书中抗議查禁他的杂志，同时他还提出自己家族的证据，說他是一个多么善良和有用的公民。薩克森議員中的那些驯良的庸人同意查封《德国年鉴》，这就充分說明，他們对《德国年鉴》的內容毫无所知，以及他們对于所听到的一点內容也完全不了解。

第八章

《萊茵報》

海爾維格的信給了浪漫派一個很好的機會，重新壓制由於發布了比較緩和的檢查令而開始恢復生機的報刊，雖然大多數報刊只是微微地吁了幾口氣。新法令公布之後一星期，暗里發牢騷，明里搖尾巴的庸人的柏林機關報《福斯報》用勝利者的口吻說，現在可以說話了，它要利用這種自由——但是在適當的範圍之內——，並且毫不隱晦，但懷着好意發表意見說，向庫爾蘭^①發送信袋時最好派一個隨車管理員，因為不久以前有一個信袋被人偷走了。接着郵政管理部門在《施本納報》上對此作了非常粗野的答復，以致福斯女士十分狼狽地把她大膽伸出的觸角又收了回去，只是羞怯地提出問題，郵政當局是不是認為它是沒有任何缺點的。

在一些重要的日報當中，只有三家報紙對於普魯士的居民發生強弱不等的影響。其中之一，是遠銷普魯士境外的《萊比錫總匯報》。一些不滿意普魯士官僚政治的人士，暗地里資助這家報紙，可是在它發表了海爾維格的信件以後，馬上就被普魯士政府查封了。在普魯士國家境內，《科尼斯堡日報》和《萊茵報》的報道正

^① 現名庫爾澤姆，是拉脫維亞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行政区，首府为利耶帕雅。——譯者

直而大胆。浪漫派的国王陛下喜欢用他那近卫军少尉的特殊語言，把这两家報紙称为“科尼斯堡的下贱報紙和它的萊茵卖淫姊妹”。《科尼斯堡日报》站在約翰·雅科比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立場上，由一位高級教師維特主編。維特由于編这份報紙，曾不得不忍受艾希霍恩大臣的卑鄙迫害。年輕的瓦列斯罗德在这份報紙的撰稿人之中博得文名。但是这家報紙却落后于从1842年1月1日开始在科倫出版的《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特别是在眼界的广度方面。

根据《萊茵报》創刊号登載的声明，它是由一伙独立的萊茵省居民創办的；这些人傾向进步，力求萊茵省发达，竭力发展萊茵省的各种設施，要把萊茵省同整个德意志的利益結合起来，并且关心整个人类社会和它的內部繁荣。正如讀者所看到的，這項声明并不十分清晰；同样地，后来該报以政綱形式发表的东西，即实行包括一切阶级和代表各方面利益的普遍选举法，公布政府的施政活動，要求出版自由等等，也沒有按照已經成熟的政党的慣例，分章分节一目了然地列出。《萊茵报》联合着成分不同的各种人士，他們知道什么东西使他們結合起来，但是还不知道什么东西能使他們分开。在萊茵省资产阶级的两个年長領袖的后面，即在大卫·汉澤曼和科倫商会长卢道夫·康普豪森这两个敢想敢做的商人的后面，是在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萊茵报》对工商业問題的了解比政治問題清楚得多。它要求精确而詳細地公布关于国家財政的報告，减少国家的支出，扩建铁路，降低訴訟費用和邮費，为参加关税同盟的各邦規定共同的国旗和派遣共同的駐外領事。

这种情况使《萊茵报》对易北河以东的反对派报刊占了很大的优势。在思想的大胆和明确方面，它至少不比《德国年鑑》逊色，而

在了解推动德国生活前进的工业发展方面，则远远超过它。《莱茵报》支持关税同盟的程度同雪恩反对关税同盟的程度不相上下。这家报纸评论说，普鲁士国家对德意志的领导权是建立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的。如果这个国家继经济进步之后，能为精神进步和政治进步开辟道路，那么，报纸愿意在这个国家的旗帜下进行斗争。梅特涅的御用文人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以憎恨者的尖锐眼光，揭露了《莱茵报》的亲普鲁士倾向，但是普鲁士的政治家们却窃窃私语，说《莱茵报》依靠法国政府的钱维持，柏林政府的眼光过于狭小，没有理解《莱茵报》想把一个锋利的武器交给它掌握。《莱茵报》越坚决地想把它抬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高度，它就越顽固地死守自己的专制一封建的落后状态。这种冲突一天比一天尖锐化了，而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莱茵报》的领导权就越来越被激进分子所掌握。

这是一群卓越的人物。在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中，有布鲁诺·鲍威尔、科本、瑙威尔克、施蒂纳等人为《莱茵报》写稿；该报德文部的第一编辑鲁滕堡也是柏林人。参加《莱茵报》工作的莱茵省当地人有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格奥尔格·荣克、莫泽斯·赫斯、海尔曼·皮羽特曼和卡尔·马克思。《莱茵报》不按期发表社论，还没有被单调的竞争经营的清规戒律所束缚。因此附页里登载的技术论文和科学论文较多，而小品文栏里的材料也比较丰富，其中发表关于美学、文学和哲学问题的研究以及许多优美的诗篇。海尔维格和普鲁茨经常为这一栏写稿。但是不久《莱茵报》的最年轻的撰稿人就成为该报的最优秀的力量。即使今天你把积满灰尘的《莱茵报》合订本打开，也不难在大量的优秀作品当中发现马克思的著作是最好的。他的这些杰作的特点是：构思广博而深刻；文笔有力而漂亮；辩证的论据具有尖锐的对立性；思想敏锐，在分析问题的

时候，总是深入到德国的混乱状态之中，一直把問題彻底搞清为止。1842年秋，馬克思担任該报的編輯，整整作了一个冬季，直到報紙停刊的前几天才离开編輯部。

馬克思的最初几篇文章是討論出版自由問題的。他在卢格編輯的《軼文集》里发表了《評普魯士最近的书报檢查令》，文內要求完全廢除书报檢查制度。他說，檢查制度本身是不好的，而檢查令却比人还要威風。馬克思嘲笑虛伪的自由主义的做法，由于更換了执行这种坏制度的人員，虛伪的自由主义就感到滿足了。他逐条分析新檢查令，以揭露其中在浪漫主义的曖昧詞藻下隱藏的邏輯荒謬。也同旧书报檢查令一样，新檢查令中有一條規定：探討书报中的真理應該严肃而謙逊。馬克思对此反駁說：“你們贊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們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調。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謙逊的風格。沒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許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們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沒有一枝黑色的花朵。”^①

但是新檢查令毕竟与旧檢查令有所不同，那就是新檢查令指示檢查人員严密地注意书报的傾向是否善良。馬克思对此辛辣諷刺地写道：“这样一来，作家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頁。

到了懷疑的制裁。反對傾向的法律，即沒有規定客觀標準的法律，乃是恐怖主義的法律，在羅伯斯比爾時期，國家在萬不得已時所制定的法律就是這樣的法律，在羅馬各王朝時期，國家在腐敗不堪的情況下所制定的法律也是這樣的法律。凡是不以行為本身而以當事人的思想方式作為主要標準的法律，無非是對非法行為的公開認可……追究傾向的法律不仅要懲罰我所做的，而且要懲罰我所想的，不管我的行為如何。所以，這種法律是對公民名譽的一種侮辱，是威脅着我的生存的一種陰險的陷阱。

我可以任意翻轉打滾，事態決不會因此而有絲毫改變。我的生存遭到了懷疑，我的最隱秘的本質，即我的個體性被看成是一種壞的東西，而且由於這種意見我要受到懲罰，法律懲罰我並不是因為我做了壞事，而是因為我沒有做壞事。其實我受罰的原因是我的行為並不違法，正是由於這一點，我就迫使好心腸的法官只去審查我那非常慎重、不至於使自己在行動中暴露出來的惡劣的思想方式。

懲罰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國家為它的公民頒布的法律，而是一個黨派用來對付另一個黨派的法律。”^①

馬克思接着說道，追究傾向的法律是由那些把自己同人民在原則上對立起來，從而認為自己的反國家的思想方式是普遍的和標準的思想方式的政府發明出來的。統治集團的齷齪的良心，捏造出一套追究傾向的法律，把它們作為報復的法律，用來懲辦實際上只是政府官員才持有的思想方式。“追究原則的法律是以無原則……為基礎的。這些法律就是齷齪的良心的不自覺叫喊。怎樣才能使這種法律付諸實施呢？這要通過一種比法律本身更令人痛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7頁。

恨的工具——侦探，或者通过认为所有写作倾向都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一种事先协定……在追究倾向的法律中，立法的形式是和内容相矛盾的，颁布这一法律的政府瘋狂地反对它本身所体现的东西，即反对那种反国家的思想方式，同样，在每一种特殊的場合下，政府对自己的法律來說就好像是一个顛倒过来的世界，因为它采取了两面的手法。对一方是合法的东西，对另一方就是違法的东西。政府所頒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这些法律使之成为法律的那种东西的直接对立面……”“又如，檢查令想要保存宗教，同时又破坏了所有宗教的最普通的基本原則——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檢查令宣布，心的法官是檢查官而不是神。又如，檢查令禁止使用侮辱个別人的詞句和进行毀坏其名譽的判断，可是它又使你們每天都遭到檢查官的侮辱和毀坏你們名譽的判断。又如，檢查令想要消灭来自居心叵測和听信坏話的人物方面的流言蜚語，同时又迫使檢查官相信这种流言蜚語，要他們依賴上述这些人所进行的侦探活动……”“新的檢查令也陷入了这种辯证法。当它責成檢查官去做那些它在指摘出版物时曾斥为反国家行为的事情时，它就陷入了矛盾。”^① 在这篇文章中，獅子首次揚起巨掌痛打沒有法制和专橫跋扈的行为，它的毁灭性打击今天也像五十年前击中书报檢查法一样，击中反对工人阶级的暴行。

馬克思以对 1841 年萊茵省議会辯論的有效的批判，开始在《萊茵报》上发表言論。科倫地方向萊茵省議会送去一份由一千多人签名的請願书，請求省議会把請願书直接呈給国王。請願书中要求准許公众自由进入省議会會議厅旁听，每天公布未經刪节的辯論記錄，報紙也要有权相当自由地討論这些辯論以及省內一切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8—19 頁。

大事，最后还要求用出版法代替书报检查制度。省議会只是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同意这些要求，它請求国王准許在省議会的會議記錄里注明发言人的姓名，它并没有請求頒布出版法，也没有請求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而只請求頒布防止檢查官为所欲为的书报检查法規。这两項請求都被国王駁回了。

于是馬克思接連写了六篇长文章严厉譴責省議会。有一个发言人声称，等級會議可以根据情况或自己的裁夺公布會議上的发言。馬克思用冷冷的輕蔑口气反駁說：“我們可以使他相信，省决不会对等級代表这些个別人物的‘言論’发生兴趣，然而正是‘这些’言論代表們可以公正地叫做‘自己的’言論。与此相反，省的要求是把等級代表的言論变为公众的、到处可以听见的全省的声音。”^① 馬克思在这里已經抨击了后来他称之为議会迷的流弊。“这里談的是省是否应当了解自己的代表机关！还需要在政府这一秘密上面再蒙上一层新的秘密——代表机关这一秘密嗎？然而，在政府中人民就是这样被代表的。如果等級會議这一新的人民代表机关的特征不是省本身在这里起作用而是別人代替省起作用，不是省代表它自己而是別人越俎代庖，那么这种代表机关就会丧失一切意义。脱离被代表人的意識的代表机关，就不成其为代表机关。不了解的事情，就不必为它担忧。主要用来表現各省独立活動的这一国家职能，甚至完全被排斥于各省形式上的协作即互通声气的范围之外，——这是一个极其荒謬的矛盾；其荒謬之处在干，我的独立活动包藏在我所不知道的別人的活动中。”^②

馬克思同样毫不留情地对待省議会关于出版自由的辯論。諸侯和騎士等級的代表害怕出版自由发生敗坏道德的作用。馬克思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4頁。

② 同上书第54—55頁。

反駁这种意見說，情況恰恰相反，經過檢查的出版物才起敗壞道德的作用。一个很大的罪惡，即偽善，是同这种出版物分不开的，从它的这一根本罪惡中，又派生出它的其余一切毫无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可惡的（就是从美学观点来看也是这样）罪惡，即消極性。“政府只聽見自己的聲音，它也知道它聽見的只是自己的聲音，但是它却欺騙自己，似乎聽見的是人民的聲音，而且要求人民擁護這種自我欺騙。至于人民本身，他們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梅林引文中缺“國家”一詞〕，變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①但是馬克思也不滿意城市等級的人士对于出版自由發表的意見。馬克思对于希望出版不被排斥在一般的行业自由之外的要求，諷刺地評論說：“這裡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資產者反對派，而不是市民反對派。”^②當然，他不打算否认这种意見的相对正确性。“無論辯論人的觀點乍一看來是多么獨特，我們仍然應當無條件地承認，這種觀點比德國自由主義派那種內容空洞、含糊其詞、模棱兩可的議論來得高明，這些自由主義者以為，把自由從現實的堅實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這些流於幻想的空談家、這些傷感的熱心家把他們的理想同日常的現實的任何接觸都看成是褻瀆神明。對我們德國人來說，自由之所以直到現在仍然只是一種幻想和傷感的願望，一部分責任是要由他們來負的。”^③德國人一般易于感情冲动，过于激奮，他們有一種愛聽藍色天空音樂的癖好。德國人生來就特別忠誠和恭順。他們由於過分地敬重思想，而就不去實現這些思想。但是，不管上述的出版自由觀點怎樣相對地正確，它毕竟是虛偽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頁。

② 同上書第80頁。

③ 同上書第83—84頁。

的。“作家當然必須掙錢才能生活，寫作，但是他決不應該為了掙錢而生活，寫作……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於不要成為一種行業。”^①這個論題的巨大真實性，從那時起已為資產階級出版的六十年的不自由所証實。

除了少數意見，特別是農民等級的意見以外，萊茵省議會關於出版自由和公布省議會會議記錄的辯論給馬克思留下了一種陰郁不快的印象，這些代表經常動搖在特權階級的蓄意固執和不徹底的自由主義的天生無能之間。“這些老爺們想給自由吹噓一番，說它不是理性的普遍陽光所賜的自然禮物，而是吉祥的星星所賦與的超自然禮物。既然他們認為自由仅仅是个別人物和個別等級的個體屬性，他們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結論說，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邏輯地構成的體系’的幻想。為了拯救特權的特殊自由，他們就斥責人類本性的普遍自由。”^②馬克思不承認那種只想以多數形式存在的自由，他同伏爾泰一樣，把“多數的自由”叫做一般的奴隸狀態的例外。特別種類的自由是自由的一般原則產生的必然結果。在行業自由中，行業的本性採取符合於它的內在的生命原則的形式；在審判自由中，法院要遵循它自己固有的法規。“在宇宙系統中每一個單獨的行星一面自轉，同時又圍繞太陽運轉，同樣，在自由的系統中各界也是一面自轉，同時又圍繞自由這一太陽中心運轉。”^③

在這幾篇論文中，馬克思還完全站在黑格爾主義者的立場上。誠然，他已經是一個極想從虛幻世界走向現實世界的激進黑格爾主義者，但畢竟還是一個從純粹唯心主義的前提引出結論的黑格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頁。

② 同上書第58頁。

③ 同上書第86頁。

尔主义者。《科倫日報》的編輯海爾梅斯被政府收买，向警察当局和书报檢查机关告密說，青年黑格尔分子是些好管閑事的空想家，他們的政論活动是幼稚的自負的令人討厭的表现。馬克思对《科倫日報》进行了歼灭性的論战，并用下面的話作为結束語：“从前的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善交际，或者甚至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公共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看国家的。最新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龐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須實現法律的、倫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規律。”^① 从这个立場出发，馬克思对于法的历史学派揮动了閃亮而鋒利的宝劍。他在談到胡果的自然法教科书时指出法的历史学派的方法，即证明現存事物不合乎理性，而不是证明它合乎理性。法的历史学派曲解自己的先生康德，认为我們不能認識真实的事物，所以我們就应当承认不真实的事物（只要它是存在的）是完全有价值的。法的历史学派自鳴得意地从各方面搬出論据，以证明下面的事实是显而易見的，即理性的必然性并不能鼓舞各种实证的制度，比如所有制、国家制度、婚姻；这些制度甚至是同理性矛盾的，至多也不过容許在拥护自己或者反对自己的問題上空发議論。在馬克思的关于把出版法同书报檢查法对立起来的言論中，也相当明显地反映着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檢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檢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出版法却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出版法惩罚的是濫用自由。檢查法却把自由看成一种濫用而加以惩罚……檢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9頁。

式……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反映自由的肯定存在……应当认为没有关于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① 現实的法令汇編中的出版立法同年輕的馬克思从哲学上給它算过命的出版立法是多么不同啊！

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來到了“平地”（用他自己的話說）上，在同經濟事实的严重冲突中，认识了唯心主义的社会观和国家观的缺陷。他在另一組由五篇长文构成的評述中，批判了萊茵省議会关于林木盜窃法的辯論。他在这里也要求从政治上，即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倫理联系起来解决每一项实际任务。他把在討論关于林木盜窃法时只考慮薪材和林木的作法，也就是使意識盲目地服从物质的作法，叫做“下流的唯物主义”、“違反人民和人类神圣精神的罪恶”，“不道德、不合理和冷酷无情的抽象”。但是，正如他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辯論中看到了資产者和市民之間的差別一样，他在关于林木盜窃的辯論中发现了資产者和无产者之間的差別。对于他这样明察秋毫的人來說，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大資产阶级的上升时代，竭尽全力想把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最后几条根系拔掉，并发动剥夺人民群众的财产的残酷战争。在普魯士 1836 年审理的 207,478 件刑事案件中，約有十五万件，即近四分之三的案件，是属于盜窃林木和違反关于森林、狩猎与放牧的立法的。

剥夺财产的方法之一，就是宣布拾捡枯枝为盜窃林木，馬克思对此駁斥說，甚至 16 世紀的刑律也沒有敢于这样。“……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做違反森林条例的行为称为盜窃林木，那末法律就是撒謊，而穷人就会成为法定謊言的牺牲品了。”^② 馬克思援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71 頁。

② 同上书第 139 頁。

引了孟德斯鳩的話：有两种坏現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变坏；后一种禍害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禍害。“但是我們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貧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唯命是听的所謂历史学家們所捏造出来的东西，他們把这种东西当作真正的哲人之石，以便把一切骯髒的欲求点成法之純金。我們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但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① 馬克思又向前迈进一步，提出习惯权利按其本质來說只是沒有財产的最低下的群众的权利的論点。

他的证明很简单。特权等級已經發現法律承认它們的合理权利甚至不合理要求。他們奢望非法享有的权利，为自己的怪癖和乐趣寻求活动場所。“然而，貴族的这些习惯权利是和合理的权利概念相抵触的习惯，而貧民的习惯权利則是同現存权利的习惯相抵触的权利。貧民习惯权利的內容并不反对法律形式，它反对的倒是自己本身的不定形。法律形式并不同这一內容相抵触，而只是这一內容还没有具备这种形式。”^② 馬克思认为貧民的一切习惯权利的基础都是某种所有权的不固定性。由于这种不固定性，这种所有权既不是絕對私人的，也不是絕對公共的，而是我們在中世紀一切法規中所見到的那种私权和公权的混合物。理智取消了两重的和不稳定的所有权形式，而使用从羅馬法中借用来的抽象私权范疇。“由此可見，在貧民阶级的这些习惯（在梅林的引文中为“习惯权利”）中存在着本能的权利感，这些习惯的根源是肯定的和合法的，而习惯权利的形式在这里更是自然的，因为貧民阶级的存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1—142頁。

② 同上书第144頁。

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还没有在被有意地划分了的国家里找到应有的地位。”^①

马克思从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引用一个实例，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一位城市代表发言反对把采集林中的越橘和浆果也当作盗窃惩办的决定。他指出，穷人家的孩子们采集这些野果，是想帮助可怜的父母挣几个零钱；这是从古至今就为林木的占有者所许可的。所以也就产生了孩童们的习惯权利。另一位代表起来反对说，在他的地区，这些野果已经成为交易品，并被成桶地运往荷兰。马克思用以下几句尖刻的话粉碎这一论据：“的确，有一个地方已经把穷人的习惯权利变成了富人的独占权。你们看，这就充分证明公共财产是可以独占的，从这里自然就得出结论说，公共财产是应该被独占的。事物的本质要求独占，因为私有制的利益想出了这种独占。某些贪婪的现代生意人想出的主意，只要能使枯枝给古代条顿人土地占有者带来利益，就不会引起任何异议。”^②马克思最后承认说，他以厌恶的心情注视了这些枯燥无味的、卑鄙庸俗的辩论，但是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假如召开一个私人利益的等级会议来立法，对它究竟能期待什么。

评论林木盗窃的文章，引起马克思去研究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问题。但是，《莱茵报》对于经济问题的深切关注受到它的青年黑格尔派撰稿人的思想意识的自满的重大阻碍。既然国家是公共性的，那么它就应该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在国家的“公共性”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的企图究竟被什么东西打破了呢？答案是明确的，而且实际上早就有了答案，即自由被贫困破坏，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7页。

② 同上书第147—148页。

貧困又使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失去自由發揮自己力量的可能性。在《萊茵报》駐瑞士的通訊記者中，有威廉·魏特林的朋友奧古斯特·貝克爾和塞巴斯提安·戴勒爾。1842年9月底，《萊茵报》引用了魏特林編的《年輕一代》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共产主义原則的統治形式发表意見說，应当选入政府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才能，这是《萊茵报》不想否认其天才和独創精神的一种思想。第二天，《萊茵报》轉載了《年輕一代》杂志上一位临时記者的关于評論柏林家庭住宅的通訊，认为这个报道对于了解目前这个重要問題并不是沒有意义的。这篇通訊把汉堡門附近的几所工人住宅描写成“半打工厂式的鼠洞，用泥土、木头和桁架拼湊而成，高四十英尺，長約九十英尺，墙上塗着藍色和白色”，也就是描写成实际上存在的极其悲慘的貧民窟。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萊茵报》也发出了响应法国社会主义的微弱回声。報紙派遣自己的記者（大概是莫澤斯·赫斯），到斯特拉斯堡的学者會議去采訪。有許多德国学者和法国学者出席了这次會議。在像韦尔凱尔这样欢迎法国革命，认为它是自然法的母亲的德国自由主义者的身旁，坐着孔西得朗和勒魯这样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會議的政治經濟学小組，討論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体系。《萊茵报》的記者就這項討論发表短評，认为中层等級現在所处的地位同1789年貴族的地位相似，当时第三等級曾經覬覦貴族的特权，并且得到了这种特权，而現在的一无所有的等級，則要求占有目前当权的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財产。但是，現在的中层等級比1789年的貴族更有远見，所以問題大概会通过和平方法解决。

发表这則短評和轉載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文章，使奧格斯堡《总汇报》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借口，以此攻击《萊茵报》，說它进行共产主义宣傳。剛剛担任報紙主編的馬克思在1842年10月16日

用一篇論文对《急汇报》的攻击作了有力的反击。奧格斯堡《急汇报》的一位駐巴黎記者，“談論歷史像糖果商談論植物學一樣”，竟然異想天开，认为君主政体应当設法用自己的方式占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馬克思嘲笑“奧格斯堡长舌妇”，并且問道：“也許她是因为我們既沒有及时开出一个驗方，也沒有悄悄塞給惊愕的讀者一个十分清楚然而却毫不解决問題的方案才指摘我們的吧？我們沒有本事用一句空話来解决那些正由两个民族在解决的問題。”^①但是，馬克思在反駁不公正的攻击的同时，也以不可否认的尖銳性反对那种不管出于什么善意而在这类問題上所做的拙劣工作。他以自己特有的老實态度承认自己還沒有对法国的社会主义作出独立的判断。他用下述一段話闡述了自己的綱領：“《萊茵報》甚至在理論上都不承认現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現實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實際上去實現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實現是可能的事情。《萊茵報》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然而对于像勤魯、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別是对于蒲魯东的智慧的作品，則决不能根据肤淺的、片刻的想像去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奧格斯堡长舌妇希望得到比沙龙空話更多的东西，如果她比沙龙空話能有更多的才能的話，那她也会承认的。……我們坚信，真正危險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實際試驗，而是它的理論論證；要知道，如果實際試驗會成为普遍性的，那末，只要它一成为危險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們的意識、支配着我們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們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則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掙脫出來的枷鎖；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們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②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2頁。

② 同上书第133—134頁。

馬克思是注定不能在《萊茵報》上實現自己的計劃的。他進入編輯部以後，報紙就採取了鮮明的反對派的立場，同時以自己的靈活戰術使檢查機關大傷腦筋，以致省長馮·格爾拉赫在 11 月中旬就向報紙發行人表示了“政府對於報紙的方針的最大不滿”。“當局只希望報紙‘回到比較令人滿意的道路上來’，並沒有採取查封的措施，而只是把魯滕堡趕出科倫。為了使報紙改邪歸正，當局將檢查官警察顧問多勒沙爾免職。當然，多勒沙爾是愚昧的檢查官中的特制品。有一次他從《科倫日報》上刪去介紹未來的薩克森國王斐拉雷特翻譯的但丁的《神曲》的文章，其理由是任何人都不得把神的東西作成戲曲。陪審官維陶斯接替了他的職位，新檢查官的任務是以更巧妙的方法窒息輿論，但是他不能或者不想把劊子手的職務執行得使柏林的當權者滿意。

不久就發生了新的衝突。《萊茵報》從別恩堡和摩塞爾的其他地方收到關於摩塞爾地方農民的悲慘處境的可靠報告。在特利爾和科布倫茨之間，艾費耳高原和洪斯呂克山之間的摩塞爾河沿岸地區十分貧困。摩塞爾農民不像萊茵普法爾茨地方的農民那樣，用一小塊土地種糧食或栽煙草；他們的全部土地都用於栽培葡萄，所以一遇到葡萄歉收，他們就毫無辦法，走投無路。然而從 19 世紀 20 年代中葉到 30 年代中葉，葡萄連年歉收，而且後來又成立了關稅同盟，它規定的低微稅率促使法國的葡萄酒大量進口，從而給摩塞爾葡萄酒造成了銷售困難，使它跌價。摩塞爾農民的其他申訴是反對官僚主義的鄉鎮行政機關的資本主義經營侵害了他們對森林和牧場的公有權；反對葡萄汁的稅太重而且課稅不均；反對高利貸對他們的殘酷盤剥。他們的很少一點土地，一塊一塊地被強制拍賣出去，因為他們無力繼續繳納稅款和利息。這些赤貧的居民的悲慘狀況已經明顯得連普魯士的專制政府都不敢否認，雖然

它只是在附带一切自作聪明而毫无能力的官僚政府在不得不解决实际問題时慣用的“如果”和“但是”的条件下才承认的。专制制度的最后手段照例是揮动大棒，打倒那些討厭的人，因为这些人想从它身上得到的东西，比它能够給予的为多。

《莱茵报》的摩塞尔通訊是以冷靜的态度，根据事实写出的报告。其中的一篇通訊譴責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有几千居民的乡里，虽然拥有极其茂盛的森林，然而还没有分配薪材。另一篇通訊以高兴的心情欢迎較大的出版自由，因为从此以后，摩塞尔农民可以公开地抨击折磨着他們的毒疮，而不被指責为无耻叫囂了。这两篇通訊引起馮·沙培尔总督发布了两个訓諭。他在一个訓諭里，要求報紙說出那个據說发生了薪材事件的乡鎮的名字；在另一个訓諭里，他否认任何当局曾有过把种葡萄的农民对他們“公认的貧困状况”的申诉称为无耻叫囂的这种“不体面行为”。他希望通訊的作者特別指出当局即使在比較寬大的书报檢查令公布以前，曾阻撓过公开坦率地談論摩塞尔农民的貧困状况的事例，并且向通訊的作者保证，如果作者願意坦率說明损伤种葡萄的农民的元气的是什么毒疮，特別是作者能够提出根治毒疮的有效办法，他将十分感激。这个官僚在客客气气地发泄了一頓怨气以后，就改用粗暴的口吻，宣布作者的論斷乃至反面的证明都是恶意誹謗。

《莱茵报》起来应战。它通过自己的記者收集了关于摩塞尔农民状况的大量資料，并报道了这些材料，而且它本身还从其他来源找到一些材料做补充，以对总督的攻击进行彻底的反击。1815年1月15日，報紙上发表了儿篇这方面的文章，同时把材料清清楚楚地分排在五个标题下面。報紙提出討論的問題是：一、关于分配木材的問題。二、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对于較大的出版自由的态度。三、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毒疮。四、摩塞尔农民的吸血鬼。五、改善

这种状况的建議。第一項的材料完全报道出来，因为通訊的作者同意編輯部把那个沒有分配过薪材的乡鎮的名字告訴总督。关于第二項，報紙用大量的官方材料和文件材料证明政府确实用暴力压制过摩塞尔农民的申訴，证明政府从来没有想认真地改善这里农民的处境，而一直是玩弄空洞的言詞，证明官僚制度根本不能为消除社会罪恶作任何事情，因为这个制度的上层机构依靠下层机构，而下层机构又仰仗上层机构。这几发厉害的炮彈打得政府难于招架，政府就急忙在檢查官的紅鉛笔的掩护下仓皇退却。1月20日这些論文突然不見了；既怯懦又强暴的官僚制度不允许報紙討論最后三項。

但是1月28日，在《萊茵报》最醒目的地方登出一则簡訊，內称主管书报檢查的王國各部联合下令《萊茵报》从本年4月1日起停刊。同时授权馮·格爾拉赫省長要求該报在每天已經通過檢查后把全部送到他那里复查，在未經他亲自檢查以前絕對不准付印和发行，如果他发现初檢时漏过的不妥之处就禁止報紙出版。在1月25日发布的禁令中說，《萊茵报》从它創刊之日起就遵循着一个应受指摘的方針；显然被不良的意图所支配，即想从根本上攻击国家制度，动摇君主政体的原則，挑撥輿論怀疑政府，教唆某些等級反对另一些等級，煽动群众对現行法制不滿。報紙的活動以一些空洞的理論为基础，追求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容忍的应受指摘的目的。報紙的用語和表达方法都十分放肆。命令承认檢查制度軟弱无能，命令认为，长期制止这种具有如此頑固恶劣傾向的胡作非为不是檢查制度的任务。命令用另一种方式提出了基督教德意志原則（尽管這項原則在道德上对世俗的傾向抱着厌恶的态度，但是它对叮当作响的洋錢却怀着溫柔的情感），說什么如果不考慮到股东們的金錢利益，政府早就把報紙查封了。这个考慮目前也还

促使政府不立刻而在第一季度結束后才查封報紙。

在檢查官維陶斯上面設置了山省長兼任的高級檢查官以后，維陶斯就辭退了他的職務；為此科倫合唱團給這位“下野的檢查官”舉行了一次隆重的小夜曲晚會。由柏林派來的部務秘書聖保爾接替了他的職位。這個聖保爾終於發揮了政府所要求的粗暴和狡猾並用的手法，因而在2月18日又撤銷了高級檢查官的職位。唯恐失去財源的股東們2月12日召開了股東大會，向當局苦苦哀求，這也許促使當局作出撤銷高級檢查官的決定。雖然《萊茵報》的各欄里今天還可以隱約看到指責檢查官的專橫跋扈的痕迹，但是促使馬克思在3月17日退出《萊茵報》編輯部的，並不是同檢查官進行的鬥爭，而是股東們的一種想法，他們認為報紙的態度緩和以后，就能使當局收回對報紙所作的死刑判決。馬克思立刻得到了從實踐中檢查他的關於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於不要成為一種行業的見解的機會。

股東的幻想當然要變成泡影。他們派到柏林去的代表團甚至未被允許謁見國王。科倫、特利爾和萊茵其他城市的請願，得到了禁令繼續生效的答复；而參加請願的政府官員還額外受到申斥，說他們本應對社會關係持有更為老練的觀點。1843年3月31日《萊茵報》就停刊了。

但是甚至這面驕傲的旗幟在被迫降下時，也沒有能夠免遭德國人的卑躬屈膝精神的玷辱。在為報紙舉行的葬後宴會上，扼殺報紙的檢查官同股東們同桌進餐，而在檢查官的椅子上還用鎖鏈綁着一份《萊茵報》。聖保爾在威風凜凜地完成了這件文化業績以后，還沒有來得及離開科倫，就因在妓院前同巡夜人員斗毆而被警察法庭判了罪。另一個檢查官是他在這次英勇鬥爭中的同志，即那個弗里茨·歐倫堡伯爵，三十多年以后他以一個腰挎砍刀、手執

步枪的虔誠老妇的姿态出现在社会民主党面前。可惜，普魯士的历史学家們沒有向后世报道，浪漫主义的国王在用自己幻想的动听的和形象化的語言胡說什么“萊茵卖淫姊妹”的时候，是怀着什么样的虔信宗教的情感，去看他的勇敢的宗教和道德斗士在世俗的妓院前同秩序的維护者打架斗毆的。

第九章

《德法年鉴》

馬克思退出《萊茵報》編輯部之后，立即給卢格写信說：“自由主义肩上的华丽斗篷掉下來了，极其可惡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現在全世界的面前。”^① 卢格在給他的兄弟写信时，就把这个专制制度的老根子揭露出来，在整个德意志，扼杀书报出版的不只是一个官員，也不只是国王，而是經過人民、作家、学者、市民、士兵和农民的同意并以他們的名义扼杀的。如果政論界的反对派想要扎下新根，那它就必须到国外去做这一工作。《德法年鉴》就是出于这种必要而产生的。

一 杂志的創办和停刊

为新事业所做的事务和組稿方面的准备工作，差不多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当《德国年鉴》被查封以后，卢格就會計劃同馬克思在国外使这个杂志复刊。他在弗呂貝爾的文艺书店入股，出資六千塔勒，但是新杂志不要像《軼文集》那样在瑞士出版。正如馬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7頁。

克思所說，蘇黎世服从柏林的命令。海爾維格早在2月間就成了一對君主政體反動的畏懼心的犧牲品，被逐出蘇黎世。他不得不放棄出版雜誌的計劃，而利用書報檢查制度的漏洞（准許出版二十印張以上的書籍），把準備登在雜志頭几期的幾篇得以幸存的文章，編成一本《來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張》。

但是馬克思和盧格所以使自己的脚步迈向巴黎，不仅仅是因為他們想要完全擺脫德國的書報檢查制度。實際的鬥爭促使他們兩個人從宗教方面轉向政治方面。馬克思在《萊茵報》上有力地支持海爾維格和盧格同鮑威爾兄弟的論戰，無情譴責那些自由人的輕佻行為，譴責他們舉止行動上的柏林派頭，政治上的浪漫主義，譴責他們自詡才高和自我吹噓，不過他也認為就每一個單獨的人來看，他們大部分是卓越人物。事實表明，在德國不可能進行政治鬥爭，而政治鬥爭的風浪已在法國高高掀起。此外，馬克思到任何地方也不能像在法國這個社會主義發源地那樣方便地研究法國的社會主義。在盧格那一方面，還打算在德國人和法國人之間建立一個精神同盟。他認為反對法蘭西和反對政治，就是反對政治和反對自由。法蘭西是政治原則，即歐洲的人類自由的純洁原則，而且只有它才能是這種原則。在這個新的同盟里，作為形而上學和幻想方面的羅盤針的黑格爾哲學的邏輯洞察力，應當成為德國人帶來的嫁妝；法國人（甚至拉梅耐和蒲魯東，更不用說聖西門主義者和傅立叶主義者了）在形而上學和幻想的海洋上，像一只沒有舵的船，任憑風浪擺布。盧格打算邀請拉馬丁、拉梅耐、路易·勃朗、勒魯和蒲魯東為雜誌撰稿。

1843年夏末，盧格前往巴黎，在那裡住了幾個月了解情況。結果他認為很好，於是在1843年底，他也像馬克思那樣完全搬到巴黎去。但是過了三個月以後，盧格就寫信給他母親說，《德法年

鑒》的第一期双刊号問世了，而整个事业也隨着寿終正寢了。

这次失敗的原因只有一部分是杂志在德国的行銷遇到了很大阻碍，文艺书店的資金很快就耗竭了。这个困难本来是可以克服的。至于法国作家的冷漠矜持則更不能把人难倒。沒有一个法国作家在《德法年鑒》上发表文章。他們有一部分人虽然答应写稿，可是沒有兌現；另一部分人往往用很不客气的态度加以拒絕。拉梅耐对两位編者作了两小时关于他的宗教怪論的報告，然后宣称，在参加杂志的工作以前，他要对編者的活動觀察一个时期。拉馬丁甚至正式对报載他答應同異端分子（！）拉梅耐一起，为卢格和馬克思两位先生的杂志写稿的消息表示異議。关于这一点，卢格和馬克思在《和平民主日报》上反駁說，拉馬丁曾使他們对他的合作抱有期望。路易·勃朗表現得最不客气。不錯，他曾經由于德国青年开始注意生活實踐而为德国庆幸，但是他認為德国青年应当懂得节制自己的热情，因为哲学中的无神論必然在政治方面产生无政府状态的后果。他譴責那些由于崇拜法国的唯物主义，崇拜狄德罗、霍尔巴赫和百科全书而使自己后退了一百多年的德国青年，并且以夸張的語調要求他們：“你們要記住，卢梭才是以團結和博愛為基礎的民主制的代表者！你們要記住，正是那只把社会契約給我們的手寫下了薩瓦牧師的懺悔！”这个战战兢兢的小資產者不能放棄那种用某种宗教的神光來包圍实际生活斗争，从而阻止自己深刻認識这个斗争的可爱習慣。但是，一棵大树被砍了一斧头是不会倒下来的，而且在最初时期，《德法年鑒》的編者可以不必要求法国人写稿，因为海涅、海尔維格、約翰·雅科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人已經組成了一个德国撰稿人总部，他們可以为杂志写稿。

是什么东西使他們遭到无法挽救的失敗呢？这就是他們两人

关系的破裂。关于这种破裂的表面原因，我們只能从卢格的話里找到，但是这些話里流露着对于馬克思的刻骨仇恨，所以不能盲目相信。据卢格說，馬克思同他断絕朋友关系，是因为他指責海尔維格显然被巴黎的享乐生活所陶醉，做了許多蠢事，从而他不承认这个“流氓”有任何前途。这里面也許有一些真实的东西。馬克思对于真正的詩人都有一种意气相投的了解；假如他像卢格那样，一年前同海尔維格同在柏林，他是不会怀着卢格的隱秘的滿足感眼看着詩人去謁見国王的，而要尽自己一切力量阻止詩人謁見。現在，当海尔維格由于这种年輕人的胡鬧的后果而感到十分苦恼的时候，他可能更为公平地，从而更为溫和地判断海尔維格所犯的是表面的过错还是实质的过错。也許卢格的根深蒂固的庸俗道德不知怎的引起馬克思发火。要知道，卢格甚至对像海涅这样的詩人，也沒有放棄絮絮不休的道德說教，虽然他这时对于海涅的評价要比以前在哈雷时正确一些；过了許多年以后，他曾自鳴得意地說，他同馬克思一起鼓励海涅写下了像《冬天的童話》这样不朽的諷刺詩。其实，馬克思和卢格的私人关系是由于什么原因破裂的，并不怎么重要，只有他們在政治上的決裂才有历史意义，而且这种決裂的根源要比他們由于海涅或海尔維格而临时发生的爭論深刻得多。

只是因为浪漫主义的反动势力目光短淺，才使卢格这样的人成为极端反对派。假如人們让他享有那种連昏庸的老王^①都容忍的談論哲学的自由，他就会滿足于担任哈雷或德累斯頓的市議員这个英雄角色了。他对于这些鄙陋的事情感到如何滿意，从他二十年后在回忆这些往事时表現的巨大滿足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应不應該为了載貨馬車夫和載客馬車夫的利益在易北河左岸修建新

①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譯者

車站，或者为了旅客的利益在易北河右岸修建新車站；柏林的犹太人可不可以拿着假钻石参加一年一度的德累斯頓集市；可不可以禁止粗野的英国人在閱覽室里看书时把两只脚放在桌子上——这都是卢格最喜欢討論的問題。作为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在《萊茵报》工作的馬克思所碰到的一些物质冲突，同卢格所关心的这些問題形成极其鮮明的对比。这些冲突是：資产阶级社会同封建社会之間的斗争，資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間的对立，甚至只是貿易自由和保护关税之間的爭論，特別是由李斯特領導南德工厂主掀起的反对关税同盟的低稅率的这种爭論。当馬克思和卢格都置身于法国生活之中的时候，馬克思像一艘主力艇，乘風破浪，終于駛到开闊的海域，而卢格的核桃壳却畏畏縮縮地极想退回到岸边的淺滩。为了熟悉工人的共产主义团体的生活和活动，馬克思十分願意同当时領導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但澤人艾韦貝克来往；可是，当艾韦貝克要卢格捐几个法郎印刷魏特林的著作，并附帶說了“卢格有錢”这句沒有恶意的話的时候，这位已經下野的德累斯頓市議員，却对艾韦貝克“怒吼”一通，而且他认为值得把这一“怒吼”的內容写下来，以供后世人浏览。他請求別人不要过問他的私事，他不是为了让艾韦貝克控制他的财产，而躲避德国的警察監視和檢查制度的，接着又說了一些諸如此类的話。这个資产者在实际接触社会主义的时候，就把他的哲学家外衣丢掉，露出本来的面目；卢格开始用比观察共产主义者的“卑鄙龌龊的犹太灵魂”更为寬大的眼光去看“普魯士的劊子手”。

在以后五十年的历史的反光照射下，卢格和馬克思之間的典型差別，即一个喜欢吵吵嚷嚷的市僧和一位革命的思想家之間的差異，已經十分明显地反映在載于《德法年鉴》創刊号上的馬克思、卢格、巴枯宁和費尔巴哈的通信当中。卢格后来冒充这些书信的

作者，但是无论从心理方面来看，或者从风格上去分析，都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信件出自卢格的手笔。至少就书信内容的本质来判断，它们毫无疑问是由那些把自己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写在信上的人写的。马克思以短促而富有情感的弹奏为这束书信开了头。他在第一封信里写道，浪漫主义的反动势力将要引起革命；国家是十分严肃的东西，要它演什么滑稽剧是办不到的；一艘满载傻瓜的船只，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的，因为这些傻瓜根本没有料想到这一点。^①对此卢格则用对于德国庸人的绵羊般的一成不变的忍耐的冗长诉苦作答。卢格很想消灭这些德国庸人，可是他知道自己也是一个庸人，所以不打算洗雪共同的耻辱。“请您告诉我任何令人不快的话，我都准备接受。我们的民族没有前途了，我们的名声又有什么了不起？”

马克思对此回答说：您的来信是一支出色的哀曲，可是它毫无政治内容。世界是属于庸人的，我们应该更仔细地研究这位世界之主。马克思分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一些初步措施，认为它们是一个明智的君主企图在原来的基础上消灭庸人国家的尝试。这个尝试失败了，而且也必然遭到失败。庸人是构成君主制度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两者仍然是现在这样，为王的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国王希望用来治理国家的不是死的法律，而是自己的活的心；他想把人人的心都鼓舞起来，以便为他的衷心愿望效劳，但是别人的心却不像国王的心那样跳动；那些受国王统治的人一开口便说要消灭旧的统治。那些曾无耻地宣称要使人成为人的理想家也讲话了；当国王按照旧德意志的方式来幻想时，他们认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8页。

自己有权按照新德意志的方式发表議論。由于存在这种分歧，那些以前事事都处理得得心应手的奴僕，以及全 Hinterrussen 的皇帝^① 可以容易說服暴躁的国王，叫他相信这样就无法管理那些大声疾呼的人了。接着，就回到了旧的僵化了的奴僕和奴隶的国家；而缄默則成了摆脱这个僵局的唯一办法，这样一来，就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证明，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而不可能具有人性。

然后，馬克思认为，卢格当然不会指責他对于目前状况过于乐观。如果说他对于目前状况还没有灰心失望，那只是由于这种绝望的現状使他产生了一种希望。他沒有談論主人的无能和一切都听天由命的奴僕与臣民的漠不关心，虽然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足以引起巨大灾难。他只注意庸俗主义的敌人，換句話說，就是一切有思想的和受苦受难的人都已經互相諒解，甚至那种旧臣民的消极繁殖制度也在每天为新人类招募新兵。“工商业的制度，人們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現今社会內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創造，它只是存在和享乐而已。”^② 他們的任务是彻底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其次是巴枯宁和費尔巴哈的书信。他們两人也反对卢格的悲观失望情緒。巴枯宁以高傲但又出于好意的笔調描述了德国的状况：“我这个斯基台人，要解开束縛你們——想成为希腊人的德国人的枷鎖”。《德国年鉴》的被查封使費尔巴哈想起波兰的灭亡；“少數人的努力在已經腐朽的人民生活的公共泥潭里是得不到任何結果的……我們需要新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們不能像民族迁徙时

① 指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参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3頁編者注。——譯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4頁。

期那样从沼澤地帶和森林里來。我們应当用我們的肋骨來創造他們。”他建議創辦一个新的机关报以便清洗人的头脑。卢格承认自己被“新安納卡西斯^① 和新哲学家”所战胜。最后，馬克思在美妙的和音中給整個討論作了結論。

馬克思說，顯而易見，必須為真正思考的、獨立自主的人們建立一个新的集合地点。虽然对于“从何处來”這個問題沒有什么疑問，但是对于“往何处去”這個問題却更加糊涂。“姑且不談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們中間的每一个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來沒有明确的概念。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們不想教条式地預料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謎語的答案都在哲学家們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張开嘴来接受絕對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現在哲学已經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識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渦。如果我們的任务不是推断未來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們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們現在應該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現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謂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縮。”^② 馬克思不願树立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卡只、德薩米和魏特林等人鼓吹的共产主义，对他來說也不过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有两种东西，第一是宗教，第二是政治，目前在德国引起极大的兴趣。不管这两种东西怎样，都不应当拿一种制度，比如《伊加利亚旅行記》中的制度，来和它們对立，而應該同它們結合起来。

① 安納卡西斯(Anacharsis)是公元前6世紀斯基泰族的王子和哲学家。普魯士人克洛茲曾用这个名字做自己的化名。克洛茲后来入了法国籍，在巴黎主張极端革命和无神論，1794年被判处死刑。——譯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5—416頁。

“极端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政治問題沒有什么价值，馬克思反对这种意見。到处都可以从政治国家同自身的冲突中，从政治国家的理想使命同它的現實前提的矛盾中，发展出社会真理。他援引自己以前在《萊茵报》上指出的等級制和代議制之間的区别，认为这个問題不过是用政治的方式来表明人的統治和私有制的統治之間的区别而已。“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們把我們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結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場結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們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結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就不是以空論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現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們是從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闡发新原理。我們并不向世界說：‘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謂之举’，而是給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們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識則是世界應該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願意与否。”^① 最后馬克思提出一个綱領結束这一通信：对当代的斗争和願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闡明。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就达到了这个綱領的頂峰。其他撰稿人的一切作品，比如海涅和海尔維格的詩歌，約翰·雅科比从他的叛国案审訊的文件中摘出的报道，貝爾奈斯的文章和赫斯的书信，都多少具有很大的美学价值或历史价值，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却沒有什么意义。

二 馬克思的論文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为《德法年鉴》写了两篇文章。馬克思的兩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7—418頁。

篇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彼此具有一定的内部联系；同样地，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也是如此。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所有这四篇文章好象被一条红线连贯在一起。这条红线就是费尔巴哈，他们从费尔巴哈出发，然后超过他摸索着前进。

马克思在 1843 年 10 月 30 日寄自克罗茨纳赫的信中，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第一期写一篇批判谢林的文章。马克思称费尔巴哈是“颠倒过来的谢林”。谢林青年时期的真诚思想在费尔巴哈身上发展为真理、现实和豪迈的热情，而在谢林那里仍然是青年时代的一种玄妙的梦想。“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的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对手。”^① 这几句大胆而亲切的话好象是在感情激动时说出来的，使得费尔巴哈深为感动，以致他立刻开始阅读谢林的讲义，以便满足马克思给他指出的“义务的必然性”。但是最后他还是拒绝了这个请求，说他已把最必要的东西简明地叙述过了，不想为了使一般人理解 (ad captum vulgi) 再重复已经说过的东西。也象费尔巴哈评论马克思时一样，马克思在评论费尔巴哈时总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但是，使他们分离的那个因素，即十九年的工业和政治的发展，在他们初次接触时立刻明显地表露出来：四十岁的中年人只想穿着哲学家的高贵的古代长袍走过感性世界，而二十五岁的青年人则想用利剑征服这个世界。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所奠定的反宗教的批判的基础出发：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但是，马克思立刻向前迈进了一步：“……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46 页。

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① 历史的任务，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任务，就是在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马克思没有针对原本，而是针对副本进行批判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批判关系到德国。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那就要犯时代错误。“即使我否定了 1843 年的德国状况，但按法国的年代来说，我也不可能是处在 1789 年，更不可能是处在现代的焦点了。”^② 其次，应当清晰地描述德国的状况，“描述各个社会领域间的相互倾轧，描述普遍的沉闷和不满以及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偏颇，也就是描述专以维护一切卑鄙行为为生的、而且自己本身也无非是一种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卑鄙事物的那个政府机构内部的一切。”^③ 如果批判打算理解现代的社会现实，如果批判打算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那它就必须超出德国的状况，不然的话，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工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是怎样使德国人开始发生兴趣的呢？是由于保护关税制度、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条顿主义从人变成了物质，我们的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也就不知在哪个黄道吉日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④ 当时马克思已经撕破了今天还被捧为民族英雄的李斯特给自己的资本主义一重商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52 页。

② 同上书第 454 页。

③ 同上书第 455 页。

④ 同上书第 457 页。

义宣傳披上的爱国主义外衣。在法国和英国，問題是政治經濟学或社会对财富的控制；在德国却是国民經濟学或私有财产对国家的控制。那里正在把結解开，而这里才在打結。这个例子充分說明了現代問題的德国形式，說明德国的历史就像一个沒有受过訓的新兵只会重复旧的操练一样，到現在为止的任务只是重复陈旧的历史。

但是，德国的历史在德国的哲学中有它的观念上的繼續，德国人是现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现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同正統的当代現實相一致的德国历史。对这种哲学的批判，要达到目前需要实际解决的那些問題的深处。政治實踐派——大概是指自由主义的資产阶级——否定哲学是正当的；这一派的錯誤只在于沒有实现这一要求，而且也不可能实现它。只是掉过头去，把背冲向哲学，对它嘟囔几句沒有意义的气話，是否定不了哲学的。这一派想从生活的現實萌芽出发，可是它忘記了德国人民生活的現實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們的头脑里生长起来的。这一派如果不实现哲学，它就不能消灭哲学。从哲学中产生出来的政治理論派（大概是指柏林的自由人）則犯了相反的錯誤。这一派不批判哲学，而是从哲学的前提出发，并且沒有超出由这些前提得出的結果。这一派的根本缺陷，是它认为不消灭哲学就可以实现哲学。恰恰相反，問題在于：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原則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公认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

馬克思对此回答說：“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論只要說服 *ad hominem* [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論只要彻底，就能說服 *ad hominem* [人]。所謂彻底，就是抓住

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①可是，彻底的德国革命看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論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論滿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德国怎么能够一个斤斗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即越过它实际上應該看做擺脫自己实际障碍的一种解放、而且應該作为它的目的来爭取的那些障碍呢？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即德国各邦的政府懂得把现代国家世界（德国人民沒有这个世界的长处）的文明的缺陷，同旧的国家世界的野蛮的缺陷（这些缺陷德国人却大加欣賞）结合起来；德国分担了现代发展的一切痛苦，可是沒有享受到这一发展的快乐；有朝一日，德国会在还没有处于欧洲解放的境地以前，就陷于欧洲崩溃的境地。“对德国來說，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純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烏托邦式的空想。”^②

这样一种革命的基础，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統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即有錢又有教养，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想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一瞬間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在这瞬間，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間，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臟。”^③相反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頁。

② 同上书第463頁。

③ 同上书第464頁。

地，要使人民革命和个别阶级的解放互相吻合，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外一个阶级，一个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切等级的共同障碍的化身，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须被看成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所以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法国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

马克思接着指出，德国的任何一个特殊阶级，不仅仅缺乏那些把它自己标志为社会的消极代表的彻底性、尖锐性、勇敢精神和无情。同样地，任何一个等级也缺乏使自己同人民的心胸一致（即使是瞬间的一致）的开阔胸怀，缺乏那种鼓舞物质力量实行政治暴力的灵感，缺乏那种敢于向敌人傲然挑战、大喝“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德国社会各领域之间的关系不是戏剧式的，而是史诗式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就连德国中等阶级本身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也同其他要求一起，只是以认为自己是其他一切阶级的卑鄙庸俗性的总代表这一意识为根据的。每一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便卷入同低于自己的阶级进行的斗争。中等阶级还只是勉强地敢于表述自己对于解放的观点的时候，社会情况的发展以及政治理论的进步，就已经宣布这种观点是陈腐的，或者至少是成问题的了。

那末，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

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領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領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領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領域，它本身表現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結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級來說，就是无产阶级。”^①

无产阶级是随着德国工业的急剧发展才开始形成起来的。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貧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別是由于中层等級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不言而喻，自发产生的貧民和基督教德意志的农奴等級，也在不断地（虽然是逐渐地）补充着无产阶级的队伍。如果说无产阶级宣告了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这也不过是揭示了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如果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这也不过是把社会已經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則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結果而体现在它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沒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臟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現實；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为現實，就不可能消灭自己。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②的高鳴来宣布。”^③

馬克思在《論犹太人問題》一文中批判布鲁諾·鮑威尔的这方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6頁。

② 高卢是法国古称，“高卢雄鸡”是法国在第一共和国时代用在国旗上的图案，标志当时法国人民的革命意識。——譯者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頁。

而著作时，論述德国可能实现的不是政治解放，而是人类解放，同时探討了这两种解放的区别。犹太人問題可以說是德国唯心主义着手研究經濟发展的起端。基督教德意志国家一直虐待、压制和迫害犹太人，可是同时又容忍犹太人，庇护他們，甚至疼爱他們。在18世紀老弗里茨把犹太人变成了真正无权的人，可是同时他又广泛地庇护犹太人，“主要是为了促进商业、作坊和工厂的发展”。“哲学家国王”給予协助他伪造硬币和进行其他性质可疑的財政活动的犹太富翁以“基督徒銀行家的自由”，他所以容忍哲学家莫塞斯·繆达尔桑住在他的国境内，并不是因为繆达尔桑是一个哲学家，而是因为他給一个犹太富翁当管帳先生。19世紀4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千方百計地刁难犹太人，可是这种刁难并沒有妨碍犹太人的資本随着經濟发展而有所增长。犹太人的資本开始使統治阶级服从于自己，并把自己的鞭子抽在被統治阶级身上：以产业資本形式鞭打无产阶级，更为普遍的是，以高利貸資本形式鞭打小农和小市民阶级的广大群众。

布魯諾·鮑威尔反对这种奇怪的矛盾，反对这种“虚假的情况”。在这一点上，他看到了資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只认为它是中世紀的胚胎，是基督教德意志国家的贅瘤。因此，他沒有能够走出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間的宗教对立的圈子。尽管他批判神学时十分尖銳，但是他仍然戴着神学的眼鏡去观察事物。他攻击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认为从这个国家的宗教本质来看，它不能解放犹太人；可是同时他又攻击犹太人，认为从犹太人的宗教本质来看，他們不能获得解放。宗教观点对于鮑威尔具有决定性作用。基督教和犹太人如果希望成为自由的人，就必须不再是基督徒和犹太人。但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基督教胜过作为一种宗教的犹太教，所以犹太人走向自由的道路，就比基督教徒的这条道路漫长而艰巨。按照

布魯諾·鮑威尔的意見，犹太人在获得解放以前，必須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向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学习。犹太人問題的解决，犹太人的解放，在布魯諾·鮑威尔这里变成了唯心主义的怪論。

馬克思对此提出实际的結論，这种結論是他从研究法国革命当中得出来的。馬克思說，只是探討“誰應該解放別人？”和“誰應該得到解放？”这两个問題是絕對不够的。批判还有第三个任务，即應該提出这样的問題：这里指的是哪一种解放？应当探討政治解放对人类解放的关系。鮑威尔問犹太人：根据你們的观点，你們有沒有权利要求政治解放呢？其实，他本应当提出这样的問題：政治解放的观点有沒有权利要求犹太人放棄犹太教，要求一切人放棄宗教呢？

馬克思对这个問題作了否定的回答，同时证明基督教德意志国家，即特权国家只是一个不完备的国家，还是一个神学的国家，仍然沒有发展成为純粹的政治国家。政治上完备的、再也不知道宗教特权为何物的現代国家也是这种完备的基督教国家。这种国家不仅可以解放犹太人，而且已經解放了他們。根据它的本质，它也应当解放他們。在政治国家高度发展的地方，在国家的宪法明确宣布实施不受宗教信仰限制的政治权利的地方，比如在北美的某些州里，不信奉宗教的人仍然不被視為正派人。可見，宗教的存在并不同国家的完备性发生矛盾。犹太人、基督徒和一切信奉宗教的人的政治解放，就是国家摆脱犹太教、基督教和一切宗教而得到的解放。国家可以使自己摆脱某些限制，可是人实际上不会同时解除这种限制，政治解放的局限性也就表现在这里。

例如，国家作为国家正在廢除私有財产。像在北美的許多州里发生的那样，人一取消选举和被选举方面的財产資格，就是宣布私有財产已在政治上被廢除。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职

业为非政治的差别的时候，当国家不顾这些差别而宣布每个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参与者的时候，国家就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廢除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职业上的差别。然而国家却在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按它们固有的方式，即作为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发挥作用，表现它们的特性。国家远远沒有廢除所有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的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公共性。完备的政治国家，从它的本质來說，是同人的物质生活对立的人的类生活。这种自私生活的一切前提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继续存在于市民社会，而不在国家領域之内。国家同它的前提（无论这些前提是私有财产这样的物质因素，还是宗教这样的精神因素）的关系，就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作为一种特殊宗教的信仰的人跟自己的国家公民身分和作为社会成员的其他人发生的冲突，归結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間的分裂。

可是，如果一个人，虽然是犹太人，但也能够从政治上获得解放，那末他是否可以要求和获得人权呢？鮑威尔否认这一点。馬克思对此回答說：从人权这一概念决不能得出宗教同人权毫不相容的結論；恰恰相反，信奉宗教的权利，而且是不管用任何方式信奉宗教的权利就包含在人权之中。信仰的特权是一般的人权。Droits de l'homme（人权）是同公民权不同的。和 citoyen（公民）不同的这个 homme（人）究竟是誰呢？不是別人，正是市民社会的成员。馬克思援引最激进的宪法，即1793年法国宪法关于人权（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的规定，詳尽地证明了这一点。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在封建制度下，社会一方面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因为市民生活的各项要素，比如財产、家族、宗教和劳动方式，都已經以領主

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成为国家生活的要素。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又由此分裂为许多特殊社会，把个人从国家整体中排除出去。这种组织的必然后果，就是普遍的国家权力变成同人民隔离的统治者及其僕从们的特殊职能。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到人民事务的高度，以制宪形式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确定为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摧毁了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从而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①

最后，马克思研究鲍威尔的另一个观点。鲍威尔认为，基督徒比犹太人具有较大的解放能力。马克思在这里也粉碎了问题的神学提法。尽管鲍威尔对神学持有批判的态度，但是他并没有走出神学提法的圈子。马克思打算观察的不是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平素的犹太人。毫无疑问，犹太人问题也是宗教问题，但是它具有一种实在的世俗基础。不应该从犹太教去解释现实的犹太人，而是恰恰相反，应该到现实的犹太人中去寻找对于犹太教的解释。因此，在马克思这里，把犹太人的解放能力问题变成了要想消除犹太就应当克服哪种特殊的社会因素的问题。犹太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是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是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生意。他們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是金錢。“既然这样，那末从做生意和金錢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一种社会組織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組織也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識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異化的极端实际表現而奋斗。”^① 馬克思在犹太中看到一般性的现代反社会的因素，而这种因素經由犹太人从坏的方面积极参加的历史发展而达到了目前这样高度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必然要瓦解。

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因为他們掌握了金錢勢力，因为金錢成了世界勢力，而且犹太人的实践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國人民的实践精神。“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就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② 在理論上人們不承认犹太人有公民权，而在实际上他們却有很大的权力。既然鮑威尔把这叫做虚假的情况，那末上述的矛盾就是一般的政治同金錢勢力之間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凌駕于金錢勢力之上，但在实际上，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犹太的继续存在不是違反历史，而是順应历史。市民社会不断从自己的内部产生犹太人。金錢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在它面前諸神都要退位。金錢蔑視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了商品。金錢是一切事物的为自己本身制定的普遍价值。因此金錢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6頁。

② 同上书第447頁。

身的价值。金錢是从人身上異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的本质却統治着人，而人也向它膜拜。犹太人的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是財迷的民族。因为犹太人的現實本质在市民社会得到了普遍的真正的實現，所以市民社会就不能使犹太人相信他們的宗教本质的非現实性。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

換句話說，馬克思認為日常的宗教問題現在具有社会意义，至于宗教利益本身就更不用說了。他不是用神学家的眼睛，而是用俗人的眼睛去觀察犹太的历史发展的。他不是根据宗教理論，而是根据在犹太教中有一种虛幻的反映的工商业實踐來探討这一发展的。實踐的犹太只有在完备的基督教世界里才能完备；甚至它就是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完备實踐。既然市民社会完全具有商业的、犹太人的性质，而犹太人从来就是这个社会的必要成员，那末，犹太人更有权利要求政治解放，要求享受一般人权。

承认人权，不外是承认利己的公民个人，承认构成这种个人的生活状况內容，即現代市民生活內容的精神和物质因素的不可阻擋的运动。人权并不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赋予人以信教自由。人权并不放棄财产，而是赋予人以拥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不阻止人去卑鄙地追逐利潤，而只是赋予人以行业自由。現代国家承认人权，跟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度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古代国家以奴隶制度作为自己的自然基础，同样地，現代国家以市民社会作为它的自然基础。市民社会通过自己的发展，打碎了一切旧的桎梏，建立起現代国家，而这个国家又通过宣布人权而承认了自己的出生地和基础。发达的現代国家組織，以发达的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必然基础，換句話說，就是以人反对人或个人反对个人的普遍斗争，所有主要由于个性而彼此分开的个人的相互战争，摆脱了特

权压迫的自发生生活力量的普遍的不可阻挡运动，个人在表面上自由和独立的情况下所处的实际奴隶地位，作为它的必要基础。个人把自己的异化了的生活因素，比如财产、行业和宗教等的不可阻挡的运动当作自己的固有自由，其实这种运动却是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地位和失去人性的表现。

混乱是从正在解体的特权中解放出来的市民社会的规律，而市民社会的混乱则是现代社会状况的基础，犹如这种社会状况是这种混乱的保障一样。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情况达到如何密切程度，它们之间的彼此对立就处于怎样严重程度。

对犹太人问题的这一批判使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如果说黑格尔把国家置于社会之上，那末马克思则认为，实际上是社会高于国家。马克思援引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发达的现代国家证明了这种情况。他指出，在古代和封建时代，同在现代一样，社会都是国家的必然基础，而国家并不是社会的必然基础。但是，只是到了现代，才使社会同国家之间的对立简化而同时又深化到必须在社会力量的有意识组织内加以解决的地步。这种有意识组织以一种更高的统一消灭社会混乱和国家强制之间的矛盾，并在使人成为他的生活源泉的主人以后，把人解放出来。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论文，包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有发展前途的萌芽。

后来，马克思再也没有研究犹太人问题本身。他对于这个问题所要发表的意见已经全部说出来了。从此以后出现的犹太人问题的文献真是汗牛充栋，可是没有一个在思想上超过马克思的，而是一直落后于马克思的这篇论文。马克思与反犹太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他不仅指出犹太人有无可争辩的权利要求政治解放和享有一般人权，而且也证明了为什么犹太人有这种权利。此外，他

還說，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進步；尽管它不是一般解放，但是无论如何，在迄今为止存在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然而在另一方面，馬克思也与亲犹太主义沒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亲犹太主义喜欢用萊辛的《智者納旦》中的几句美丽的詩来抵制对愛財犹太的一切批判。而馬克思却把犹太看作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个产物有它一定的历史形式，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并随这些条件的消失而灭亡。历史的发展把犹太变成金錢勢力的体现者，变成必然要解体的反社会因素。它对于这一变化沒有責任，但也有責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犹太就要解体；这个社会所圍繞旋轉的中心已經不是金錢的上帝，而是劳动的太阳。

如果我們用今天的話來概括馬克思当时对犹太人問題发表的意見，那末，他的研究結果是說：同工人的社会解放一样，同妇女的人类解放一样，犹太人的人类解放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

三 恩格斯的論文

像馬克思研究法国革命一样，恩格斯从英国工业的研究中寻找和发现了关于当时的斗争和意向問題的答案。恩格斯看到，使人貧困、下賤、残酷和处于奴隶地位的，只是与人異化的财产的不可遏止的运动；然而他也看到，财产在对一切私人利益发生破坏作用的时候，就为我們这一世紀的偉大变革，即为人与自然界和自己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

恩格斯在其所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綱》中，把从亞当·斯密开始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由貿易學說，称为目前在一切領域都同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地位的伪善和不道德。它比重商主义的學

說前进了一步，因为它闡述了私有制的規律，但是它畏于最后的一步，沒有提出私有制是否合理的問題。因此，它不能真正战胜重商主义學說；而自由主义政治經濟學的不彻底性也必然对它的各組成部分发生影响。在新經濟学家的伪善的人道主义精神后面隱藏着旧經濟学家所不知道的野蛮；旧經濟学家的概念混乱，比起新經濟学家的虛伪邏輯来还算是單純和彻底的；貿易自由的拥护者是比旧重商主义者本身还坏的壟斷分子。既然他們无法理解李斯特为什么要恢复重商主义体系，所以联系仍然是很简单的。“正如神學不回到迷信，就要进步到自由哲学一样，貿易自由不造成壟斷的恢复，就要造成私有制的消灭。”^① 在一切純經濟問題的爭論中，貿易自由的捍卫者是正确的。当然，这里指的是和重商主义者的爭論，而不是和私有制的反对者爭論，因为正如英國社会主义者早就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证明的那样，反对私有制的人从經濟观点出发也能够更正确地解决經濟問題。

恩格斯从这个总的观点出发，研究了各个經濟范畴，其中包括商业、价值、价格、地租、資本、劳动、竞争等等。恩格斯揭露了这些范畴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但是沒有像蒲魯东那样，把它們作为可以用来同政治經濟学家进行爭論的前提提出来；相反地，他证明这种矛盾是私有制的合乎邏輯的表現。布魯諾·鮑威尔在批判神學时十分尖銳，但是他仍然沒有走出神學前提的范围；同样地，蒲魯东虽然十分尖銳地批判了私有制，可是他仍被来自私有制的一些經濟学概念所束縛。像馬克思在自己的論文里打破了問題的神學界限一样，恩格斯在这里冲破了問題的政治經濟學領域，并使它回到普遍的、純粹的人类的基础。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9頁。

在重商主义体系下，商业公开地暴露了自己的卑鄙的贪婪。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商业变得人道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因为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同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关系越友好，买卖越有利。“伪君子叫道：难道我們沒有打倒壟斷的野蠻嗎？……难道我們沒有使各民族和睦起来并减少了战争嗎？不錯，这一切你們都做了，但是你們是怎样做的呢！你們消灭了小的壟斷，为的是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壟斷，即私有制能够更自由地更漫无止境地发展起来；你們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为的是夺取新的天地来施展你們的卑鄙的貪欲；你們使各民族結为兄弟（但是是盜賊兄弟），你們減少了战争，为的是在和平时期发更大的横財，为的是使个別人之間的仇恨和可耻的竞争达到极端尖銳的地步！”^①但是还不止于此！当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竭尽全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来使仇恨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利害相同而互相吞噬的凶恶野兽（竞争者不是凶恶野兽又是什么呢）以后，即在做完这个准备工作之后，只要再前进一步——使家庭解体，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它是利用自己的巧妙发明，即工厂制度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它通过这个制度，把共同利益的最后殘余，即把家庭的财产共有制破坏了。恩格斯指出当时至少在英国已經常见的現象：小孩子一到九岁、从而能够劳动的时候，就靠自己的工錢生活，把父母的家只看做一个客棧，向父母支付一定数量的膳費和宿費。

然而，恩格斯认为地主无论如何不能责备商人。“他靠壟斷土地进行掠夺。他利用人口的增长来进行掠夺，因为人口的增长加强了竞争，从而抬高了他的土地的价值。他把別人的劳动成果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2頁。

完全偶然地落到他手里的东西当做他个人利益的泉源以进行掠夺。……土地是我們的一切，是我們生存的首要条件；把土地当作买卖的对象就是走向自我买卖的最后一步；这无论过去或現在都是那样不道德，只有自我买卖的不道德才能超过它。”^①恩格斯說，认定地主的发财方式是掠夺的公理，亦即确认人人都有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的公理和确认不耕者不得收获的公理，并不是他的主張。第一个公理沒有包括撫育子女的义务；第二个公理剥夺了每一代人的生存权利，因为每一代人都得继承前一代人的遗产。相反地，这两个公理都是从私有制产生出来的結論。要末实现私有制所产生的一切結論，要末放棄私有制这个前提。

私有制分化出土地和人的活动，土地沒有人耕作是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是土地。私有制又把人的活动分为劳动和資本，并使两者彼此敌对。但是土地、資本和劳动之間的这种斗争还不够充分，所以私有制又把其中的每一因素加以細分和割裂。結果，一块土地同另一块土地对立，一个資本同另一个資本对立，一个劳动力同另一个劳动力对立。換句話說，由于私有制把每一个人孤立在他自己的粗鄙的独特状态中，又由于每一个人都与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害关系，所以地主敌視地主，資本家敌視資本家，工人敌視工人。正是由于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利害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况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競爭就是頂点。“競爭是經濟学家的主要范畴，是他最寵愛的女儿，他始終愛撫着她，但是請看，在这里出現的是一張什么样的美杜莎^②的怪臉。”^③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9頁。

② 希腊神話中的一个蛇发女妖。——譯者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1—612頁。

恩格斯首先证明，竞争中包含的矛盾同私有制的矛盾完全一样，即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尖锐矛盾。每一个单独的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而社会则关心每个人所占有的要与他人相等。因此每个人都想取得垄断地位，可是社会本身却要因垄断而遭受损失，因此必须消灭垄断。竞争就是以垄断，即财产的垄断为前提的，只要财产的垄断存在一天，垄断权也和它一样是正当的。因为既然存在着垄断，垄断也就是所有权。可见攻击小的垄断，保留根本的垄断，即私有制，这是多么可怜的不彻底啊！

竞争的规律是：供给和需要始终互相补充，可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从来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供不应求，价格就要上涨，供给就要受到刺激。只要市场上供应一增加，价格就会下跌，而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急剧下降，以致重新刺激需求。“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总是兴奋和消沉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永无止境地摇摆不定。这个规律永远起着调节的作用，它能使在这里失去的又会在那里得到补偿，因而经济学家非常欣赏它。这个规律是他最大的荣誉，他简直不可能把它看个够，甚至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条件下都要细细地看它。然而很明显，这个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这是一个孕育着革命的规律。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来证明‘生产绝不会过多’，但是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驳斥他，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近八十年来，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按期来临，而且它所造成的悲惨现象和不道德的后果比瘟疫所造成的更大……当然，这些商业革命证实了这个规律，完完全全地证实了这个规律，但是它并不是用经济学家所用的那种方式证实的。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个只有周期性的革命才能给它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

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彼此都分担一部分，那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的危机的倾向了。如果你们是像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而不是像那些连类意识也没有的分散的原子那样，那末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但是只要你们继续照目前这样无意识地毫不思考地全凭偶然性来进行生产，那末商业危机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因而也一次比一次更严重；这样就必然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破产，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剧增，因而也必然使急待就业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所有这一切势必引起一次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①

竞争，即资本同资本、劳动同劳动、土地同土地之间的斗争，使生产陷入热病状态，把一切自然的和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凡是被卷入竞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竞争。“一方面这样过度紧张，结果他方面必然会削弱。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反而无以为生，人们恰恰因过剩而饿死。长时期来英国就处于这种瘋狂的状态中，处于这种荒謬絕倫的情况下。如果生产摇摆得更加厉害（这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結果），那末就会出現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经济学家从来就不能够理解这种怪誕現象；他为了解釋这种現象，就編造了一套人口論，这种理論和貧富并存的矛盾同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3—614頁。

样荒謬，甚至比它更荒謬。”^①自由主义政治經濟學的人口論通過馬爾薩斯的論述而獲得了典型的名声。但是恩格斯在開始批判人口論之前，先說明了一國人民正是由於富裕和過剩而必然餓死的這種“不可思議的事實，這種比宗教中的一切奇迹的總和更不可思議的事實”。^②

恩格斯說，人類支配的生產力是無窮無盡的。應用資本、勞動和科學，就可以使土地的收穫量無限地提高。根據最有才能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計算，“人口過剩”的大不列顛在十年後，就能使糧食的產量達到足以供應六倍於當時人口所需的程度。資本在日益增加，勞動力在隨著人口的增長而增長，科學又日益使自然力服從於人。“這種無窮無盡的生產能力，一旦被自覺地用來為大眾造福，人類所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要是讓競爭自由發展下去，生產能力雖然也會起同樣的作用，然而是在對立的情況下起作用。一部分土地在實行精耕細作，而另一部分——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三千万英畝好地——却荒蕪着。一部分資本在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周轉，而另一部分却死死地躺在箱子里。一部分工人每天得工作十四小時至十六小時，而另一部分却無事可干，無工可做，活活餓死。這種對立情況也可能不同時出現：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到處是一片忙碌景氣，資本以驚人的速度周轉着，農業欣欣向榮，工人干得筋疲力盡；而明天停滯到來了，農業得不償失，大片土地荒蕪了，資本在運動得最緊張的時候突然停頓下來，工人無事可做，整個國家都因財富過多、人口過剩而備嘗痛苦。”^③ 尽管說明這種現象極其簡單，可是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却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6頁。

② 同上書第620頁。

③ 同上書第616—617頁。

不敢承认它，要是承认了，它就要放棄一整套漂亮的貿易競爭學說。

自由主义政治經濟學沒有放棄競爭學說，而企图利用人口論擺脫窘境。馬爾薩斯斷言，人口总是威胁着生活資料，人类生来就有其增长超过它所支配的生活資料的不变趋势。根据这个假定，人口是按几何級數(1:2:4:8:16:32……)增加的，而土地的生产力是按算术級數(1:2:3:4:5:6……)增加的。自由主义政治經濟學認為經常的人口过剩是一切貧困和所有罪惡的根源。它由此得出下述美妙的結論：救济穷人是犯罪，因为这会加强过剩人口的增长；相反地，把貧穷宣布为犯罪，把劳动院变为监狱，以及諸如此类的事情，却是极为有益的。的确，这种理論不符合聖經上关于上帝及其創造的完美无缺的教义，但是篤信上帝的英國資产阶级却认为，把聖經拿来和事实相对抗的反駁是拙劣的反駁。

恩格斯严厉譴責这种“卑鄙下流的學說，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的誣蔑”^①。他問：在什么地方证明了土地的生产能力是按照算术級數增加的呢？同这种毫无根据的論断相反，恩格斯指出19世紀农业仅仅由于一門化学，甚至仅仅由于亨弗利·戴維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二人而获得的成就。当地球上的全部土地才被耕种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采取現在已經是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候，談論什么人口过剩，这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馬爾薩斯犯了两个錯誤。首先，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口过剩始終同財富过剩、資本过剩和地产过剩有联系；研究这个事实，一定会对情况得到正确的理解。其次，馬爾薩斯把生活資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談了。馬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8頁。

尔萨斯实际证明的，是另外一个事实，而这一事实的被证明，乃是他的功绩。他证明了人口总是威胁着就业手段，劳动力的生产迄今一直受着竞争规律的调节，所以也受到周期性危机和波动的影响。

尽管自由主义的人口论完全站不住脚，但是恩格斯仍然承认它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它为社会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论据。“由于这个理论，我们才开始明白人类极度堕落的情况，才了解这种堕落是和竞争的各种条件相关联的；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取决于需求；它指出竞争制度因此屠杀了，并且每日屠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①

恩格斯在考察竞争怎样影响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一问题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首先，土地或资本都比劳动强，因为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土地所有者可以靠地租过活，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土地来生活。因此，工人所得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些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所瓜分。此外，在市场上较强的工人排挤较弱的工人，较大的资本排挤较小的资本，大土地排挤小土地。实践证实了这个结论。大家都知道，大厂主和大商人比小厂主和小商人占优势，大土地所有者比只有一摩尔根土地的人占优势。其结果就是：在普通情况下，按照弱肉强食的道理，大资本和大土地并吞小资本和小土地，就是说，产生了财产的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1页。

中。在商业危机和农业危机时期，这种集中就进行得更快。一般說来，大的財产比小的財产增长得更快，因为前者的占有費用只占收入的很小的一部分。这种財产的集中是一个規律，它同所有其他的規律一样，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阶级必然愈来愈多地被消灭，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貧穷的短工为止。任何法律，任何地产的分割，任何偶然的資本的分裂，都无济于事……”^① 同壟斷引起競爭一样，自由競爭又引起壟斷；要想走出这种窘境，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消灭确立这两者的原則，即消灭私有制。

競爭貫串到人們生活的一切方面；它不但支配着人类在数量上的增长，而且也支配着人类在道德上的发展。“凡是稍微熟悉犯罪統計的人都会看出，犯罪按照特殊的規律性在年年增长着，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殊的規律性在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这种規律性证明犯罪也受競爭支配，证明社会产生了犯罪的需求，这个需求要由相应的供給来滿足……”^② 姑且不談別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惩治犯罪究竟公正到什么程度，恩格斯让讀者自己去判断。他指出競爭已經扩展到了道德領域，并只想通过这一点來說明私有制已使人墮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最后，恩格斯強調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土地和資本在它們反对劳动的斗争中，还有一个强大的同盟者，那就是科学。“例如，几乎一切机械发明都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引起的，哈格里沃斯、克倫普頓和阿克萊发明棉紡机尤其是如此。劳动需求的急剧增长总会引起发明的出現，这些发明大大地增强了劳动力量，因而就降低了对人的劳动的需要。1770年以来英国的历史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2—623頁。

② 同上书第623—624頁。

棉紡業中最近的重大發明自動紡紗機，就完全是由于對勞動的需求和工資的提高而引起的；這個發明使機器做的工作增加了一倍，從而減少了一半的手工勞動，使一半工人失業，因而也就降低另一半工人的工資；這個發明破壞了工人們對廠主的反抗，摧毀了勞動在和資本堅持作實力懸殊的鬥爭時的最後一點力量。”^① 經濟學家們，說什麼歸根到底機器對工人是有利的，因為機器能夠降低生產費用，為自己的產品開辟新的更廣大的市場，從而能使失業工人重新就業。恩格斯反對這種說法，並援引也是由經濟學家們確定的一個規律加以證明。根據這一規律，勞動力經常威脅著就業手段。所以上述的有利情況即使出現，也一定會成為泡影，因為一群尋求工作的過剩的競爭者已經又在等待就業；然而不利的情況，即一半工人突然被剝奪生活資料，另一半工人的工資下降，却不是虛妄的。

恩格斯發表在《德法年鑑》上的另一篇文章，即對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一書的評述，同上述這些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論點具有密切的聯繫。恩格斯首先以鮮明的綫條勾畫出英國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精神貧困的圖景；他把大陸上據以判斷英國人的民族性格的有教養的英國人，稱為世界上最卑鄙的奴隸，他們滿腦袋偏見，特別是宗教偏見。“只有大陸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國人，只有工人、英國的賤民、窮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儘管他們粗野，道德敗壞。將來拯救英國的却正是他們，他們還是可塑性的材料；他們沒有受過教育，但他們也沒有偏見，他們還有力量從事偉大的民族事業，他們還有前途。”^② 恩格斯說，當施特勞斯的《耶穌傳》流傳到英吉利海峽的這一邊的時候，沒有一個安分守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4頁。

② 同上書第628頁。

己的人敢于翻譯这本书，也沒有一个著名的出版商敢于印行这本书。“結果有一个社会主义的lecturer……，即一个非上流社会出身的人把它翻譯出来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小出版商把它印成单行本，每本一辨士；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倫敦的工人却是施特勞斯这本书的唯一的英國讀者。”^① 恩格斯认为，在由有教养的英国人組成的两个政党当中，托利党对于事物具有比較公正的观点，比如，托利党认为工业至少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因为工业破坏了这个党的威力和专政；而輝格党则认为使它掌握了政权和发财致富的工业无可非議，把发展工业看成全部立法工作的唯一目的。博爱主义的托利党人，比如艾釋黎勳爵、弗兰德、瓦尔特、奧斯特勒等人，把代表工厂工人反对厂主作为自己的責任。托馬斯·卡萊尔起初也是托利党人，而且在他同托利党和輝格党的关系方面，他始終比較靠近托利党。一个輝格党人，永远也不会写出一本能像《过去和現在》这样哪怕是一半关心人的书来。在 1843 年英国出版的书籍中，这是唯一值得閱讀和唯一能够动人心弦的一本书，它叙述了人們的关系，表現了人的思想方式的痕迹。

卡萊尔的这本书，是 12 世紀英国和 19 世紀英国的对照。它用最忧郁的目光观察了現在，用被痛心的耻辱激起的鮮明笔触描述了現在。它用令人震动的具有先見之明的語言威胁現在，向它发泄怒火。寄生的占有土地的貴族，連安分守己都沒有学会，至少还没有学会不做坏事；从业的貴族沉溺于拜金主义，与其說他們是一群領導劳动的人，还不如說他們是一伙工业海賊；議会是贿选产生的，單純旁观和无所作为的人生哲学，宗教遭到破坏，日益瓦解，人类的一切共同利益彻底崩溃，对宗教和人类普遍感到失望，一切生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629 頁。

活关系一团混乱，糾纏不清，一切人对一切人进行战争，人数多得不成比例的劳动阶级处在难以忍受的被压迫和贫困状态，对旧的社会制度感到不满并进行反抗，因此威风凛凛的民主主义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到处紊乱不堪，没有秩序，出现无政府状态，旧的社会联系瓦解，处处精神空虚，没有思想和实力衰退，——这就是卡莱尔描写的 19 世纪 40 年代的英国状况。卡莱尔承认，没有什么万应灵药可以医治社会弊端，或用卡莱尔的原话来说，没有“莫里逊氏丸”^①。

在这一方面，恩格斯是同意卡莱尔的见解的，不过也不是没有保留。他写道：“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最后结论，还在开莫里逊氏丸的药方，它就远不是完备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干巴巴的几条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不足取，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时就已经知道了；结论如果变成一种故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但结论在一定时期应当有一定的形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摆脱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应当形成明确的思想，这样一来，这些结论就一定会采取‘莫里逊氏丸’的形式，至少在像英国人那样纯经验的民族手里会是这样。”^② 接着，恩格斯解释了英国的怀疑论。一切英国哲学思想的结论，是承认它们无力解决自己最终必然遇到的矛盾。因此，一方面在恢复信仰，另一方面又信赖纯粹实践，对形而上学等毫无兴趣。在卡莱尔的全部狂想曲中只字未提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是纯粹实践家，所以他们提出了建立国内移民区等类似莫里逊氏丸的办法。他们的哲学是纯粹英国的、怀疑论的哲学，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理论，而在实践中

① 当时英国流行的一种包治百病的所谓特许专灵药。——译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642 页。

依靠唯物主义，他們的整个社会学說就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他們是片面的，然而卡萊尔也是片面的。他們双方都是在矛盾的范围內——社会主义者在實踐的范围內，卡萊尔在理論的范围內——克服矛盾。他們双方所缺乏的是关于德国哲学的知識。恩格斯希望英國的社会主义者自己去認識德国哲学，不可以急于把德国哲学强加于他們的身上，德国哲学在最初时期还不会对他們有很大好处。但是恩格斯也认为，卡萊尔只要前进一步，就能够克服他所陷入的矛盾，不过德国的全部經驗證明，这是很难走的一步。

卡萊尔宣称，只要人类还在坚持无神論，还未重新得到自己的“灵魂”，那末一切都是无益的，都是沒有效果的。卡萊尔所理解的无神論，不是不相信人格的上帝，而是不相信宇宙的内在本质及其无限性，不相信理性；他不是反对不相信聖經的启示，而是反对“不相信世界史的聖經这一种最可怕的不相信”。他是斯宾諾莎、歌德和青年时期謝林一类的泛神論者。他的未来的宗教，以歌德为預言家，以劳动为崇拜对象。卡萊尔的泛神論，是宗教的最后形式，但这仍然是宗教。因为他還未能摆脱二元論，繼續承认某种比人本身更高超的存在。根据这个理由，卡萊尔所相信的只是民主主义的暫时胜利，而不是民主主义的永久胜利。卡萊尔說，千百万劳动者由于生活需要，将抛棄冒牌領導，并且在某一时期希望，沒有領導者也成。但是这个时间很短，只能持續一刹那。偉大的任务还没有解决。這項任务就是由人类的真正領袖，即由工业司令官、英雄和好人来領導人类。如果由这些人領導，就可以把必然的民主主义和必要的主权結合起来。

針對卡萊尔的这些意見，恩格斯提出了布魯諾·鮑威尔和費尔巴哈获得的研究結果。恩格斯說，卡萊尔的控訴是正当的，但只

是控訴并无济于事。要消除弊端就得找出弊端的原因。如果卡萊爾这样做了，他就会发现他所指責的无神論和无灵魂都是以宗教本身为基础的。宗教，按其本质來說，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內容，把它轉給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再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給人和大自然。“我們也反对現代基督教世界秩序的伪善，我們唯一迫切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同它进行斗争，使我們和世界摆脱这种伪善；但由于我們是随着哲学的发展来认识这种伪善，是在科学的基础上来进行斗争的，因此这种伪善的本质对我们來說，就不像卡萊爾設想的那样不可捉摸，不可理解。我們把这种伪善也归咎于宗教，因为宗教的第一句話就是謊話；宗教一开头向我們說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說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嗎？但我們知道，所有这些謊話和不道德現象都来源于宗教，宗教伪善……又是其他一切謊話和伪善的藍本，所以我們就有理由像費爾巴哈和布·鮑威尔破例做的那样，把当代一切謊話和伪善都叫做神学。如果卡萊爾願意了解毒化我們一切关系的不道德現象产生的根源，那就請他讀一下費爾巴哈和布·鮑威尔的著作吧。”^① 恩格斯又补充說，产生宗教的一切可能性都沒有了；不可能創立一种像泛神論的英雄崇拜或劳动崇拜的新宗教，并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继基督教之后，不可能再出現任何一种宗教。泛神論也不可能产生，泛神論本身就是基督教的产物，它同自己的前提是分不开的，費爾巴哈也证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也想推翻卡萊爾描述的那种无神論，但是使用了另一种方法：他把人由于宗教而失去的內容归还給人，不过所归还的已經不是神的內容，而是人的內容了，所以整个归还过程不外是喚起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8—649頁。

人的自觉。人的和大自然的事物妄想成为超人和超自然的野心，是一切虚伪和謊話的根源。“正因为如此，我們才永远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毫不顧及別人会給我們扣上什么无神論或者別的帽子。同时，假如卡萊尔对无神論下的泛神論定义是正确的，那末真正的无神論者就不是我們，而是反对我們的基督徒。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进攻‘宇宙的永恒內在〔梅林的引文中缺“內在”一詞〕事實’；相反地，只有我們才认真地論证了这些事實，证明它們是永恒的，使其不受自相矛盾的上帝的万能任性的危害。……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怀疑或輕視‘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視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檢驗他的邏輯結構的工具。

輕視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这完全是对方的罪过，仍然又是基督徒的罪过；他們編造了一部奇特的‘天国史’，否认真实的历史具有任何內在意义，只承认彼岸的抽象的而且是杜撰出来的历史具有这种意义。他們硬說人类是基督創造的，說历史有一个虛幻的最終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已經由基督所实现；他們割斷了历史，因此为了自圓其說，他們声称后来的 18 个世紀完全是胡說八道。我們要求把历史的內容还給历史，但我們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偉大，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貫有把握的胜利，了解人类战胜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順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认識到人和大自然的統一，自由地独立地創造建立在純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我們沒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偉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卡萊尔大为不滿的現代

的无神性恰好是现代的有神性。……历来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神是什么？德国哲学这样回答问题：神就是人。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这些在‘预言家’歌德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凡是睁着眼睛的人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读到这些。歌德很不喜欢跟‘神’打交道；他很不願意听‘神’这个字眼，他只喜欢人的事物，而这种人性，使艺术摆脱宗教桎梏的这种解放，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这方面，无论是古人，还是莎士比亚，都不能和他相比。但只有熟悉德国民族发展的另一方面——哲学的人，才能理解这种完满的人性、这种克服宗教二元论的全部历史意义。歌德只是直接地——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预言式的’——陈述的事物，在德国现代哲学中都得到了发展和论证。”^①

从对卡莱尔观点的内部的宗教方面所做的这一批判当中，就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恩格斯考虑到卡莱尔观点的外部的政治—社会方面，考虑到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和与此有关的其他一切。“……似乎英雄碰到好时候会比人高出一头。如果卡莱尔所了解的人是真正的人，具有无限性的人，他就不会再把人分成两类——山羊和绵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和平民，老爷和百姓；他就会发现天才的真正社会使命并不是用暴力去统治别人，而是去唤醒别人，带动别人。天才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这样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实现，因为思想被掌握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②正如卡莱尔所说，民主主义是过渡阶段，但它不是向新的改良的贵族制度、而是向真正的人类自由过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9—652页。

② 同上书第652—653页。

的阶段；同样地，当代的非宗教性，最終将使时代完全摆脱一切宗教的、超人的和超自然的事物，而不是恢复这一切事物。

恩格斯在結束他的这两篇論文的时候，都談到不久以后就要詳細研究工厂制度，研究英國的状况及其核心——工人阶级的状况。《德法年鑑》的夭折，使他未能按照原来拟定的形式实现自己的諾言，而是后来用另一种方式履行了這項諾言。

四 《神圣家族》

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繼續他們已在《德法年鑑》上开始的正面的自我闡明以前，首先联合起来完成了他們的第一部共同作品，以便批判地分析德国的唯心主义，因为德国的唯心主义还有一些有名望的代表人物，即布魯諾·鮑威尔和柏林的“自由人”。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都在《德法年鑑》上发表了自己的論文，而开始經常通信，恩格斯为了同馬克思會見，并在 1844 年 9 月到巴黎去了几天。1845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尔及其伙伴》的书名，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馬克思合著出版的一书的序言，注明的就是这个月份。这部书在表面上同《德法年鑑》沒有什么联系，但从它的实际內容来看，它完全包括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該杂志中所划定的思想范围之内。在一定程度上，这部书是对他們达到的新观点的巩固性和可靠性的首次实际考驗；如果經得起考驗，当然这个观点也必然得到一些新的依据。

两位作者在該书的序言中說，《神圣家族》的目的，是向广大讀者說明思辨哲学所制造的幻想。“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說来，沒有比唯灵論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險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

識’即‘精神’代替現實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傳播者一道教誨說：‘精神創造众生，肉体則軟弱无能。’显而易見，这种超脫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像中才具有精神力量。鮑威尔的批判中為我們所駁斥的东西，正是以漫畫的形式再現出來的思辨。我們認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則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則所作的最后一次掙扎就是要通过变‘批判’本身为某种超經驗的力量的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是針對《文学总汇报》月刊的头八期进行的。这个杂志是布魯諾·鮑威尔同他的弟弟埃德加爾以及法赫爾、萊格尼茨、施里加等人，在沙洛頓堡由 1843 年 12 月开始出版的。

在这个杂志里，柏林的“自由人”試圖論证他們的世界觀，研究影响过当代生活——宗教和哲学、基督教和犹太教、赤貧現象和社会主义、英國工业和法國革命——的一切重要現象的历史作用，并对这一切現象作出絕對自我意識的判決和进行批判的批判。杂志的綱領有一部分包含在布魯諾·鮑威尔的下述理論当中：“到現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偉大的活動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沒有实际成效的，是因为它們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喚起了群众的热情。換句話說，这些活動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慘的結局，是因为在这些活动中有一个中心思想：它必須滿足于一种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指望博得群众的喝采。”“精神”和“群众”間的对立，像一条紅綫貫串着整个《文学总汇报》。这个杂志宣称：現在精神已經知道它應該到哪里去寻找自己唯一的对头，——就是要到群众的自我欺騙和軟弱无力中去寻找。

在某些方面，这个观点同一些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依据

①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7 頁。

的观点相似。像法国革命这种好像使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群众运动，都遭到了失败，最后以建立市侩的十分鄙俗的专政而告终。精神的一切进步，迄今为止都是损害群众的进步，使群众陷入每况愈下的非人境地。在一定意义上，傅立叶和欧文也是对被动的群众持有主动的精神的代表人物。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傅立叶和欧文所处的环境是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而鲍威尔和他的追随者们，则生活在封建落后、鄙俗不堪的社会里；前者是两位实际的事业家，而后者则是一伙德国哲学家；前者以法国的唯物主义为根据，而后者则立足于德国的唯心主义上面；前者研究现实社会的基础，研究人同工业和大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则使想像出来的精神成为想像出来的历史的指导者。

《文学总汇报》对当时的一切“群众”运动所做的判断是既专横又荒诞的。这个杂志对英国工业和法国革命都没有好感。西欧各文明民族的生活和活动，或多或少都是它厌恶的对象。然而，甚至在德国的条件下，这个杂志都是极大的退步。它不仅拒绝费尔巴哈已经获得的成果，而且也把黑格尔哲学弄成一幅可悲的漫画。黑格尔总是事后才使绝对精神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实际上他只是说，绝对精神在思辨的想像中，表面上创造历史。同时黑格尔坚决反对据说哲学家个人就是绝对精神本身这种不正确的解释。鲍威尔和他的追随者与此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批判的化身，是绝对精神的化身，绝对精神通过他们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同其余的人类对立。如果说黑格尔哲学是关于神统治世界，精神统治物质的基督教德意志信条的思辨表现，那末，《文学总汇报》就是批判的漫画，在这幅漫画里，黑格尔哲学本身把自己弄到荒诞无稽的地步。黑格尔哲学的观点失去了支点，悬在半空中，以致甚至在德国这样哲学气氛浓厚的国家里，

它都非常迅速地揮发逸散了。《文学总汇报》只出了十二期，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机会在《神圣家族》的結語里預言該報的灭亡。

因此，《神圣家族》剛一問世就受到了非难，說它是多此一举。卢格給《神圣家族》的作者的一个朋友寫信說：“可惜，《文学总汇报》不是直布罗陀”。后来他又說，两位作者把恶毒的、下賤的滾水澆在从前最亲密的朋友的身上。实际上，这本著作既不恶毒，也不下賤，而且也不是背棄曾把恩格斯和馬克思同布魯諾·鮑威尔联系起来的友誼。书中絲毫沒有对鮑威尔兄弟进行人身攻击，只是拿他們的公开著述活动为例，來論证唯心主义哲学的彻底破产。两位作者滿有权利这样做，因为《文学总汇报》經常挑战，反对馬克思在《萊茵报》和《德法年鉴》上所做的面向实际生活的轉变；它狂妄自負，尽一切可能支持三月革命以前的反动势力，甚至对书报檢查制度和行会制度表示好感。

对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同鮑威尔兄弟論战是一項清理性的准备工作。他們先进行这次論战，然后再各自独立地寫了許多文章，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从而表明自己对于近代哲学和社会学的态度。今天的讀者往往会觉得这場論战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特別是批判柴格尼茨、施里加和其他現在已被遺忘的批判的批判的名家的部分，有时使讀者产生叙述冗长使人疲倦的感觉。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經常使用的那种簡短尖銳的批判技巧，在他們的第一部共同著作中，还不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但是，为了躲避德国的书报檢查，而必須扩大篇幅，超过二十印張，这或許使作者过于詳述細节了。在其他情况下，他們是很不喜欢这种做法的。在书中某些地方，好像有青年人的过于自信的口气，但是任何地方都沒有下賤的或不下賤的恶毒笔調。三十多年后，当孤独的、被人遺忘的布魯諾·鮑威尔逝世的时候，恩格斯是唯一在悼詞中对死者

的不朽功績做了正確評價的人。

要說《神聖家族》是多此一舉，這也不是事實。證明唯心主義哲學所處的墮落狀態，指出它甚至在語言和風格方面都在變壞，這還是該書的最小功勞。主要是書里已經光輝奪目地表現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戰的另一個与众不同的特點，就是那種產生實效的精神。這種精神用確凿的事實打击唯心主義的妄想，它在摧毀的同時又進行創造，在破壞的同時又進行建設。比如，馬克思簡短有力地把法國唯物主義的“世俗的群眾的歷史”同布魯諾·鮑威爾的几句批判言詞做了對比。恩格斯在對尤利烏斯·法赫爾進行的論戰中，從他所持的歷史觀點出發，闡述了英國的大地主、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濺涌澎湃的階級鬥爭。同時，恩格斯也沒有“多此一舉”，他甚至沒有打破德國知識分子的封閉的感覺。馬克思在闡述法國革命，以反駁布魯諾·鮑威爾關於“18世紀的實驗”的高傲言詞時，情況也是這樣。

在《神聖家族》的這些章節里，以及在再一次同布魯諾·鮑威爾關於猶太人問題展開爭論的章節里，馬克思擴大和深化了他在《德法年鑑》中已經發揮了的思想。根據鮑威爾的主要論點，到現在為止，歷史上的一切偉大活動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沒有實際成效的，正是因為它們引起了群眾的關懷和喚起了群眾的熱情，或者因為它們的中心思想必須指望博得群眾的喝采。馬克思在反駁這個論點時說：“‘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難了解，任何得到歷史承認的群眾的‘利益’，當它最初出現於世界舞台時，總是在‘思想’或‘觀念’中遠遠地超出自己的實際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類的利益混淆起來。這種錯覺構成傅立葉所謂的每個歷史時代的色調。資產階級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決不是‘不成功的’，它‘壓倒了’一切，並獲得

了‘实际成效’，尽管‘激情’已經消失，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裝飾自己的搖籃的‘热情’之花也已經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順利地征服了馬拉的筆、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侖的劍，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只有对那样的群众來說革命才是‘不成功的’，这种群众的政治‘观念’并不是关于自己的实际‘利益’的观念，所以他們的真正的主导原則和革命的主导原則并不是一致的，他們获得解放的現實条件和資產階級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① 革命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质上不超出其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有限的和特殊的群众；也就是因为对不同于資產階級的絕大多数群众來說，革命的原則并不代表他們的实际利益，而只是一种观念而已。

恐怖主义者的錯觉在于：他們打算按照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古代国家的样式，建立以資產階級社会为基础的現代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現代資產階級社会，即工业的、籠罩着普遍競爭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滿了自我異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締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現，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腦，这是多么巨大的錯誤！”^② 拿破侖的錯觉在于：他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作司庫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下屬。恐怖主义者和拿破侖都由于自己的錯觉而遭到复灭。后来，反革命重新进攻資產階級。“1830年自由資產階級終於实现了它在1789年的願望，所不

①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3頁。

② 同上书第156頁。

同的只是他們的政治启蒙运动現在已經完成。他們不再把立宪的代議制国家看做国家的理想，不再认为爭得立宪的代議制国家就是致力于挽救世界和达到全人类的目的，相反地，他們把这个国家看做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現，看做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①但是，从 1789 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的生命史还没有終止——馬克思用这句极有力量的話結束了关于法国革命的一节。

馬克思从《神圣家族》中的这些和其他的历史余論中得出的結論概括起来就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們表現为怎样的異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員彼此連接起来。他們之間的現實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彼此連接起来的不是国家（布魯諾·鮑威尔认为是国家——弗·梅·），而是如下的事实：他們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的想像这个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在实际上他們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他們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②馬克思对于布魯諾·鮑威尔輕視自然界和工业的言論作了如下的反駁：“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論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認識嗎？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認識（比如說）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認識这个历史时期嗎？誠然，唯灵論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58 頁。

② 同上书第 154 頁。

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① 在这些话里已经露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幼芽。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另一方面仍然依存于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但是决不能把这种依存关系叫做盲从。他们坦率地承认费尔巴哈的天才发展，认为他的功劳是为批判一切形而上学提供了伟大而高明的要领，用人本身代替了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但是，他们越过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越过抽象的人达到历史的人。他们以令人钦佩的敏锐洞察力，在当时还乱成一团的西欧社会主义世界中找到了正路。他们揭穿了饱食终日的资产阶级借以自娱的社会主义把戏的秘密。人的贫困本身，不得不接受施舍的极端堕落成了金钱贵族和知识贵族的娱乐，成了满足他们的私欲和激发他们的优越感的东西。德国的许多慈善协会，法国的不少慈善团体，英国的无数堂吉诃德式的慈善事业，如为赈济穷人举办的音乐会、舞会、义演和义餐，甚至为遭遇不幸的人进行的公开募捐，都只有这种意义。

在几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中，傅立叶对《神圣家族》的思想内容贡献最大。但是，恩格斯已经把傅立叶同傅立叶主义区分开来。他说，《和平民主日报》所鼓吹的那种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不过是一部分博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而已。马克思强调指出，“劳动组织”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口号，而是政治激进派的口号，这一派试图在法国实现政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妥协。两位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1页。

者一再強調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来沒有理解的东西：历史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埃德加尔·鮑威尔狂妄地說，工人什么东西也沒有制造，所以他們也就一无所有；他們之所以什么都没有制造，是因为他們的工作始終是为了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是平凡的工作。恩格斯对此反駁說：“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創造，工人才創造一切，甚至就以他們的精神創造來說，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國和法國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①为了駁斥布魯諾·鮑威尔所謂的“精神”和“群众”之間的互相排斥的对立性，馬克思也指出，广大的群众的运动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他說，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識的渴望、他們的道德力量和他們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

法国的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最卓越的代表就是蒲魯东，他的論财产的著作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欧社会主义的最前哨。因此蒲魯东在《文学总汇报》里受到特別恶劣的待遇，他的著作甚至沒有被正确地翻譯出来，更談不到对他作正确的評价了。因此，在《神圣家族》中，对法国社会主义者中的这位无产者做了最詳細的評論。《神圣家族》中研究蒲魯东的章节，以及全书的绝大部分都出自馬克思的手笔。他热烈地拥护蒲魯东，反对埃德加尔·鮑威尔对蒲魯东进行的吹毛求疵的批判。因此，就产生了一种迂腐的說法，說什么馬克思原先信奉和崇拜蒲魯东，而后来却又十分激烈地攻击起他来了。

其实，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并没有把自己和蒲魯东等同起

^①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頁。

来，而是拿他同布鲁諾·鮑威尔相比。埃德加爾·鮑威尔譏笑蒲魯东，說他从平等的原則中为財产找到了一切证明的最后的合理根据，然而他却想从这一原則引出財产的不可能性的結論。馬克思对此反駁說，蒲魯东所做的同布鲁諾·鮑威尔所做的完全一样，后者把无限的自我意識当作自己的一切論述的基础，也把这个原則看做福音书的創造原則，而福音书则由于自己的无限的无意識性，似乎是同无限的自我意識直接矛盾的。接着，馬克思意味深长地指出，偏重實踐的法国人那里的平等原則和愛談理論的德国人这里的自我意識的原則是同一个东西。德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在以費尔巴哈为代表对現實的人进行考察以前，力图用自我意識的原則來鏟除一切确定的和現存的东西，而法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則力图用平等的原則來达到同样的目的。

布鲁諾·鮑威尔对神学作了批判的分析，可是他始終从神学的立場出发；同样地，蒲魯东从国民經濟学的立場出发对国民經濟学作了批判的分析。馬克思认为，蒲魯东的巨大进步是对国民經濟学的基本前提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而国民經濟学的代表們却把这个基本前提看做是确定不移的、不必再做任何进一步研究的事实。誠然，国民經濟学家們早就有时指出过像工資、价值等这类經濟前提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同私有制的違反人性的現實之間的矛盾，然而他們只是把表現在某种个别形式中的私有制，当作本來合理的（即他們认为合理的）工資或价值的伪造者加以攻击，比如，亞当·斯密有时攻击資本家，西斯蒙第攻击工厂制度，李嘉图攻击土地所有制。蒲魯东认真对待經濟关系的合乎人性的外观，并把它同經濟关系的違反人性的現實尖銳地对立起来，从而永远結束了这种无意識性。他把私有制干脆描述为国民經濟学概念的伪造者。所以

从国民经济学观点出发，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到的一切，他都已經做了。但是，蒲魯东并沒有脱离这个观点；馬克思接着指出，蒲魯东用国民经济学本身的前提同国民经济学作斗争，所以他只能在国民经济学的占有形式下理解人重新占有实物世界，他宣称国民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是“社会的职能”，但是他沒有能够相应地發揮这一思想。

但是，馬克思在反对鮑威尔兄弟用含混不清的高談闊論把蒲魯东所做的巨大进步化为烏有的时候，也像批判鮑威尔兄弟的神学局限性一样，对蒲魯东的国民经济学局限性作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批判分析。埃德加尔·鮑威尔指责蒲魯东的論斷具有“片面性”，即說蒲魯东从貧穷和困苦的事实中去寻找自己的武器，說他认为这个事实是絕對的、合理的，而认为財产的事实是不合理的。批判与此相反，它把貧穷和財产这两个事实合而为一，它发现了两者之間的联系，使两者成为一个整体，并向这个整体本身詢問它的存在的前提是什么。馬克思用一句簡單的話粉碎了这种唯心主义的肤淺論斷，他說，整体的存在前提就是整体的两个方面的本性。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們本身构成一个統一的整体。它們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产生的。問題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們是統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私有制，作为私有制來說 作为富有來說，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滿足的私有制。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來說，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約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內部的不安，是已經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由此可見，在整个对立

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的确，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①

批判的批判说，承认无产阶级具有这种世界历史的作用，就好像是宣布无产者是神。马克思坚决反对批判的批判早就提出的并且后来一再重复的这种遁辞。他说：“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下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44页。

它不消灭集中表現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違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沒有白白地經受了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鍛炼成鋼鐵的劳动的教育。問題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問題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現代資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結構最明显地无可辯駁地預示出来了。”^① 于是，馬克思再一次強調指出，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識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

《神圣家族》一书对于同时代人似乎沒有发生很大的影响。恩格斯本人在收到这部书时就曾說，书的篇幅过多了，它的大部分內容将不为广大讀者所理解。两位作者最不喜欢《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的书評，因为它过于称贊該书，而远不是实事求是地写出来的。今天的讀者很容易把这本书看成一堆熄灭了的煤炭，但是如果他有一双相当敏锐的眼睛，他就会从煤灰中看到許多宝石向他发出永不消失的光輝。

^①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5 頁。

第 十 章

卡尔·马克思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是从《神圣家族》开始的，以后继续了将近四十年，它对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把他们两人联系起来的这种真挚的、经得起考验的友谊，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它完全没有彼此倾轧和互相不满的现象，而两个个性都非常突出的人，在进行无数的反复无常和胜败兼有的激烈斗争的时候，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这种现象的。这种友谊好象护有一层钢甲，防止外界对它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的一切引诱。现在，也许永远都不能严格区分，他们的共同创作哪一部分是属于马克思的，哪一部分是属于恩格斯的。不错，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时常把大部分功绩，而且是很大一部分功绩写在自己的亡友名下。同时毫无疑问，在他们两人中间，马克思的天才和智

① 本章可参阅古斯达夫·迈耶尔《恩格斯传》，共两卷，1934年海牙版，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1818—1844年，1954年柏林版。这两部著作中有些材料是梅林当时所没有掌握的。特别是恩格斯的一些早期著作，如小册子《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的哲学家》（皆写于1842年），梅林还没有看到。——原编者

慧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说恩格斯有理由说，没有马克思他就做不到他所做到的一切，那末这句话还应该按照他去世的战友的意思加以补充，即马克思没有恩格斯也不能成为后来的马克思。这一点在他们合作的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来。

卡尔·马克思在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律师，后来得到司法顾问的头衔。他在1824年率领全家由犹太教改奉基督教。正在成长的卡尔·马克思在年幼的时候，就引起父母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当然这种希望是注定不能按照他们的想法实现的。他的母亲是荷兰籍的犹太人，终生说着一口半通不通的德国话。她是一位慈爱而精心的妇女，虽然她似乎没有什么过人的才智。父亲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读过洛克、莱布尼茨和莱辛的著作，但决不是一个革命者，而不过是德意志的甚至是普鲁士的爱国者。他为人温和和蔼，怀着忧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魔鬼”在爱子身上的最初活动。他在卡尔·马克思刚满二十岁的时候与世长辞，比在1863年才逝世的马克思的母亲幸福，因为这位老妇人恰好经历了天才同反对他的世界进行坚强斗争的几十年最艰苦的岁月。卡尔·马克思由于父母的关怀，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他所以能具有一开始就用来对抗犹太人习气的那种毫无偏见的精神，也应当感谢他的父母。我们从任何一位曾在历史上发生作用的德国籍犹太人身上，都沒有见到过这种程度的毫无偏见的精神。甚至像海涅和拉萨尔这样一些同他气质相似的人物，或者像白尔尼和约翰·雅科比这样聪明的人物都沒有达到这种程度。雅科比利用宗教容忍的错误论据为犹太人辩护，而马克思早已理解了犹太人问题的社会性质。

东欧的犹太人和西欧的犹太人，在文化上处于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英国以及荷兰，犹太人把精

神寄託于偉大历史的傳統，漂浮在資產階級文化的激流上面；甚至他們還有時遭到的迫害也在頑強的斗争中鍛煉他們。在東歐，即在多瑙河沿岸各國、波希米亞和波蘭，以及在德國，一直到亞爾薩斯和法國北部情況就不同了。這些地方的猶太人同荒淫無度的專制暴君和遭受奴役的群眾生活在一起，這兩者都需要猶太人，可是又輕視他們，而猶太人也瞧不起他們兩者。這裡的猶太人還完全依靠寄生性的买卖和高利貸維持生活。這種社會的對立性勝過了血統和信仰的共同性。比如在漢堡 一個具有高度教養的葡萄牙—西班牙籍猶太人集團，同另一個完全沒有教養的德國—波蘭籍猶太人集團并存，彼此之間沒有任何關係。法國革命的法制最初對“南猶太人”和“北猶太人”有所區分；它首先只從政治上解放了前者，後來才使後者有了同基督徒完全平等的地位。拿破崙法典堅持了這一點，但是後來的萊茵普魯士在 1808 年就頒布了一道嚴格限制猶太人放高利貸的敕令。在這方面，萊茵河沿岸地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資產階級西歐和封建主義東歐之間的連結地點。在萊茵地區的城市里住着有教養的猶太人，他們的猶太性格被一般的資產階級文化所保存和吸收，而在萊茵地方的農村里，並且恰恰在特利爾附近，猶太人的高利貸非常盛行，並用它在東歐封建制度解體過程中琢磨出來的惡毒方法扼殺小農。

有些官吏用鮮明的筆觸在報告中描述了猶太人的高利貸壓榨小土地占有者的情況。馬克思律師正是同這些官吏交往，同他們保持事務關係和社會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特別有一項對卡尔·馬克思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就是把馬克思家同政府顧問威斯特華倫家聯繫起來的鄰誼。路德維希·馮·威斯特華倫不是一個普通的普魯士官僚。他的父親菲力浦·威斯特華倫做過機要秘書，參加過七年戰爭，有一個資產階級的軍事史家曾稱他是“斐迪南·

馮·不倫瑞克公爵大本營中的智囊”，曾在五次戰役和五次會戰中把五個法國元帥打得大敗，並且很有平民意向，甚至從來都不穿軍服，英國國王為了給他榮譽，曾授給他軍團副官長的頭銜，他却一笑置之。他之所以願意“升入貴族等級”，正和迫使席勒這樣做的原因相同，是为了能跟一個姑娘結婚，她那精神和心靈的崇高特性同他不相上下，同他一樣缺乏世俗的財富，但卻是一個蘇格蘭男爵世家的小姐。這對夫婦的幼子就是路德維希·馮·威斯特華倫，他雖不同他父親一模一樣，也有一部分像他父親。

在拿破崙把王党趕走，建立了威斯特華倫王國以後，這位原來的不倫瑞克的顧問，擔任了“威斯特華倫的職務”。“威斯特華倫時代”給它勢力所及的普魯士、黑森、不倫瑞克以及其他地區帶來了許多改革，從資產階級方面來說，這些改革早就是必要的，但被德國的諸侯所阻止。面對這個事實，路德維希·馮·威斯特華倫就把到底是像日羅姆·波拿巴這樣的輕率的保護者，還是像臭名遠揚的辯子選帝侯這樣的“世襲”君主和人販子在卡塞爾發號施令，看做是非常次要的問題。他痛恨法國統治本身；1813年法國元帥達烏下令逮捕了他，經過严厉審訊後，把他關進了吉弗賀恩的監獄。滑鐵盧戰役之後，威斯特華倫立即由札耳茨韦德耳的地方長官升為特利爾的政府顧問；柏林政府至少在他身上証實了這一見解，即必須把最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最能干的、沒有任何官僚一毫克怪論的官吏派到新得到的萊茵地區去。

年輕的卡尔·馬克思把这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官吏的家庭當作自己的第二個家。他跟老威斯特華倫學習閱讀荷馬和莎士比亞的著作，這兩位作家成了他終生喜愛的詩人。威斯特華倫家的孩子們成了他的遊戲伙伴，而燕妮·馮·威斯特華倫後來成了他的終生伴侶。燕妮在1814年生于札耳茨韦德耳，比馬克思大几歲；她

是一位高雅而勇敢的夫人，恐怕其他革命斗士很少有过这样的内助。早在 1836 年，他们就决定将来共同生活，而在 1843 年《莱茵报》被查封后，便与克罗茨纳赫举行了婚礼。从此以后，燕妮·马克思不仅分担了丈夫的工作、斗争和命运，而且以最透彻的了解和最炽烈的热情参加了这些活动。“最坏的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曾经说过，这段姻缘是上帝安排的。

卡尔·马克思的生活道路是在吉星高照之下开始的。早在幼年时期，马克思就已显出丰厚的禀赋。他不必浪费这种禀赋去反对外界的障碍；相反地，这种禀赋受到马克思从小在其中长大的整个社会环境的鼓励，得到了和谐的发展。在马克思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他将来变成像无产阶级的死敌们迄今还想把他描绘成那样的丑恶人物——冷酷如冰、心地恶毒、既厌恶又厌恶、血管里流着的不是血液而是硝酸的蛊惑家。在这种奇谈当中，也有一点点真理，那就是马克思不是出于一时的热情而是由于深刻地认识了事物的内部联系才成为革命家的，这一事实说明马克思的发展是极其和谐的。年轻的马克思是一个精神焕发、身体健康、力量充沛的人，一心向往丰富的现实生活。诗是他的最初的文艺作品。他所以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一首诗，想必是出于一个基本原因，即受形式束缚的语言是同他格格不入的。但是他甚至在阐述最枯燥无味的问题时，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描写无比突出，这就证明他具有真正诗人的一种特征。在海涅、弗莱里格拉特和维尔特的革命诗里，可以看到他们受过马克思影响的深刻痕迹。每当他评论美学问题时，都以感受的细致和深刻而显得与众不同。

卡尔·马克思十六岁入波恩大学，遵照父亲的愿望在这里学习法学，但是在大学生活的第一年，似乎没有得到特殊的成果。这个渴望求知的青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学习，以致在 1836 年秋天刚

剛訂婚以後，就遷往柏林去了。不錯，他在这里也沒有成为一个規規矩矩的大学生；在九個學期當中，他只選了十二門課程，而究竟聽完了幾門，也還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如果有必要研究這個問題的話。根據馬克思的文章判斷，可以知道大學教師當中，只有甘斯一人對他發生過影響。當時，甘斯正同法的歷史學派及其首領薩維尼經常論戰。對於大學時代的馬克思具有巨大意義的事件，是他放棄了最初毫無實現希望的掌握雜亂的大量科學資料的企圖，走出自己的孤獨的書齋，加入柏林的青年黑格爾派團體。當時，青年黑格爾派正忙於清理自己老師的精神遺產，而且比施特勞斯在《耶穌傳》中所做的清理更具有批判精神。在這個團體里，卡尔·馬克思結識了布魯諾·鮑威爾和弗里德里希·科本。他們都比馬克思大十來歲，已經在精神共和國取得了顯著的地位，可是都在同志式的平等地位上同這個年輕大學生交往，並且切實感覺到，這裡有一個強大無比的力量走上了戰場。布魯諾·鮑威爾認為馬克思是他在工作和鬥爭中的最好的伙伴，弗里德里希·科本也把自己的充滿戰鬥精神的小冊子獻給特利爾的朋友。

經過頑強的反抗以後，馬克思才歸順了黑格爾哲學；然而在黑格爾哲學的無數信徒當中，誰也沒有像馬克思這樣徹底研究和深刻了解這一哲學。關於馬克思還有一個流行的說法，似乎他的那種猶太法學家的，甚至是諺師的敏感可以充分地分析和解剖概念。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強有力地吸引他去研究黑格爾哲學的呢？這就是黑格爾哲學的辯證方法。不過，這一辯證方法的革命鋒芒恰好被模糊不清的概念的影子遮蓋起來了。馬克思坦白研究了大量的歷史材料，清除了這些概念。他很早就証實了把科學的皇帝同科學的苦力區別開來的東西，那就是無厭的求知欲和不倦的自我批評。早在青年時期，馬克思的朋友們就責怪

他說他彻夜工作，把铁一般的健康身体都搞坏了。但是，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的孜孜不倦的勤勉精力用去琢磨鸡毛蒜皮的小事。誠然，他在青年时代，就有时由于自己的銳利而沉重的武器初露锋芒而有一种天真的愉快心情，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坚强而性急的青年來說也是应有的。但是只有軟弱无能心怀嫉妒的人，才会认为这是令人討厭的裝腔作势和卖弄才气的涉奇猎異。

卢格在同馬克思爭論的最初阶段，对馬克思作过比較正确的評論，当时对馬克思的憎恨使他的眼睛变尖了，但还没有发花。卢格那时寫信給費尔巴哈說：“他（指馬克思——譯者）讀的书很多，工作起来非常緊張，他有一种批判的才能，这种才能有时变成退化为驕傲自負的辯证法，但是他沒有完成任何工作，干了一陣就突然放下，而且每次都重新投入无边无际的书海。从他的学术爱好來說，他完全屬於德国人世界，而从他的革命的思想方式來說，则应当从德国人世界把他开除。”青年馬克思的这一形象沒有为阿訥奉承所粉飾，但是也沒有被歪曲。馬克思把德国人的一切浮士德式的求学欲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以便永久控制它們。他既把生活带进了科学，又把科学带进了生活。这是一个只有德国教育还能做出的进步，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德国教育不希望历史发展的驅动輪变成沒有头脑的庸人的脚踏輪，它就必須做出这一进步。由于馬克思具有革命的思想方式而把他从自己队伍中开除出去的学术界，同时也把本身从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中开除出去，使自己成为为統治阶级的短暂利益服务的唯命是听的奴才。

1841年，馬克思讀完大学的課程，并由于提出关于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学之間的差別的論文，而得到了博士学位。这篇学术論文原定只是一部大著作——伊壁鳩魯哲学、斯多葛哲学和怀疑論哲学总論的初步嘗試。这些希腊的自我意識哲学在

古代是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哲学产生的，正如現在的布魯諾·鮑威尔及其小集团的自我意識哲学，是从黑格尔的絕對理念中产生的一样。这部大著作沒有写成，博士論文甚至也沒有发表，馬克思本想依靠这篇博士論文，取得波恩大学哲学讲师的职位。在波恩大学担任神学讲师的布魯諾·鮑威尔被艾希霍恩赶走以后，馬克思就沒有再到普魯士的大学里去找教职。一向狂妄自大的反动勢力把这位天生的斗士推入斗争之中。根据馬克思的初期写作活动，我們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一斗争怎样一步一步地推动他在认识的道路上前进，这一斗争怎样在他眼前把事物的观念外壳一个接着一个打碎，这一斗争怎样日益深入地把他投入現實生活的汹涌波濤中。

馬克思在巴黎度过的 1844 年，毫无疑问是他青年时期最有成果的一年。大革命及其震撼世界的后果，使日光能够看到这一革命的最深奥内部和把第三等級的阶级斗争追溯到中世紀的重要历史著作，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到极其細微地步并且正好通过卡貝的空想、路易·勃朗的社会政治宣传和蒲魯东的宣言傳播到工人阶级中去的大量文献——这一切使人得到許多变化不定的印象，甚至头脑聪明的人都可能被这些印象弄得糊里糊塗，但是也必然更要激发一位天才把新光源发出的四射的光芒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卢格在巴黎失去了任何依据，馬克思却在这里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綫索。

有一种越肤淺越裝得艰深的思想意識誹謗馬克思，說他在做輕率的报社工作的时候，产生了社会的經濟結構决定着它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思想，这种說法同事实不符。最初，馬克思也跟一切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一样，沒有接近物质利益的領域，但是斗争的毫不容情的必然性把他推进这一領域。他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不

能引起这一斗争，但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深刻地了解这一斗争。他沒有閉上眼睛，頑固地不看这样的事实：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不能成为他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可靠向导。他寻找并且找到了人类社会賴以活动的真正基础。这就是他的过錯，如果說施特劳斯、卢格和鮑威尔在他們脱离現實的道路上未曾被任何經濟障碍物絆倒，并且正因为这样，他們始終沒有能够在实践世界中找到出路，最后作为德国的不幸的牺牲品而死去，就是他們的功劳的話。

馬克思在运用德国哲学的辩证法方面表現的技巧，使他能够在物质利益的領域內做一个迅速而可靠的概观。我們可以看到从 1842 年春到 1844 年秋，馬克思有了长足的进步。1842 年春，他全身还披挂着唯心主义的鎧甲，投入实际斗争，而到 1844 年秋，他对社会关系的明确理解不仅超过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且超过了西欧的社会主义，超过了它的最先进的代表人物。当然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过渡还没有完全結束，所以在在他看来，經濟范疇还披着哲学的外衣。例如，我們从他的一个已被六十年来的历史所证实的惊人敏銳的預言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他預見到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资产阶级将一事无成，而无产阶级却大有可为。但是，他在表达这一預言时是这样說的：德国可能实现的只是人类解放，而不是政治解放。在这里，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用来透視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双受过哲学訓練的炯眼。馬克思看到，资产阶级社会产生出发展更高的社会以后就必然灭亡，这个社会的肢體已經隐约地在资产阶级社会內部活动。但是馬克思并没有从经济学的武器庫，而是从哲学的武器庫去取自己的证明。

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給他做了十分重要而又有决定作用的补充。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样，也是一位天生的辩证法大

师，在古典哲学中锻炼和加强了自己的天才。他沒有受过馬克思那样严格的哲学教育，但是他的清醒明晰的头脑使他牢固地抓住了黑格尔著作中的不朽的东西。他很早就被卷入实际生活的漩涡，所以这个优点充分弥补了他沒有系統地受过教育的缺陷。

1820年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于巴門市一个工厂主的家庭。“埃尔門一恩格斯公司”在萊茵工业史上享有很好的名声，因为它曾坚决反对过由来已久的工厂制品的尺寸和重量的欺骗行为。恩格斯家庭是巴門地方的大戶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同馬克思一样，推动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不是个人的困苦，而是高度的智慧。因此他同十分守旧和虔信宗教的家庭的精神断絕了关系。早在童年时期，他就不願步入家庭希望他走上的宦途。巴門实科中学的物理和化学的直观教学，給恩格斯后来学习自然科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从这所規模不大的学校毕业以后，便升入爱北斐特高級中学，差一年沒有毕业，就最后决定去当商人。他最初在巴門的一家商号，后来在不来梅的另一家商号当学徒。从1841年10月到1842年10月，他作为一年志願兵在柏林的近卫炮兵部队服役。萊茵地方出生的人，当时沒有一个人认为“王家的軍服”是荣誉的服装，所以萊茵地方的资产阶级广泛寻找行贿的門路，以使自己的儿子不服可恨的兵役。可是恩格斯在庫弗尔格拉班的古老兵营里，对軍事科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后来一直把这种兴趣保持下来。这个事实更能证明恩格斯具有一种实践精神，甚至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并不可爱的方面他也要把握。

但是他并沒有因此而荒廢了他的哲学研究。費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有力地吸引着他，他同鮑威尔兄弟友好地交往，有时还給《萊茵报》写通訊。1842年11月底，他在赴曼彻斯特——到那里的一家他父亲有股份的工厂去当职员——而途經科倫的时候，

在《莱茵报》的编辑部里同马克思初次见面。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次会晤是相当冷淡的。当时，马克思正表示反对柏林的“自由人”的活动，并认为恩格斯是他们的同志，但恩格斯则由于同他通信的鲍威尔兄弟的影响，而对马克思产生了反感。

恩格斯从1842年12月到1844年9月，在曼彻斯特住了二十一个月。他在这里上了他的高等学校——生活在使资产阶级社会解体而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基础的大工业当中。他在这里既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也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研究了这个世界历史过程的人道方面和非人道方面，而他的哲学修养，又使他能够认识英国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无产阶级还无法理解的这两方面之间的内部联系。恩格斯既给宪章派的机关报《北极星报》写稿，也给罗伯特·欧文的报纸《新道德世界》写稿。恩格斯从当时领导正义者同盟的鲍威尔、莫尔和沙佩尔身上认识了最初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后来始终没有忘掉这三个真正的人给正想成为一个战士的他留下的深刻印象。马克思由于研究法国革命而认识到，不是国家组成资产阶级社会，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组成国家；恩格斯则从英国的工业中认识到，在过去的历史著作中根本没有谈到，或者谈得很少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构成现在的阶级对立的产生基础。在这种对立由于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特别是在英国，这些经济事实也是政党的形成基础、政党斗争的基础，从而也是整个政治史的基础。

他们两人通过不同的道路达到同一个目的。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哲学观点占主要地位，而在恩格斯那里，已经是经济观点占主要地位。马克思对所得到的认识作比较一般的叙述，而恩格斯则把对于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面突出地表达出来。

馬克思称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經濟学大綱》是一个天才的大綱；这个論斷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恩格斯沒有系統地批判資产阶级經濟学，他的評論带有概括的性质，因为当时他对資产阶级經濟学的最重要代表李嘉图只是間接了解的。但是这个热情的年輕人却正确地断定了資产阶级經濟学的无法医治的弱点。他胜利地证实了它內在的不合理，接触到它必然流血的伤口。恩格斯第一个描绘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的藍图；他的這項功績并沒有因为他說他发现的东西，馬克思自己也会发现而降低，因为历史判断所依据的主要是已經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可能存在的东西。

恩格斯对于卡萊尔的批判，虽然本质上不如批判政治經濟学那样深刻，却几乎更能代表恩格斯的个性。同馬克思一样 真正的詩人情感同敏銳的批判力在他身上結合起来。他对英國工人詩歌和民間詩歌的卓越翻譯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虽然敬仰卡萊尔，但是他并沒有被这个神秘的預言家的迷人魔力所掌握。恩格斯能够理解这个孤独人物直到他独到的深处，但是他也看到了卡萊尔无法超越的界綫。

当 1844 年秋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二次在巴黎会晤的时候，他們在一切理論問題上意見已經完全一致了。他們的战斗的兄弟情誼最初就建立在这种一致上面。当然，后来由于这两个人的人品都达到了思想家和战士的高度，这种兄弟情誼又得到了一种毫不逊色的牢固結合剂。他們只使用最鋒利的武器同压迫者进行斗争，因为他們知道，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怀着庸人們称之为惻隱之心和道德憤慨的那种薄弱无力和毫无成果的情感是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就的。但是他們并沒有因此而减弱对于受苦人和被压迫者的同情。在他們身上，既沒有伤感主义的痕迹，又毫无三百年来的可悲

历史为德国的庸人所养成的那种假仁假义、昏庸愚蠢、懦弱无能和感情脆弱的品质。但是，他们也不是忧郁的狂热病者，他们没有装模作样地觉得自己十分了不起。他们的豪迈的，因而也是谦逊的自我意识轻视资产阶级的最高贵、最优秀的人物，这个阶级的公众领袖十分喜欢摆出的一切姿态。他们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时，可能有无情的表现，因为事实上必须这样，但是除此而外却是非常仁慈的。他们态度温和、宽宏大量，乐于帮助别人，充满对生活的永不耗竭的乐趣，他们都有坚毅而明朗的性格。他们常常由衷地捧腹大笑，并且喜欢孩子们的朗朗笑声。他们对圣经里的基督最感到满意的就是基督对儿童的爱。

他们在取得了第一次的谅解以后，又暂时别离了。恩格斯到巴门去，为了在那里把他论述英国工人状况的著作写完。马克思留在巴黎。^① 当时祖国的大门对他已经关上；科布伦茨的最高行政长官以马克思的著作有害为理由给国境警察机关下了逮捕他的命令。可是不久他也不能在巴黎继续寄居下去了。普鲁士政府以值得表扬的热心，关怀着它最可怕的敌人的宝剑不要生锈。它像从德国把马克思驱逐出去一样，又把马克思逐出法国。一批德国逃亡者在巴黎出版一份小报，企图利用这份报纸继续同本国的压迫者斗争。马克思偶尔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就成了把他赶出法国的表面借口。

这份小报就是《前进报》。它从1844年开始在巴黎出版。报纸由作曲家迈耶贝尔出资，由演员亨利希·密恩斯坦创办，最初曾

^① 1844年4月到8月，马克思在巴黎研究哲学和经济学，并写了一直没有发表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梅林还不知道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著作。这几篇文章1932年才第一次被编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批判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本第3卷，莫斯科版）中正式出版。——原编者

为创办人的多方面的、有时可疑的事务服务。作为一个贩卖文字商品的商人，同时又作为一个头脑灵活的商人，秘恩斯坦在《德法年鉴》停刊以后想到，如果使自己的报纸变成德国流亡者的最后避难所，那他就能做一笔好生意，何况《前进报》即使安分守己，也难免要被德国各邦政府查禁。秘恩斯坦就这个问题同担任编辑的贝尔奈斯达成了协议。大约从1844年年中以后，《前进报》就开始进行政治斗争。当然报纸毫不留情地痛斥了德国各邦政府，特别是普鲁士专制政府的丑恶行径。贝尔奈斯对德国反动派不讲什么客气。从此以后，海涅、海尔维格、巴枯宁、赫斯和卢格等人，由于没有其他报纸可以发表文章，也有时给《前进报》写稿，同时文责自负，与报纸的编辑部无关。

马克思为这家报纸写稿，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不得已。卢格在这个报纸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一部分是对普鲁士国王夫妇所作的并不高明的挖苦，一部分是对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所作的哲学训谕。卢格说，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社会甚至还没有对于自己的改革产生预感。在像德意志这样非政治的国家里，不可能把厂区的局部贫困提高到一般意识，即把它看成与一切人都有关系的事情，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地方性的火灾或水患。国王认为这是行政机关办事不力或慈善事业办得不够的结果；归根到底，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基督徒之心的善良思想上面，认为这种思想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德国的穷人并不比可怜的德国人聪明些，他们除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厂、自己居住的地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整个这一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洞察一切的政治精神接触到；然而，社会革命没有政治精神是不可能的。卢格的这篇文章以及其他几篇文章都是用“普鲁士人”这个笔名发表的，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马克思确实是普鲁士人，而卢格自

从迁居到德累斯顿以后，便不再是普鲁士人了。他向法国官厅声明自己是萨克森人，并受萨克森政府驻巴黎使馆的保护。

卢格这种卑鄙的写作活动激起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当然，并不是为了批判卢格对普鲁士国王夫妇所作的挖苦，而是为了批判他对普鲁士的社会改革所持的哲学幻想。马克思指出，不仅非政治的普鲁士，就是赤贫现象更具有普遍性质的政治的英国，都沒有能够把社会的贫困理解为“与一切人都有关系的事情”。英国的济贫法表明，英国人认为赤贫现象之所以产生：第一，由于自然规律；第二，由于行政工作上的缺点；第三，由于工人的意志不好。因此，最近想出了设立劳动院的办法，在那里慈善和报复（资产阶级给予向它要求救济的贫民身上的）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由此可见，英国也同作为政治动力、政治势力和政治理智的顶点的国民公会当时未曾预感到自己的改革一样，仍然没有达到“关于自己改革的预感”。正同英国从穷人的意志不好中寻找赤贫的原因，而普鲁士国王则从富人的非基督教情感中寻找这种原因一样，国民公会也从私有者的反革命的思想方式中去寻找赤贫的原因。为了消灭赤贫，国民公会砍掉了私有者的脑袋，正像英国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惩罚穷人，而普鲁士国王为此规劝富人一样。

马克思用他在《德法年鉴》中已经用过的方式发表意见说，国家不管具有什么形式，都不能消灭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因为国家正是建立在这个矛盾之上的。“因为这种分散性、这种卑鄙龌龊的行为、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是现代国家借以存在的天然基础，正如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是古代国家借以存在的天然基础一样。国家的存在和奴隶制的存在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古代国家和古代奴隶制这两种赤裸裸的典型的对立之间的联系也并不

比現代國家和現代商業世界這兩種經過偽裝的基督教的對立之間的聯繫來得更緊密些。現代國家要消滅自己的行政機關的無能，就必須消滅現在的私人生活。而要消滅私人生活，國家就必須消滅自己……”^① 一個國家越是強盛，從而它的政治性越強，那末，它就越不想從國家的原理本身中，也就是越不想從現存的社會結構（它的行動的、意識的和正式的表現就是國家）中去尋找社會罪惡的原因，越不想理解社會的一般原理。政治理智之所以為政治理智，就是因為它是在政治範圍以內思索的。政治理智越敏銳，越活躍，它就越沒有能力去理解社會疾苦。典型的政治理智時代就是法國革命。法國革命的英雄們根本沒有從國家的原理中去尋找社會缺陷的根源，相反地，他們却認為社會缺陷是政治弊病的原因。

馬克思駁斥盧格對德國工人所作的輕蔑的判斷。他說，盧格要求德國工人進行的具有政治精神的社會革命，要末是一堆毫無意義的廢話（如果把社會革命理解為同政治革命對立的革命，可是却賦予它以政治精神）；要末就不過是通常所說的政治革命或革命的同義語。每一次革命都破壞舊社會，所以它也是社會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舊政權，所以它也具有政治性。“可是，如果說具有政治精神的社會革命不是同義語就是廢話，那末具有社會精神的政治革命却是合理的理想。一般的革命——推翻現政權和破壞舊關係——是政治行為。而社會主義不通過革命是不可能實現的。社會主義需要這種政治行為，因為它需要消滅和破壞舊的東西。但是，只要它的組織活動在何處開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何處顯露出來，社會主義也就在何處拋棄了政治的外殼。”^② 馬克思勸告“普魯士人”暫時放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寫作，以及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9—480頁。

② 同上書第488—489頁。

于德国状况的高談闊論，而开始誠懇地把自己的情況檢查一番。

卢格非常自負，当然不会接受忠告。他无力反对馬克思用来批判他的曖昧論斷的尖銳的辯證法，而罵自己的論敵是反复无常的发生腐蝕作用的詭辯分子，并用波美拉尼亞人的一切粗野手段对付《前进报》。在《德法年鑑》時期，他时常劝告馬克思不要在談話上花費許多腦筋，而要把所想到的一切勤勉地筆記下來，利用它写作；現在他自己再也产生不出什么新思想了，而是滿足于一遍又一遍地重彈《哈雷年鑑》和《德国年鑑》的哲学老調。

秘恩斯坦的算盤确实打对了。由于一些撰稿人暂时只能利用《前进报》作为他們反对言論自由的压迫者的武器，報紙便暢銷起来，尽管禁令重重，仍旧日益在德国境內傳播。因此柏林的合法的王朝請求巴黎的不合法的資產階級王朝执行睦邻的警察性职务。基佐尽管思想非常反动，但还是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他似乎沒有立即听从这种哀告，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有一定的困难。法国陪審員不能对據說侮辱了或者真正侮辱了普魯士国王的人作出有罪的判决，而違警法庭以違反法国出版法为名对報紙的編輯貝爾奈斯判处几个月徒刑，还远远不能强制《前进报》停刊。只是亞历山大·馮·洪堡的不体面的斡旋，才使基佐在1845年1月中旬命令把《前进报》的撰稿人，十九名德国作家在二十四小时内逐出巴黎，并尽快地逐出法国。

但是，起初毫无結果地打击过基佐的天使是一个不吉利的天使。法兰西的文明对普魯士的野蛮表示憤慨；它珍視民族的好客美德，而瞧不起那种引起柏林大吵大嚷的問心有愧的担忧。独立自主的报刊强烈抗議基佐政府充当劊子手的角色。另一方面，秘恩斯坦深信这样一个真理，泥罐碰到铁罐的时候，必須知道后退。世界上不是沒有善人的；秘恩斯坦自願不再繼續出版《前进报》，而

法国政府为此收回了驱逐他出境的成命。秘恩斯坦使自己的同人受到了牺牲，不过其中也有几个人幸免。例如經過长期的登門哀求和多次請願，卢格得到繼續留在巴黎的許可，条件是今后的行为要規规矩矩。

作为普魯士政府的主要打击对象的馬克思当然不能采取这类办法。他迁居布鲁塞尔，在那里住了三年，大部分时间是同恩格斯在一起工作。我們可以把这个时期称做他們的治学和漂泊生活的后半期。

第十一章

无产阶级运动

一 在瑞士的革命鼓动

早在马克思被逐出法国以前，魏特林在瑞士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就已经突然结束了。宣传之所以失败不仅是由于外来的暴力，而且也由于内部的矛盾，因为魏特林企图通过鼓动家的革命活动实现共产主义的空想。

起初，魏特林的实际成果是很大的。他的秘密同盟伸展到日内瓦、伏特、劳恩堡、苏黎世、阿尔高、伯尔尼各州。虽然许多地方只有少数分散的信徒，但是魏特林给他们灌输的真正的热情使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甚至深入资产阶级内部吸收新的信徒。在伏特州，像德律埃这样有名的政治活动家，特别是邦纳罗蒂的学生德拉加雷阿次都是魏特林的拥护者。此外还有左芬根的苏特尔迈斯特医生和苏黎世的威廉·舒尔茨医生，后者是黑森的一个流亡者，格奥尔格·毕希纳就死在他怀里。尤利乌斯·弗吕贝尔从书商的立场给魏特林出些主意，在德国秘密出售魏特林的著作，除此而外他同魏特林保持一定的距离。魏特林的信徒们要想争取的阿道夫·福伦教授也是这样。奥古斯

特·貝克爾企图从海尔維格手里弄到一些錢，但是海尔維格同他們似乎只保持一种疏远的关系。

倫敦的沙佩爾，特別是巴黎的艾韦·貝克經常同魏特林通信，給他出主意。他在瑞士的最亲密的助手，除去奧古斯特·貝克爾和西蒙·施米特之外，就是哥本哈根的制革工人尼尔斯·彼特森和西里西亚人塞巴斯提安·戴勒尔，后者曾在里格涅茨的法院里当过文书，在瑞士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轉变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核心是由手工业工人，大多是德国的手工业工人組成的。他們的求学求知的欲望、他們的自願牺牲和勤勉努力的精神簡直是难以想像的。他們聘請教師，学习各种課程；为了使《保证》的第一版能印行两千册，三百个工人分担了这笔費用，就以书作为报酬；四个工人拿出全部积蓄共二百法郎付印刷費。在魏特林編的杂志《德国青年的呼吁》和《年輕一代》中，比魏特林的著作里更多地反映了鼓舞他的信徒的精神。那里有关于手工业工人遭受的貧困状况的动人描述，对于王宮官厅用来迫害手工业工人的狡猾手段的无情譴責，同时也有对于他們的压迫者的辛辣諷刺，这些諷刺有时采用欧洲各河流对话的形式，有时采用人們在 2000 年时的回顾或前瞻的形式。

不过有些观点还很模糊，比如有一次說，共产主义者是把自己的一小块面包分給饥饿的手工业工人的勤勞的农民，是不虐待自己的雇工，而从共同劳动的收益中給雇工以相当的报酬的勤勞的手工业者，是把自己的剩余財富用来为受苦的人类造福的富人，是为最貧窮的、人数最多的阶级的福利制定法律的皇帝、国王或諸侯等等。但是正是从这种模糊不清的理論中，透出革命的本能，比如《年輕一代》有一次宣称，他不參加任何共产主义宗派。“人們想用魔鬼的力量迫使我們加入这些宗派；人們希望我們按照宗派主义

者的方式互相殴打、爭論。这种事我們恐怕是不会干的。我們只反对那些阻止我們前进的人，而不願計較那些超过我們的人的缺点。”《年轻一代》杂志所謂的宗派主义者是指那些不願使任何人走在前面的人。它拒絕提出永远有效的原則。

魏特林的杂志肯定比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杂志胜过一筹。当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杂志用英勇的詩歌和社論，为爭取“自由萊茵”而斗争的时候，《年轻一代》宣称：“首先力图实现爱邻的純洁原則的民族将不費一兵一卒征服各族人民的心。这就是解决萊茵問題的办法，此外沒有任何解决办法。”《年轻一代》特別尖銳地批評小资产阶级的最激进的领袖威尔特。今天許多有學問的人还用那种陈腐的笑談，絞尽脑汁对社会主义进行文化斗争，其实这种关于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廢墟上的兵營或罪犯教养所的笑談，在当时就已经不新鮮了。空想社会主义存在一天，这种詭計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完全被人看透；但是魏特林的理論正是要把一切人的和諧同个別人的最大可能的自由結合起来，他可以对此回答說：“你們将来就会看見，要把世界变成一个罪犯教养所或一个兵營的思想使我們极为討厭。你們将看到，我們不願为了普遍平等而牺牲个人的自由，因为使我們成为平等原則的卫护者的，正是这种天生的自由欲望。”这时威尔特以一种可笑的自负态度說，傅立叶的“漂亮的兵營”对于“有教养的感情說来是一种可恶的东西、可怕的东西。”《年轻一代》对此反駁說：“在我們德国学者身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妄自尊大的思想和可恶的阶级偏見。”这句话正好揭露了那种陈腐的笑談在德国学者的思想中保持这样持久而突出的地位的原因。

当时小资产阶级解决社会問題的处方就同今天一模一样，威尔特完全用今天的語調贊揚这种解决办法同社会主义者的奇特

的、幻想的、热狂的主張相比是“真正的社会改革”。《年輕一代》对此反駁說：“我的天！这是利用儲蓄所和慈善机关进行的一种滑稽的社会改革啊。儲蓄所！为什么不也利用扑滿呢？喚，現在社会上吝啬和貪利的風气还不够普遍，所以还有必要，再多建立一些这种守財奴的机关。不！不！人們給嘴省下来的东西，全被貓和狗吃掉，这就是說，我們越节省，人們給我們的工資就越少。誰不敢消費，誰也就不敢掙錢。至于慈善机关！德国人，你有自尊心嗎？慈善机关，这种在官吏和学者監护下的施舍面包的机构。貧民收容所！呸！自由人民的貧民收容所，这是胡說八道，威尔特先生！”《年輕一代》有充分理由譏諷威尔特的嘲弄实际狀況的空洞論斷，他认为，“就目前的国家情况来看，至少在德国对于真正的貧困是相当”关心的。

可是，不管魏特林及其追随者如何巧妙地进行他們的活動，他們还是沒有把在瑞士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中的革命分子全都爭取过来。青年德意志的鼓動仍然同他們处于对立的地位。它虽然日益失去資产阶级的民族的性质，带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但是它沒有走上法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走上了德国哲学的道路。两个在瑞士法語区做語言教師的年輕的图林根人，海尔曼·杜勒克和尤利烏斯·施坦道领导这个运动。他們受过正規的教育，在这一方面比魏特林强，可是就才能和品格來說却远不及他。浪漫主义反动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和宗教混和在一起，由于这种混和，德国哲学的革命发展在觉醒的手工业工人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對他們說来，摆脱了一切迷信和偏見的有思想的人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和中心；他們看到，人类的精神枷鎖一粉碎，人的枷鎖也就粉碎。他們把魏特林的空想看做是一种新的福音，把魏特林本人看作是一个新的先知，把他的組織看作是一个新的教派。他們认

为，解放人的意識就是解放人类社会，所以他們不要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他們的理想就是人摆脱一切强制的絕對自由，我們可以把他們这种理想叫做无政府主义，但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模糊性，特別是他們同魏特林一起进行的实际斗争使他們的无神論成为最突出的特点。

魏特林的自发的共产主义是在經濟的阶级对立中成长起来的，它对哲学思辨的蜘蛛网毫不了解。他說德国哲学家是些曖昧不明的人，他們在超感觉的王国中摸索抽象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的概念是誰也不能理解的。“在我看来，被捧上了天的黑格尔同样是一个曖昧不明的人。我可以这样称呼他，虽然我沒有讀过他的任何著作。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整个曖昧不明的德国哲学大談特談黑格尔，但是誰也不能告訴我，他究竟要做什么。”正是这种自发的共产主义使得魏特林不断回顾原始基督教，回顾福音书中的耶穌，对耶穌表示欽佩的同情，尽管他同教条主义的宗教信仰是格格不入的。同时，他的头脑也很清醒，他认识到，經濟状况决不会随着意識的一切改变而有所动摇，而劳动者正是在这种經濟状况下受着难以名状的痛苦。青年德意志的手工业工人和共产主义的手工业工人之間沒有和解的余地。艾韦貝克确实也提醒說，面对共同的敌人，應該和睦相处，并且也介紹魏特林同在巴黎的莫澤斯·赫斯通信，后者也是由哲学走到社会主义的，但是他比杜勒克和施坦道对魏特林有更多的了解。不过对立仍然存在，而且魏特林越是真正被迫充当先知的角色，这种对立也就越尖銳。

这是魏特林的鼓动的內在矛盾造成的。他的成就加强了他的自负，但是同时也引起他力图破坏的那个世界的日益加剧的反抗。瑞士的保守政府开始畏惧已經闖入个别激进机构中去的共产主义运动；《年轻一代》的印刷商受到警察的迫害；魏特林又不得不更换

印刷处。他的著作在德国、奥地利、法国受到严密追查。有一次基佐政府事先也沒有发出禁令，就命令在边境沒收并燒毀了一千二百份《年輕一代》；可怜的裁縫当然可以說出这样的话：当权者就是这样尊重私有财产的！在办食堂这个問題上，魏特林也担了許多心思，食堂多次失敗的原因是，这些組織應該进行反对旧社会的斗争，并且應該是新社会的萌芽。尽管他的信徒自願牺牲一切，可是魏特林个人的处境却非常困难了。越有成果，他的困苦和他的自負就同样增长。因此他的事业欲更加受到刺激，但是事实不幸地表明，他的革命鼓动却沒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为了尽快推翻現社会，魏特林想出了种种奇怪的主意。他想立即提倡“妇女联合”，組織一个窃盜集团对有产阶级进行游击战策划一个密謀，将来突然起事。当然艾韦贝克和沙佩尔，奥古斯特·貝克尔和西蒙·施米特都反对这些冒險的計劃。不用說，他們的看法是对的，不过至少艾韦贝克和貝克尔又在另一方面有了錯誤的看法。他們否认了魏特林的革命热望的进步性。貝克尔用长輩的告誡口吻給“孩子”写信，奇怪的是，这种語調很适合这个魏特林的信徒中最有才华、也最放蕩不羈的人的身分。被卡貝的教化的空想社会主义所吸引的艾韦贝克也用上对下的口吻迫切地劝告“亲爱的兄弟”，不要再写像《保证》那样有系統的著作，但是魏特林却为这些著作而感到自豪。艾韦贝克劝他离开日内瓦湖畔，到苏黎世去进行鼓动工作，那儿离德国边境近，可以同作家們取得較紧密的联系。魏特林很願意这样做，但是弗呂貝尔对这个計劃又表示反对，弗呂貝尔由于同社会主义观点有某些接近，就动摇了他在激进党中的地位。他預言，魏特林出現在苏黎世，就会使共产主义以及激进主义遭到暴力打击。

所有这些問題全都摆在魏特林面前，他沒有一个可靠的指南

針，不能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定出正确的方向。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产生了錯誤的看法；他的自負发展成为虛荣心。他的旺盛的战斗精神变成了固执己見的爭辯欲；他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被埋沒的天才。他越是弄不清怎样对旧社会进行革命，他就越明显地产生“第二个救世主”的思想。在这种心情下，他在1843年春天写了《貧苦罪人們的福音》。

在这本书中，魏特林想用一百多处聖經的引文证明，自由思想的最大胆的結論同基督教义的精神完全一致。他說，伏尔泰和其他一些人，为了解放人类曾想破坏宗教。相反地拉梅耐（他在魏特林的著作出版后借机否定了这一著作）和他以前的許多基督教改革家，比如卡尔斯塔特和托馬斯·閔采尔指出，一切民主思想都是由基督教中产生的。魏特林贊同他們的看法；他认为，为了解放人类必須利用宗教；基督是自由的先知，他教人以爱。

从共产主义宣传的角度来看，这本著作比起《保证》来是一个很大的退步，但是这部著作却最中肯地反映了魏特林的本质，也許还是他的才能的一个最特殊的样本。魏特林並不否认现代福音批判的成果。他只是說，他的任务不是揭露福音书的矛盾，它的矛盾施特劳斯已經揭发了不少。相反地，他想把基督教賴以存在的基本的、肯定的和可能的东西作为真理来接受，以便从这里面引伸出基督教的原則。他借福音书中的耶穌反映他自己。他以气质相似的本能感觉到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在福音历史中得到的許多反映。他清楚地看到，这种共产主义的范围只包括消費方面，而不包括生产方面，但是他认为，“共同享受”以“共同劳动”为前提。“这一点不容易說明，也許更不容易理解；今天还有千百万人不明白这一点。他們所能理解的是，人們很可以把某人的剩余財富拿来分給穷人。但是只有糧食、衣服和家具可以公分，而手工工具、錢、土

地却是不可公分的；前者（剩余物）变成无用的东西并被廢除，后者（財产）为一切人所公有，而不为任何人所特有。”这本书是魏特林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一种懺悔，其对象也許主要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书中所談的是他用来衡量耶穌的言行的經驗和成就，欢乐和痛苦。尽管敌人們对他說，人們可以利用聖經为所欲为，但是魏特林回答他們說：“好啊！先生們！你們已經證明，你們用它創造了一个暴虐、压迫和欺騙的福音，而我想用它創造一个自由、平等和團結的福音，知識、希望和愛情的福音，假如不是已經有这个福音的話。如果那些人錯了，那是由于个人利益造成的；如果我錯了，则是由于对人类的爱造成的。我已經表明了我的意图，我的引文也都做了注解。現在讀者可以閱讀、考查、評論和相信他所需要的东西。阿門。”魏特林主要是談自己而不是談耶穌，第二个救世主为了自己向第一个救世主挑战。他比第一个救世主更偉大，因为魏特林由于耶穌当时所处的环境而原諒耶穌，“要末很不完善地制定了，要末根本没有制定”一个新社会的組織計劃，而这也是“可以推測”的；不能要求他“当时完全理解今天的共产主义學說的一切奧秘”。

《貧苦罪人們的福音》还是魏特林在洛桑写成的。他想在苏黎世出版这本书，他于 1843 年 5 月迁居到苏黎世。弗呂貝爾为了不使文艺书店遭到危險，拒絕出版这一著作，但給他另外找了一家出版商。可是书还没有出版，就发生了禍事。苏黎世的教士拿着魏特林让人印发的广告以侮辱上帝的罪名向檢察厅檢举魏特林。檢察厅馬上进行調查，并在 6 月 8 日夜里逮捕了魏特林。官厅在他的住所和印刷所进行搜查，拿走了他的私人信件和《貧苦罪人們的福音》的部分手稿。

弗呂貝爾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苏黎世政府想給共产主义派，

通过它也給激进派以毁灭性的打击。至少只要德国人說話，上帝在天上唱歌，这就是这种类型的第一个救国行动，就其方式來說，这次的救国行动对于以后的行动是有示范意义的。檢察厅把沒收的信件书稿交给政府，政府委員會为了調查“瑞士境內的所有共产主义秘密活動”組織了一个五人委員會。这个委員會委托布倫奇里教授写了一份报告，并用國家經費把这份报告印出来，交给了书商。布倫奇里写的这份报告证明，作者在历史、經濟、政治的認識方面远不及裁縫魏特林，也证明他不愧三十年后还作为德国自由主义天空中的一等星放射光芒。他絲毫不想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論目标进行評价，更不用說对它的实际根源进行評价了，而他却悲叹，一切神和人的秩序将会墜入共产主义的冷酷、抽象的原則的无底深淵里。他沒有提出任何消除劳动者的痛苦的积极建議，而求助于警察棍，他提議把同魏特林有过几次来往的苏黎世工人协会的外籍會員驅逐出境，对于一切有共产主义秘密活動嫌疑的外乡人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如果他們經過这种阴谋“案件的簡單審訊”以后被遣送出境，还要在他們的护照上注明曾被逮捕的字样。此外，布倫奇里还提出一个真正庸俗的建議，就是限制飯店和酒館的数目，不言而喻，这是庄严地推荐用基督教作一种感化手段，这种手段通过“精神生活的內在圣物”必然能够安慰穷人，使他們不去計較外在世界的財产狀況的差別。

同这种伪善的限制結合在一起的还有那种为了党派活动而利用紅色鬼怪的阴谋。布倫奇里为了揭露政府的政敌这一崇高目的，公布了从魏特林那里搜来的一些私人信件，这些人同案子毫无关系，而且也沒有違反苏黎世州法律应受惩罚的行为，委員會根本无权公布这些信件。布倫奇里違背常識地把他非法利用的材料整理成这样，使得苏黎世激进派的領袖們都背上了毫无根据的黑鍋，

彷彿他們支持共产主义者的所謂罪惡的目的。福倫和弗呂貝爾是主要打击目标，他們两个对这种行动提出了抗議，但是沒有什么結果。而政府反以对委員會“口出不遜”的罪名判处他們罰金。資產階級的激進派一旦被自己最接近的敌人扣上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帽子，他們就被吓倒，这是当时同今天之間的一个最后的相似点。激進分子离开了弗呂貝爾。《瑞士共和主义者》因为訂戶太少不得不停刊了。

可是共产主义运动沒有想到偃旗息鼓。魏特林以豪迈气概在法庭前面为自己辯护。虽然他在这里也同后来在监狱里那样，流露出一种病态的激动情緒，但是他并没有否认他的原則。檢察厅在公訴中加給魏特林的罪名是：侮辱上帝、攻击私有財產，秘密結社和类似罪行，第二审同第一审所选的这些常用的名詞不尽相同，而这种有意图的判刑的所謂根据并不决定于这些名詞。使魏特林感到难受的，同时也是苏黎世司法界的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就是：第一审已严厉判处魏特林徒刑六个月，无罪侦查羈押的两个月不算在內，而第二审又把判期加重到十个月，四个月无罪侦查羈押的不算在內。此外第一审判決終生驅逐出境，第二审只判驅逐出境五年，不过这对被判刑的人來說实际上是一样。

魏特林在苏黎世监狱里待了差不多一年，他在那里屢次受到紀律处分，根据一份材料記載，他甚至还受过体罰。获釋之后，他想同他的信徒安得列阿斯·迪奇迁居美洲，在那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移民区，但是乐于执行捕更职务的苏黎世政府坚持要把他交给普魯士警察机关。魏特林在极力反抗的情况下被解往德国边境，經過德国的好几个邦，由这些邦的卫兵押送，有时就住在监狱里，就这样被押到他的故乡馬格德堡，作为逃兵交給了军队。由于身体不合格，不久他就被除名。这时普魯士政府不顾魏特林的国

籍权，不管他由于有一个书商负责他的生活，而证明他有充分的生活费用，却把他送到汉堡，在那里给了他一共七个塔勒的旅费和饭钱，打发他到远方去。魏特林到了伦敦；在一次大聚会上，这个世界都市的德国、英国、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热烈欢迎这位“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勇敢的、天才的领袖”（欧文的机关报语）。

他在瑞士的信徒也勇敢地继续他的事业。对他们进行的打击产生了一种常见的相反的作用。社会公众更加注意这些被迫害者，甚至布伦奇里的报告也为他们做了有力的宣传。向最广泛的公众公布的材料本身，特别是从魏特林著作中引来的长篇引文给无产阶级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布伦奇里的巧妙的编排以及他的歪曲的注解所抹煞不了的。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向柏林报告说，布伦奇里的报告促使三百名德国手工业工人加入了正义者同盟。莫泽斯·赫斯在一份讽刺性的呈文里感谢勇敢的救国者布伦奇里对于这桩好事立了这样大的功劳。一篇匿名著作《论瑞士的共产主义》严肃地揭发了布伦奇里的阴谋，中肯的指责并未因这位共产主义作者讨厌魏特林的革命倾向而减弱却反而加强了。魏特林的最后一部著作的大部分手稿被他的朋友挽救出来，在伯尔尼改名《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出版了。他的旧作也出了新版。安得列阿斯·迪奇的一篇共产主义短篇著作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接连出了三版。迪奇是瑞士人，是个毛刷匠。在协会中，公共厨房和公共食堂只要办得成功，也表现出它们对宣传有好的一面。它们在混乱状态中使共产主义者集合在一起，这种混乱是由于魏特林突然被捕和警察的迫害引起的。

虽然有这种光荣的反抗，可是瑞士的共产主义运动还是一天天庸俗化了。其所以如此，并不是，或者不只是由于这个运动失去了它的精神领袖魏特林。相反地，我们还不如说是：因为盟员按照

首脑活动的节拍活动。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始终或多或少是他的信奉者的集体创作；这一点魏特林也知道得很清楚，虽然他的自负情绪不断增长，他在《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中还说，苦行派同盟传播了共产主义学说，耶稣自己的思想可能没有显著地超过他的同盟的盟员的思想。促使魏特林回到宗教的空想主义去的这些原因，也同样有效地对他的信徒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他离开瑞士只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后果，那就是各种不可靠的领导人代替了一个正直的、有独特才能的宗派领袖。

代替魏特林的起初是像奥古斯特·贝克尔这样好心肠的放荡不羁的人物，他对待事业是很认真的，在一个坚定的人物领导下，也做了一些杰出的工作，但是当他独当一面时，他就失去主张，摇摆不定了。有一些正统教派的热烈拥护者，只要他们的教民稍微背离唯一造福的教义，就以共产主义的罪名加以告发，贝克尔受了这种叫嚷的玩弄，甚至想结交德意志一天主教的那些昏聩人物。此外还有像“先知”阿尔勃莱希特这样的没有坏心的傻瓜，他是阿尔屯堡的一个老“煽动家”，被囚禁六年，六年中除圣经外不能接触其他读物，于是成了一个宗教狂人。最后还有像霍尔斯坦的假博士库尔曼这样的公开的骗子和流浪汉，他传播有名的学说：在新的世界中，最贤明的人管理享受品的分配，因此现在在旧的世界里，弟子就应该把享受品大量地送到最贤明的人那里，自己则应该以少量享受为满足。库尔曼用他这套掏人腰包的理论不仅迷惑了共产主义的手工业工人，而且也使奥古斯特·贝克尔这样受过教育的人惊叹地说，库尔曼以当代这样一个人的身分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人用他的嘴道出了我们的一切痛苦和一切憧憬和希望，总之道出了在最深奥的地方推动我们的时代的一切”——这些事实比冗长的叙述更雄辩地证明，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如何迅速而不可

阻擋地在宗教空想主义的陡坡上沒落下去。

它的衰亡使青年德意志的鼓动工作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不用說，在进行反抗的无产者看来，青年德意志的庸俗的无神論比阿尔勃萊希特和庫尔曼的宗教狂似乎还有点好处。这时青年德意志的领导人是汉堡来的一个青年店員威廉·馬尔，他在苏黎世参加过魏特林的組織，魏特林被捕后，他也被驅逐出境。馬尔讀过費尔巴哈和蒲魯东的著作，把一些学說帶到青年德意志的鼓动工作中来。他把弗里德里希·費尔巴哈的《未来的宗教》通俗化了，其实在这部著作里已經把路德維希·費尔巴哈的学說通俗化了。此外，馬尔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吹牛家，可是他善于用頑固的自私的热情进行鼓动，他懂得一些煽动人的小手法，甚至举行令人毛骨悚然的化裝舞会，以引誘人們参加青年德意志的秘密同盟。馬尔恬不知耻地大吹大擂，并且嘲笑魏特林失敗的教士作風，而他那种放蕩的情欲同魏特林的健康的感情相比就显得更加令人討厌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只限于一些陈腐、庸俗的方面。他认为私有财产这件东西可以消灭，但是想要占有财产的内心欲望不能消除，他干脆就在解釋他自己在信里发出的叹息，因为他想得到一个漂亮的掌上明珠，一位有錢的小姐。

在遭到苏黎世的慘禍以后，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又迁移到了日内瓦湖边，而那里从来就是青年德意志宣传活動的根据地。貝克尔和庫尔曼住在洛桑，而馬尔也住在那儿，两个秘密同盟在瑞士法語区的工人协会中爭夺领导地位。青年德意志逐渐使大多数协会受自己支配，并分成三个派別，最大的列曼同盟由馬尔领导，其他两个同盟由杜勒克和施坦道领导。1844年12月，馬尔創办《社会生活現實报》作为青年德意志的盟报，几个月后，貝克尔也創办了《快乐的使者报》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喉舌。自从《年轻一代》停

刊以后，共产主义运动就沒有自己的机关报，只是在必要时用巴黎的《前进报》做代用品。两种報紙斗争很激烈，不过它們的寿命已經屈指可数了。

1845年2月，伏特州的一个政治轉变使激进党掌握了政权。魏特林的朋友德律埃和德拉加雷阿次进了大委員會。他們企图在新宪法草案中規定劳动的权利，这个企图当然失败了，不过却給被推翻了的保守党人一个值得欢迎的机会，借此攻击新政府拥护共产主义活动。同时，当时还受普魯士管轄的紐沙都州的政府也找到了青年德意志和共产主义秘密同盟的纔索。在偵查中，双方的敌意似乎促使它們过多地进行不体面的互相告发。总之，两个同盟的最主要的分支都在伏特州这一事实已經清楚了。这时伏特州的保守党人就更猛烈地攻击激进党政府。他們把青年德意志分子同共产党人同等对待，并且让大委員會里的社会主义成員对馬尔的恬不知耻的文章負責。政府上了有意或无意設下的圈套，把馬尔驅逐出境，查封了他的報紙，解散了青年德意志的协会。但是政府想用表面的偵查掩护共产主义协会，洛桑的市长報告偵查的結果說，如果这些协会不存在，那么他提議，建立这些协会。可是保守党反对派决不願这样輕易了事。如果政府要想維持，就必須用对待青年德意志的手段对待共产主义运动。于是貝克尔被驅逐出境，報紙被查封，共产主义协会同青年德意志的协会一样遭到取締。庫尔曼事先已經离开伏特州了。

青年德意志运动永远停止了。此后馬尔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杜勒克和施坦道以移民的身分到了阿尔及尔，后来行踪不明。而貝克尔却想在苏黎世把共产主义运动恢复起来，这时激进党人通过1845年的选举在苏黎世掌握了政权。貝克尔把从前当过教員，現在出版一份民主主义的周报的特賴希勒尔爭取过来。在这份小

报上宣传的共产主义是十分模糊的。特賴希勒尔一再强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不是取消私有财产而是建立私有财产，不是推翻国家而是使它完善，不是瓦解宗教而是实现宗教。他的策略是尽可能把共产主义理论推到一边，而要更加猛烈地攻击政府中的“自由主义的新貴”和“假开明人士”。不管他使用这种策略的用心如何，他在写给魏特林的一封信中出于谨慎小心企图对这种策略进行辩护，无论如何总是十分错误的。

资产阶级激进派还是老样子。苏黎世的激进党人也许像伏特州的激进党人一样对共产主义运动不加干涉，可是当他们的物质力量显然受到威胁时，他们就牺牲共产主义以及他们自己的原则了。特賴希勒尔对他们攻击得越厉害，布偷奇里一伙人越是大声叫嚷，事情表明，激进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早熟果实，他们就越乐意颁布一个特别法，这个法令不仅禁止为盗窃以及其他类似的罪行辩护，而且也禁止由于财产不均而煽动一群公民反对另一群公民，或者通过攻击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恶意地危害国家的安宁和福利。他们就用这根有弹性的棍棒打死了共产主义运动。特賴希勒尔很有见識，他逐步向自由主义教授的方向发展。贝克尔离开了瑞士，1871年才在经过长期漂泊以后在辛辛那提去世。

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永远结束。手工业工人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归根到底是因为工业还没有发展，这种情况不允许它不断地获得新的力量，同时也不允许它认识到胜利的真正道路。但是，如果说它怀着当时还没有实现的实际前提条件的目标，是它的缺点，那么这也就是它的长处。它的错误是由当时的条件造成的，它的成绩是由那些人物取得的。魏特林和他的同志们的斗争并没有白费。他们想要燃起的大火被扑灭了，可是煤炭还在灰烬中继续燃烧。二十年后，斐迪南·拉萨尔又用这堆炭火点起德国

社会民主党的灶火。他的《公开的答复》就是对魏特林的信徒发出的。

二 德国的群众性无产阶级

正义者同盟在德国国内虽然也分布各地，但是它当然不能像在瑞士有时可以做到的那样开展大规模的鼓动工作。德国警察紧紧操纵着它允许手工业工人成立的教育协会和娱乐协会。有一两次，它在这些协会中抓到了同正义者同盟有关的线索，比如柏林的门特尔密谋，但是这些线索在它手里又断了。裁缝门特尔和他的同志，有的被宣判无罪，有的只受到在普鲁士的情况下令人惊奇的轻微惩罚。

德国的经济发展更忙于培养大量的无产阶级，从而给共产主义创造实际的前提条件。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以及铁路的建筑而开始的生产和交通状况的变革，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大工业和大商业开始建立现代化的大城市，消灭手工业，使一小撮人掌握财富，有了吃饱饭、付得出钱的道德，而把大多数人扔进贫困和犯罪的深渊，它们破坏了城市居民到那时为止还过着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方式。农村里的封建大地主日益资产阶级化。他们投入马铃薯酿酒厂和甜萝卜糖厂的资金越来越多，大量地剥夺没有受到赎买法和调整法保护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他们用封建的十字钉把他们需要的劳动力钉在份地上，制造了一个贫苦无援的无产阶级。封建主义在它腐朽的霉味中作垂死挣扎，工业也力求取得统治地位；在这场残酷斗争中，劳动人民就像有许多神秘的铁骑从他们身上驰过一样，被踩得粉碎。

有一份官方报告，其明确的任务是驳斥报纸上的所谓夸大事

实，但它也不得不单调地反复谈到易北河以东地区大庄园中的农业工人的状况，谈到小自耕农和雇农，佃户和短工（不管他们叫什么名称）的状况。这个阶级的生活最为贫困。这些工人的境况大概是最不稳定的。他们的精神文化和道德文化的水平大多很低。这个阶级的人大部分寿命不长，其原因当然是生活方式不好，劳动过度和营养不足。在其他没有理由缄口不言的同时代的报告中，报道了饥饿和寒冷怎样残害各教区居民的可怕情况。农村无产阶级住在茅屋里，这种茅屋像是兽洞，而不像人住的房子。他们的食物通常是马铃薯、盐和烧酒。只要马铃薯歉收，马上就引起斑疹伤寒和其他杀人的恶症。西里西亚东部马铃薯三次歉收以后，可怕的灾难就降临到这个地区。在普勒斯、里布涅克和拉提波尔等县有四千名贫苦无援的孤儿嗷嗷待哺。在普勒斯县仅1847年就死了六千八百人，差不多为平常年份的三倍，其中有九百人是饿死的——一位普鲁士历史学家干巴巴地补充了这个统计数字。

随着大工业在城市中开始发展，群众的贫困及其可怕的伴随现象也就接踵而至。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的头九年中，柏林各工厂的蒸汽机由二十九台，三百九十二匹马力增加到一百九十三台，一千二百六十五马力；与此同时，娼妓的人数增加到一万，罪犯增加到一万二千人，没有到警察局去登记的流浪汉增加到一万二千人，接受救济的穷人增加到六千人，乞丐增加到四千人，在罪犯教养所和劳动院做苦工的人数增加到三千。而有工作能力的市民估计只有两万人。手工业成了工业的机器和商业的仓库之间的玩物。柏林四千名独立的裁缝中有三分之二没有足够的活计可做。相反地，却有二百零六个服装商人以低得可笑的工资剥削那些无工可做的裁缝师傅。大约三千名独立的鞋匠和二千名独立的木器工人的状况也差不多一样。随着手工业的没落，以手工业

生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家政也被打乱了。机器大量生产的便宜产品使家庭妇女丧失了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反动立法企图用阻碍离婚的办法，防止资产阶级夫妇关系的松弛，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大工业中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最深。工厂的规章不仅用暴力压迫他们，而且用狡猾地设下的圈套，盘算他们可怜的工资的最后一文钱。许多工厂区盛行实物工资制。在这种制度的老家佐林根，甚至制定了这样的法律，工人往往在若干年内拿不到一文钱的货币工资，而拿商品，这些商品有的超过他们的所谓需要的十倍，有的对他们完全没有用处，有的计算的价格过高。女工和童工占了优势。无产阶级的夫妇关系发生了同资产阶级夫妇关系相反的变化。在资产阶级那里，妻子成了一种装饰品，在无产阶级这里妻子成了一家之主。在爱北斐特，就可以听到这些怨言：老婆进工厂，男人待在家里织袜子，如果可能还要喂吃奶的孩子。入学的儿童在爱北斐特占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七十九，在柏林只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亚琛甚至只占百分之三十七。

工业无产阶级和没落的手工业者同样遭遇到的是越来越严重的房荒。在大工业建立新中心的地方，发生房荒的情况较少，主要是工业在旧城市，比如柏林、科伦、布列斯劳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出现房荒的现象。柏林汉堡门外的那些住宅是臭名远扬的。在四百个小房间——那是些什么房间啊！——里住了二千五百人。往往两家住在一间又小又暗的屋子里，用粉笔画一条线或者拉一根绳子当作界线。有三万个受救济的科伦的工人向国王呈了一份请愿书，在请愿书里，他们清楚地描述了他们如何因为付不起房租、被从人住的房子赶到人不能住的房子里去，而且现在就担心，根本就没有房子住。施诊所的医生说，布列斯劳工人住的与其说是房子，还不如说是猪圈。这些房子年久失修，脚步重一点整个房子都摇晃。

厕所和畜厩就在院子里，蒸发出来的臭气把工人住的房子弄髒，墙上往往像小河一样往下淌水，长出有害的菌类。关节炎、腺病、萎黄病摧残着居民的健康。

可是大工业无产阶级的贫困同家庭工业的工人，特别是纺织业中的家庭工业工人的贫困相比几乎又算不了什么了。他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干，首先建立了德国工业的可怜的世界声誉，那就是依靠最低的工资在世界市场上维持自己的地位。可是现在，这种悲惨的荣誉之光已经在英国竞争的毁灭性冲击下黯然失色了。英国的机器麻纺业得到这样有力的发展，以致它也可以把较大量的机器纺的好纱向关税同盟输出，在相同时间内，英国的机动纺纱机的产量等于德国手工纺纱机的五百倍。比雷菲尔德的工业家在柏林商业局的询问中，谈到威斯特伐里的纺纱工人的状况时说：“目前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纺纱工人估计有十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二近几年来完全是白干活……一个优秀的细纱工人现在每天只挣两个银格罗申，纺二股纱的工人每天只挣七个分尼。”的确，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由于成千上万的纺纱工人死于斑疹伤寒，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

这些比雷菲尔德的工业家还在柏林商业局说：“织布工人的状况比纺纱工人稍好一点，不过也很坏。”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巴登日报》登载了一个了解情况的可靠人士谈符佩尔塔耳的家庭手工业织工的文章，那里面说：“早晨织工们鸡一叫就得起床，一直劳动到半夜，甚至还要更晚。他们的力量很快就使尽了，他们的筋也过早地变钝了。由于整天弯着腰坐着，他们的胸部经受不住，肺部也有了毛病，开始吐血。他们的身体的其他部分也衰弱、麻木了。因此，他们这些肉体的人成了墓地上早开的花。”这篇文章发表在符佩尔塔耳的工厂主们的眼前，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敢反驳这一

叙述。

在这家庭手工业的悲惨的地獄中，西里西亚的紡織工人又由于他們所受的痛苦很深而占有最突出的地位。他們的身子受到資本主义競爭的猛烈的旋風的襲击，而他們的脚还埋在封建的泥潭里。加之政府的貿易政策又堵塞了西里西亚麻布的最后一条出路，本来在英國紡織品競爭得勝的情况下，它可以到那里去避难的。由于对于革命的特殊厌恶，政府沒有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同中美和南美的共和国簽訂貿易协定；只要无所事事的君王的正統主义的幻想得到滿足，不管勤勞的子民像蒼蠅一样死去。波兰一俄國市場对普魯士严密封閉还不过是俄國君主的一种溫和的打击。海外貿易公司在西里西亚山区建立的大規模的机器紡織工厂發揮了釋放一批劳动力的第一个作用。劳动不可遏止地衰落下去，而由于营业自由日益迅速地集中起来的資本的力量超过劳动得到巨大发展。小商人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資本家，他們之所以大，当然只是由于他們的錢袋大，并不是由于他們的思想偉大。他們仍然企图用毫无良心的詭計保持世界市場，越来越殘酷地勒緊被他們剝削的无产阶级的褲帶。麻布不行，他們就抓棉花，使家庭手工业工人逃出狼窩又入虎口。

一个自己有房子，还有两三摩尔根土地的西里西亚麻布織工，在男人、老婆和孩子們不遺余力地劳动的情况下，一年的收入最多只有六十塔勒。其中約有三分之一要交封建稅和國稅，如地租和織工捐，狩猎捐和紡紗捐，地方捐和學費，土地稅和等級稅；一天的收入大約四个銀格罗申，要用来买面包、馬鈴薯、盐、木柴、蜡烛、淀粉、肥皂、衣服，修理房屋以及做其他用。在由一个牧师，一个警官，一个法院文书发表的一份呼吁书中談到棉布織工的状况时說：“有时候，这种体力劳动好像不重，可是健康状况和体力不容許

在少于六个工作日的时间内织成一百四十艾勒^①的布，即使日以继夜地劳动到半夜也不可能，而织这么多布厂主只赐给十四个银格罗申的工资。任何一个教养所和陆军监狱里的犯人，由于生活无忧无虑、有规律和受人道待遇，比起这些织工的生活来值得羡慕得多。灾难以不可阻挡的暴力闯入所有织工的家中。”至于自己没有房子的织工，用同时代的一位作家的话来说，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同它们相比，领主的畜厩应该称为客厅”。他们虽然不用缴土地税和地租，可是他们作为所谓房客每年要缴一塔勒到二塔勒的保护金，为的是当精神和肉体的野蛮化促使他们犯罪时，可以保证领主有钱供给他们在罪犯教养所里的生活费用。在西里西亚的容克中只有很少人慷慨地放棄向最穷的穷人括这种血腥钱。

西里西亚山区饥民的绝望呼号终于传布到全德国。饥民们得到了一些救济，可是这点救济只是火热的沙漠中的一滴水。加之由于官僚无能，这些救济金还浪费了不少。几哩长的札耳茨布隆村的全体饥民一共只从县政府得到了三十八麦采^②的马铃薯，在分配时发现这些马铃薯全是冻坏的，甚至连牲口都不吃。

三 饥餓暴動。西里西亞織工

新形成的群众性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足以自卫的法律武器。资本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或者情绪大批地解雇工人，可是工人却不能以牙还牙。如果工人像柏林的棉布印花工人或勃兰登堡的铁路工人那样，为了争取提高工资而试图罢工，警察就用棍棒把他们镇压下去。无产阶级的毫无权利就是基督教国家的权利，德

① 从前德国使用的一种长度单位，一艾勒约合三分之二米。——译者

② 德国古时的容量名，一麦采约合3.44公升。——译者

国各邦的君主，特别是普魯士国王正为实现这种权利而努力。

人們不給这些饥饿的群众以面包，却給他們出了一些好主意。他們劝这些身体衰弱、弯腰驼背的織工去当铁路工人、馬路工人或做其他需要强壮体格的劳动。对于家庭手工业者的病态的脑筋迟钝，人們感到没有办法，这些从幼就做劳累工作的家庭手工业工人抱住他們从父輩继承下来的、早已过时的工作方法，而不了解开始搶夺他們手中的最后一块面包的机器的好处。人們劝束縛在土地上的农村无产阶级移居国外，并且认为这个主意十分聪明，其实是既愚蠢又多余。因为在被压迫阶级之中，誰只要能够离开这个祖国，他早就自发地这样做了。40年代，德国移民的数目上升到434,626人。

在年輕的无产阶级本身，还不能产生明确的阶级意識。这是一个本身十分复杂的集团，由于陷入深渊而感觉麻痹，根本还认識不到，它的貧困是为了統治阶级的利益由人制造出来的，只有同这种利益进行斗争才能消灭貧困。他們力求在醉乡中忘記他們的似乎不可改变的悲惨命运。新制度对于穷人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廉价供应馬鈴薯燒酒。燒酒瘟疫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傳播，从情况最严重的上西里西亚一直到萊茵工业区，这种瘟疫在萊茵区使那些本来只喝一点酒借以取乐的工人变成了胡乱斗毆的醉汉。这种轉变也是出于上帝的意旨，它是把人变成兽的最后手段，同时也是加强王位和祭坛的封建支柱的最初手段！

可是下降的最后一級也就是上升的最初一級。現代无产者不容許別人用暴力剝奪自己做人的权利，凡是这种可怕的进程要想永远实现的地方，那怕是最軟弱的人也要拿起武器反对他的压迫者。40年代中期，随着歉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发生了多次暴动預示着革命将要到来。这是无計劃、无目标的饥饿暴动，是絕望的

行动，它只能而且已經以发起人和参加者的失敗而告終。因为基督教国家对付要求面包的呼声有两套办法，每套办法又有三种有效的法宝。第一套办法是步兵、騎兵和炮兵，第二套办法是苦工、监狱和皮鞭。可是这些暴动蔓延到整个德国，从布勒斯劳到美因茲，从勒根斯堡到施泰廷，甚至一直蔓延到遙远的后波美拉尼亞。全国各地普遍发生暴动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說明无产阶级群众已經开始认识到，他們有过像样的生活的权利。

这些饥饿暴动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1844年6月在西里西里歐倫山麓織工住的村庄彼得斯瓦尔道和郎根比劳发生的。彼得斯瓦尔道村的織工特別痛恨茨万齐格尔兄弟。一个織工織一百六十艾勒的粗棉布要緊張劳动整整八天，而茨万齐格尔兄弟只付十二个半或十二个銀格罗申的工資。这种压榨还嫌不够，他們宣称如果有人願意作同样的工只拿十个銀格罗申的話，那么他們准备还用三百个織工。他們用这样多的工資竟也招到工人。这些最穷的人訴苦說，他們現在簡直不能生存了，甚至連馬鈴薯也买不起了，而茨万齐格尔兄弟却說，織工将来还必須为一小块面包劳动，还說，要是織工沒有任何別的东西可吃的話，他們只可能吃青草，現在青草长得茂盛。同时这些殘酷的剥削者还驕傲地显示他們的財富；他們无耻地夸耀从劳动者的血汗中剥削来的錢，借以譏笑他們的牺牲者。

受苦的織工編了一首歌，它那簡樸的歌詞动人地反映出他們在无穷无尽的悲慘境地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緒。群众自己創造这首歌，他們逐字逐句地編着，一直到歌詞突然中断为止，正如織工的斗争突然被军队的齐射鎮压下去一样。在这首二十多节的詩歌中，下面几节是十分动人的：

这个村子里有一个法庭，

宅比弗迈^① 还要凶狠，
在这里法官不用宣判，
很快就夺走了人的生命。

这里的人被慢慢折磨，
这里是一个拷问室，
这里有很多人呻吟叹息，
证明着他们的不幸。

茨万齐格尔兄弟是刽子手，
他们的家僕是帮凶，
一个个都仗势欺人，
一点也不留情。

你们这些无赖，你们这些恶魔！
你们是地狱里的坏鬼！
你们夺去了穷人的财产，
你们应该受到诅咒！

请求没有用，哀告没有用，
一切诉苦全是白费；
你们不满意，你们可以走开，
去勒紧你们的裤带！

想一想这种苦难吧！
想一想这些穷人的困境，

① 德国中古时期的一种秘密法庭，盛行于威斯特伐里亚，1495年以后废除。——译者

家里沒有一片面包，
难道这不值得怜憫？

怜憫？哼！你們这些吃人的生番
那有这种美好的感情。
每个人都知道你們的目标
就是剥掉穷人的皮和衬衣！

这个有五千居民的彼得斯瓦尔道村的織工在茨万齐格尔家前面反复唱这首歌。有一个織工被抓住，带到屋子里面去受到毒打并被交给当地的警察。6月4日下午群众的憤激情緒达到頂点。一群織工从彼得斯瓦尔道到了附近的卡培倫貝爾克，列队向他們的压迫者的华丽的住宅前进。他們要求增加工資还要一点酒錢。在一片冷嘲热諷声中，要求遭到拒絕。于是群众就冲进住宅，闖进所有房間、仓库、擋樓、地窖，打烂了值錢的家具、鏡子、瓷器，撕毀了书籍、票据、文件，在打包房、烘干室、車房里把貯藏品和貨物扔到窗外，在那里撕裂、弄碎、用脚踩烂或者分給周圍的人。茨万齐格尔吓得要死，帶着一家从这个城市逃到那个城市，誰也不願收留这位討厭的客人，最后他在布勒斯勞才找到了一个避难之地。

織工們在无限憤怒的情况下，仍然表現出他們的无限仁慈。工厂主瓦根克納希特就住在茨万齐格尔家附近，但是他不像茨万齐格尔那样压榨織工，織工們不仅沒有伤害他，而且还因为他給了一点酒錢而祝他健康。甚至那个像織工歌中所說“厚顏无耻、肆无忌憚地”压低工資的工厂主費尔曼，他們也只让他付給每人五个銀格罗申，把面包、黃油、猪油分給他們。而茨万齐格尔家里还剩下的一些东西，在6月4日傍晚和6月5日早晨被完全砸烂了。織工們拒絕了他們之中少数几个人把茨万齐格尔的房子燒光的建議

他們拒絕這樣做的主要理由是，燒毀了他的房子，他就可以領到火災保險金，可是問題是要把这一家子弄窮，使他們知道餓肚子是多么難受。

6月5日，這支已經增加到三千人的織工大隊到了郎根比勞，這是個有一萬三千居民的村子，這里人最痛恨的是开着兩個大鋪子的迪里希兄弟。織工們首先攻打這家人的高地住宅，他們却利用店員和工廠里的工人守衛，在一場激烈的棍棒戰中打退了進攻的織工。這時織工們就向迪里希兄弟的另一所房子進發，那裏受這家商號剝削的織工參加了他們一伙。這時迪里希答應給每個保護他的財產的織工五個格羅申的酒錢，並叫人把这个諾言寫在紙上貼在門口。織工們馬上排成兩行，準備接受這個條件。可是這時候從施魏德涅茨^①開來的軍隊到了。織工們向兵士喊話，少校指揮官馮·羅曾貝爾格大概看到其中的危險性，就向後退了一段距離，以便在房子後面和房子兩側占領有利陣地。軍隊一到，廠主就遲遲不給他答應給的酒錢。織工們忍耐不住，並越來越向軍隊逼近。這時少校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齊放三次。

開槍射擊的後果是可怕的。十一個死者和二十個重傷者躺在地上。腦漿和鮮血濺到很遠的地方。血的景象、垂死者的呻吟和喘息，受傷者的痛苦喊叫促使受驚的織工轉為拼命的反抗。他們用斧子、棍棒、石头向軍隊衝擊，把軍隊趕出了村莊，然後就把迪里希兄弟的住宅砸毀。

這是一個短暫的勝利。6月6日早晨，施利希庭少校率領三個步兵連和一個配備四門火炮的炮兵連（炮兵帶着點着了的火繩）開到郎根比勞村。一會兒騎兵也開到了。任何抵抗都是沒有希望

^① 波蘭西南部城市，現名希維德尼察，在弗勞茲拉夫西南。——譯者

的。一部分起义的織工就到了劳依特曼村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斯格隆，銷毀了从茨万齐格尔的发货人家中搜出的貨物，此外再沒有進行任何攻击。总的說來，在三天的暴動中沒有一个剝削織工的商人受到人身攻击或者虐待。也沒有人放火燒他們的房子，甚至織工們所痛恨的面包商人也完全沒有受到惊扰。

这时一部分逃到山里和森林中去的不幸的織工受到更殘酷的追击。其中有八十三人被送上了法庭，判处重刑，最多的被判做十年苦工，还要挨二十四下鞭打。織工的苦难不但沒有消除，却反而增加了。几項緩和手段沒有发生什么作用，而國王却下令禁止西里西亚報紙談論織工区的状况，几年以后，愚蠢的普魯士外交参加了神圣同盟反对波兰克拉科共和国的暴行，并容忍它被圈入奥地利关税線之内，这样普魯士就封閉了西里西亚紡織业的最后一个銷售市場。

在西里西亚的饥饿暴動中，連普魯士警察的銳利的眼睛也沒有发现任何共产主义倾向。它急忙利用在希爾施貝克山谷发现共产主义密謀的叫囂弥补了这一缺陷。1845年春天，柏林高等法院的法官施梯伯，化名为風景画家伊曼努尔·施米特到了这个地区，據說他发现瓦爾姆布隆的木匠师傅烏爾姆领导一个由六至八个工人組成的秘密同盟，其目的是要消灭富人。同时代人立刻就怀疑这个密謀是“制造”出来的。事实上，可怕的秘密同盟的可怕的規章好像是一个奸細帮一个腦筋混乱的人搞出来的。烏爾姆被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后来被“寬大”改为終身监禁，他的同伙被判处多年的有期徒刑。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这个密謀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这种惩罚确实执行到1848年的大赦把这些被判刑者釋放出来为止。可是今天几乎不可能十分明确地斷定，这件事同那个所謂的叛国者烏爾姆和他所謂的同犯到底有什么关系，而且

也沒有很大的必要这样做。救国者施梯伯以及交給他这个任务的人們的目的显然在于消灭两个英勇正直的人，一个是艾希貝克的工厂主施略費尔，一个是希尔施貝克的小学教員万德尔。这两个人由于对群众进行政治启蒙而受到官僚政府的憎恨，容克們还特別痛恨施略費尔，因为他以实际行动帮助农村无产阶级，反对任意增加封建負担。

施梯伯完全不顾三月革命前的立法对臣民人身的一点保护，逮捕了施略費尔和万德尔，說他們是烏尔姆的同党，把他們的信件文书等等一張不漏地搜來，可是他从这里面找不到一点綫，以供他那創造性的幻想擰一条绳子来捆綁这两个被捕者。經過一个长短不同的时期，法院不得不釋放了这两个人。西里西亚总督梅克尔成了这次失敗的救国行动的牺牲品。这位老先生本来是一位老练的官僚，他用看不見織工的苦难，听不見他們的呼救声这个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不知是出于官僚的妒忌，还是出于一种較好的感情，施梯伯的飞揚跋扈的行为引起他的不滿，他对待被捕的施略費尔不像秘密警察所要求的那样严厉。国王对他表示不滿，于是他只得辞职。

施梯伯在他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时，就可以說：我就是普魯士国家，他后来的行为也一再表明了这一点。

第十二章

德国的社会主义

为了給西歐的社会主义开辟通往德国的道路，并不需要先有发展中的群众性无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的学术发展当然使得具有圣西門和傅立叶思想的出版物在萊茵河以东很快就得到很大重视。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使得在評价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时，文献观点占了主要地位，它那空想的外壳中的經濟实质，人們連看也沒有看到，更不用說理解这种实质了。

圣西門主义的学說最先而且最广泛地在德国知識分子中得到反应。30年代初期，有几个神学家把圣西門主义当做一个新的教派加以研究。同时，柏林的几个美学团体也像青年德意志派一样，用感觉迟鈍的方式解釋肉体的解放，甚至像拉埃尔（万哈根·封·恩賽）这样一个有名望的妇女也沒有超出对这一点进行有才气的考察，或者只是玩弄才气的考察的范围。今天不值得花費精力詳細討論这种以社会主义为題的文字游戏。

皮羽克列尔侯爵1832年2月5日写給拉埃尔的信中有几句话頗有意思，“这的确是一种新学說和对一个正开始的新时代的明确認識，虽然这个新时代在几个世紀中发展很慢”，但是他馬上补充說：“再說，这个新时代距离我們比較远，仍然只是作为一个远方的

流星以供观赏，如果人们不想到施潘道^①去的话。”这些奇怪的社会主义者不仅是由于害怕施潘道而手足无力、头脑迟钝。拉埃尔在同皮羽克列尔谈论圣西门主义以后写信给他，说：“昨天您那些崇高、纯洁、温和、安静和坚定的计划给了我的力量啊！它像是在干旱的土地上降下的五月的大雨，给我莫大的安慰和保证！”可是这个喜欢同自己的女朋友搞这种精神错乱的色情事件的老罪人不久就在给拉埃尔的丈夫，讨厌的伪善者万哈根的一封信中做了不言而喻的保留，说社会主义不可破坏他自己、他的朋友和上流社会至今的美好关系。30年代玩弄的一些社会主义游戏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那些不愁吃喝的先生们的时髦的消遣，这些人由于看到了饥饿、有病和肮脏的面孔，破坏了他们的美的快感，于是凭着一时的热情传播一种要使所有人都受到教育，都过幸福生活的福音。

只要提到当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就不能不谈这样一个人，他对劳动阶级的痛苦深为同情，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有批判性的见解，并且有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在这些方面可以同西欧社会主义的偉大空想主义者并列而无愧。这个人叫路德维希·噶尔，是莱茵地方的一个下級官吏，先在法国人手下服务，后在普鲁士政权下服务。他曾抱着种种幻想，力图消灭无产阶级的贫困。噶尔起初想组织向国外移民，并把自己所继承的财产用于这个计划，结果遭到悲惨的失败。后来他要求（正如他的主要著作的标题所标明的），“用粮食贮备保证纸币的价值；这是提高和巩固德国人民已经下降的福利，一劳永逸地防止任何匮乏和剩余的灾难的迅速的，也许是唯一的手段”。这本著作所得到的唯一成果就是内务大臣

^① 施潘道是柏林西部的一个城堡，其中设有拘留政治犯的监狱。——译者

舒克曼的一道粗暴的命令，命令中說，噶尔大概是沒有足够的工作可做，今后不應該让他无公可办。噶尔在辞职以后，終于打算在乡村里安家立业，通过打谷机、面包房、洗衣房等合作机构在居民中引起普遍社会化的思想和願望。噶尔是一个伶巧的发明家，他想利用他发明的收入得到实现这个空想的資金。事情沒有成功。噶尔还想在自己所办的《博爱报》上宣傳圣西門、傅立叶和歐文的空想，可是由于讀者太少，这个杂志出了一期就停刊了。噶尔的社会主义活动遭到一系列的失敗。

他引以自慰的是，真理終将胜利，这个希望沒有欺騙他。他的美名值得在德国社会主义史上提一提。噶尔作为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一个德国人，特別是一个普魯士的地方政府的秘书，他所做的事情是值得敬佩的。但是要想摘取个别名詞，找出个别句子证明噶尔是一个划时代的理論家，那也是白費力气。他为数不多的著作中的最好的部分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有力的共鳴，噶尔从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中找出傅立叶和歐文。特別是噶尔关于富裕中的貧乏，关于資本、劳动和才能的必要联合，关于分散劳动則生产力枯竭，集体劳动則生产力增长所說的一些話都淵源于傅立叶。他的建議同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同的地方（如組織移民和永久性的粮食貯备），都证明这些建議在历史上是落后的，这当然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德国的落后状态造成的。噶尔沒有走到傅立叶和歐文的前面。尤其是他虽然到 1863 年才去世，也从来没有对于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表示过任何关怀。

1842 年，罗侖茲·施泰因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出版了。这部书在某种意义上說是一块界石，从此德国社会主义結束了童年时代的，或者說是幼稚的游戏，开始了严肃的生活。这部书可以說給德国知識分子撞开了通往在资产阶级社会下挖掘的地下

坑道的門戶。总的說來這本書還是一個相當輕率的作品，有濃厚的通俗文學的筆調，過分詳細地敘述空想社會主義的奇異的外形，傅立叶關於地球過去的發展的空想，安凡丹團體的教會式的組織以及類似的东西。但是它也揭露了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經濟—社會基礎，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儘管其中有許多理解錯誤或根本不了解的地方。這是一個沒有成熟的酸蘋果，但也是一个認識的蘋果。羅雪爾說，施泰因的書對德國公眾起了一個來自遠方的童話的作用，這種說法是把事情顛倒過來了。吉伊多·魏斯的評論却中肯得多，他說年輕的資產階級通過這本書認識了自己。施泰因對自己寫的這本書的成績估價過高，他認為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是由於他這本書產生的。這種運動的遊戲形式以前就有，而它的明顯的形態不是從一本書，而從一個經濟事實，即群眾的不斷貧困化產生的。為了理解這個事實，資產階級分子費了或多或少的力氣在施泰因的著作中探索。

今天也沒有必要分別地追究這些思想線索。當時在德國還沒有統一的政黨，集聚在“社會派”的旗幟下的形形色色的貨色同集聚在“自由主義者”的旗幟下的一樣多，或者還要多些。比較有效果的辦法是追究事物的根底，只要能夠截然分開，就把各種形式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根據它們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所由形成的經濟利益加以區分。

一 基督教—封建的社會主義

同青年英國和一部分法國正統主義者一樣，德國的封建主義早就試圖利用群眾性的無產階級的苦難反對咄咄逼人地增長着的資本的力量。

可是它所能做到的不过是笨拙地模仿那些比較出色的样本。所有的，或者說几乎所有的封建社会主义的发动都是同一种庸俗的虔誠主义混合在一起的，这种虔誠主义从一开始就彻底消除了这些行动的危险性。普魯士国王在一个庄严的敕令中宣布天鹅骑士团^①是对贫苦人们的基督教的仁爱行为的宗教上的合作者，这个骑士团立刻引起普遍的哄笑。国王不得不放棄恢复这个骑士团的企图。在国王的浪漫主义的怪論背后并不藏有一种真正的同情。当蓓蒂娜·冯·阿尔宁在《君王必讀》一书中用雄辯的言詞描写了首都无产阶级的苦难时，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真正的仁爱的光輝面前非常狼狽，这种光輝曾經从歌德的明亮的眼睛里射到浪漫主义的巫婆身上，現在还时常从她那混乱的思想中冲出来。这个模糊的头脑对于蓓蒂娜的人道主义的話——国王的邻人是他的饥饿的人民——，或者她那沉痛的控訴——罪犯是国家本身的罪恶——应当作何理解呢！

国王力所能及的、基督教社会的两个唯一的創造物象阴郁的古堡似的矗立着：在首都的南面是贝塔宁医院，在首都北边是莫阿华特单身牢房监狱。国内布道会^②要在这两个地方医治人民的肉体和灵魂的疾病。凯泽斯韦尔特^③的教会护士在医院里占統治地位，他們怀着宗教上的自负心情行使医生的职权。陋室^④的教士們在单身牢房监狱里，在那些由于残酷的隔离措施变得軟弱的

① 天鹅骑士团是中世纪的一种宗教骑士骑士团，創立于1443年，在宗教改革时期衰落下去。——譯者

② 基督教福音派的一种組織，創立于1848年。——譯者

③ 普魯士杜塞尔多夫行政区的城市，在莱茵河畔，1836年福音派牧师弗里德納在此創办教会护士学校。——譯者

④ 1833年，福音派神学家魏歇尔恩在汉堡創立的国内布道的机构。——譯者

犯人身上試驗他們的拯救灵魂的技术。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巴士底獄的劳动院也像雨后春笋似的成立起来，这种劳动院实在可怕，失业的乞丐在那里拉散羊毛，每天从早晨五点工作到晚上九点，监工可以任意用皮鞭抽打他們。差不多在国王自称是天鹅骑士团的首領的同时，他批准了 1842 年的济貧法，在其理由中作为“貧民救濟的首要原則”确定下来的就是穷人“根本没有要求救濟的权利，不能按照法律手續提出这种要求”。貧民救濟机关只应“給他們最必需的东西，只应防止他們真正在貧困中死去”。普魯士高等法院在全体会議的決議中对这种賢明的法令作了一个完全多余的說明，它說，考慮到“由于貧困、需要救濟和沒有食物而对社会的安宁和道德狀況产生危險”，貧穷的工人不应餓死。这就是基督教一封建社会主义的实质，浪漫主义的一切宣传机器也不能把这个小狗吹成大象。

浪漫主义的国王怎样，浪漫主义的容克也是怎样。这些容克十分虔誠，不过他們的基督教的对邻人的爱只限于想用宗法一封建方式，而不想用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剥削农村无产阶级。住在他們的主要巢穴后波美拉尼亚的容克有：特利格拉弗庄园的家长塔敦，他的女婿，齐梅尔豪曾庄园的布兰肯堡，格罗斯—提科夫庄园的急性人克莱斯特—雷措夫，此外还有克尼福夫庄园的高傲的容克奥托·馮·俾斯麦。俾斯麦負了很多債，沒有資本也借不到錢来經營已經沒落的庄园，当然只研究摩西第二书^① 第三十二章中的金牛犢的优美故事，而其他人，喚醒者和被喚醒者都学着《旧約全书》里的四个大先知和十二个小先知說話。在波美拉尼亚經濟界在科斯林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議上，年迈的塔敦发表了一篇热烈

① 即《旧約全书》《出埃及記》。——譯者

的演說，說出所有容克的內心秘密：他責備那些喝醉了酒，不得不被从地方議會中指走的貴族，他咒罵用騎士莊園謀取暴利，他嘲笑“各邦人民的不知羞耻的要求”，他們希望諸侯把“造福”这个動詞預先變成过去完成時態。他把騎士的服裝以及它那發亮的肩章象徵化——“我們的肩部裝飾，它無非就是飛到坐在王位上的鷙那里去的翅膀！”——最后是“領主及其居民之間的統治者和父輩的關係”之歌的尾聲。塔敦用預言家的憤怒語調向反对封建剝削特权的人們喊道：“他們一会儿要剝奪我們的管轄權，一会儿要取消我們的警察，一会儿要剝奪我們對教会和學校的保護權，并用各種方法縮小我們的等級代表權利，如果可能就使我們只同吃草的牲口為伍……这就是說，不是乘四匹馬拉的馬車，而是用四肢在地上爬，这就是我們的敵人想把我們造成的样子。”对，“用四肢爬行的吃草的牲口”，在容克們看來，这就是他們雇用的短工，他們仍然想乘着四匹馬拉的馬車从這些雇工身上疾馳而過，只是他們不仅手里拿着鞭子，而且嘴里还念着上帝。

基督教一封建社会主义只有两个目光比較远大的文献方面的先鋒战士：維·艾·胡貝爾和海爾曼·瓦蓋納。在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并在国外作过长途旅行之后，胡貝爾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从此以后他无条件地信赖國內布道會和上帝恩賜的王國。他本人是个正直而善良的人，他在英國和法國理解到封建一派会反动的实际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无产阶级的有組織的行动的价值。但是由于他存在一种虛幻的希望，即期待統治阶级普遍地，“社会王权”特殊地进行一种自願的社会改革，他那些較好的認識就陷入歧途。胡貝爾被國王召到柏林，因此他沒有能够發揮自己的实际作用。在艾希霍恩的統治下心怀不平的大学事不由己地受了欺騙，胡貝爾被大学里的同事用种种恶毒行为排挤出去，他

在普魯士官場中所碰到的，如他自己所說是“一群可怕的活死人”，他办的杂志《雅諾斯》^① 讀者很少，因而国王不得不拿出錢来貼补出版費用。

海尔曼·瓦蓋納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出生在勃兰登堡馬尔克的乡村里，长得瘦骨棱棱，面貌冷酷，是一个鲜明的冷靜的形象，但同时又是一个堂吉訶德式的人物，他善于为了不能实现的理想投出他那生鏽的标枪，在歐文教派^② 中一直升到大执事的职位。他不是一个空想家，也不是一个欺騙者，可是他却是一个欺騙者和一个空想家的不可分割的混合体。瓦蓋納的初期活动对于他整个一生的經歷有很大意义。他在图赫尔荒地的土壤改良的工作中上了实践的社会主义的一課，这是一个名声很坏的“國內殖民”的嘗試，国王对于这一可耻的失敗用一句可耻的挖苦話安慰自己，国家为这些改良的沼澤地的一斤干草所花的錢可以买一斤真正的中国茶叶。后来瓦蓋納到馬格德堡担任宗教法庭陪审官。在这里，他的上司中的几个有才气的老浪漫主义者帮助他在精神上有所进展。他对于試作买卖和进行商业投机始終很有兴趣，而且也常常遭到失敗。不过这种失敗正是由于他不是一个狡猾的投机家，不是一个卑鄙的交易所之狼，而是在自己获利不多的情况下，力图使他认为正义的事业得到越来越大的利益。瓦蓋納憎恨資本主义，他善于敏銳地发现它的弱点，但也不低估它的优点；他清楚地知道，衰老的官僚制度不能同它对抗，不懂得用某种方式同工业无产阶级和解的封建主义也不能同它对抗。他在选择手段时沒有疑慮，在論战中毫无顧忌，主意很多（不管是好的或坏的），假如他

① 罗馬神話中守門的两面神。——譯者

② 苏格兰傳教士爱德华·歐文（1790—1834）所創立的一个天主教教派，它认为世界末日已近，1844年基督就要再来。——原編者

不是一个注定要开展封建社会主义的群众性鼓动工作的人，假如易北河以东的乡村容克的精神上的惰性不阻止他谱出捕鼠人的一种相当有诱惑性的乐曲，他会成为一个老练的鼓动家和政論家。他絕望地叹息說，保守主义者有一半生来就是笨蛋，有一半是有原則的笨蛋，但是他沒有认识到一种真正的阶级本能也可能包含在他們的精神的局限性之中。一开始，保守分子們就畏惧瓦蓋納的性格和策略中的一些成問題的东西。

有一个时期，瓦蓋納曾在科倫出版的一份半官方報紙《萊茵觀察家》上試驗他的煽动伎俩，为的是把《萊茵报》所播下的杂草除掉。年轻的自由主义一开始 就认为在大城市中代替等級稅征收的磨面稅和屠宰稅是加在穷人身上的一种不正当的负担。自由主义者所以反对这些稅收，一半是出于空洞的理論，一半是出于使英国工业家厌恶粮食关税的那种心情，汉澤曼就属于后一种情形。自由主义者曾經要求用等級稅代替加于貧穷的阶级的面包和肉类上的这些間接稅，不足之数以向富有阶级所課之所得稅来弥补。这时政府向 1847 年的聯合議会提出一个相应的法律草案；它建議实行自己查定的所得稅，四百塔勒以上的收入一律課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限于固定收入）的所得稅。政府并不热心坚持这个草案，因为它不希望这个草案被通过；它提出这个草案只是因为它估計这个草案不会被通过，这样就使聯合議会在群众眼前显得十分狼狽而自己却不花一文錢，得到关心工人的美名。可是这个如意算盘沒有完全打对。聯合議会的諸侯、領主和騎士除了少数例外，都激烈反对政府的提案，而在东普魯士和萊茵的自由主义分子中，至少有相当多的人认真地或者狡猾地坚持自己的意見。康普豪森和汉澤曼热烈拥护計劃征收的所得稅，康普豪森甚至声称，一种真理存在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深的根基中，“这个真理就是，一个

活着的人就有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應該由社会在扩大的范围内加以承认”。在反对草案的大多数人之中，政府的最忠实的拥护者表現得最为坚决。

但是其他自由主义者，其中包括萊茵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很有名望的大人物（如作为一个已經发展起来的資本家吹牛說，他的搖籃是放在他父亲的織布机旁的門諾教派的貝凱拉特）却上了圈套，他們反对所得税，认为它是一种麻烦的措施，一种对道德的危險的考驗，是走向革命的一步。这时《萊茵观察家》就抛出了基督教一封建社会主义的鉤子。所得税是一种麻烦的措施嗎？“什么話，难道几乎买不起面包的穷人还要为吃飯而繳稅，这就不麻烦嗎？窮人們的收入如果够用，他們一定願意繳稅。”所得税是对于道德的一个危險的考驗嗎？“什么話，难道受到捐稅的重負压迫、被削減了工資的穷人的状况不是一种考驗嗎？”所得税导致革命嗎？“当然导致社会状况的变革，导致消灭无边无际的貧困，也导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由共产主义者虛构出来的，而是一般国法所允許的，它已經有了基督教的灵感。”《萊茵观察家》就这样用优美的声調說下去，最后甚至鼓吹国王同无产阶级的联盟。

如果基督教一封建社会主义要想通过这样的論文提供一个范例，說明它不仅指責自由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也能贏得劳动阶级的人心，那么它就打錯算盘了。萊茵区的无产阶级太有本領識別这种欺騙了。他們听着这种說教，可就是根据正当的理由不予置信。

二 資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也企图用它自己的方式帮助无产阶级脱离貧困。当

时资产阶级也同今天一样，喜欢把它自己内部的分歧，如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争吵说成是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它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如此高尚，如此英勇地忍受痛苦。

除了这种演说家的姿态以外，资产阶级就满足于禁酒运动和慈善活动，满足于建立工厂互助会，奖金基金和其他鸡毛蒜皮的改良，其目的不外乎借各种补助来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这些补助据说是为工人自己而发给工人的，可是实际上大多却降低了资本的生产成本。当时资产阶级就已经把使无产者成为满足的人当作一件好事，其先决条件是：第一，它不用出钱，可能的话还要从中得到利润，第二，所用的手段不致激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而当工人已经觉悟时，就尽力麻痹工人的觉悟。

40年代，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壮门面的东西是劳动阶级福利中央协会。它成立于1844年秋天，当时西里西亚织工的饥饿暴动使得正因为看了柏林的工业展览会而洋洋得意的、上升的资产阶级大吃一惊。这个协会要使它的分会遍布全德国，它要彻底解除无产阶级的痛苦。在那个沸腾的时代，在阶级斗争还很不成熟的时候，这种思想是很有力量的。从国王一直到最不满意的反对派，甚至一部分工人都兴高采烈，国王答应给协会一万五千塔勒，反对派把关于职业介绍所和劳动组织的各种美好计划同协会联系起来，同时有几百个工人申请参加协会。

这是一些美丽的梦想，可是结果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虽然中央协会的工厂主在他们的第一个宣言中认为“工人阶级的积极合作”是必要的，可是当他们发觉他们不能简单地让安排好的木偶在绳索上跳舞，而必须同真正的工人打交道时，他们的信念很快就改变了。柏林分会决定把每年的会员费订为十个银格罗申，每周或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这时工厂主们立即声明，不应该诱使工人增加

新的支出，而且根本也沒有这样多的房子供开会之用。再說，他們自己能够最彻底地判断人民需要什么，而人民还很不成熟，沒有能力作这种判断，計劃召开的大会就会成为共产主义爭論的雅各宾俱乐部和戰場。当然这种論調在基督教国家得到知心的反应。柏林分会沒有能够得到官厅批准。

在創立科倫分会的时候，演出了几乎更为激烈的几幕。《萊茵报》以前的撰稿人毕尔格尔斯和荣克在組織大会上提議，这个协会應該叫做互教互助的协会，以便从协会的名称上去除一切傲慢的恩人气派。但是这个提議剛一通过，萊茵资产阶级的最有威望的、而且目光也比較远大的領袖卢道夫·康普豪森就宣布退出协会，他用值得贊揚的坦率态度作书面发言說，他不能参加这些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可以激发工人阶级提出更高的要求，使得工人阶级更不滿現状，更不願意劳动，不是讓他們滿足現有的欲望，而是使他們产生新的欲望”。在科倫也是由警察做了其余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凡是劳动阶级福利协会想做一点比做压迫阶级的工具較好的事情的地方，情形都是这样。压迫阶级想利用协会使被压迫阶级不了解痛苦的根源，从而加强自己对被压迫阶级的統治。最沒有疑問的爱国主义一旦对无产阶级表示某种好感，就免不了披上“世界主义和博爱主义”的嫌疑。在 1848 年柏林大会上，一个右派領袖，格賴夫斯瓦耳特的鮑姆斯塔克教授严厉指責政府，故意延迟批准他和洛貝尔图斯打算建立的波罗的海分会，一直到事情无声无息为止。

最后，基督教国家和社会王权对于中央协会本身也产生了怀疑。不管中央协会如何忙于“修改”它的章程，国王也不賞給它錢了，它也得不到官方的批准了。三月革命以后，当它感到迫切需要欺騙工人的时候，它在一篇华丽的宣言中声称，“已經束縛住它

的死神的羈絆”終于解脫了，現在它要顯示它的“生命力”。可是它“從自由中重新獲得的力量”也同這時國王真正送給它的錢一樣對它不能有所幫助。隨着無產階級的覺醒，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也就自動地消失了。越是無利可圖，資產階級就越想放棄這種偽善的負擔和偽善的欲望。今天，勞動階級福利協會還像一棵紫羅蘭似的悄悄地开着花，而且它也符合它的創辦者的本來意圖。那就是：協會的活動只限于，從自由貿易資本主義的立場出發，向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散布各種小報和宣傳小冊子。可是連資產階級也不再注意這件事，無產階級更不管它了。

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在其興盛時期通過它救濟貧民的實際工作顯示了自己，就像基督教一封建的社會主義通過它原則性的濟貧法顯示了自己一樣。柏林貧民救濟機關中的資產者表現博愛精神的方式非常奇怪；因而年輕的母親們往往遇到這樣的事，貧民救濟機關在發給救濟金以前派人調查這些不幸的女人是否還有奶喂孩子。

三 哲學—純文學的社會主義

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第三種類型，就其最後的效果來說也是反動的，因為它確實認為自己是革命的。它的代言人是莫澤斯·赫斯、奧托·呂寧、卡尔·格律恩以及其他萊茵、西里西亞、薩克森王國等地的作家，這些人大多經過黑格爾歸依了費爾巴哈，這時由於無產階級的不斷增長的貧困而吃驚，想通過法國的社會主義實現“真正的人”。他們創辦了一系列的機關報刊：1845年夏天到1846年夏天出版《社會明鏡》，1845年和1846年各出了兩卷《萊茵年鑑》和《德國公民手冊》，此外還有一個月刊，叫《威斯特伐里亞汽船》也

是1845年开始出版的，不过它的寿命一直延续到德国革命为止，最后还有像《特里尔日报》这样的一些日报。

毫无疑问，这个运动有它好的一面。首先是它揭露了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它的杂志登载了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丰富的报道，就是今天来读这些报道也有很大好处。在《德国公民手册》中，威廉·沃尔弗写了具有革命的顽强精神的西里西亚织工的历史。《莱茵年鉴》赞扬巴贝夫和马拉是饥饿群众的真正朋友。庸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驳斥受到辛辣的讽刺。从对“分配”的责难一直到在“未来的国家”里谁该擦皮靴这个令人伤心的问题，这一切当时已经很普遍了。稍稍不同的是，今天开明的政治家的慎重的首脑们深入考虑著名的擦皮靴的问题，而当时这个问题只是给旅行客商在饭店里饭后吃点心时提供一个消灭社会主义的好机会。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是赫斯和格律恩的思想围绕着旋转的中心。凭着这一点，他们好像站在德国以及法国精神发展的顶点。

事实恰恰相反。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用哲学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这件事，在德国也由一件革命的事业成为一件反动的事业，而赫斯和格律恩却打不破哲学的圈子。他们在掌握法国社会主义时，阉割了法国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不是把它理解为阶级间的经济斗争的文字表现，而是理解为关于人的本质的空幻的思辨。他们基本上以空想社会主义的人为的社会结构为依据，然后用种种滑稽的哲学办法，在黑格尔范畴的高空中“扬弃”和“克服”这些社会结构。他们没有注意空想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所做的尖锐批判。甚至在蒲鲁东的著作中，他们感到兴趣的也不是蒲鲁东的正确的国民经济学的观点，而是他错误的哲学观点。

可是德国哲学也同法国社会主义一样断送在他们手里。费尔

巴哈揭露基督教的上帝是異化了的人的本质，人要脫離上帝只要認識自己就行了，而赫斯認為，經濟學領域中的金錢同哲學領域中的上帝是同一个東西，人為了擺脫金錢，從而擺脫一種非人道的現實的整個廢物，只要把自己看作是人類社會的活動的成員，是一個有創造力的萬能的生物就行了。赫斯企圖用把經濟學概念立即翻譯成哲學概念的辦法，使這種奇怪的社會主義成為可信的。可是當他強調指出：“物質財產是已經成為固定觀念的、精神的自為存在”的時候，這種妙論甚至比不上空想主義的最奇怪的未來圖景。格律恩又把費爾巴哈對愛的頌揚變為一種難以容忍的愛的夸張，這樣一來，他就把人類的一切鬥爭都化為可喜的和諧，他甚至明顯地幻想，將來可以輕而易舉地管理整個生產。

儘管如此，如果僅僅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德國社會主義的這個變種進行的尖銳批判，來對它進行評價，是不公平的。特別是對它的最嚴重的責難，即說它是三月革命前的反動派手中的武器，只是在一定條件下才能站得住腳。哲學一純文學的社會主義喜歡以驕傲自大的態度否定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活動，這當然間接地巩固了專制政權的地位。參加軟弱無力的省議會的資產階級的還很胆怯的反對派使得柏林政府感到不舒服的程度要比把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翻譯成已經衰落的黑格爾德語使它感到不舒服的程度大得多。但是哲學一純文學的社會主義，或者如格律恩所命名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却完全沒有被用做“吓唬那來勢洶洶的資產階級的一個稻草人”^①的意图。就它的本性來說，它是想真正革命的。它只是沒有認識到，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上是革命的東西，在缺乏這種基礎而必須先建立這種基礎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7頁。

地方必然成为反动的。

假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哲学一純文学的社会主义看做是一个虚假的兄弟，他們自己就不会为它的杂志撰稿。就他們两个人而言，他們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当 1845 年，哲学一純文学的社会主义开始在德国傳播的时候，他們早已超出了它的范围。但是他們并沒有做他們往往，甚至經常受到不公平的指責的事情。他們沒有用自負的优势攻击一种还不发展的运动，而是想使这种运动形式超过自己本身。因此，恩格斯同赫斯一起創办了《社会明鏡》，馬克思也为它写了一篇論文^①，虽然赫斯在这个杂志的綱領性的創刊詞中宣称，“我們对于一切政治一自由主义的活动不仅毫不关心，而且确实感到厌恶”。如果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哲学一純文学的社会主义作出合理的估計，认为不好的音乐家很可能 是好人，那么当这些好人毫不表示要放棄他們的坏音乐的时候，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在哲学一純文学的社会主义自己的杂志上反对它，也是合理的。

《社会明鏡》創刊后一年，恩格斯在《1846 年的德国公民手册》上写道：“德国人逐渐把共产主义运动也弄得庸俗起來了。在这里，那些后生之輩和庸庸碌碌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够用輕視前輩和空談哲理的办法来掩飾自己的落后。共产主义剛在德国出現，它就被一批投机分子用來作为資本。这些人把在法英两国已經陈腐了的論点翻譯成黑格尔邏輯的語言，就以为自己創造了奇迹；而現在他們就把这种新的智慧当做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当做‘真正的德国的理論’献之于世，以便将来可以尽情地誣蔑目光短淺的法国

① 指馬克思关于雅克·珀歇《警察档案摘录》一书中《論自杀》一文的一篇論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历史批判全集》第 1 部，第 3 卷，1932 年柏林版，第 391—407 頁。——原編者

人和英国人的‘拙劣的实践’和‘可笑的’社会体系。”^① 恩格斯向“这些聪明的先生”介绍了傅立叶论商业的不很多的一章，因为这一章可以给他们做个榜样。“的确，傅立叶没有从黑格尔的理论出发，因此——可惜！——他不能认识绝对真理，甚至也不能得出绝对的社会主义。的确，可惜正由于这个缺点，傅立叶走入了歧途，采用了分类的方法来代替绝对的方法，产生了海水变柠檬汁……狮子改变兽性、行星交配这些想法。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同乐观的傅立叶一起相信所有这些奇迹，而不相信那根本没有任何柠檬汁的绝对的精神王国，不相信有和无的同一以及永恒范疇的交配。法国人的无稽之谈至少是令人高兴的，而德国人的无稽之谈却令人丧气和抑郁。”^②

恩格斯在介绍了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以后，继续写道：“最后，现在已经是德国人停止这样夸耀自己做事切实认真的时候了。他们非但可以从最无谓的材料中给你作出随便什么样的结论，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结论和世界史联系起来。他们可以根据初次碰到的第三手的材料给你证明，事情必定是这样，而不会是别的，虽然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是否是这样……因此，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是可怜得怕人。稍微谈谈现在大家都乐于挂在嘴上的‘人性’，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宁可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还是经过了第三手或第四手呢！）稍微谈一下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一下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状况却茫然无知，这种‘社会主义’整个就归结为这几点。而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4页。

② 同上书第655—656页。

想絕對平靜'而喪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們却想用这些空話使德国革命，去推動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① 最后恩格斯劝告"絕對的"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先彻底知道在他們之前已經做了些什么以后，他們才能表現他們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可是他无论用严肃的或是幽默的語調都沒有能够动摇那些把整个看得見的和看不见的世界拘禁在他們的黑格尔概念之网中的哲理空談家的頑固不化的自負。

从哲学—純文学的社会主义內在的不明确性，可以知道它决不是一个統一的整体，可是經過几年的時間，它在德国有很大的发展。它的精神上的最主要的代表者是莫澤斯·赫斯，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就轉向社会主义，可是他从来没有，或者最多只是半心半意地同哲学決裂。他在馬克思之先被人斷言是一个在細致分解概念中得到充分的自我滿足的煩瑣哲学家。当然他也不是这种人，因为他的有点狭隘和呆板，刁钻多于敏锐的头脑决不可能使他錯到这种程度，以致他那正直的良心不再使他不斷回到劳动阶级真正利益所在的地方。赫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貢献出漫长而艰苦的一生，到了晚年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战斗。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同他年轻时期曾想指出的道路完全不同。赫斯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寄居在布鲁塞尔这一时期交往甚密，并且在一起工作；他曾試圖树立他們两个人的世界观，他认为馬克思是一个卓越的人物^②，甘拜下風。但是他始終沒有擺脫那种又引起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8—659頁。

② 莫澤斯·赫斯在1841年9月2日写給貝托爾特·奧爾巴赫的信中明确地表明了这种态度，信中說："你一定高兴，在这里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現在也是我們的朋友……虽然我正在同一个領域內活動，但是这个人的出現給我一种敬佩的感觉；总之，你可以准备认识这位偉大的、也許是現在活着的唯一的真正的哲學家，不久当他公开发表文章，或出現在讲台上的时候，就会受到所有德国人

新的摩擦和不和的唯心主义的残余。

奥托·吕宁与其說是一个哲学家，还不如說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在他編的《威斯特伐里亞汽船》中，大概是追求路易·勃朗的桂冠，所以他很少攻击自由主义反对派，但是当然也跟他的法国榜样一样，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越尖銳化，他就越无可奈何地倒向资产阶级一边。这种社会主义的純文学方面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卡尔·格律恩。他是一个應該从令人不快的意义上了解的純粹的文人，他的文章毫不深刻，甚至也不严肃，喜欢吹毛求疵，而又肤淺表面，偶尔写出几个有才气的句子，与其說是掩盖，还不如說是揭露了一种庸俗性。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有理由把他看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中最不可容忍的一个人，特別是他在1844年到了巴黎，在那里写了《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格律恩在这本书里指責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些脑筋混乱的人，而同时却热情地——可惜也沒有得到任何成果——力图用灌輸被他誤解的黑格尔学說的办法，把才华焕发的蒲魯东变成一个无聊的学究。

哲学—純文学的社会主义虽然表現得非常模糊，可是它并不像杜門不出的书呆子的空想那样是种毫无內容的东西。在它身上反映出来的是德国庸人对威胁着他們的昏沉沉的生活的阶级斗争阴影的恐惧。“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向这种庸人灌輸一种甜蜜的感觉，仿佛自己站在人类至今尚未达到的頂点，像一个新的救世主

的注目……我所崇拜的这个人叫馬克思博士，他的年紀还很輕（最多大概只有二十四岁），他将給中世紀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把哲学的最大的严銳性同最尖銳的諤謠联系起来；你可以設想是卢騷、伏尔泰、霍尔巴赫、萊辛、海涅和黑格尔集于一人之身；我是說集，而不是說混合——这就是馬克思博士。”（卡尔·格律恩貝克編《社会主义史档案》第10年度，萊比錫1922年版第412頁。——原編者

在革命的海洋上行走，連鞋底也不湿。从这里就可以說明，哲学—純文学的社会主义在三月革命以前为什么能像瘟疫似的傳播，而在三月革命以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 麦克斯·施蒂納

法兰克尼亚人卡斯巴尔·施米特企图用不同于赫斯和格律恩的方法，把黑格尔的絕對理念、鮑威尔的自我意識、費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蒲魯东的无政府主义推入有形的現實之中。他是柏林“自由人”团体的一个成員，这个团体所有的卖弄才气、大言不慚和严重的庸俗气等缺点，他都有很大的一份。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哲学家，一个革命者，因此他懂得为自己爭取历史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說，甚至能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并列。他用麦克斯·施蒂納的笔名发表的关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哲学研究，从一个方面标出唯心主义哲学的界限，而不久以后出版的《神圣家族》則从另一个方面标出了这个界限。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本书同《神圣家族》一样，也是同鮑威尔兄弟的《文学总汇报》論戰的。

一个哲学教授只把这本书看做是对費尔巴哈的諷刺，这是不公平的。施蒂納想用自己的方式十分严肃地把費尔巴哈的悬在空中的人拉到地面上来。不过，他能够使它存在的唯一者不是这个人，而是吃不飽飯的教師卡斯巴尔·施米特在三月革命前的柏林所認識的最进步的一种人。这就是有財产，即有資本的資产者，他的資本不願再受专制政权的爱撫，而已經强大到能够在无限制的竞争中，在单纯享受生存中独立生活。施蒂納是一个哲学家和革命者，他感到这种粪土和火的可笑产物同他关于人的哲学理想存在尖銳的矛盾，由于这种感觉，产生了那种絕望心情，以致使人怀

疑他这本书只是智慧和才气的一种娱乐。

但是，施蒂納不能使它生存的是他的哲学理想，是这人，是至高无上的我，我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性，解脱了良心、权利、习惯、法律、家庭、社会、国家加在它身上的一切束缚。这个我同费尔巴哈的人一样，也是一个抽象概念。由于它想证明自己的现实性，就更加明显地成为一个抽象概念。人是一个社会的生物；作为人，他只能在人的社会中生活，并通过这个社会生活；作为孤独的我，人就变成动物。施蒂纳当然也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企图通过他的“利己主义者联盟”同这个不容置辩的事实妥协，每个我的私利一有这种要求，每个我就参加这种自由的团体，这种要求存在一天，每个我也就在这种团体中待一天。可是这些联盟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每个要想这样行动的联盟的前提条件是，各成员必须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牺牲个人的利益。在一个联盟中，我就不再是唯一者了。

施蒂纳在他的体系中彻底清除了资产阶级和基督教的伪善，这种伪善善于歌颂和赞扬统治阶级的不怕牺牲的美德，以及它们对于被统治阶级的热爱和深情。恐怕还没有另一个人像施蒂纳这样对这种谬论进行了嘲讽。他对统治阶级说：“我不向你们要求任何东西，因为，不管我要求什么，你们都将是，而且必然是专横的立法者，因为乌鸦不会唱歌，强盗不抢劫就不能生活。”他嘲笑关于富人的“千年错误”在于穷人的谎言。富人的行动是他们的必然的行动，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是傻瓜。犯了真正的错误的是穷人。“只有你愿意承认是别人的财产的那个东西，才是别人的合法的正当的财产。一旦你不愿意承认，那末它对你来说就失去了合法性，而你就嘲笑对它的绝对所有权……当别人抢夺我们的东西时，为什么要归罪于他们呢，因为这是我们自取其咎，我们让别人没有

受到搶劫。富人的存在應該由穷人負責……蒲魯东可以不必那样慷慨激昂了。他說：有一些东西只归少数人所有，从現在起我們这些其余的人要想索取或追求这些东西。讓我們夺取这些东西吧，通过夺取，就变成財產，現在我們还被剥夺的財產也只有通过夺取才能到所有者手里来。財產在我們大家手里比在少数人手里更为有用。因此，讓我們为了这个搶夺的目的联合起来。”但是这种聯合馬上取消了唯一者的特性；每次罢工表明，个人利益多么迅速地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施蒂納用他的方式鼓吹階級斗争，但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論，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这个斗争中不过是工贼和他的罪恶报酬。

由于施蒂納想把哲学的人的模糊形态变成有血有肉的人，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这个模糊形态变为虛无飄渺的东西。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完全相反，他們自动地放棄了一切模糊形态，在唯一能够找到真正的人的地方，即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寻找真正的人。他們不是在哲学中，而是在經濟学中寻找真正的人。

但是思想的历史只反映現實的历史。在西欧，无产阶级的階級斗争已經开始，而在东德，資本主义的竞争才开始。前者影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后者則影响施蒂納的观点。誰也沒有資产阶级的思想家卢格这样迅速而尖銳地認識到这一点。卢格馬上就称頗施蒂納是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解毒剂。他三番五次地称施蒂納的著作是一种“解放行动”。他写道：“我們必須支持和宣揚这本书。它是从一切蠱貨中的最愚蠢的东西，即手工业者的社会教义学这种新基督教中的一种解放，这种新基督教是那些愚人所傳布的，实现这种基督教就是过卑賤的牛馬一样的生活。”当然施蒂納书中所散发出来的革命气息也刺着庸人卢格的鼻子，可是他善于給自己想办法。他說，施蒂納当然从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接受

了一件“蠢事”，那就是他“想从现实世界中走出去”。“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愚蠢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是正确的”，或者像卢格用不同的词句表达同一思想时说：“施蒂纳著作里的公开的利己主义是真实的，作为秘教的利己主义（如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是伪善的”，这些话用真正的资本家德语来说就是：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愚蠢，对资产阶级来说是真理；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利己主义，对无产阶级来说是放逐。但是卢格并没有因为外壳而忘记了内核；对他来说，施蒂纳著作的核心就是这句有力的话：“依靠你自己吧；依靠别人的人就已经是够孤独的了。”二十年后，那些“仅仅是自由贸易者”企图用来欺骗复兴的工人运动的也就是这种催眠曲。

其实，卢格为了从粗糙的外壳中取出甜果，马上就用尖锐的阶级本能认识到这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不願离开现实世界的这个决定，以及我們不用追求最好的世界了，因为我們已經有了这个世界这一率直的認識就足以把施蒂纳对現存一切的革命变革变成自由貿易的简单福音了。撇开关于关税税率的爭論不談，这个福音的漂亮原則过去已經由一个侨居德国的英国人勇敢的約翰·普林斯一史密斯宣布过，他用狭隘頑固的方式证明，对于“通过宪法承认金錢的实际力量”这一点來說，普魯士已經成熟过度了。对德国的思想意識來說，这是一块不好消化的点心，尤利烏斯·法赫尔首先作为一个虔誠的学生，坐到施蒂纳脚边，为了向他学习一些动人的詞句，以便把一般的买卖修飾成人类的千年王国。德国自由貿易者的年轻学派完全为了甜蜜蜜的买卖，在它的第一个机关报《柏林晚邮报》上，参照施蒂纳的理論，宣扬廢除道德和国家。

此外，施蒂纳的著作在德国生活中沒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它不可能成为哲学派別，因为它正是用言語和行动宣布哲学的破产的，作为无政府主义的愉快的使者，几十年后它才受到外国的注

意，并不是因为施蒂納从某种学派的意义上說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想做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因为他用德国教师的荒誕的彻底性和曾經就学于黑格尔的一个邏輯学家的一貫性描述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状况。

五 洛貝爾圖斯的国家社会主义

德国的自由貿易者是些營利心切的活跃人物。他們的实际目标是：打破对资本主义竞争的一切限制，他們的口号是：听之任之，因为世界自发地行走。他們說，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时候，占有欲都以同样的方式支配人类；对最大可能的利益的追求自发地引起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和諧。他們依靠英國的自由貿易学派，法赫爾后来也当了科布頓的秘书；他們从古典經濟学中只拿他們所需要的东西，这点东西是够少的；几个概念和名詞，他們割断了它們的联系，为了自己的事业的目的加以修改。

作为資本主义的散兵，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同还没有能够放棄封建一行会主权的三月革命前的各政府存在尖銳的矛盾。他們沒有到大学里教課，因为他們可以找到获利多得多的工作，所以也不追求学术界的荣誉。人們就更有理由期待时刻都把亞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挂在嘴上（虽然只是在小市民的角落里）的国民經濟学的特权代表来駁斥資本主义自由貿易者的胡乱的引证了。可是这些代表沒有这样做，或者是用非常特殊的方式做的。学者的智慧对自由貿易的热情說：你引证古典經濟学也沒有什么不可以，不过古典經濟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經誤入歧途了。40年代，在德国大学中产生了国民經濟的“历史方法”，这盏灯不久就开始大放光明。

假如信仰这种方法的人企图证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不是万无一失的金言，而是历史地产生的，因此虽然在历史上得到承认，但在历史上也是暂时的学說，那么他們就走上了真正进步的道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論述的那些东西，用黑格尔的話來說，就是他們在思想中把握的、当时的生产方式。他們是手工业工場时期，也許是大工业萌芽时期的理論家。如果說，他們在他們那个时代越是清楚地环顾四周，却越不能超过他們的时代，如果說，他們把当时的經濟状况看做永久的自然規律的現實化，这些永久的自然規律經過一个长时期的充满錯誤的过程，終于取得了巩固的地位，現在决不会再受到任何威胁了，那么这就是他們特殊的历史局限性，是他們照在国民經濟規律上的灯光的阴影。如果讲授他們的学說的德国教师不想只做他們的盲从者和追随者，而想独立地發揮他們的学說，那么消除这种历史的局限性就是他們的責任，在这一方面，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已經做出了大有发展前途的开端。

但是德国的教授們却不是这样来理解他們的“历史方法”。德国的經濟矛盾越是尖銳化，他們的怯懦的心就越不敢从安靜的課堂投入激烈的斗争中去。正因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說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真正的历史产物，所以这些学說对封建的世界观进行最后的冲击，并且已經包含着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最初的預感。有浪漫主义气息的君主們的忠实奴才对于他們两人的学說都同样厌恶。因此，这些忠誠的爱国者对于激进的自由贸易者把古典经济学的学說磨成几个抽象的、干癟的概念，从而更加显出他們的“历史方法”的丰富和光采这件事感到十分高兴。这种方法无非是一种非历史的企图，也就是想迴避历史发展的結果，再好也不过是想調和不可調和的东西。在“历史主义”的幌子下，在德国还占有很大一块地盘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可以一会儿在资本主义的，一会

儿在社会主义的論證面前受到保护，或者在一大堆历史材料后面，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会儿頻送秋波，一会儿怒目橫视。

这一派的首領是哥丁根的威廉·罗雪尔。他以正确的感覺把他的方法叫做法的历史学派企图用来使历史車輪后退的那种方法的模仿。他放棄了对現代生产過程的批判性研究，也沒有清楚明白地叙述这种研究的成果；他却拿一切民族和所有时代作比較，以便从大量的历史現象中找出有規律的和基本的东西。他不想揭示，而是想抹煞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他不探索英法两国状况的有示范意義的发展，而“特別”研究古代民族，他从“它們的发展也完全結束了”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得出可疑的結論說，凡是古代国民經濟同現代国民經濟相似的地方，古代国民經濟都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判断“线索”。罗雪尔用这种絕妙的方法当了差不多半个世紀的“国民經濟学的大师”，幸运地用一种不置可否的模糊态度談論所有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急于求得一个明确的答案的經濟学問題。可是，他也是一个学識淵博的人，对于資产阶级古典經濟学的代表者的某种尊敬使他沒有完全把他們当作“死狗”看待，而这种情况在他那些学識比他差得多，良心比他坏得多的模仿者之中，很快就成为一种風氣。“历史方法”蛻化成为一种完全沒有原則的机会策略，它善于把一切封建一行会殘余都打扮成一种历史的裝飾品，甚至在它比所謂划时代的发现更好的成果中，也只是重复亞当·斯密和李嘉图决沒有忽略而是特別強調的东西。

在 40 年代中，只有一个德国学者，他不屬於盖过官印的学派，他固守着古典經濟学的高地，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古典經濟学。卡尔·洛貝爾图斯出身于学者阶层。他的父亲是格賴夫斯瓦耳特大学的法学教授，他的外祖父是 18 世紀的著名的重农主义

者，曾以实际行动支持巴登的边疆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按照重农主义的原则建立产区，后来在巴塞尔和吉森教书，最后在梅克伦堡他妻子带来的一个骑士庄园上作为农場主結束了他的晚年。卡尔·洛貝爾圖斯的精神发展不是直接淵源于这位在他出生以前已經去世的外祖父，可是继承下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同大农場主的實際經驗和經濟独立性的結合对于洛貝爾圖斯的天賦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洛貝爾圖斯在德国大学里受了当时的法学和哲学的教育，然后当过普魯士政府的低級官吏，在布列斯劳和奥佩恩的西里西亚行政区政府認識到社会問題的重要性，在辞去国家职务以后，到英国和法国作长途旅行，然后又在海德尔堡和德累斯顿研究历史和經濟学，最后这个三十岁的人得到了前波美拉尼亚的雅盖左夫骑士庄园，在那里他可以悠闲地为自己的喜好生活，不管外界是否賞識，当然也同外界的生活和活动隔离开来。

1839年，洛貝爾圖斯本想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他第一篇論述劳动阶级的要求的論文，可是这个教授報紙就认为它是不合时宜的幻想退了回去。这篇論文就已經表明洛貝爾圖斯达到了当时还没有其他德国学者达到的經濟学的認識水平。三十多年后，当洛貝爾圖斯出版他那些陈旧著作时，他可以說，那些著作已經包含了他的整个体系，他越来越相信这个体系的正确性。这是一种有点含混的自我贊揚，因为它也可以說明，事实上也只說明，洛貝爾圖斯基本上停留在他1840年左右所达到的高度上。虽然如此，他仍然远远超过德国官方和资产阶级方面作为經濟学說創造出来的东西。正如他在40年代超过罗雪尔和李斯特那样，他在50年代和60年代用亮光闪闪的宝劍砍杀自由貿易的行商，而在70年代批評讲坛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不彻底的东西，当他快要死的时候，他还預言(在这一方面当然也表現为一个社会預言家)，

俾斯麦将在对俄国的远征上寻求社会問題上的荣誉。在这个范围内，洛贝尔图斯可以說是德国最偉大的国民經濟学家，拉薩尔有一次曾这样称呼过他。

洛贝尔图斯决不甘心退到古典經濟学后面。他用一种真正历史的原则同德国大学經濟学家的“历史方法”抗衡，他說：“社会的反动（一般的反动也一样），在我看来就是那种过去存在过，但已經消灭了的制度，可是它在将来还要恢复，而它的存在条件同这个未来时期的历史生活阶段并不吻合。”洛贝尔图斯始終贊成移居自由和营业自由，他嘲笑恢复行会的企图是“海市蜃樓，是幻象，是錯觉”；他反对保护关税制度，认为自由貿易是亚当·斯密体系的較好部分；他譴責那些为了爭取无产阶级的支持以实现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扔給工人一口面包的反动“政治家”；他指出，对老人、殘廢、病人的社会保險并不接触工人問題的核心；他嘲笑企图利用警察和大炮，利用道德說教，甚至單純的学校教育压制劳动阶级的正当要求。正如他一开始所說，对他來說来，沒有后退，只有前进，因为社会已經破釜沉舟了。

因此，洛贝尔图斯企图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論中得出社会主义的結論。他在第一篇論文中已經这样做过，后来在 1842 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对于我們的国家經濟状态的認識》中，又以相同的精神，不过更为詳細地这样做了。对于德国說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不过仅仅对于德国而言是这样。因为洛贝尔图斯所說的話，在英国和法国早就有人一点不差地說过了，即使不比他說得好，也不比他說得差。洛贝尔图斯清楚地知道，到 1840 年为止在这两个国家中关于政治經濟学和社会主义发表了哪些論著。他說，誰不知道論述 1818 年（当时还没有人想到拉薩尔和馬克思）以来的社会問題的文献，誰就不知道文献中的最好的东西。而在国际工人协会

成立八年，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五年以后，他竟能作出这一惊人的判断，即无论在科学上，或是在工人集会上，社会問題的討論都沒有达到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水平。

洛貝爾圖斯究竟直接从英法两国的文献中汲取了多少东西，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这些文献的鼓舞独立地从李嘉图的学說中得出自己的結論，今天很难詳細斷定，因为他本人在引用別人的文章方面并不斤斤計較，却怀着猜疑的心情警惕着自己所謂的或者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創立权不受第三者侵犯。他甚至指責他周圍那些人，这些人同馬克思一样在一切主要問題上同他的見解完全相反。不过对这个問題感到更大兴趣的是洛貝爾圖斯傳記的作者，而不是社会主义史的作者。后者只要知道这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說，不管社会主义者洛貝爾圖斯的学說是怎样来的，来自何处，反正他所說的那些話，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都說过了，而且說的不比他差或者比他还好，有一点例外，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无论同西欧大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或者同西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相比較，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都不是一个进步，而是大大的退步。

洛貝爾圖斯在其最早的著作中比較起来引用最多的是西斯蒙第的文章。他虽然沒有在第一篇論文中就明确地称西斯蒙第是一位“不仅著名，而且有一种人道精神的經濟学家”，但是他已經以西斯蒙第的学說为依据，为的是論证通常同李嘉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規律，根据这条規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为了維持劳动力、为撫育孩子以代替自己所需要的工資不过是他必需的生活費用。但是西斯蒙第恰恰同李嘉图相反，他贊成产生商业危机的原因是劳动阶级消費太少这种說法，而这种說法也就是洛貝爾圖斯理論的基本思想，同这种基本思想相比（为了說明和論证，用他自

自己的話來說), 其余的一切只不过是附屬品。可是我們也不能由此馬上得出結論說, 洛貝爾圖斯的基本思想(他自己认为这种基本思想是前所未有的), 是从西斯蒙第那里拿来的。早在西斯蒙第以前, 欧文对商业危机的解釋就与此类似。虽然在洛貝爾圖斯的第一篇論文中, 甚至沒有隐隐約約地提一提欧文, 但是在那裡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欧文思想的痕迹。

洛貝爾圖斯在他的第一篇論文中用如下的話叙述了每个人通过它可以最可靠地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社会組織: “……相反地, 廢除生利的財产(給不劳动的所有者带来利息的东西), 只会更加巩固地建立对产品的所有权。土地和資本成为社会的公共財富, 但是利用这些劳动工具在資本再生产以后产生的东西則归工人所有, 以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的原則分配。这种状况就接受了这个正当的原則, 即劳动不仅是构成財产的要素, 也是分配財产的准绳。这种状况同圣西門主义的制度有共同之点, 即生利的財产是不存在的, 但是在这方面同它也有很大的不同, 即这种状况把追溯到那种天然尺度的財产看做一种法律状态的主要部分, 在那里由上层分子任意决定的东西, 在这里从个人自己的权利中得到它的根据和尺度。如果人們在李嘉圖学派的进步中探索經濟原則——劳动, 如果人們同意李嘉圖的实际价值的計算(根据这个計算, 实际价值, 甚至由固定資本轉为产品的部分都化成劳动时间), 如果人們再进一步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 工人的所有权要求的根据也只是使用的劳动时间; 因而就有了一个既可以衡量权利, 又可以衡量相对的物品数量的尺度; 如果人們終于再前进一步, 在这个权利和物品价值的共同尺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貨币, 这种貨币具有这种性质, 并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 它用劳动时间的公正形式給工人证明, 他在一定時間内交出了供流通的产品, 因而它也是他可以

取得其他任何产品的票据；如果人們考慮到，沒有一种貨币比这种貨币提供更大的保证，这种貨币經常可以換到同等价值的东西——如果人們彻底研究了這些問題，那么就必须承认，这样一种状况并不含有任何不可能或不利于生产的成分。”洛貝爾圖斯在这些冗长的句子中所叙述的，无非是歐文的社会主义的特殊的空想。这个事实是不可动摇的，无论洛貝爾圖斯把这种思想說成好像是由他想出来的（在这件事情上他可能是自己欺騙自己），或者他在二三十年后斷言，他在写第一篇論文时不知道歐文已經在30年代就做了实现他的空想的实际試驗，而且归于失败。

歐文的空想就是洛貝爾圖斯的理想，他不仅卓越地叙述了土地和生产資料的公有制怎样成为可能，而且也說明这对人类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进步。可是对他來說，这只是一个空虛的理想。他认为人类要“从土地和資本的私有制中解放出来”，进入“应許之地以前大概还要在荒漠中走五百年”。洛貝爾圖斯作出了这个規定，可是他从沒有說明需要这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的經濟原因，或一般的具体的理由。他在第一篇論文中有一处說，現在距离实现这个理想的时间还远，不必在这方面詳細論述，另一处又說，人們普遍希望工人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損害土地和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后来他大概說过，人类再过五百年也还不能摆脱生利的財产对劳动的压制。这一切以及与此相似的一切，从最好的方面來說，也不过是一种真正的、但是沒有任何客观根据的信念的流露。

可是洛貝爾圖斯找到了一条出路，使得达到公有制的五百年預備阶段成为可以忍受的。为了彻底貫彻亞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一切物品从經濟上說只是劳动的产品，其价值就是劳动，他想創立一种歐文式的紙的“劳动貨币”，但是其目的并不是保证每个人得到他的劳动成果，或者减少地租和資本的利潤，或者只是阻止它

們的增长，而是抱着一个小得无法比較的意图，即利用这种“劳动貨币”，使国家能在劳动生产力增长的时候，按照工資对地租和利潤的相应比例增加工資。比如，到目前为止，从劳动所創造的全部产品中，地租分到三分之一，利潤分到三分之一，最后只有三分之一归工資，将来也要保持这个比例，劳动創造的成果增加了，工資也同地租和利潤各得三分之一。同欧文、甚至同格雷以及后来的蒲魯东所主張的“劳动貨币”的空想所不同的是，它的手段和目的更不完善，如果不可能性是有程度的話，那就是更不可能。至于国家怎样执行交給它的这个困难任务，洛貝爾圖斯始終只是含含混混地提了提一种标准劳动日，指了指他口袋里的万无一失的处方，而在他生前或死后都沒有把这个处方公諸于世。而且即使实现了这个空想也不能达到洛貝爾圖斯要想达到的目的。劳动阶级的消費量低在商业危机中也起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它不是大工业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灾难的原因，下述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即阶级統治存在一天，被剝削阶级都遭受到这种苦难。

产生上述思想缺陷的原因是，空想主义者、德国哲学家和普魯士大地主的洛貝爾圖斯擋住了曾經用社会主义思想补充古典經濟学、而有了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的社会研究者洛貝爾圖斯的去路。

同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洛貝爾圖斯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无所知。他不想給劳动阶级的旗帜題字。他真正同情劳动阶级，但也真正害怕劳动阶级。他正确地譴責了德国資产阶级报纸对巴黎公社的愚蠢的咒罵；他能够咀咒和怒斥到处为工人治病的“基督教道德”，他强烈地感到，无产者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开始超过有产阶级。不过工人阶级的任何独立活动，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对統治者敲了一下警钟。他虽然不是用一句咒罵語，也是用現代

文明在自己內部孵化出來的野蠻人的一句流行語不得已承认了巴黎公社，王党分子馬累·杜·龐在法国大革命中首先創造了这句套語，从此以后就成了封建的社会主义的蒙上灰尘的滯貨。洛貝爾图斯甚至为自己在修訂第一篇論文时，发现自己曾用同一句套語否定了30年代的宪章运动感到自豪。他甚至对于无产阶级采取完全合法形式的阶级斗争也毫无了解。他預言，一百年后工人的結社自由将被宣布为一种瘋狂行为。不管他怎样严厉地指責反对工人阶级的卡尔斯巴德決議，可是他对于用警察棍对付“荒謬的罢工”也沒有感到不快。有几次，他直接面向工人，或者想直接面向工人，警告他們不要进行政治斗争，劝他們同統治阶级进行和平談判。

“劳动貨币”的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指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他們站在現代资产阶级的活动之中；他們用或多或少的推理（虽然都同样失敗）寻求实现自己的空想的社会制度，他們想用经济学的方法解决經濟問題。而德国哲学家和普魯士騎士庄园的主人洛貝爾图斯則更加求助于国家。

德国哲学对洛貝爾图斯有很大影响。他了解德国哲学的从費希特的閉关自守的商业国到施塔尔的法哲学的国家形态；他甚至十分奇怪地斷言，他在所有这些著作中，从古典哲学的这种不正常的后产中学到的东西最多。真是一种罕見的，或者也不是罕見的方式！洛貝爾图斯自己承认这一点，他用以下的話描述施塔尔的方法說，施塔尔的社会思想淵源于中世紀的状况，把这种思想賦与全权的君王，然后又借回几道神圣的光輝，以便用来給一个新的君主立宪国以一种假象。在另一个地方，他从他那个角度反对施塔尔科学應該折回的要求，他說，應該把社会科学从它的个人主义的理解上引回来，这是对的，但是社会科学不能在自己制造的荒野中

折回，而應該穿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世紀都不能还元。尽管如此，为什么洛貝爾圖斯恰恰被施塔尔的著作所吸引，并且令人遺憾地好像从他那里学了許多东西呢，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就其历史本質來說，是以階級对立为基础的，它組織并且掩盖一个階級对另一个階級的統治，所以无条件的国家崇拜就有一种专橫而神秘的特征，被統治階級的日益增长的文憤越是威胁着他們的幻想，这种特征就在它的无条件的信奉者身上更加强烈地表現出来。洛貝爾圖斯就是这种情况。他越觉得革命的工人运动可怕，他就越把国家奉为神圣或者把它偶像化。

这一半是名称和数字的一种神秘游戏，一半也是真正的宗教崇拜。洛貝爾圖斯硬把人类历史塞在各种国家制度的框子里：以人为财产的古代—異教的国家制度、以上地和資本为财产的天主教—日耳曼国家制度、以劳动为财产的基督教—社会的国家制度。他把这些国家制度中的每一种又分为許多种国家，比如把天主教—日耳曼的国家制度分为教会国家、等級議会国家、官僚制度国家和代議制国家。我們現在在最后一种天主教—日耳曼国家制度中生活，在它后面随之而来的是带有明显的宗教特征的第一种基督教—社会的国家制度。洛貝爾圖斯坚决地把代議制国家放在等級議会国家之上，尽管他认为代議制国家是很不完善的；他在40年代和50年代加入民主—自由主义反对派，反对带有基督教色彩的等級議会国家，拥护施塔尔。他也是一个头脑清楚而冷靜的人，生来就不喜欢任何伪善；在社会問題上他“忌恨穿黑衣裳的人”^①，他在參觀國內布道会的“陋室”时，在教士的图书室里发现各种“基督教观点”的地理、历史和自然史的小册子，这时他几乎

① 指教士。——譯者

要提出一个恶毒的問題，这些教士是否也“根据基督教观点”做算术。可是，他的“未来的国家”为什么恰恰是以劳动为财产的基督教—社会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的第一种形式甚至还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质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洛贝尔图斯給世界历史的进程規定的式样就是这样要求的。第一种天主教—日耳曼国家制度是中世紀的教会国家。所以第一种古代—異教的国家制度也必須是一个教会国家。为了这个目的，他把曾經构成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共团体的埃及国家的末期的一种神权政治放在它的开头。但是，如果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这种修改沒有使他感到不安，那么为了类似，“未来的国家”也随着宗教原則的复兴而被建立起来这一預言就更不会使他不安了。国家崇拜使这个无疑有丰富的历史知識的人陷入何等严重的图式主义，的确是令人惊異的。对于今天的国家虽然只属于一类、可是却有很大的差異这一事实，洛贝尔图斯用人当然有一种“变换花样的自由”来自圓其說。人是否想用一点或多或少的“立宪政体”裝璜一下代議制国家，由他自己决定。但是除此而外，人必須“服从在历史中占統治地位的神”并且必須服服貼貼地像洛贝尔图斯根据神的意旨給他規定的那样，改变国家制度及其特殊种类。为了在这一点上更好地证明自己正确，洛贝尔图斯发现了一条三位一体的規律，他不倦地不仅通过人类生活的一切阶段而且也通过神的生活的一切阶段深入探討这一規律——用的是一种可靠的方法，即始終以他想找到的东西作为前提。

普魯士騎士庄园主的洛贝尔图斯比德国哲学家的洛贝尔图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把握实际得多。我們这样說并不带有任何貶意。洛贝尔图斯的性格單純，甚至他的怪論都有一种吸引力，使人感到亲切，他完全是一个紳士，社会民主工人大会的友好的問候

使他“深为感动”，比他可爱的国家授給他的职位和头銜更使他感动。但是他那四十年易北河东大地主的生活并不是毫无罪过地度过的。洛貝爾圖斯的社会阶级立場在他第一批最有朝气的著作中已經不自觉地表現出来。他的空想狭隘而溫和，他不相信工人阶级已經成熟，他奇妙地推測任何无产阶级都要再熬过五百年，尽管每天有人写文章給无产阶级证明，它所使用的大部分劳动力被游手好閑的阶级剝削去了。在一个有才能的、多方面有教养的社会政治家身上，这一切只能用下述事实解釋，即洛貝爾圖斯从实际經驗中只認識德国还不发展的无产阶级中的一个也許是最不发达的阶层，即波美拉尼亚的农村无产阶级。

德国的工业越发展，从而資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越发展，认为无论資产阶级胜利或是无产阶级胜利都只能带来禍害的洛貝爾圖斯就越是想到，必須巩固和支持在这里已經被資本的巨爪抓住，在那里已經被叛乱的劳动挖了墙脚的資产阶级社会中的第三大阶级，地主阶级，以便保持目前不可缺少的阶级国家的平衡。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洛貝爾圖斯在毅然用自己的方式拥护“劳动阶级的要求”以后正好三十年，向他同阶级的人呼吁：讓我們集合到我們的租息的周围吧！他要求国家帮助乡村容克解除债务比要求国家帮助德国工人解决饥饿問題更为迫切。他这样做不是出于不道德的阶级道德，因为他明确地說，社会問題是反对租息原則的怪物，是由这个怪物提出的、地主阶级的新負債形式。他所以这样做，还不如說是出于一种世界观的必然結果，当然归根到底这种世界观是由他的阶级意識决定的。

洛貝爾圖斯的第一部著作的命运比他的第一篇論文强一些，他至少可以在梅克倫堡的一家小出版社里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可是人們根本不知道他这部著作，因此它在40年代的精神活

动或社会活动中沒有留下明显的印象。只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洛貝爾圖斯的影子才落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說，是他的影子的影子。因为实际上他死后才被人出于最暧昧的动机，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奉为正統的教皇，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这个大異教徒。他的崇拜者在他有所作为的地方把他贬低为一个不成熟的空想家，而在他毫无作为的地方却把他尊为划时代的天才。

他得到了一个較好的命运，因为在一切基本問題上，他始終忠于自己。不了解老年时代的洛貝爾圖斯就不能了解青年时代的洛貝爾圖斯 同样，不了解青年时代的洛貝爾圖斯也不能了解老年时代的洛貝爾圖斯。因此在三月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描繪一下他的形象是适宜的，在这个时代里描繪这个形象的一些线条随着岁月的消逝只会更加明显，更加深刻。

六 社会主义的抒情詩

在 40 年代德国社会主义分出的支流中，社会主义詩歌并非最薄弱的一环。文学中仍然存在着德国資产阶级古典时代的有力的傳統。无产阶级的痛苦呼声在其中得到强烈的反应。东德較弱，西德較强，在流亡的德国詩人中最強，正如一个德国詩人所吟咏的，“他們的詩歌之劍驅使他們走向西方”。

卡尔·倍克、迈斯納和雷瑞的詩首先是充满阴郁的怨恨，同时对解放也抱着一种不肯定的希望。倍克在《穷人之歌》中，憤激地控訴了国王之王的路特希尔德家族，并用自由人的法庭来威胁奴隶主。迈斯納看到一群面色蒼白的儿童，那里高大的烟囱在冒烟，铁輪按着沉重的节拍在熾热的空气中震动；他对着那把天国許給

儿童的救世主表示愤慨。雷瑙怀着热烈的期望和沒有偿报的痛苦,比他們更深刻地感到黎明时的死亡。他比他們更确实地感到,他站在新时代的門口,像从前他的《阿耳比派》^①的教徒那样。他給这些教徒对自由的模糊預感披上了美丽的“幻想”,由于这种幻想具有真正哲学的真实性,馬克思在科学的太阳在他最偉大的著作中放射光芒时,让这美丽的幻想再度歌唱起来,

“无论你用紫衣或是黑袍,
都不能击散太阳的光輝,
也不能遮住太阳,不让它露面;
胡斯信徒跟在阿耳比派的后面,
报复了后者的血仇,
随着胡斯、西斯卡来了路德、胡登,
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的战士,
巴士底獄的攻打者和其他的人們。”

亨利希·海涅的音調是多么与众不同啊! 馬克思侨居巴黎期间,海涅經常同他来往,正是在这个时期,1844年,海涅出版了不朽的《冬天的童話》,在他三年前出版的《阿塔·特洛尔》中还有浪漫主义的逃遁的阴影从它上面掠过,而照进《冬天的童話》中的乃是社会主义的不斷涌现的光輝。在海涅的头脑中从来就有三种世界观的思想交織着;这种在一切尖銳矛盾中,仍然发出和諧的声音的色彩和形式的奇妙演奏,正表現出在他那个时代其他詩人所不具备的天才。海涅沒有完全忘記浪漫主义的藍花,也沒有完全克

① 13世紀初叶法兰西南部的一个教派,因以阿耳比城为中心,故名“阿耳比派”。它代表被压迫阶级的要求,在宗教形式下隱藏着对于現存社会制度的抗議,因而受到以教皇为首的反动势力的殘酷鎮压。——譯者

服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可是《冬天的童話》是他創作的詩歌中最自由的詩歌；它的諷刺尖銳有力，它的悲愴的情調是真实的。它是为了让一个新世界的不死鳥^①从灰烬中复活而燒毀腐朽世界的歌之火焰。它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一再鳴响，它是严肃而自负的具有胜利信心的詩歌：

“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我要为你們創作，
我們要在地上
建筑起天国。

我們要在地上幸福生活，
我們再也不願挨餓；
懶虫們不应消耗
双手辛勤的得获。

为着一切的人們，
这地上有足夠的面包产生。
玫瑰花呀，桃金娘呀，美呀，乐呀，
甜豌豆呀，也同样孳生。

是的，豆莢一开裂，
甜豌豆就是万人的！
我們把天国交给
天使和麻雀。”

即使沒有卢格的明确的证明，海涅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詩就已

① 古埃及的神鳥，相傳此鳥活五百年后集香木而自焚为灰，由灰复生，再活五百年再自焚为灰，如是生死，循环不息。——譯者

經表明，馬克思对他的影响多么巨大。他們兩人时常不倦地推敲一首不多几行的小詩中的每一詞句，直到滿意为止。但是海涅对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深刻的影响；他們在 40 年代后半期所写的論文中常常引用海涅的詩。激进的小資产阶级分子白尔尼所沒有做到的，今天的激进的庸人更不能做到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却同今天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一样立即做到了：他們了解海涅的偉大，因此也了解他的弱点。馬克思对海涅的弱点非常寬容，他认为，詩人是特殊人物，應該讓他們走自己的路，不可以用平常人或不平常人的尺度衡量他們，馬克思这样想并不比白尔尼不道德。他的想法更偉大而且——如果人們想把問題扯到道德范圍里來的話——也更道德，因为他从历史上了解，为什么海涅不会是別的样子，只能是他現在的样子，因为在在他看來，海涅一生的社会活动是爭取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的一件偉大事業，而海涅个人的缺点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要是那些午后的說教者认为不道德而生气，那也很好。相反地，由于同卢格的狹隘的資产阶级观点严格划清了界限，卢格的資产阶级威望任何时候也沒有使他迷惑。

海尔維格企图近似海涅那样飞翔，可是他所做到的仅仅是强烈的、憤懣的嘲諷，而不是解放世界的幽默和詼諧。他的弦乐是，而且永远是破碎的。比較起来，他从前的对头弗萊里格拉特的社会主义詩歌却得到更大的发展，于是弗萊里格拉特双倍得到了由于諷刺海尔維格的凱旋旅行而失去的旧日的荣誉。奴役他所热爱的德国的可耻的专制政权在紅色大地的詩人身上喚起薩克森人的古老的反抗精神：他从異国的飞翔归来，奔往祖国的心臟，变成了另一个人但又是同一个人。他在他的詩集《信仰告白》中同浪漫主义絕交，被浪漫主义反动派赶出德国国境后，他把他的詩集《撒·依拉》寄回祖国。这是一些热情的、气势雄壮的詩歌，今天一位普魯士

陆军大臣还骂它们是胡思乱想的作品，这就充分证明了这些诗歌的巨大鼓舞作用。诗人把一艘载着国王在阳光照射下的莱茵河顺流而下的轮船看做是国家的形象，他让无产阶级的司机人忿忿不平地说：

“呵，国王，同我相比，你远不是一位泰坦^①，一位宙斯^②！
供你行走的经常燃烧着的火山，不是归我统治？
一切都在我——在这期间，我只要敲击一下，
瞧，你靠它维持崇高地位的那个机构就要毁灭！

船板裂开，火焰上升，把你弹到半空！
我们却不受火伤，从我们的黑洞上升到光明的地方！
我们就是力量！由于上帝的愤怒，我们现在还是无产者，
我们要把老朽的国家捶得年轻起来！”^③

《莱茵报》在快要停刊的时候还向弗莱里格拉特放过利箭；这时，当马克思被逐出巴黎、到了布鲁塞尔时，他对同行的华尔格尔斯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他在这儿，我一定要纠正当他还没有站到党的城垛上的时候《莱茵报》对他的攻击；他的《信仰告白》弥补了一切。”不久以后，弗莱里格拉特写道：“一星期以前，马克思也到了这儿，他是一个有趣的、亲切而朴实的人。”从此弗莱里格拉特同马克思成了亲密的朋友；在弗莱里格拉特的不少革命诗歌里，甚至每个思想、每个用语中都渗透着马克思的精神。人们只有知道马克思关于加利福尼亚的金矿”的发现从历史方面和经济方面所说的一些话，加利福尼亚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译者

② 希腊神话中最高之神。——译者

③ 参见《德国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41页。——译者

的巨大幻想才在它最深奥的核心发出光輝。这不是責备弗萊里格拉特，而是相反。不管人們关于詩的修辭學或修辭學的詩說些什么，押韵的詞句、組織好的音节除了激发听者的感情，使他感到悦耳而外，还有更高的任务。

格奧尔格·維尔特同弗萊里格拉特一样，也出生在德特莫耳特。他在布莱得福德一家德国商号里当店員，同恩格斯交往甚密，恩格斯曾称他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德国无产阶级詩人。他献給西里西亚織工一首歌，这首歌可以同海涅的三重的咀咒^① 和弗萊里格拉特的忿恨的呂貝察尔^② 之詩媲美。他用有力的笔触描繪了宪章主义者，約克郡和郎卡郡的粗野、憤怒的汉子的剛勁形象，当他們听到西里西亚織工起义的消息时，都怀着悲痛的心情欢呼起来。維尔特称工业是人类的压迫者和解放者；它用忧郁的目光和沉重的鞭策驅使穷人去做聞所未聞的苦工：

“永无止境的錯誤的貪心，
又在那儿拿人类当作牺牲品；
可怜的穷人蒙着头悲哭，
而另一些人却在夸耀富丽的裝飾品。

每一次大战虽然带来眼泪，
它也使苦难变成一定的胜利！
学会鍛造利劍和鎖鏈的人，
会用利劍斬断鎖鏈解放自身！

人类的崇高的精神所賜予的一切
不是賜給一人——它将属于人类全体。

① 指海涅的《西里西亚織工》一詩。——譯者

② 西里西亚里曾山脉的山神。——譯者

等到最后的鎖鏈鐺鐺地粉碎，
等到最后的手臂憤怒地举起，
这位阴暗的女神也会改变面貌——
她周圍的一切都流露出幸福和欢笑！
没有人能減輕的劳动的困苦，
就是她自己，能給我們把一切障碍扫除！”^①

他常常运用海涅的韵律，是不可模仿的事物的唯一模仿者，他善于用新的精神充填借用的形式，善于用超过海涅，接近歌德的自然的肉体快乐的感情之火使借用的形式变得活潑生动。維爾特作為詩人也是一个自由的人，他完全摆脱了詩人集团的那种繁文縟节，他的詩只要写出来，把抄本送給馬克思或恩格斯（后来他同他們一起住在布魯塞尔），就不再談論这些詩了。革命是他的繆斯；有一次他給馬克思写信說：“的确，我认为最可怜的事情莫过于，为了逗祖国的丑人发出痴呆的微笑而說內容貧乏的笑話，开恶劣的玩笑”。

其他像皮羽特曼、諾伊豪斯、溫克施特恩等人都不及这些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的詩人，恩斯特·德朗克也不及他們。德朗克的詩和小說虽然超过中等水平，可是他特有的才能在他描写普魯士首都的书中比在他的詩和小說里表現得更加明显，这本书是对三月革命前的柏林的最成功的描述。德朗克有健康的判断力和尖銳的觀察能力，此外他在各种不同的方面都有丰富的知識。他能够清楚地認識和描写阶级对立，同时他的詩才和他对无产阶级的深厚同情給他的叙述灌注了新鮮的生命。虽然今天这本书已經过时

^① 參閱《德国詩选》，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08—409 頁。——譯者

了，可是至今还没有人写出一本同它有点近似的描写柏林的书。

这本书有它自己的命运。德朗克在柏林大学念宪法学系以后，就以“外国人”的身份被警察驱逐出境了。这种“外国人的身份”的根据是，他在科布伦茨当文科中学校长的父亲，曾在黑森的富耳达担任过几年同样的职务，恩斯特·德朗克就生在那儿。被逐以后，他就住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当作家，在这个自由城市的一家出版社里，他出版那本描写柏林的书。普鲁士的警察在这本书里嗅到一种所谓亵渎国王陛下的气息，德朗克到科布伦茨探望他的父母时被捕并被送上了法庭。他满有理由地说，他是“外国人”，在“外国”可以出版他想出版的书，可是没有用。歪曲法律的普鲁士法官判他两年要塞监禁，因为他把两本书寄到普鲁士，因而越过国界在普鲁士犯了亵渎国王陛下之罪。二月革命爆发时，德朗克正在布泽耳监狱里。为了不受普鲁士国王赦罪之恩，他做了大胆的越狱尝试，他侥幸成功了。他越过荷兰边境，到了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

社会主义的诗人在斗争的年月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德朗克、弗莱里格拉特、维尔特进入了《新莱茵报》编辑部。

第十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

1845年春，恩格斯从巴门迁往布鲁塞尔。一些个人的原因对于这件事情可能发生了一定的作用。恩格斯同他家庭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存在极其尖锐的矛盾，而且他同莫泽斯·赫斯和画家克特根一起对故乡的市民群众发表的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讲演，虽然具有学术性的和平性质，也被警察当局强制阻止了。这些演说就其思路来说，同恩格斯同一时期的著作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些次讲演中说了许多反駁李斯特的重商主义药方的精采的話。

然而，促使恩格斯到布鲁塞尔去的最有力的动因，是他渴望同马克思合作，以便彻底搞清他们的新观点。为了这个目的，恩格斯随身带去了一部很有价值的预备性著作，即他在1844年冬季写成的論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那本书。这部书的序言是1845年3月15日在巴门写的。

一 恩格斯論英國工人状况

恩格斯在序言里說，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給社会主义理論和

认为这种理論有權存在的見解提供坚实的基础，肅清贊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論的一切空想和臆造。他认为必須介紹无产阶级的真实境况，特別是向德国的理論家們介紹，因为他們几乎毫无例外都只是通过費尔巴哈对黑格尔思想的解决而走向共产主义的。但是只有在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因此恩格斯描述了英国工人的状况。

誠然，恩格斯不是第一个描写現代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人，并且毫无疑问他也不是一个贬低自己的先驅（他本身以这些先驅的著作为依据）的功績的人。但是他这本书是这类德国文献中的第一部著作，而更重要的，它是性质特殊的第一部著作。同时，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在恩格斯以前，沒有一个人能够描绘出现代无产阶级苦难的这种触目惊心的真实图景，而是因为这位二十四岁的作者的值得欽佩的洞察力极其敏锐，他依靠这种洞察力理解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并且能够由此不仅說明了資产阶级的兴起和无产阶级的貧困，而且也說明了資产阶级的沒落和无产阶级的解放。

只有这本书才为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鑑》上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提供了正确的解說。如果说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里研究的是原則，即研究了自由競爭；那末，他在《英國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研究的是實踐，即研究了大工业。在这两部著作之間，既沒有常常有人斷言的任何差異，也沒有下述的任何不同。據說恩格斯在前一著作里，是从倫理学观点出发下判決，只是在后一著作里才从經濟学观点出发作判断。这两部著作都有經濟学的基础，而且恩格斯在后一著作中，也像在前一著作里一样，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資产阶级理性的人类理想同工业資产阶级的不合人性的現實之間的尖銳矛盾。实际上，后一著作比前一著作进步的地

方，是作者越来越脱离了德国哲学的激进派。他沒有再引用布鲁諾·鮑威尔和費尔巴哈的著作，只是有两三个地方援引过“友人施蒂納”的話，而引用的目的是为了向施蒂納指出他的“我”的理想（这个我把别的我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榨取主体），被资本主义社会极其完美地实现了。在这两部著作之間恰恰还有一部《神圣家族》。不錯，到处都还可以看到恩格斯是从德国哲学走过来的，但是人們也可以看到，他已經开始脱离德国哲学的遗产了。有些地方，他还站在“一般的人的基础”上，比如他在該书的結束語中宣称共产主义不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这种說法在理論上是很正确的，但是，只要統治阶级不願意听到共产主义，它在实践上是完全不会收到成效的。然而在全书的叙述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已經作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事实，十分突出地顯現出来；并且由于恩格斯越来越明确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它作为理解随着大工业而开始的世界历史时期的钥匙，而对于这个事实作出了正确的評价。

恩格斯认为，自从进入这一历史时期，现代工人阶级的历史就开始了。“分工、水力、特別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搖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偉大的杠杆。小工业創造了资产阶级，大工业創造了工人阶级，并把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可是，这只是为了后来在某个时候〔梅林的引文缺“后来在某个时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們。”^① 这本书的要点是指明大工业怎样創造了现代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怎样发展起来和它为了推翻自己的創造者应当怎样按照历史辩证法（作者已經詳細闡明了这种历史辩证法的一些規律）发展下去。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頁。

資產者之間互相競爭，無產者之間也互相競爭。無產者之間的競爭決定工資的最低額；資產者之間的競爭決定工資的最高額。無產階級為了一般地能够生存，就需要把生活資料最大量地壟斷為己有的資產階級；而可以依靠自己的資本生活的資產階級，則需要無產階級作為他們發財致富的駄貨牲口和商品。如果現有工人的人數多于資產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需要的人數，那末，工人為了不致躺下等着餓死，就把勞動力的價格降低到勉強能够糊口以免餓死的最低水平。如果工人少于資產階級對工人的需要，那末，個別的資產者就會利用提高工資的辦法招攬工人。在平常的條件下，即當工人的數目恰好等於生產當時所需商品使用的工人數目的時候，工資略微比工資最低額高一些。至于高多少，這要以工人的平均需要為轉移。如果工人有每周吃幾次肉的習慣，那末，資本家就不得不向工人支付足以使他們買到這些食物的工資。這種工資不會再低，因為工人不必彼此競爭，從而沒有理由滿足於較少的工資；可是這種工資也不会再高，因為資本家之間沒有競爭，他們就沒有特別的恩惠為自己招攬工人。

由此可以得出早由亞當·斯密作出的一個結論：對工人的需求正如對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樣，它調節着工人的生產，即調節着所生產出來的人的數量，如果生產進行得過慢，需求就要使它加速，而如果生產進行得太快，需求就要使它緩慢下來。如果工人過少，那末，他們的價格，即他們的工資就要上漲，工人將會生活得好一些，結婚的人數多起來，人口的出生率提高，更多的兒童成長起來，直到生產出足夠的工人為止。如果工人過多，那末，他們的價格就要下落，開始出現失業、貧困、飢餓和由此引起的流行病，而流行病則會滅絕“過剩人口”。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實上都是資產階級的奴隸，他們竟可以像商品一樣被卖掉，像商品一樣漲價跌價。這

种奴隶制度和旧式的公开奴隶制度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是一下子就永远被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即按日、按周和按年出售的，还因为他们不是由一个主人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出卖自己，成为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对于他们来说，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虽然也给他们带来一些真正的自由，但是没有人保障他们的生计，只要资产阶级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到兴趣，随时都可以把他们赶出去。可是，对资产阶级来说，现在的制度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却有利得多。他们在解雇工人的时候不会损失投入的资本，而且会大大降低生产费用，这是亚当·斯密为了安慰他们而早已算好了的。

但是，由于几乎经常有“过剩人口”，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几乎经常比争夺工人的竞争激烈，由于工资几乎经常接近最低水平，无产阶级的状况更加严重地恶化了。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工人的相互竞争而达到最高限度。分工、使用机器、利用自然力、雇用女工和童工——这一切不断地使许多工人失业。被解雇的工人什么都买不起了，新的工人也就没有面包吃。但是，这种循环被日益扩大工业和掠夺国外市场所打断。最近 60 年来，对纺织品的需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工人的需求，都在不断地、迅速地扩大，大不列颠帝国的人口也以飞快的速度增加。虽然如此，英国还有过剩的无用的人口。这个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

恩格斯回答说：“是从工业和竞争的性质本身以及这种性质所造成的商业危机来的。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例如英国供给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某个厂

主知道某种貨物在一个国家里每年要消費多少，但他究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時間內在那里有多少存貨，更不知他的競爭者往那里运去多少。他只能根据經常波动的价格对現有的存貨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可靠的推測，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送出去碰运气。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机会的。只要好消息从某个市場傳來，每个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的东西都送到那里去。不久，这个市場就充滿了商品，銷售逐漸停止，現金收不回來，价格日益下降，英國的工业也沒有什么工作給自己的工人做了。”^① 随着积压的存貨被消費掉，情况也逐漸好轉起来；四面八方傳來的好消息，以及日益上漲的物价，又使人們恢复了活动。

以后的情况又怎样呢？我們还是請恩格斯自己来叙述吧。“市場大部分都在很远的地方。在新的商品到达那里以前，需求总是在增加，价格也随着上漲。第一批运來的貨物人們都爭先恐后地购买，第一批成交的买卖使市場更加活跃起来，以后运來的貨物还要看漲。人們怀着这种还会漲价的希望把商品买了囤积起来，这样，本来是供消費用的商品却在最需要的时候从流通中被抽出去。投机更加抬高了市价，因为它鼓励其他的人去购买新到的商品，并把剛运到的商品从流通中夺去。这一切漸漸地傳到了英國，厂主又重新开始加紧工作，开办新的工厂，尽一切力量来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于是这里也开始了投机，它的后果也和国外市場上完全一样：物价上漲，商品从流通中被抽出去。这两件事情使生产緊張到极点，于是出現了‘根基不稳的’投机家，他們运用虛拟資本，靠信貸來維持，而如果他們不能把买进的商品迅速地轉賣出去，那就得宣告破产。他們大干这种普遍地漫无秩序地追逐利潤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6—367頁。

的勾当，由于自己的貪得无厌，更加加强了混乱和奔忙，这种貪得无厌使他們发瘋似地哄抬物价和扩大生产。一种瘋狂的竞赛开始了，连最稳重最有經驗的人都給迷住了。铁、紗、布匹开始大量生产，好像要把整个人类重新装备起来，好像在月球上的某个地方发现了有几十亿消费者的新的市場。”^①当然，这样以来市場上的貨物又堆得过多了，接着就开始新的危机。“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繼續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英国〔梅林的引文缺“英国”一詞〕工业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②恩格斯认为，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毫无計劃的生产和不可遏止的竞争，是产生商业危机的原因，同这种情况相比，工人的消費不足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从这种情况中产生了下述事实：英国的工业不得不經常（除了最繁荣的时期）拥有一支沒有就业的工人后备軍，以便在最旺盛的月份利用它去为市場生产所需的大批商品。不算苏格兰和爱尔兰，仅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就有一百五十万正式登記的貧民。恩格斯接着細細分析了这对英国工人的状况造成了哪些后果。他談到工人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他們吃的什么和穿的什么，他們的精神、道德和身体怎样变坏，他十分詳細地描述了社会对工人进行的謀杀行为。他研究了前几个世紀劳动阶级的貧困同无产阶级的貧困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无产阶级的生活沒有保障，他們必然过着掙一天吃一天的日子。“……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就什么也没有，昨天掙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沒有任何保证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任何危机，主人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8頁。

② 同上书第369頁。

的任何逞性都能使他失业，——这个无产者已經被置于人們所能想像的最令人憤怒的非人的地位了。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致于餓死的保障；而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們又不許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絲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滴而已。”^① 此外还有强制劳动的令人屈辱的痛苦，这种劳动的使人动物化的作用，由于分工和应用蒸汽力和机器而增长了无数倍。“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門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瑣碎的純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削針头或銼齒輪，再加上像英國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② 最后厂主还采用下述种种手段，使工人完全处于奴隶地位，这就是：制訂厂規，惨无人道地延长工时，雇用女工和童工，实行夜班工作（这种工作破坏着一切家庭联系，不仅危害活着的一代，而且危害未来的一代），采用实物工資制和小宅子制，以及熟悉內情的恩格斯詳細地描述的工厂制度的无数弊端。

恩格斯并不諱言，大工业把現代无产阶级变成一群丧失了人类尊严、降低了地位、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淪落到动物状态，在身体上受到損害的人。在英國工人当中，酗酒、乱搞男女关系、粗野和侵犯所有权的現象十分普遍，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不这样呢？不过在今天的这种困苦中，恩格斯也看到了明天的希望。对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1頁。

② 同上书第404頁。

于工人來說，只有一个可能使他們繼續为人和感到自己是人，这个可能就是激烈地反抗資产阶级。淪落到牲畜状况的危險性不可遏止地增长着，这种危險性促使无产阶级投入反对資产阶级的斗争。这一斗争不知道什么叫停火，它必然以无产阶级战胜資产阶级而告終。正是資产阶级用来使无产阶级丧失人类尊严的手段，成为无产阶级手中反对資产阶级的武器。

爱尔兰的移民，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人状况的恶化，然而爱尔兰人的生气勃勃的气质也对英国无产阶级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人口的集中，使工人的道德墮落到最严重的地步，但是这也喚起了他們的阶级意識，使他們认识到寡弱众强，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人口集中消灭了工人和所謂供养人之間的家长制关系的最后残余；大城市逐漸成为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工人的悲惨命运，使他們比較人道，比較和藹可亲，他們把每个人都看做人；而在財迷，即透过自私的眼鏡觀察一切和除了裝滿自己的錢包沒有其他生活目的的資产者看来，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比資产者偏見少得多，看問題清楚得多。由此就改变了資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所处的那种人为的无知状态。无产阶级从实践中受到的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廢物，而且还消除了同那一套廢物糾纏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貧困教人去祈禱，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讀，更不会写，但是他們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們却知道得很清楚。資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們能够从这个資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們也是知道的。虽然他們不会写，可是他們会說，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說。虽然他們不会算，可是他們对政治經濟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們看穿主張取消谷物稅的資产者，并且駁倒他們。虽然他們完全不了解教士們費尽心机給他們讲的天国的

問題，可是他們很了解人間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問題。”^① 英国的无产阶级逐渐变成完全不同于英国资产阶级的另一种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政治和宗教。恩格斯同迪斯累里同时说出了两种民族的见解^②，但是又与迪斯累里不同，恩格斯补充说，工人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代替死抱着种种阶级偏见和不关心一切历史运动的资产者。

恩格斯研究英国工人运动的各种形式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結果。工联有强大的力量反对个别的、害处不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但是工联尽一切力量也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③ 但是，工人为什么甘冒这些失败呢？“問題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須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應該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④ 工厂主用来向工人宣传罢工毫无用处的論据，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們也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对工人的理智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工联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經懂得，资产阶级的統治只是依靠工人之間的竞争，即依靠无产阶级的分裂，依靠各个工人之間的对立。工联組織是工人打算消灭相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8—399頁。

② 迪斯累里在他的长篇小說《神巫，或两种民族》中，几乎同恩格斯同时说出了大工业把英国人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的见解。——譯者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5頁。

④ 同上书第506頁。

竞争的首次尝试，打击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最致命的所在。正因为这一首次尝试决不能长期消灭工资规律，所以它要超越自己的范围向前发展。

工联发动的罢工只是前卫战，不过有时也会变成较大的战斗。这种罢工虽然不能决定任何问题，然而可以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就要开始了。罢工是工人学习战斗的学校，罢工本身也具有无比的作用。恩格斯详细描写了1844年春季诺森伯兰和德勒穆两地矿工英勇进行的十九个星期的大罢工。一般说来，工人除了反对他们所处的全部生活状况以外，就没有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所以工人就在这种反抗行动中，把自己最高尚、最可爱和最合乎人情的方面表现出来。不错，在几乎每天都有罢工中，并不是没有粗暴和恐怖的行为，不过英国正在进行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一战争，那末，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阴险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资产者所以认为法律是神圣的，是因为法律是他们创造的，法律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相反地，工人知道得非常清楚，他们经常有机会从实践中体会到，法律不外是资产者准备抽打他们的鞭子，所以除非万不得已，他们是不诉诸法律的。同时，他们也力图用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他们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

宪章里面包括的六条，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宪章运动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形式。在宪章运动中，整个工人阶级起来反

对资产阶级，并力图把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但是，宪章运动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宪章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宪章派工人加倍热心地参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十小时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廢除新的济貧法，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同宪章里的六条一样，是宪章运动不可缺少的部分。誠然，宪章派的社会主义还很不发展，他們的消灭貧困的主要方法，即把土地分为小块份地的办法已被工业战胜了，但是下一次危机——恩格斯說这次危机最迟在1847年到来，在激烈和尖銳的程度方面估計都要超过以往的历次危机——将把宪章派推入社会主义的怀抱。

宪章派在理論上还非常落后，不过却是真正的道地的无产者；社会主义者的眼界則比較寬闊，可是他們都出身于资产阶级，爱好和平，性情溫順，他們的原則是抽象的。虽然社会主义在实质上使自己高高地位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的对立之上，但是在形式上却对资产阶级十分宽容，而对无产阶级在許多方面都非常不公道。社会主义者不希望斗争，而希望輿論贊同他們的各项原則。“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經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墮落，他們看不見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看不見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墮落。他們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們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灭……的目的。他們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资产者，但是，他們认为这个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憤怒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宣揚对英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沒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們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独的人在內，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們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們

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① 恩格斯說，在这种形式下，英國的社会主义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它必須汲取宪章运动的革命的內容，犹如宪章运动需要更加明确和广闊的社会主义見識一样。社会主义同宪章运动合流，会使工人阶级成为英國的真正統治者。恩格斯詳細說明，不同的工人派別現在已經对无产阶级的教育做了許許多的工作。无产阶级面对一切有产者，正在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則，具有独特的見解的独立的阶级。在这个阶级内部蘊藏着民族的力量及其发展的能力。

恩格斯曾在自己著作的結束語中預言英國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发生社会革命，所以資产阶级評論界在这个沒有应驗的預言上糾纏了半个世紀，为的是用自己的一套手法“駁倒”这部划时代的作品。可是事实上，恩格斯所預言的革命已經出現了，不过沒有采取恩格斯所說的，英國工人阶级从絕望的貧困中站立起来，成为一支坚强的大軍，一步一步地夺取政权的形式。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有理由自豪地指出，使人感到惊異的，并不是青春的热情激起他作出的預言實現得很少，而是有很多都应驗了。当时，恩格斯也同非常熟悉英國情况的蓋斯克尔和卡萊尔，甚至同英國資产阶级的主要報紙《泰晤士报》一样，錯誤地认为暴力革命不久就要爆发，但是，他的书中的一切新颖的和独創的观点，以及构成他的精神財产的一切东西都是首次得到闡明的真理。

无庸諱言，恩格斯（馬克思也是这样）特別是在他們的青年时代，有时过高地估計了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步伐。一切沒有头脑的人，过去和現在都認為他們用这一点就证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是沒有根据的，而像阿尔伯特·朗格这样的人却与此相反，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5—526頁。

他會經作出結論，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惊人正确地”判斷了他們的時代。朗格寫道：“一般說來，我們總喜歡把我們清晰地預見到的東西想像得比它的實際存在近一些。”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這種愛好；恩格斯甚至在年邁的時候都是如此，他一直到暮年都保持著一顆青年人的心。但是，不應當由此就說他們徘徊在五里霧中，盲目摸索；恰恰相反，用朗格的話來說，他們是“明察秋毫的思想家”，因為他們清晰地看到了道路的終點，所以他們才把這條道路估計過短。

恩格斯的這本書，剛一問世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它成了人們最愛讀的三月革命以前的社會主義作品。但是，吸引資產階級讀者注意的，實際上只是那種對於悲慘情節的動人描寫。恩格斯應用的方法，以及他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仍然未被人們理解，正如不久以後“歷史學派”的首領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教授在他的學術著作中所表明的那樣。希爾德布蘭德想用歷史記錄的濃密的陰雲，重新把恩格斯射入歷史發展中的光線遮住。他找出一堆亂七八糟的資料和數字，企圖由此說明英國的勞動階級在以往幾個世紀比19世紀的處境還要惡劣；英國的手工業者、海員和僕役的生活，比恩格斯描寫的工廠工人、農業工人和礦業工人的生活良好；在黑森選帝侯領的上黑森省，手工業無產階級比英國的大工業無產階級還要痛苦，以及其他與此類似的反駁。即使希爾德布蘭德確實證明了他力圖證明的東西，他能够用這種結論來證明恩格斯是不對的嗎？十分明顯，完全不能證明。希爾德布蘭德完全按照“歷史學派”的“歷史方法”，對恩格斯提出的一切主要問題避而不談。恩格斯一定是一個幻想家，因為他在世界市場上沒有發現希爾德布蘭德在黑森選帝侯領的上黑森省見到的那種現象。

而且應當承認，希爾德布蘭德是“歷史學派”的目光比較尖銳

的代表人物之一。大約三十年后，罗雪尔出版了他的《德国国民經濟学史》，其中除了抄了几句希尔德布兰德論恩格斯的話以外，对恩格斯再沒有讲什么。他甚至沒有說出自己的高明見解的来源，這也許就是“历史方法”的特点吧。

二 馬克思論費爾巴哈

1845年春恩格斯迁居布魯塞尔以后，就同馬克思一起开始全面地研討他們同德国哲学的思想認識相对立的观点，以便清算他們过去的哲学信仰。他們在两卷本的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的著作中，实现了这个計劃。但是这部著作是注定无法問世的①，在威斯特伐里亚找到的那家出版商，在接到原稿以后刁难起来，說“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这是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注定要长期忍受的那种困境的开端。連卢格这样的人也毫不客气地逼迫他的合伙人弗呂貝爾，不叫文艺书店出版馬克思的任何著作，虽然卢格自己也承认，馬克思很难写出不好的作品來。

既然馬克思和恩格斯达到了自己弄清問題这一主要目的，他們就情願把自己的手稿交给“鼠牙去批判”了。但是，馬克思用来同費爾巴哈爭辯的几条提綱，却从这个时期一直保存下来。馬克思在这个提綱里，說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現實、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他說，有一

① 这里指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費爾巴哈、布·鮑威尔和施蒂納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該书的全文于1932年由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第一次出版。梅林沒有見到这部著作的全文，因为梅林在世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遺稿的保管人爱德华·伯恩斯坦保存着这部著作的原稿，他只发表了其中的很少一部分。——原編者

种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說忘記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說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可是实际上，人的活动改变环境这件事，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費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結于人的本质，世俗家庭是神圣家族的秘密。但是他忽視了一个問題，即在完成上述工作之后还有一項主要工作要做。如果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像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如果世俗家庭被規定为某种云霄中的独立王国，那末，这个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这个矛盾应当被人理解，而且在理解之后，还要通过世俗基础的实践的革命化来消除。只有这样，宗教的本质才会真正归結于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費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

費尔巴哈沒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論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馬克思用下述簡明論点結束了他对費尔巴哈的批判：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哲学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社会（在馬克思的原文中是“世

界”），而問題在于改变社会。

不难理解，抱着这种观点可以达到什么目标。费尔巴哈想回到唯物主义，可是他始终没有能够同唯物主义完全结为好友。在他打算回到唯物主义而完全同唯心主义断绝关系的时候，他牺牲了德国唯心主义超过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所取得的进步，即放弃了把人类历史看做一个川流不息的生成和消灭的过程的辩证方法。这个辩证方法与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黑格尔这样称呼它）不同，后者认为世界是现成事物的某种复合体，是一下子生成的固定不变的探讨对象的复合体。尽管形而上学方法曾经十分必要和有过用处，但是它利用自己的显微镜和解剖刀，只能把尸体研究到一定程度，因为它使事物脱离了它在其中存在和展开其特有的定在的那种联系。辩证法与此不同，它掌握着事物产生和消亡的过程的整个复合体，它不把人看做是一下子生成的抽象的东西，而把人看做是历史的、不断改变的存在物。

马克思同意费尔巴哈的做法，抛弃了唯心主义的一切奇谈怪论，可是他又与费尔巴哈不同，牢牢地把握住德国唯心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从正面完成了费尔巴哈只会从反面完成的工作。他把唯心主义的永恒内容放进唯物主义，正如康德曾把唯物主义的永恒内容放进唯心主义一样。但是，既然一方面人类历史不受什么神或什么绝对观念支配，另一方面这个历史是通过永无间断的辩证过程发展的，那末，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对于自己过去关于社会和国家的研究作了总结，他认为人的真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人的发展。但是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决定于经济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变革引起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马克思并不是盲目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和费尔巴哈的抽象的孤立的唯物主义。他证明不

是思想具体化为事物，而是事物反映在思想之中，于是他就顛倒了黑格尔的辯证方法；而当他指出川流不息的辯证过程怎样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生作用时，就把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

資产阶级学术界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出了两点反对意見：第一，說这种历史观根本不是新的；第二，說它决不是真实的。可是，无论 是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从来沒有說过他們凭空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假如他們这样断言，那么他們自己就否定了按照其全部意义，只有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才能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人們研究資产阶级社会以前，必須先有这种社会存在；而且理所当然的是，从这个社会出現初期起，即从它由中世紀的封建社会的内部产生出来的时候起，有头脑的人士就在这方面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想法：是不是这种社会創造了表面上在它之上的国家，从而应不应当从經濟的生产方式中导出政治的和其他的意識形态，而不是相反。

資产阶级社会越广泛地发展，它的各种經濟矛盾彼此冲突得越厉害，封建等級的分散殘余越結成巨大的阶级，政治斗争不外是这些阶级的斗争的这一事实就越尖銳地表現出来。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的大工业都令人信服地证明，資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意識形态随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云消雾散，化为烏有。七月革命和改革法案已經使現在資产阶级社会的三大阶级——貴族阶级、資产阶级、无产阶级公开地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从此以后，英国的，特别是法国的历史科学认清了現代历史的动力就是这三个阶级的斗争，就是它們三者的利害冲突。其次，甚至在落后的德国至少也对这一真理产生了模糊的預感。浪漫主义反动分子在經濟形式是一切社会組織和国家組織的基础这个論点上大做文章；而自

由主义者，比如汉泽曼在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斗争中提出一种意见，认为书报检查制度既妨碍政治問題的討論，又阻撓經濟問題的討論，因为經濟問題差不多經常要变为政治問題的。不言而喻，从资产阶级的理想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經濟现实之間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都被推向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我們可以从圣西門、傅立叶和路易·勃朗的著作中找到无数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任何新的发现和发明总有一段很长的经历，而一切新的科学认识也是这样。任何人都沒有像馬克思这样明确地指出，人类始終只能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而任务本身，只有当它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經存在或至少已在形成的时候，才会产生。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的先驅者，恰恰相反，他們使圣西門和傅立叶，黑格尔和費尔巴哈这些人恢复了，或者第一次得到了历史荣誉。他們这样做是由于他們大公无私，即使为自己打算，他們也只能这样做。不貶低他們的先驅者的功績，不但不会使他們的貢献失色，反而使它充滿光采。阿尔伯特·朗格曾經說过，我們几乎經常同我們的其他同时代人分享一些卓越的思想，只有完滿地实行一种原則，才能保证我們受到他人应有的尊敬。实际上，所謂完滿地实行一种原則，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划时代的意义。他找到了摆脱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以及德国的哲学陷入的絕境的出路。現代文化本身的矛盾要把現代文化分裂为各种不同的思潮，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思潮导入一条可以排除一切矛盾的革命洪流。

有人硬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表明他們相信听天由命的宿命論，并把一切思想的动力从人类的历史发展中驅逐出去。再沒有比这种說法更沒有根据的事情了。从他們

的辩证方法中自然得出这样的結論：社会决定国家，但是国家也反过来影响社会；經濟事实是最后的决定因素，但思想观念也能影响經濟事实；决不能因为意識形态不能发生独立的作用，就认为意識形态不发生作用。在《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天才地发展了新世界观的基本特征，直截了当地表示，他正是要把唯心主义的积极方面从直观唯物主义的惰性中拯救出来，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他來說不仅是一种理論上的认识，而且也是一种实践的武器，他打算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革命的工具來把資产阶级社会改造成为社会化了的人类。

但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檢驗这个崭新的世界观是否正确。首要問題是揭开現代資产阶级社会的秘密，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判决，而是理解它，由它的产生的必然性证明它的灭亡的必然性。在西欧的社会主义者当中，蒲魯东比其他社会主义者前进一步，他試圖弄清事情的固有联系，而不只是揭发它的恶劣后果。在批判費尔巴哈以后，馬克思着手批判蒲魯东。

三 馬克思反駁蒲魯东

馬克思在巴黎期間，曾同蒲魯东有过私人交往。他們时常彻夜爭論經濟問題。馬克思把蒲魯东带进了黑格尔的思想世界，可是蒲魯东不懂德語，始終沒有能够掌握这个世界。馬克思被逐出巴黎以后，蒲魯东加入了卡尔·格律恩一派，从格律恩那里，他根本学不到哲学方法。

事实上，馬克思不断前进，而蒲魯东却不断后退。从 1846 年 5 月 17 日蒲魯东由里昂寄給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們分手以后一年多時間，彼此已經相距很远了。可惜，引起蒲魯东写这封回信

的馬克思的去信沒有保存下來或者沒有發表^①。但是，不管这封信的內容如何，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蒲魯东当时一定悲喜交加，而沒有理解馬克思的观点。蒲魯东对他“亲爱的哲学家”大放厥詞，說他是胡亂咒詛的第二个路德，是一个主張猛打猛冲的人，希望巴托罗繆之夜^②也临到私有者的头上，用血来滿足无产阶级的求知欲。至于蒲魯东从哪里吸取了这些希奇古怪的知識，也許由他在这封信的末尾对卡尔·格律恩的歌頌中可以推断出来。蒲魯东宣称，他的目标是发现社会規律和实现这些規律的方式，而这也正是馬克思企图弄清的問題。問題在于他們两人之中，誰最熟悉这一工作。蒲魯东写信告訴馬克思，他将在已經发表了一半的著作中談到这个問題的解决办法。他請馬克思严格地批評他的著作，并答应高高兴兴地接受这种批評，并做答复。可是当馬克思提出严格的批評时，蒲魯东的答复却变成了一种对“一位馬克思博士的詆毀文”的即兴的謾罵，說它集了“粗野、誹謗、伪造和剽窃的大成”。

蒲魯东所說的著作是《經濟矛盾的体系，或貧困的哲学》，它試图答复财产的本质是什么这一問題，但是已經不是像他的处女作那样用憤慨的指責去回答了，而是从政治經濟学的分析去解答的。蒲魯东这次沒有使用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而是运用了黑格尔的矛盾。他在政治經濟学的一切范畴中发现了这种矛盾，并試图解决它。首先，他研究了关于基本的价值学說，以及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之間的矛盾。他想通过对李嘉图的价值学說作出空想

① 馬克思 1846 年致蒲魯东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狄茨出版社 1953 年柏林版第 22—25 頁。——原編者

② 法国胡格諾战争期间发生的大屠杀事件。1572 年 8 月 24 日（圣巴托罗缪节）前夕，天主教派突然在巴黎及其他城市对胡格諾派大肆屠杀，死者仅巴黎一地即有三千人。——譯者

主义的解釋，以消除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之間的矛盾。这在英國，甚至在德國已經有人試过了。但是蒲魯东是像格雷那样从小資产阶级立場理解問題的，而不是像歐文及其門徒那样从大資产阶级立場，也不是像洛貝爾图斯那样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場来理解問題的。蒲魯东想用他的“构成价值”說出人类的最后意見，而歐文和洛貝爾图斯(后者以其特有的方式)則认为“构成价值”不过是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同时蒲魯东粗暴地誤解了黑格尔的辯证方法。他死死地抓住黑格尔辯证法的已經變成反动的那一方面不放，根据这一方面，現實世界是由观念世界产生出来的；同时，他又否定了黑格尔辯证法的革命方面，即否定了观念的独立性。观念可以安置自己，并把自己同自己对立起来，以便在这种斗争中发展那种既能消除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形式又能保持它們的实在內容的更高的統一。蒲魯东与此相反，他把每一个經濟范畴都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为的是寻找合題，即寻找把好的方面保存下来，把坏的方面消灭掉的科学公式。他认为好的方面已由資产阶级經濟学家提出，而坏的方面已由社会主义者揭发。他以为利用自己的公式和合題就可以凌駕于經濟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之上。

馬克思用下面的話粉碎了这种幻想：“蒲魯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純經濟的細节；說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沒有远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个合題，結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錯誤。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駕于資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結果只是一个資产者，經常在資本和劳动、政治經濟学和共产主义之間搖来摆

去。”^① 尽管这段話像判决一样严厉，但是馬克思是有权下这个判决的。答复《貧困的哲学》的《哲学的貧困》，是用法語写成，在1847年7月問世的；馬克思在这部著作里不仅指出蒲魯东为什么失敗和失敗在什么东西上，而且解决了蒲魯东給他自己提出的任务，馬克思发现了社会規律；他使政治經濟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超出自己原来的范围，有机地把它们結合在科学的共产主义当中，他也是利用辯证方法做到这一点的，不过沒有用它的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而是用它的唯物主义的革命形式。

本书共分两章，第一章是專門討論蒲魯东的“构成价值”的。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換是同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時間相符合的。蒲魯东的“将来的革命理論”正是李嘉圖作为資产阶级社会的理論阐明了的东西。劳动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工人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和延續后代所必需的一切物品的必要劳动時間。李嘉圖曾經推斷說：“如果用减少維持生活的粮食和衣服的自然价格的办法来减少人們的生活費用，即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可以大大增加，結果工資也会下降。”劳动的自然价格不外是工資的最低限額。由此可見，用劳动時間来測量的价值，必然是工人遭受現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魯东斷言的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理論”。

为了支持自己的空想，蒲魯东假定，如果产品的价值决定于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時間，那末，供給和需求必然得到平衡。为了确定他这个論点，他援引了一个所謂历史证明，即說生产最有用的东西需要的時間最少；社会总是先从最輕便的生产部門开始，然后才逐漸地轉而生产那些花費劳动時間較多和适合于較高級需要的东西。馬克思舉出一种說法，來說明这个令人惊奇的历史哲学，即因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頁。

因为在羅馬皇帝时代人們在人工池塘里飼養海鰻鰐，所以全体羅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羅馬人民連最必需的面包都买不起，而羅馬的貴族却不缺乏充当海鰻鰐飼料的奴隶。馬克思沒有就此止步，他把被蒲魯东顛倒过来的历史发展恢复了原样。馬克思写道：“实际上，情况完全不像蒲魯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級別、等級和階級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沒有对抗就沒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階級对抗的規律而发展起来的。”^①但是历史也证明，产品的交换方式一般是同产品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个人交换同以階級对抗为基础的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产品的消費决定于消費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而这种条件本身則以階級对抗为基础。为什么棉花、馬鈴薯和燒酒是資产阶级社会的基石呢？为什么它們是最普遍的必需品呢？是因为它們是社会最有用的产品呢？还是因为它們是建立在貧困之上的社会中最粗劣的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給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呢？只有在沒有階級对抗和沒有階級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時間的最低額来确定，相反地，花費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時間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

在資产阶级社会里，供求不受包含在劳动時間中的产品价值調節，而供求的波动性运动使劳动時間成为价值尺度。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迄今用两小时才生产出来的东西，就会使市場上現有的一切这类产品跌价。竞争迫使生产者出卖花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貴于花一小时生产的产品。竞争实现着产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所使用的必要劳动時間这一規律。但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頁。

是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物品的实际生产时间，而是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而这个最低限度的时间，也是由竞争来规定的。这样一来，劳动时间充当交换价值尺度的这一事实，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而这种跌价又是同生产过剩和生产无政府状态齐头并进的。

马克思把蒲鲁东的空想叫做一个希望商品能够按照比例生产，从而可以使商品按公平价格出售的憨直人的愿望。他指出，为了要把资产阶级社会说成是不允许任何人损失利己的和谐和永恒公平的状态，很久以来就存在一种进行没有阶级对抗的个人交换的资产阶级幻想。但是，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在极狭窄的范围内进行，供不应求，消费大于生产的时候，这种“供求之间的正确比例”才有可能。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就不可能了。大工业被它的工具所迫，已经不得不经常以愈来愈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它不等待需求。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大工业不得不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和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在现代社会中，在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希望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或者是希望一种没有无政府状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持生产力。”^①

马克思接着指出，蒲鲁东决不是第一个试图“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价值学说的人。他列举了一些英国的先驱者，同时进一步讨论了约·弗·布雷的空想。马克思用下述明确的推论驳倒了布雷的空想：假定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独立的生产者，那末，要进行劳动时间的等量交换，就只有事先确定花费在物质生产上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页。

时间数量，然而这种协议却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如果不以产品的分配，而以生产行为本身作为出发点，也可以得出上述推论。在大工业中，谁也不能自己规定自己的劳动时间，因为他的劳动，如果没有联合在一个企业中的所有其他人的合作，那就没有什么作用。这也清楚地说明了英国的厂主为什么那样顽固地反对减少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的法案，成年男工的劳动时间如不同样减少，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也不会减少。在大工业中，所有人的劳动时间都必须是一样的。“今天是资本以及工人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的东西，如果一旦取消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明天就会成为以生产力总额对现存的需要总额的关系为基础的一个实在的协定。但是这样的协定就是个人交换的死刑……”^①

然后马克思又评述了蒲鲁东对自己的发现的几项特殊的实际应用。根据蒲鲁东的意见，金银是价值已经达到他所谓“构成”的第一种商品。君主们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马克思对此反驳说，货币不是物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的一环，所以同经济关系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同个人交换一样，这种关系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货币并不是由君主们任意创造的。“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②打在黄金上的印章并不表明黄金的价值，而只表明它的重量。但是，金银所以成为不受它们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唯一商品，正是由于它们具有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6页。

② 同上书第121—122页和第124页。

性。因此金銀在流通中可以用紙币来代替，这一点又是李嘉图早就說明过的。蒲魯东把貨币作为他的“构成价值”的实际应用的例子是完全不适合的。

用“构成价值”來說明社会劳动比个人劳动有更多的剩余，情況也不会好。为了解釋社会越来越富，而劳动者越来越穷这一現象，蒲魯东把社会总括成为普罗米修斯这样一个人，这个社会的生活活动的規律完全不同于个人的生活活动的規律。“构成价值”应当保证每一个工人在一个工作日內，由于共同劳动的进步而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馬克思对此反駁說：“英國社會中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七十年間增加了 2700%，即 1840 年每天所生产的是 1770 年的二十七倍。根据蒲魯东先生的說法，那就应当提出这样的問題：为什么英國工人在 1840 年时并不比 1770 年时富裕二十七倍？这样提問題就是說，英國人即使沒有生产这种财富的历史条件（如私人資本的积累、現代分工、工厂、无政府状态的竞争、雇佣劳动制度，一句話，沒有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一切东西），也能生产所有这一切财富。然而这些条件恰恰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劳动的剩余的必要条件。因此，要获得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和这种劳动剩余，就必需有阶级存在，其中一些阶级日益富裕，另一些則死于貧困。但是蒲魯东先生使之复活的这个普罗米修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社会，是建立在阶级对抗上的社会关系。这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关系，而是工人和資本家、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抹杀这些社会关系，那就是消灭整个社会，而你的普罗米修斯也就变成一个沒有手腳的怪影，就是說既沒有工厂也沒有分工，总之，沒有最初你为了使他能获得这种劳动的剩余而給他的一切东西。”^① 馬克思又补充說，按照蒲魯东的理論，只要在实践中把現在拥有的一切財富平均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35 頁。

分配給工人們，而絲毫不改变現代的生产条件，也就够了。当时馬克思已經承认，这样的分配一定不会保证每个参加者都获得极大的幸福，而今天，許多資产阶级思想家还用这一点天天攻击共产主义。

《哲学的貧困》第一章对蒲魯东的批判，已經間接地批判到資产阶级的政治經濟学。这門科学的一些古典代表对于資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結構的理解，要比蒲魯东所能理解的正确得多。但是，他們使用的政治經濟学的范畴，比如价值、貨币和交換等等，也只有对資产阶级社会发生作用。它們的基础是資本和劳动之間的对抗，是阶级之間的对抗。只有消除这种对抗，才能消灭这些范畴。政治經濟学的各范畴，并不像政治經濟学本身所想像的那样，是永恒的和自然的；它們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李嘉图从靜止的状态中描述經濟范畴的形式，而馬克思則从运动的状态中說明經濟范畴的职能。在探討蒲魯东的古怪方式的《哲学的貧困》第二章里，馬克思主要研究了經濟范畴。

馬克思在这里写道，“經濟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梅林引文中缺“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們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們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資本家为首的社会。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創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們所表現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① 馬克思拿資产阶级的經濟学家同正統的神学家作了比較。正統的神学家认为，他們自己的宗教是神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144頁。

的启示，而其余一切宗教都是人們臆造的。同样地，对经济学家說来，“人为的”封建制度存在时，有过历史，自从“永恒的和自然的”资产阶级制度存在以来，就没有历史了。

对马克思說来，揭穿蒲魯东采用的方法的毫无根据，是輕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把辩证的过程分成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并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末，观念就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观念不再发挥作用。它既不能把自己安置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马克思作为黑格尔的真正的学生非常清楚地知道，正是蒲魯东到处都想根除掉的这个坏的方面，在引起斗争的时候創造历史。“假如在封建主义統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騎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間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組織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結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絕，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斷。经济学家就会給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銷的荒唐任务。”^①

然后，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如下的任务，“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須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須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間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②生产关系决不是永恒的規律，而是同人类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力发生变化，生产关系也必然随着变化。由于最重要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頁。

② 同上书第154—155頁。

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經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須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傳統形式。从此以后，以前的革命阶级变成了保守阶级。

馬克思在资产阶级身上找到了同封建主义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飾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間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視、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現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現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們互相对立，他們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們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經濟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絕不是一致的單純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貧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①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得出“永恒的和自然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暴露得越明显，经济学家的理論就越混乱，于是就形成不同的学派。

馬克思只用了不多几笔，就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几位經典作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156頁。

家描写得极为詳尽，而德国大学中的經濟学的“历史学派”用一大堆历史資料也决做不到这一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殘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經濟关系上的封建殘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規律的資产阶级。从他們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經受着暫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暫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經濟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們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資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財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疇和規律并证明这些規律和范疇比封建社会的規律和范疇更便于进行財富的生产。在他們看来，貧困只不过是一种暫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現时的情况一样。”^①当資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已經暴露出来，貧困同財富一样大量增长这一事实也已經了如指掌的时候，經濟学家馬上就以听天由命的宿命論者的姿态出現，他們自命高尚，用傲慢的眼光蔑視那些創造財富的活人机器，或者以人道論者和博愛論者的姿态出現，他們要想消除資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矛盾，所用的手段是：取消坏的一面，把理論和實踐，法和事實无限地区別开来，劝說資产者和无产者以及把一切人都变成資产者。

如果说經濟学家是資产阶级的学术界代表，那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是无产阶级的理論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資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还在資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論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們为了滿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6頁。

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們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們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識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們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創立体系的时候，当他們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們认为貧困不过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学了。”^① 馬克思在这段論述中簡單扼要地說明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过渡。

接着馬克思評述蒲魯东怎样把自己的方法用在分工和机器、競爭和壟斷、土地所有权或地租、罢工和工人同盟等許多經濟范畴上的。在蒲魯东看来，分工是一种抽象的范畴。馬克思駁斥了这种看法，他证明分工是一种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工有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根据蒲魯东的意見，机器是“分工的邏輯反題”，是使被划分的劳动恢复統一的合題。馬克思反駁說，劳动的組織和划分，是随着劳动时使用的工具而各有不同的。不能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經濟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現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經濟范畴。”^② 但是工厂中的分工同社会上的分工完全不同。“当現代工厂中的分工无论巨細全由企业主的权力进行調度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競爭之外沒有别的規則、别的权力可言。”^③ 馬克思提出一个总的規律，即在分工方面，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158頁。

② 同上书第163—164頁。

③ 同上书第165頁。

工厂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

工厂是亚当·斯密所謂的分工的主要条件；在工厂里，每个工人的职责都缩减为一种极其简单的操作，而权力即資本則安排和领导工人。但是，工厂并不是像蒲魯东所以为的那样，通过工作同志或类似人的友好协定产生出来的；工厂也不是在古老行会的内部成长起来的。“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师傅。”^① 使用机器的现代大工业的前身是工場手工业，工場手工业存在的历史条件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从美洲輸入貴金属而促成的資本积累，繞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較短航道的开辟，殖民体系的建立，海上貿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封建領主的大批侍从被遣散，无数农民由于耕地变成牧場而得到自由，15世紀和16世紀几乎普遍发生流浪現象。

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紀末才出現的。在英國，由于手工劳动的产品不能滿足不断扩大的市場的需要而产生了机器。但是，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結合而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組合。“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复合的工具；由一个发动机即人手开动复合工具，由自然力开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② 劳动工具的集中，并不像蒲魯东所认为的那样，在取消分工，而是在加强分工。机械技术方面的每一項重大发明都造成更大的分工，而分工的每一次加强又引起机器方面的新发明。蒲魯东硬說工人把机器看做是一种“复原”，可是这种說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情况恰恰相反，在18世紀，工人曾經长期反抗正在确立的自動机械的統治。机器在贬低工人阶级的特长的时候，就使他們丧失了力量。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7頁。

② 同上书第168頁。

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現一种新机器。

自動化工厂引起了分工方面的革命，然而并不是蒲魯东的小資产阶级想法的革命，不是像蒲魯东建議的那样，工人不要只做一根針的十二分之一，而要按順序做完針的所有十二个部分。工厂使分工革命化了，但不是为了造就中世紀的行会师傅，而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现代社会內部的分工產生了許多专业和专门人材，以及由此而来的专业白痴。机械化工厂中的分工失去了专业的性质，同时也消灭了专业白痴，对普遍性的要求已經显露出来。

对于競爭和壟斷，馬克思也同样指出它們是社会范畴，而不是自然范畴。馬克思說，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斷改变而已。蒲魯东认为，他宣布工业方面的竞赛不外是競爭，就可以打敗那些想以竞赛代替競爭的傅立叶主义者。但是，假如有人对 14 世紀的一个手工业者說，应当把工业方面的全部封建組織廢除，而代之以工业竞赛即所謂競爭，那末他一定会回答說，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正是有組織的竞争。競爭并不像蒲魯东所认为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而是同它由于历史需要产生于 18 世紀的情况一样，它也可能由于历史需要而消失于 19 世紀。競爭并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競爭并不追求产品，而是追求利潤。“在现代各民族的經濟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謀利潤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競爭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① 蒲魯东打算消灭的競爭的坏的一面推动着社会前进。競爭越狂热地制造新生产力，它就越对资产阶级关系发生破坏作用，同时为新社会創造物质条件。蒲魯东认为壟斷是競爭的必然結果，这是正确的。但是，正如競爭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73 頁。

是由封建的壟斷产生的，競爭也产生只有經常參加競爭才能維持的現代的壟斷。如果壟斷者通過部分聯合限制相互間的競爭，那末工人之間的競爭就會加劇，而且某个國家的无产者的人数越比壟斷者的人数增多，各国壟斷者之間的競爭就越肆无忌憚。

关于土地所有权，蒲魯東認為它的起源不在經濟範圍之內，而基于同財富的生产很少有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慮；地租把人更緊地束縛于自然。馬克思反駁這一點時說：“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權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义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權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來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① 地租是农产品價格超过农产品生产費用（包括資本的普通利息和利潤在內）的余額。地租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产生的，而且只能在这种关系下产生。地租的来源不可能是或多或少明显的，或多或少持久的土地性质；它产生于社会，而不产生于自然。地租是資產階級状态下的土地所有權，也就是从屬於資產階級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權。地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土地經營变成实业性的，把实业資本用于土地，使城市資產階級移到乡村。地租并不把人束縛于自然，而只把土地的經營同競爭联系在一起。作为地租，地产丧失了它的不动产的性质，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組織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潤，只去追求农产品給他带来的貨币收入，教他們把地产看成仅仅是一架为他鑄造貨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地租使土地所有者完全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以至他連自己的土地都可以不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頁。

了解了。

最后，馬克思研究了蒲魯东对罢工和工人同盟所下的判决。蒲魯东断言，普遍提高工資会引起物价的普遍上涨，馬克思驳斥了这种說法。他指出，工資提高会使利润下降，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資和利润之間的比例发生变化，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罢工和工会有时事与願達，引起了机械技术方面的发明，馬克思认为罢工和工会对于工业发展的巨大影响就在这里。尽管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出于不同的动机警告工人不要急于使用罢工和組織同盟这两个武器，可是罢工和工人同盟仍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这种情况的真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大工业把大批互不和識的人們聚集起来。竞争把他們的利害关系分开。但是維护工資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們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組織同盟）下联合起来。”^①为了破坏这种反抗，个别的資本家也联合起来；而为了抵制联合的資本，原来各自孤立的工人同盟組成为集团。于是，工人維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維护他們的工資更为必要了。工人們捐献（这一点使经济学家們极为惊異）很大一部分工資去支援为爭取提高工資而建立的联盟。在这場斗争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发展着。工人所保卫的利益成了阶级的利益。同盟具有政治性质，因为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斗争。

馬克思提醒人們說，过去资产阶级为了首先形成为一个阶级，而在阶级形成以后，再把封建阶级改变为资产阶级，它也是从組織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的。“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6頁。

必須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現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繼續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①但是，旧社会崩溃以后，不会再出現一个表現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統治。工人阶级只有消灭一切阶级以后才能解放自己，正如资产阶级只有消灭一切等級才能解放自己一样。无产阶级的胜利将在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一个沒有阶级、从而沒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的联合，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政权就是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現。在这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对抗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社会运动并不排斥政治运动，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政治运动不同时也是社会运动。只有在一个沒有阶级的社会中，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結論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問題的提法必然如此。”马克思用乔治·桑的这几句话結束了自己的这部著作。^②

在反駁蒲魯东的論战中，马克思同一切空想主义彻底決裂。他确凿无疑地证明社会不是人脑的作品，不是聪明的或笨拙的建筑师的人造建筑物；恰恰相反，社会是本身具有自己的发展規律的活的机体。历史唯物主义已經确凿地证明是发现这些規律的方法，而不是創造这些規律的方法。三大文明民族的許多优秀人物迄今力求解决而未获成果的一些問題也得到許多新的說明。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虽然开辟了新的道路，但是在同时代人的意識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当时欧洲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頁。

② 同上书第198頁。

一点是不可理解的，或者也可以說是可以理解的。據我們所知，在德国的学术界里，当时这本书沒有受到重視，无论如何沒有受到应有的重視；在法国，它对蒲魯东的威信也沒有动摇多少，以至蒲魯东对法国无产阶级的影响仍然不断增强。

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个坚决而勇敢的先锋队逐渐团结在作为新时代的旗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周围。尽管学者們还不承认他們的成績，尽管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还不成熟，不能理解他們提出的口号，但是他們已經取得了一个值得在其中工作的活动地盤。他們的科学著作开始对当时的革命斗争发生强大的影响。

第十四章

共产主义者同盟

七月革命以后，比利时变成了认为自己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关，从而也同革命无关的标准的资产阶级君主国。它为一些大国的流亡者提供了避难场所，而在上述幻想破灭后，这个避难所也就名存实亡了。普鲁士政府想方设法要把马克思从布鲁塞尔驱逐出去，结果没有成功。但是，这种做法迫使马克思放弃了普鲁士国籍，同时他既没有在比利时、也没有在国外其他地方取得国籍。

在马克思流亡布鲁塞尔的三年中，比利时的首都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从1845年春到1846年夏，恩格斯也寄居布鲁塞尔。他们两个人从这里同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同《北极星报》的编辑朱利安·哈尼和《改革报》的编辑斐迪南·弗洛孔通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同伦敦的正义者同盟和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艾韦贝克通信。他们在布鲁塞尔市内也得到了一些拥护者，比如同蒲鲁东友好的市图书馆职员菲力浦·日果，吸引他参加革命活动的，也许主要不是共产主义理论，而是工人运动的人道方面。

他们同祖国德意志也保持着不断的联系，尤其在莱茵省，特别

是在該省的科倫，他們有一定數量的追隨者。此外，魏特林从倫敦，塞巴斯提安·戴勒尔从瑞士，約瑟夫·魏德迈从威斯特伐里亚，也先后到這裡找過他們兩人。魏德迈原来是个炮兵少尉，后来成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始終不渝的忠实战友。魏德迈返回德国以后，就尽心竭力地想給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爭取过来，同时也力图全面排除他們在德国境內从事写作活动遇到的出版困难。費尔巴哈的一个年輕的学生海尔曼·克利盖，为到新大陆去宣传共产主义而迁往美利坚合众国以前，也先到巴門去找過恩格斯，后来又到布鲁塞尔去見馬克思。

但是，在布鲁塞尔跟馬克思和恩格斯接触的一切人当中，威廉·沃尔弗跟他們兩人最为亲近。馬克思称他为“无产阶级的勇敢、高貴而忠实的先锋战士”，后来为了紀念他而把自己所著《資本論》的第一卷献給他。沃尔弗是西里西亚一个世襲農农的儿子；他历尽千辛万苦，在中学和大学里受到了古代語言的教育，而对本阶级的压迫者从来没有失去刻骨的憎恨心情。他被控为“煽动分子”，在普魯士的几个要塞监狱里受了几年折磨；后来到布勒斯劳当家庭教師，愉快而勇敢地同官僚制度和书报檢查制度作战。但是，他的革命斗志决不能滿足于这种幽默的游击战。他深入到布勒斯劳的无产阶级在其中受难的貧民窟去，他对这种“囚室”的动人描写，使他得到了一个光荣的外号——“囚室里的沃尔弗”。他在《德国公民手册》上发表的关于西里西亚織工起义的叙述，证明他对經濟問題十分了解。后来他被控違反出版法，不願意到普魯士监狱里去受罪，就先到倫敦，然后又轉赴布鲁塞尔去找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他們的最得力的助手。他为人忠实可靠，性格坚定，决不动搖，有責任感，对待朋友和敌人同样严格，而对待自己更加严格。

即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喜歡用大部头著作專門向学术界不厌其煩地傳播自己的理論認識（其实他們決沒有这样），也不缺乏进行共产主义宣傳的各种动因。他們的实际宣傳活動同他們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进行。宣傳活動是一項困难工作，往往一无所得，或者看来好像一无所得。他們不止一次地被迫放棄了他們这几年兴致勃勃地从事的写作計劃。尽管外来的障碍重重，尽管最令人不快的障碍恰恰是他們要想影响的那些人为他們制造的，比如指責他們輕舉妄动，有破坏欲，以自己的破坏性批判妨害社会主义运动，說什么如果不去計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社会主义运动一定会以不可抵挡的力量征服世界。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气餒。他們有先見之明，知道正是由于这些小事情，現代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才沒有明确的和一定的目标，才会接二連三地失敗。

毫无疑问，对蒲魯东和魏特林进行批判，对馬克思說来并不是一件乐事。这两个人都是天資聰穎的无产者，对他們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初出現，任何人都沒有馬克思那样高兴地欢迎和深刻地理解。我們也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馬克思在布魯塞尔期間对待魏特林是容忍而寬宏大量的。但是，魏特林的空想主义已經不可救药，除了把这个障碍从无产阶级的发展道路上除掉，再沒有其他办法。魏特林本人和一个公正的见证人——俄国的政論家安年柯夫，曾对彼此的矛盾达到不可調和地步的 1846 年 3 月間发生的一个場面作过戏剧性的生动描写。此后不久，魏特林自己又把事情弄到公开決裂的地步，而且采取的是一种显然是最不正确的方式。

这件事情发生在 1846 年 5 月，正值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几个亲密朋友不得不以通告形式反对克利盖的时候^①。这个年輕

① 參閱《反克利盖的通告》，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20 頁。

的大学生，辜负了特別是恩格斯寄予他的期望。他在紐約表現得幼稚而高傲，以欧洲共产主义的預言家自居，在他主編的《人民論壇報》上，正如布魯塞爾的通告所指出的，鼓吹荒誕的伤感主义的夢囈，宣傳“談愛的廢話”，把共产主义描繪成一种充滿愛的和反对利己主义的事业，把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纳为以下几个字：愛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种胡說八道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們的意志頽廢。克利益做得太不像話了，甚至他的故乡威斯特伐里亞的共产主义者都討厭他。呂寧甚至違反原作者的意志，在《威斯特伐里亞汽船》杂志上轉載了布魯塞爾通告，同时承认他这样做是对自己的杂志的一种自我批評。但是，魏特林不贊成布魯塞爾共产主义者声明，他在給克利益的信中，用极不友好的口吻說他怀疑这些人的意图。他的妄自尊大狂以及以为別人迫害自己的錯誤想法，終於使他最后一个朋友赫斯也同他疏远起来，于是他前往美国去找克利益。

在布魯塞爾共产主义者的通告中，也对克利益曾大加吹嘘的正义者同盟进行了批評。但是，参加这个同盟的无产者对布魯塞爾的批評，要比魏特林明智得多。1846年和1847年之交（馬克思說在1846年底，恩格斯說在1847年春），約瑟夫·莫尔到布魯塞爾来，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說同盟准备以他們的批判的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原則。于是，思想的闪电終於照射到素朴的人民土地上。真正无产者的組織（尽管这种組織为数还很少）所得到的东西多于一切不善于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历史意义去評价这一斗争的文献的、空想的和其他的社会主义所失去的东西。在布魯塞爾建立了同盟的几个支部，馬克思和沃尔弗在这些支部里积极活动。恩格斯为了解决格律恩在巴黎給那里的德国工人造成的思想混乱，而于1846年8月到巴黎去了，后来他也

留在巴黎支部工作，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不时返回布鲁塞尔。

就在这个时期，实际活动又展现出其他远景。在德意志邦联里，特别是在普鲁士境内 革命的预兆日益增多。在宣布召开联合议会的 1847 年的二月敕令颁布的同时，柏林的浪漫主义的国王开始向资产阶级投降。这是一个胆怯的开端，这个开端由于本身的历史条件必然要超出自己的范围。三月革命以前的专制制度的整个基础开始动摇了。雪恩和阿尔坦施泰因的传统，并没有在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中灭绝；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反复无常的统治企图完全消灭这种传统，可是正是因为这样，这种传统却反而得到巩固。隐蔽的反对派之风，一直刮到最高官厅的最秘密的柜子里，轻轻吹掉文件上的灰尘。这阵风在僧侣、教师和法官中间，在还没有完全听命于专横跋扈的最高官员的官吏阶层中间，刮得最凶。艾希霍恩在教会和学校方面的正统主义统治，在还没有完全变成伪善者的僧侣中间，在从大学一直到乡村小学的几乎所有教师中间引起了反抗的情绪。臭名远扬的纪律法使法官们感到愤慨；莱茵地方的司法人员由于法典经常遭到删改而感到怀疑和不信任。在军队里，特别是在青年军官中也有激进的趋势。当军事机关想以“有共产主义思想”为理由把明登的炮兵少尉安内克解除军职的时候，曾长期不能对他定罪。在公意审判中，他的真正同事，三十名青年军官主张宣判无罪，而有十八人主张解除军职，还有十八人主张只给予警告处分。为了解除安内克的军职，国王不得不亲自出马，他颁布了一道威胁性的内閣命令，指定了一个新的公意审判法庭，法庭成员全是校官。然后，一些年老的军官还不得不付出不少的力量，去劝阻安内克的昔日同僚不要同他保持友谊关系。这是一个特别令人惊讶的事件，但并不是青年军官中即将发生风潮的唯一征兆。

阿达尔贝特·冯·伯恩施太德原来是个普鲁士军官，他从1847年开始出版《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每周发行两期。他不是一个严格的有原则的人，但也不象秘恩斯坦那样仅仅是一个商人。由于普鲁士公使馆告密，他吃了一场官司，这件事很快就消除了流亡者集团对他的一切怀疑。马克思认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虽然存在许多缺点，毕竟还有一些功绩”^①；他希望把这份报纸搞得比过去好，而不在伯恩施太德的名字上寻找妨碍他这样做的理由。他同自己的一些朋友，从1847年春天开始，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日益热心地为该报写稿，使该报得到了当时欧洲民主主义的第三机关报（次于《北极星报》和《改革报》）的声誉。

在这期间，由于来了一些宝贵的人材，他的朋友增多了：格奥尔格·维尔特、莫泽斯·赫斯、斐迪南·沃尔弗到了布鲁塞尔，最后恩斯特·德朗克也来了。无产阶级中最进步的一些人物，如粉刷匠施泰因根斯，花边工人里德尔，还有《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两个排字工人：后来当了巴塞尔大学教授的斯蒂凡·波尔恩和后来担任美因兹市长的瓦劳，同这些博学的思想家结合在一起了。他们构成了1847年8月成立的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核心，协会约有一百名会员。不久以后，又在11月间成立了民主协会。这个协会具有国际性质。它把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同聚集在布鲁塞尔的政治流亡者团结起来。协会的名誉主席是把安特卫普从荷兰人手中拯救出来的老将军梅利奈，主席是曾任比利时临时政府委员的若特兰律师。副主席有三人：由德国人中选出马克思，由波兰人中选出曾任波兰临时政府成员的列列韦尔，由法国人中选出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土伊勒里宫总管的安别尔。当然，民主协会比德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2页。

志工人协会还要小一些、馬克思也从沒有夸大这两个組織的作用。他只认为，直接宣傳和社会活动，对每个人都会不断地发生振奋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从事直接宣傳时所創造的一切，即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文章和在德意志工人协会和民主协会上所做的报告，最后也是最多的，即他們为正义者同盟所做的一切，今天仍然不断地发生振奋作用。

一 《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

馬克思同伯恩斯太德的報紙的最初接触，是由他与卡尔·格律恩的論战引起的。

以真正的德国文人的方式在报刊上为自己大登广告的格律恩，用贼喊捉贼的手法詆毀馬克思，說馬克思为了贬低他的关于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运动的著作的价值，而在報紙上发表短篇文章进行小型攻击。格律恩办的《特利尔日报》就曾这样譏諷过馬克思。于是，馬克思声明說，为了表明他多么需要对格律恩使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而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他为自己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写的关于格律恩著作的詳細評論。这篇評論后来也确实載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上了；在发表这篇評論的同时，馬克思还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刊登了批判格律恩所著《从人的观点論歌德》一书的詳細評論^①。馬克思在評論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格律恩沒有从歌德身上发现任何天才的

^① 批判格律恩的著作《从人的观点論歌德》的文章，不是馬克思写的，是恩格斯写的。恩格斯 1847 年 1 月 15 日致馬克思的信证明了这一点。当梅林写《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时，馬恩通信还没有发表，所以梅林不知道。——原編者

和偉大的东西，而使这些东西沉沒在陈腐平庸的浊流里。他却用文人的笔法，夸大歌德的一切庸俗的、小市民的、瑣屑的特点，以便把德国的庸人描写成理想的“人”。

尽管这一批判十分中肯，尽管格律恩論歌德的那些庸俗的廢話已經受到了应有的批判，但是馬克思又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指責：“相当多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經常叫囂反对自由資产阶级，而結果，除了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沒有好处”。^①馬克思的这种做法，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莫澤斯·赫斯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并肩作战，他完全贊同他們在論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的一些文章中以及为反对卢格而写的若干評論中的观点。不錯，呂寧仍然抱怨馬克思的笔調刻薄，但是他却十分高兴地接受馬克思寄給他的批判格律恩的文章，并在《威斯特伐里亞汽船》杂志上发表。甚至馬克思对格律恩所下的严厉判決也必須限制在格律恩是一个不好的哲学家和不好的社会主义者这个范围内，而在文学活动方面，他仍然是一个好的民主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他們所特有的方式同情劳动阶级，从来没有想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卖給三月革命前的反动派。此外，在評論他們的历史功过的时候，应当写上減輕他們的責任的一筆：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对于三月革命前的自由主义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問題，不是那么简单的。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法年鑑》开始一再着重指出的，德国資产阶级正准备同王室和容克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就已經感到工人阶级掐住了它的脖子。因此，它的政策一方面仍然具有革命性质，可是另一方面，已經有了反动的色調。当馬克思和恩格斯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7頁。

要求工人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应当首先保证资产阶级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胜利的时候，当他们以辛辣的嘲笑斥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打算在自由主义击败封建主义以前就反对自由主义的一切企图的时候，历史的逻辑和理性是在他们两人方面的。但是，要想找出仍然具有革命性质的策略和已经带有反动性质的策略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也在这方面犯错误，不过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方向相反。当他们赞扬联合议会否决所得税，认为这一否决是“金钱上的一种坚决拒绝”，是从专制封建统治的薄弱地方使它失去活动能力的“有力尝试”的时候，他们给予否决所得税的反对派的荣誉太多了。联合议会上的发言和表决证明，所得税之被否决不是由于对政府的革命反抗，而是出于一种对有产阶级的腰包的十分反动的关怀。有产阶级甚至不肯牺牲一点点东西暂时地稍微改善一下劳动阶级的状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7 年 9 月 12 日发表了同《莱茵观察家》的政府一教会社会主义进行清算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在其他方面都很出色，但并没有摆脱上述错误。他们在反驳以只关心自己、丝毫不考虑“人民的福利”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为根据的人们时说：“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不会问，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资产者是不是想把无产者当炮灰。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资产者想怎么样，他们想知道的是资产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

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① 马克思又说，不要以为所谓无产阶级就是柏林的短工或波美拉尼亚的农民；无产阶级既很了解政府所说的人民福利和不良的社会地位的真实含义，也很了解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类似说法的含义。

至于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已经有过一千八百年的发展，可是这样原则又有什么成就呢？“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墜，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願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问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②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用下面一段话无情地粉碎了关于国王和人民之间可以结成同盟的美丽幻想：“对国王来说，一切政治因素中最危险的是人民。但不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所说的那种吃了拳头、得点小恩小惠就感动得流泪的人民，这种人民自然不危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0页。

② 同上书第218页。

因为他們只存在于國王的想像中。而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貧民，正像霍布斯所說的，是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一个結实而調皮的孩子；他不会让國王（无论是否瘦的还是肥胖的）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这种人民首先要向陛下要求有普选权的宪法，要求結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东西。他們一得到这些，就会充分加以利用，以便尽快地表示他們对君主制的权力、威严和詩意的态度！（梅林的引文是“……以便尽快地破坏君主制的权力、威严和詩意。”）^①这项預言只过了半年就字字应驗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上还同认为君主是一切反动势力的罪魁的政治激进主义进行了清算，这一清算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同政府一教会社会主义进行的清算。政治激进主义的这种观点，同只能把革命运动解释为煽动分子的教唆的君主們的观念具有同样的意义。这种激进主义的代表者思想越貧乏，叫囂得就越厉害；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卡尔·海因岑就是这类人物。在三月革命前的政治流亡者当中，海因岑与其說是由于智力过人还不如說是由于說話粗野而博得徽名，他决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手，但是他作为整个激进派的典型人物，毕竟还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同他进行比較严肃的論战还是值得的。

馬克思駁斥海因岑說，不能說君主制是德国社会的起源，恰恰相反，应当說德国社会是君主制的起源。“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动角色只是表明在旧社会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旧社会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須撑破。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梅林引文中缺“社会”一詞）越不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动派也越保守。这些新的破坏性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0—221頁。

社会因素越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保守意图也越反动。君主权力的反动性并不证明这种权力創造旧社会，倒是相反地证明，只要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亡，君主权力本身也就消灭。它的反动性同时就是旧社会的反动性，因为旧社会仍然是官方的社会，因此也仍然是权力的官方享有者或官方权力的享有者。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所以，現在君主专制不实行集权（集权本是它的开明措施）而打算实行分权。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級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級的活动，而現在却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末現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經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它那胆怯而魯鈍的目光又从使它繁榮的搖籃——城市，轉到了它从前埋葬强敌的地方——乡村。”^① 尽管这次辯論十分透彻，但是海因岑仍然百思不解。

他是够无聊的，在第二年革命斗争方酣的时候，写了一本枯燥无味的小册子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可是他自己的革命活动甚至不能滿足最起码的要求。叫庸人害怕而使警察高兴的是，他写了几个奇怪的問答式的小册子，为的是鼓动士兵們开小差；他还“发明”了蒸气断头台，想用它們把君主們成批地送到极乐世界。在大洋彼岸，他又大发雷霆二三十年，反对德国的君主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可是并沒损伤他們一根毫毛。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1—342頁。

二 德国工人协会和民主协会

馬克思在德国工人协会发表的关于經濟問題的几次讲演，只有片断保存在他論述雇佣劳动和資本的几篇文章中。这些文章证明馬克思在科学普及工作方面也是有才干的。馬克思首先探討了什么是工資的問題。他根据每个工人的日常經驗指出，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資是原有商品中山資本家用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劳动^①的那一部分。馬克思接着問道，劳动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他回答說，跟决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一切商品的价格决定于三方面的竞争：购买者之間的竞争，即需求；出卖者之間的竞争，即供給；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間的竞争，即供求关系的变动。这种变动每次都要导致商品的价格趋于它的生产費用的水平。但是，商品的时价总是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費用的。如果某种商品供不应求，那末，这种商品的价格就要上涨，大批的資本就要涌向生意兴隆的工业部門，直到出現生产过剩以后，該工业部門的产品价格落到产品的生产費用以下为止。如果某种商品供过于求，那末，就要发生与上述情况相反的过程，即資本由这种商品的生产領域外流，直到商品的价格漲到它的生产費用以上为止。同这种情况一样，劳动的价格也决定于劳动的生产費用。劳动价格經常变动，有时高于它的生产費用，有时又低于它的生产費用。但是简单劳动的生产費用，只等于維持工人生存

① 1891年，《雇佣劳动与資本》的單行本又出了一种新版，由恩格斯校訂并作序。在这一版本中，恩格斯作了某些修改和补充。（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53頁）按这个新版本，此处“劳动”一詞应改为“劳动力”。——譯者

和延續工人后代的費用。这种費用的价格就是工資。正如商品價格一般由生產費用決定一样，这种工資不是就单个人來說的，而是就整个種屬來說的。单个人所得，千百万工人所得，不足以維持生存和延續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資在其波动範圍內則是和这个最低額相等的。

接着，馬克思轉到資本的研究上去。按照經濟学家們的意見，資本是用作新生产的手段积累起来的劳动。馬克思反駁这种解釋說：“什么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种人。上面的說明和这个說明是一样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紡紗机是紡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資本。脫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并不是貨币，砂糖并不是砂糖價格一样。”^① 資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資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資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換价值的总和之变成資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屬於社会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換直接的、活的劳动而保存下来并增殖起来。“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資本的必要前提。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資本。資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換价值的手段。”^② 資本和劳动两者相互制約；两者相互产生。

資产阶级的經濟学家由此得出一个結論，說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的确啊！如果資本不給工人以工作，工人就会灭亡，而如果資本不剝削工人，它也会灭亡。生产資本增殖得越快，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6頁。

② 同上书第488—489頁。

也就是说，产业越繁荣，资产阶级越发财，生意越兴隆，资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越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越高。原来，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强过活的必要条件。

但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生产着同它敌对的力量——资本，而它从资本那里取得就业手段，即取得生活资料，是以雇佣劳动又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又变成使资本加速增殖的杠杆为条件的。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依存一样。

马克思假定了一种最适意的情况：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工资也提高了。但是工资的显著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而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又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速增长。所以，工人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所以我们要用社会的尺度来衡量它们。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格可能提高，甚至实际工资即用工资实际交换所得的商品量也可能提高，然而相对工资可能下降。

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但是资本家要用出售工人制造的产品所得的收入来偿付。对资本家来说，工人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可分为三个部分：补偿所用的原材料和损耗

的劳动資料，补偿工資和資本家本身的利潤。第一部分只是补偿原先就已存在的价值，而其余的两部分即工資和利潤，則完全是从工人的劳动所創造并附加于原材料上去的新价值中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來說，为了拿工資和利潤互相比較，我們也可以把两者看作工人产品中的一份。在这种情况下，工資和利潤彼此成反比，即利潤增加多少，工資就降低多少，利潤降低多少，工資就增加多少。甚至在資本和雇佣劳动之間的对比关系范围内，資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也是完全相反的。如果資本增加，工資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資本的利潤的增加却快得多。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們的社会地位的降低換来的。橫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会鴻沟扩大了。所謂生产資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論点，实际上不过是說：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敌对它的力量，即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財富，它就能在越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資本加強权力而工作——，这样的工作无非是它本身在鑄造金鎖鏈，让資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罢了。

然而資本的增加和工資的提高，实际上并不像資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所斷言的那样是彼此密切联系着的。好像資本越雄厚，它的奴隶也就长得越胖，这种說法是不正确的。資本的增殖加剧資本家之間的竞争。資本數額的增加，就使得有可能把装备着更强大的斗争武器的更有力的工人大軍投入产业戰場。一个資本家只要把商品卖得便宜一些，就可以把另一个資本家挤出戰場，占有他的資本。而为了有可能把商品卖得便宜一些，而又不使自己破产，这个資本家必須降低商品的生产費用，也就是要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首先要依靠扩大分工，依靠更加全面地采用机器和經常不断地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

人大軍的人數越多，使用机器的規模越大，生产費用相对地就縮減得越多，劳动就越有效率。因此，資本家之間就发生了各方面的競爭：他們都想扩大分工和增加机器，并尽可能大規模地使用机器。有一个規律在供求的变动範圍內必然使商品的价格同它的生产費用趋于一致，这个規律使生产方式发生革命，不断地改革生产資料，一再把資产阶级的生产甩出原先的軌道，老是在資本耳边說：前进！前进！假如我們想像这种狂热的激发状态籠罩了整个世界市場，那末不難理解，資本的增长、积累和集中怎样导向繼續不断地、突飞猛进地和日益扩大規模地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进旧机器。

这种情况同生产資本的增长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这种情况又怎样影响工資的确定呢？扩大分工使一个工人能做五个、十个乃至二十个人的工作，从而就使工人之間的竞争加强五倍、十倍乃至二十倍。不仅如此，分工还能引起劳动的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也就是說，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單調的生产力，就不需要什么特別的体力和智力了。工人的劳动变成人人都能胜任的劳动。劳动越是令人生厌，工人之間的竞争就越激烈，工資也就越减少。因为一种劳动越简单，越容易学会，它的生产費用就越低。工人試圖用多劳动的办法（或是多做几小时工作，或是在同样的工时內多生产一些产品），来維持自己工資的一般金額，可是結果徒劳。他工作得越多，他所得的工資就越少。原因很简单：他工作得越多，他給自己的工友們造成的竞争就越激烈，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們变成他自己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也像他一样按同样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

机器也发生同样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規模更大得多，因为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

上；因为哪里一开始使用机器，那里的大批手工业工人就被机器抛到街头，哪里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代替，那里的工人就被机器一批一批地排挤出去。资本家之间的产业战争有一特点，就是致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劳动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劳动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赛，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

但是，情况还不止于此！小产业家是经不住这种斗争的，这种斗争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生产的规模经常扩大，也就是说要做大产业家而不做小产业家。资本的总量和数目愈增加，资本的利息也就愈减少；小食利者就不可能再依靠利息来维持生活，必须投到产业方面去，而遭受小产业家那样的命运。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下降到工人阶级队伍里来，他们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没有别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愈来愈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愈来愈消瘦。

最后，资本家越是被迫以日益扩大的规模使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产业方面的地震也就越频繁，在这些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把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献给地下诸神才能维持下去，——简单地说，就是危机增加了。危机之所以来得更频繁更剧烈，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愈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以前未被征服或只被商业稍稍剥削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资本不光靠劳动生活。像显贵而又野蛮的奴隶主一样，资本也要它的奴隶即在危机时期死亡的大批工人给它陪葬。于是马克思用以下几句话作了总结：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那末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

业手段即生活資料就相对地縮減得愈厉害；虽然如此，資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

馬克思为了向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說明他关于大工业时代的經濟观点，做了几次讲演。可惜，这几次讲演所保存下来的，只是上面談到的仅叙述了重点的片斷。馬克思在民主协会发表的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是他当时进行实际宣傳工作的另一次嘗試。

起初，馬克思在 1847 年 9 月于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經濟学家會議上发表这篇演說，大声疾呼地拥护自由貿易。但是，馬克思当时沒有得到发言的机会。馬克思对自由貿易所持的态度，来自他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所持的原則性观点。恩格斯也是这样，他在爱北斐特发表的一些演說中，强调提高保护关税对于德国工业的必要性，但同时又警告人們不要把李斯特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宣傳看成拯救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万应灵药。后来他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指出，不論占統治的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貿易制度，工人的生活都同样坏，这样一来，是保护关税派得胜还是自由貿易派得胜，对工人都是完全无所谓。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需要保护关税，因为如果不采用人为的办法保护和鼓励它的工商业，它就无法維持和巩固下去，因而也不能战胜王室和容克阶级。从这种观点出发，工人阶级同保护关税制度也有利害关系。馬克思^①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在他反对格律恩的論文中把保护关税的宣傳叫做“资产阶级……的进步措施”^②的。但是 这絲毫也不妨碍他嘲笑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者里廷豪森。里廷豪森在布鲁塞尔經濟学家會議上为保护关税进行辯护，不过决不是从革命的立場出发的。

① 應該是恩格斯。——譯者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66 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业为了不被英国工业压倒，反而能同英国工业进行有效的竞争，就需要实行較高的保护关税。毫无疑问，他們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当他們从革命立場出发，表示拥护英国工业实行自由貿易和德国工业实行保护关税，同时揭去英国自由貿易派和德国保护关税派的口号的騙人外衣的时候，他們在原則上并没有陷入任何矛盾。由于自由貿易派把廢除英国的谷物法当做自己的最大胜利大加庆賀，而现在又不厌其烦地吹嘘，說什么无产阶级的千年王国将随着他們的統治而开始，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更有必要这样做了。

馬克思在他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中，反对自由貿易派的这种說法。他指出，英國的自由貿易派要求降低面包的价格，只是为了降低工資；并不是地租下降多少，工資就上升多少，而是地租下降多少，利潤也就上升多少。“英國工人已經向自由貿易派表明，他們是不願做自由貿易派那种幻想和欺騙的牺牲品的；他們所以联合自由貿易派來跟地主斗争，那只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殘余和孤立敌人罢了。工人并没有估計錯：为了向自由貿易派进行报复，地主和工人一起贊助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們三十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廢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①即使自由貿易像它的信徒們所声称的那样可以提高資本的生产力，这对工人也沒有什么好处。馬克思以他在关于雇佣劳动和資本的讲演中使用过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所謂貿易自由无非是資本的自由。这种自由决不会对工人阶级有所帮助。相反地，它毫不容情地使工人阶级遭受着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一切灾难。但是馬克思并沒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0頁。

有因此而维护保护关税制度。“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見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拥护者。”^① 保护关税制度只是一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这也就是說，使这个大工业倚賴于世界市場，从而依賴于自由貿易。保护关税制度促进了國內自由竞争的发展，它是年輕的資產阶级聚集自己力量的手段。馬克思指出，德国資产阶级当时为了爭取保护关税曾經付出巨大的努力。馬克思在結束他的演說时說，总的說來，保护关税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貿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資产阶级間的对立达到了頂点。总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馬克思才贊成自由貿易。

当然，在国际关系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捍卫着他們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們反对空洞无物的革命詞藻，因为这种革命詞藻忽視历史現實，把历史現實当作专制君主會議或外交家會議任意制造出來的、絕對應該受到譴責的事实，并想用所謂人民意志的絕對命令和自由的絕對要求，使这个事实在所謂人民意志面前消失得干干淨淨。他們认为各族人民普遍解放的障碍是：文明程度上的巨大差異和由此而来的各国人民的需要上的巨大差異。在同英法两国的民主主义者辯論时，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那种不顾各民族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叫它們胡乱結为兄弟的各民族普遍團結的理論。

另一方面，他們也反对妄自尊大。許多“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以妄自尊大的态度对待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特别是用这种态度对待各民族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的兄弟友爱。恩格斯在《萊茵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8頁。

年鑑》第二卷上写道：“真正的无产阶级（梅林的引文中缺“无产阶级”一詞）政党現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这种兄弟友爱比德国的一切‘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論都要宝贵得多。”^①他同马克思一样，认为民主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則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靠它本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談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經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則，群众的原則。”^②但是，这种民主所以有充分理由庆祝法兰西共和国，不仅是因为愚蠢得被人用去鎮压革命的一切人民应当公开地向法国人道歉，不仅是因为 19 世紀的社会运动只不过是法国革命的第二幕，而且是因为“在我們这个充满胆怯、自私和吝啬的资产阶级时代，回忆一下那个偉大的年代是完全适时的；那时全体人民曾經一度拋棄了一切胆怯、自私和吝啬，那时他們是敢于反抗法律的、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退縮的人，是具有坚强毅力的人，曾經在 1793 年 5 月 31 日到 1794 年 7 月 26 日使得一切胆怯鬼、一切小商人、一切投机者，总之，使得一切资产者都不敢抬头。”^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規定了各民族的兄弟友爱可能获得实践意义和成为实际力量的时代。恩格斯接着写道：“幻想成立欧洲共和国和利用适当的政治組織来保障永久和平，就像空談靠普遍的貿易自由来保护各族人民的團結一样荒唐可笑；当所有这类多情善感的幻想完全不中用的时候，各国的无产者就开始不声不响地在共产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真正地結为兄弟。也只有无产者才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662—663 頁。

② 同上书第 664 頁。

③ 同上书第 665 頁。

够真正做到这点，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无法超出民族的范围。他们的少数几个理论家即使把他们所有那些美妙的‘原则’都搬出来也顶不了什么事，因为他们根本不触犯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个现存制度，他们只会说空话。可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沒有民族的偏見，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①

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使得在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家和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的模糊预感中出现的各族人民兄弟友爱的国际思想，具有坚定、明确而具体的形式。他们探讨了在什么条件和什么前提下，这种思想才能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给他们指出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他们也毫不犹豫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三 正义者同盟內的危机

还在马克思住在法国，恩格斯住在英国的时候，他们就同正义者同盟发生了关系。但是，同盟当时所信奉的唯心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不能使他们感到满意，所以他们沒有加入同盟。

在这以后，同盟有了发展，表示願意接受他们的观点。同盟本身是由原来参加魏特林在瑞士組織的秘密同盟的成员組成的。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成员几乎全是手工业工人，其中以裁縫占大多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5—666頁。

1847 年，在巴黎的几个支部中，有两个主要是由裁缝组成的，有一个主要是由木器工人组成的。这些手工业工人的剥削者是小行东，他们自己也希望最后成为小行东。他们还有一只脚踩在持有行会妄念的德国手工业上。这些人都象魏特林在瑞士的信徒那样能干，但是也受到同样命运的威胁——陷入自己的两面性阶级状况的矛盾之中。

恩格斯对于同盟的几个最有声望的盟员作过如下的描写：沙佩尔“身材魁伟，果决刚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三十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正象他从‘蛊惑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所证明的，他虽然思维有些迟缓，但决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理论问题，并且一经理解就更加坚定地奉行。正因为如此，他的革命热情有时和他的理智是有距离的，但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这些错误。他是个纯粹的人，他在建立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亨利希·鲍威尔……皮鞋匠；他是个活泼、灵敏而诙谐的小伙子；但在他矮小的身体里也蕴藏着许多机警和果断。

……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有科伦的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这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力士——他同沙佩尔一起（屡次！）胜利地抵挡住成百个企图闯进厅门的敌人，——在毅力和决心方面无论如何不亚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智慧上则胜过他们。他不仅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多次作为全权代表出差获得的成功证明了这点，而且，对于理论问题也比较容易领会。”^①有两位比较年轻的领袖，即卡尔·普芬德和格奥尔克·埃卡留斯，在理论认识的能力方面大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42—243 页。

胜过这几个年长的领袖。普芬德是一个纤细画家，原籍海耳布朗，恩格斯说他具有一副精细独特的头脑，有诙谐、讥讽和辩证的天赋能力。埃卡留斯是个裁缝，原籍图林根。

如果拿埃卡留斯论伦敦的缝纫业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大小资本的斗争》），同魏特林的著作比较一下，立刻就可以明白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为什么没有遭到在瑞士遭到的那种失败。埃卡留斯的写作才能虽然远不如魏特林，但是他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明确理解，足以补上他在这方面不如魏特林的地方，甚至使他超过了魏特林。埃卡留斯的文章没有不健康的感情，没有伤感的、道德的和心理的批判。他把大工业战胜手工业看做历史的进步，认为大工业的成果就是历史本身所产生的和每天不断被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

当埃卡留斯写他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已经是马克思的学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正在于正义者同盟设在世界市场的中心而领会了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者同盟从把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以后，就从一个德国人的同盟逐渐变成国际性的同盟。在同盟组织的工人协会里，除了德国人和瑞士人参加以外，还有主要用德语同外国人交际的各民族的成员，即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也有俄国人和英国人。这个协会不久以后就自己命名为共产主义工人协会，并把“人人皆兄弟”这句话至少用二十种文字——据恩格斯说，有些地方还有文字错误——写在会员证上。公开的协会的国际性质，在实际上由于会员的国籍不同，在理论上由于认识到任何革命要想胜利就必须是全欧革命，也对秘密的同盟发生了影响。正义者同盟积极地参加了居住在伦敦的政治流亡者每逢法国大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而举行的国际大会。

同时，同盟的社会学說也超出了粗淺的平均共产主义的范围。这个学說在发展中通过了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哲学的几个不同阶段。沙佩尔和他的几个同志，在魏特林主办的杂志上著文介紹歐文組織的移民区。这种移民区尽管有很多空想性质，但是必然擦亮了他們的眼睛，使他們了解大工业的状况。在奧古斯特·貝克尔在瑞士同德国的天主教互相献媚的同时，鮑威尔、莫尔和沙佩尔发表了致隆格的公开信，用巧妙的諷刺痛斥了这个新的使徒。他們在公开信里写道：“你在創立新的民族教会，耶穌基督也沒有創立过任何民族教会。为了使教会成为民族的，你在做弥撒时廢除拉丁文的圣歌，改用德文的圣歌。現在人們了解，他們做弥撒时所唱的圣歌了，但是他們每个礼拜日，或者每天都听到他們所了解的东西，不也更加无聊嗎？如果你們突然在一些偏僻的地方用民族的德語去念千余年来在世界各地每天都用拉丁文念的一些經文，渴望求知的、貧穷而受压迫的教徒能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呢？”以及其他等等。当魏特林来到倫敦的时候，他再也不能和同盟的領導者取得諒解了。他已經过于迷恋自己的先知身分，而同盟的領導者們则远远地走到了一切宗教的空想主义的前面。但是他們沒有使，而且也不可能使同盟的秘密学說超过德国哲学和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的混合物的水平。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与活动具有重大意义。他們提出对資产阶级社会的經濟結構的科学理解是唯一可靠的理論基础，并以通俗的方式說明，問題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主义体系，而在于自觉地参加正在我們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据馬克思說，当时发出的一些通告，对于同盟的发展起了上述的作用；可惜，这些一部分鉛印，一部分石印的通告沒有保存下来。但是不管怎样，当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准备立即加入同盟的时候，莫尔就宣布中央

委員會准备在倫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批判的观点作为同盟的學說以公开宣言的形式提出来，但是由于有一些盟員陈腐守旧，坚持反对的意見，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亲自出馬，而他們的这一協助，又同他們加入同盟联系起来了。当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德国工人阶级內部需要一个組織，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組織只能是个秘密組織的时候，一切顾虑就都消除了。

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847年夏在倫敦召开的。馬克思沒有参加这次大会；但是，恩格斯以巴黎支部代表的身分，沃尔弗以布鲁塞尔支部代表的身分，出席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首先进行了同盟的改組工作，廢除了一切还能使人想起陈旧的密謀傾向的东西，使同盟具有了完全根据民主原則組成的宣传团体的性质。在同盟章程第一条里写道：“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統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沒有阶级、沒有私有制的社会。”同盟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称組織起来，同盟的組織机构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关于这一方面，同盟章程有以下各項規定。支部的組成至少三人至多二十人。区部轄有两个以上十个以下的支部。本国或本市的各区部隶属于一个总区部。区部委员会是区内各支部的权力执行机关，总区部是本省各区部的权力执行机关。总区部同这些区部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不少于五人，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作一次关于全盟状况的报告。支部、区部委员会以及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員任期为一年，連选得連任，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換之。代表大会

是全盟的立法机关。盟員不超过三十人的区部派代表一名，不超过六十人的派两名，不超过九十人的派三名，依此类推。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在每次會議后代表全党发表宣言。

关于同盟的經費，則由代表大会为每个国家規定每一盟員应当繳納的最低盟費。盟費半數上繳中央委員會，半數由区部或支部留用。同盟的貨币收入完全用于宣傳目的：支付聯絡費用，支付印发傳单的費用，支付派遣代表的費用。同盟章程要求每个盟員除承认共产主义外，还必須“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傳工作”，但是沒有詳細規定进行这种宣傳的方式，在實踐中，仍然使用正义者同盟試用过的方法。盟員的活動首先是成立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这种教育协会每周举行两次晚会，一次是討論各种問題，另一次进行各种娱乐、唱歌和朗誦文艺作品等活动。工人教育协会設有图书閱覽室，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成立向工人傳授各种基礎知識的学校。站在公开的协会后面并領導协会的秘密的同盟，把协会看作从事公开宣傳活動的最便利場所，并吸收协会的最合格的會員补充和扩大自己的队伍。由于德国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不定，到处飄泊，所以中央委員會只在极少数情況需要派遣特別代表。

新的同盟章程分送到各个支部討論，后来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最后通过。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是在倫敦举行的，時間在1847年11月和12月。主席沙佩尔和秘书恩格斯“受1847年秋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同盟章程上签字。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間，还发生了一个具有特色的插曲。当时正向自己的“伊加利亚”^①遣送共产主义者的卡貝，也要求倫敦的共产主义工人协会給予帮助和支持。这个协会的答复表明，它已經十分

① 卡貝在美国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譯者

清楚地了解现代无产阶级的任务。协会对卡贝本人表示了应有的尊敬，并且十分高兴地承认，卡贝以不倦的热诚和令人钦佩的毅力为受苦的人们的事业进行斗争，通过对各种阴谋所作的警告，为无产阶级立了无法估量的功劳。但是，协会同时又反对卡贝的移民计划，认为这是一条错误道路。协会利用一些令人信服的论据，证明实现这一计划会对共产主义原则带来极大的危害，使得各国政府得到胜利，使卡贝的余生因大失所望而暗淡无光。协会提醒卡贝注意他自己比较正确的看法：对于承认个人自由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没有一个过渡时期，即没有一个使私人财产逐渐变成社会财产的民主过渡时期，就不可能实现财产的公有，犹如农民认为不播种就不能收获一样。卡贝还亲赴伦敦，同那里的德国共产主义者辩论了一个星期，但是他没有能够使他们赞成自己的空想。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把同盟的学说说明文规定在宣言里面。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宣言草案，经出席代表大会的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和瑞士的工人讨论了不下十天；在草案的作者对大家提出的一些疑问作了彻底的解释以后，全体一致委托他们起草公开发表的宣言。以前的那句具有温情色彩的口号“人人皆兄弟”，被一句新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问世；不久以后，它的英文、法文、丹麦文和波兰文的译本也相继出版。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旗帜升起来了。

第十五章

《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以經典性的叙述总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他们的实际斗争和理论研究中获得的成果。

《宣言》肯定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历史性的，即像这样一个宣言，只有在它实际问世的那一历史时刻，才可能产生。对于宣言诞生的时代首先要有一个认识，然后才能完全了解它那不多的篇幅包含着的丰富的思想世界。如果说它尽管如此却胜利地经受了五十年的考验，胜过了许多企图永久生效的纲领和体系，并在巨大变革的时代里日益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旗帜，那它就应该把这种世界历史性成就归功于它的两位作者得以理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的那种明察秋毫的眼力，归功于他们得以在这个社会还处于历史开端的时候就说明了这一过程的那种巨大才能。

《宣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贯穿整个宣言的基本思想是下面几点：即经济生产和必然由此产生的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构成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基础；同这种情况相适应，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一斗争

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已经达到使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把整个社会永远从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就再也不能把自己从剥削和压迫他们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地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其中占有光荣一份的一些新研究发现了没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原始时代的历史以后，上述基本思想有了一个，但也仅仅是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就是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自从这种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后，社会才开始分裂为阶级。

在《宣言》的第一节《资产者与无产者》里，概述了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作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多次变革的产物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发生史。“资产阶级这样每发展一步，都伴随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它在封建主统治时期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面是一个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又组成君主国中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的君主国里或专制的君主国里与贵族相抗衡的势力，并且是一切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确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揽的政治统治权。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①

《宣言》以明确的笔触描写了资产阶级曾在历史上起过的那种非常革命的作用。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蔽着的剥削。它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活动的神圣光彩。它使医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468页。

律师、牧师、詩人和学者变成了向它拿錢的雇佣劳动者。它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經常发生变革，不使生产关系发生革命，从而不使全部社会关系发生革命，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地，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賴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因为它消灭着一切等級制的和停滞不前的东西，亵瀆着一切神圣的东西，所以人們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靜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銷路，資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場，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 and 消費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旧的地方的和民族的閉关自守和自給自足状态已經消逝，現在代之而起的已經是各个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賴了，而且无论是在物质生产方面，还是在精神生产方面都是如此。資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漩渦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彻底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和征服野蛮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資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在本国采用資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这样它就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創造出一个世界。

資产阶级已經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規模巨大的城市，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資料集中起来，使財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資产阶级爭得自己的阶级統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可是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利用机器进行的生产，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輪船的航行，铁路的运转，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

下呼喚出来的大量人口，——試問在过去哪一個世紀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潛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

現代的資产阶级社会，曾經像用魔法似地造成了极其龐大的生产資料和交換資料，而現在却像一个魔术士那样不能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喚出来的魔鬼了。資产阶级用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个武器，現在却对付資产阶级自己了。就像資产阶级据以成长起来的生产資料和交換資料以前粉碎了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一样，現代的生产力已經几十年来一直在反抗現代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反抗那种作为資产阶级及其統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商业危机的周而复始，越来越凶猛地威胁着整个資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在商业危机期間，发作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回到了現代的野蛮状态，而这种情形竟是因为社会文明过度，生活資料过多，工商业規模过大而造成的。資产阶级的关系已經太狭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資产阶级只能双管齐下地来克服这种危机，即一方面不得不大量地破坏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夺取新的市場，并且更加彻底地榨取旧的市場。可見，資产阶级一方面在准备更加全面和更加猛烈的危机，另一方面又在減少防止危机的手段。

但是資产阶级不仅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运用这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无产者。現代的工人只有当他們能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可是他們又只有当他們的劳动能增殖資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宣言》也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作品那样，簡單扼要地描述了現代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特別強調的一点是，旧社会的內部冲突在許多方面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过程。資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最初是反对貴族，后来又反对那部分利益同工业进步相抵触的資产阶级，并且由始至

終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求援，从而把无产阶级卷进政治运动里去，把自己的知識授予无产阶级，也就是把反对自身的武器交给了无产阶级。其次，被工业进步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的，或至少由此而使生活条件受到威胁的那部分統治阶级，也給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知識。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显得非常强烈和尖銳，以至統治阶级中間有一小部分人，特別是一部分已經提高到在理論上认识全部历史运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分化出来，归附于革命的阶级。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而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他們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們这种中层等級的生存，以免于灭亡。因此，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反动的，因为他們力图把历史的車輪扭向后轉。如果说他們是革命的，那是指他們將轉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那是指他們维护的不是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他們将来的利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的消极的腐化物，他們虽然間或被无产阶级革命卷进运动里，但是他們的全部生活条件却使他們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謀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謀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即使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也总是国内的斗争。每

一个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当然應該首先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发展，形成現存社会內部的多少隐蔽的国内战争，一直到这个战争轉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以建立自己的統治。

《宣言》这样描述了現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的变革过程以后，在第一节的末尾用几項强有力論点总括了这一过程。至今有过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某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維持它那奴隶般生存的条件。可是，現代的工人却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长得还要快。资产阶级再不能統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隶維持奴隶般的生活的水平了，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們落到必須由它养活而不去养活它的地步。社会不能再在它的权力下面生活下去了。它的生活再不能同社会相容了。资产阶级的統治依靠雇佣劳动来支持，而雇佣劳动則依靠工人的自相竞争来支持。但是，资产阶级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却使工人們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工人們因自相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工业进步就把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从资产阶级的脚底下抽掉。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宣言》的第二节論述了共产党人对无产者的态度。“共产党人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殊政党。他們并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們并不提出什么想用以限制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的原則。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別重視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

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所以，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同其余一切工人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接着，《宣言》十分卓越地证明，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造出来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而是恰恰相反，这些原理来自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阶级关系。这一证明彻底解决了五十年来资产阶级及其学者向科学共产主义提出的一切质问。叫嚷消灭个人获得的，自己用劳动挣来的财产，这除了使资产阶级也像一切已经灭亡的统治阶级一样产生错觉以外，不会再有其他结果。资产阶级消灭了封建的所有制，它不反对自己的生产方式每天在消灭小资产阶级的和小农的所有制，但是却把自己的特殊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由生产发展过程中暂时存在的历史性的关系窜改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一谈到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它就再也不去理解在说到古代的所有制和封建的所有制的时候它所能理解的那些道理了，也就是说，它不敢去理解这种所有制是历史产物并且属于历史过程的道理了。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具有的一个特征。法国革命廢除了封建的所有制，因为后者同社会的历史发展已经不能相容了；而共产党人也想在与此相同的历史基础上，廢除现代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但是，既然这种所有制是那种以阶级对抗、一部分人剥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9页。

另一部分人为基础的产品生产和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善的表現，那末共产党人就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話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

有人說，这样一来，那种构成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就被消灭了！在現存的社会里，私有制在十分之九的社会成員中已經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已在十分之九的社会成員中間不存在了。所有制以它現代的形式在資本和雇佣劳动之間的对立中演进。資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資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員的共同活动，才能动作起来。即使把資本变为屬於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财产，这也并不是把个人財产变为公有財产，而只是改变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因为所有制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另一方面，雇佣劳动者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并沒有給他們創造任何財产，而只能勉强維持他們的生命的再生产。共产党人决不打算消灭这种直接用于生命再生产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因为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能为占有造成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共产党人所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悲惨性质，它使工人仅仅为增殖資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統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們生活的时候，他們才能生活。“在資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不过是增殖已經积累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經积累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所以，在資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着現在，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則是現在支配着过去。在資产阶级社会里，資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①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1—482頁。

关于消灭自由和个性的一切言詞，不外乎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个性。资产阶级高谈自由的大話，一般說来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对于中世紀的受奴役的市民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要消灭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來說，却是毫无意义的。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然后，《宣言》反駁那些說共产党人打算消灭家庭和祖国的指責。《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家庭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的制度上面；这种家庭的完全发展的形态，只有在资产阶级中間才存在；这种家庭的补充現象，就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娼制度。大工业越是破坏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他們的子女越是变成简单的商品和劳动工具，那末，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的那一套大話，就越是令人听来作嘔。《宣言》以辛辣的嘲笑，指出资产阶级裝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对于共产党人要实行莫須有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惊駭，其实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希望在消灭現有的生产关系的同时，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消灭。

同工人沒有家庭的情况一样，工人也沒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們原来沒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确定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随着貿易自由和世界市場的发展，随着工业生产和与它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間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无产阶级的統治，将更加快它們的消逝。共同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共同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人对人的剝削一

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也会随之而消失。

《宣言》简短地批驳了从思想、宗教和哲学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人们的观念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人们谈到思想能够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时候，只不过是说明下述事实：在旧社会的内部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解体与旧生活条件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当18世纪基督教思想在启蒙思想的打击下陷于灭亡的时候，封建社会曾经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知识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① 有人反驳说，永恒的真理是存在的，比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当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改变，然而尽管有这种改变，它们终被保存下来；共产主义如果不同历史发展背道而驰，是消灭不了这些真理的。《宣言》对此回答说，社会的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采取各不同的形式的，然而这种剥削却是过去一切世纪所共有的事实。“所以，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一定的共同的形态中演进的，也就是在那些只有随着阶级对立的彻底消逝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识形态中演进的。”^② 共产主义革命将像它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一样，来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宣言》这样有力地驳斥了对共产主义的责难以后，又回过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8页。

② 同上书第489页。

来叙述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这种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手里，并且尽可能迅速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最初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是各不相同的。《宣言》认为，在一些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以下的办法：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征收高额累进税，廢除继承权，沒收一切逃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把信贷和运输事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的数量，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人人都必须劳动的制度，成立产业军，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以及其他等等。

在发展过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都集中到由各个成员组成的联合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在团结成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消灭扎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根子的旧生产关系的时候，它也就一并消灭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宣言》的第三节是批判 19 世纪上半叶的社会主义文献和共产主义文献的。《宣言》把这种文献分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

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又分为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宣言》对封建的社会主义作了经典性的评价。这一评价现在对于这种社会主义还完全适用，只是封建的社会主义的那种绝望的讽刺更加平淡无味了，它的政治实践更加彰明较著了。封建的社会主义是作为法国贵族在七月革命中，英国贵族在改革法案中遭受失败的结果而产生的。法国贵族和英国贵族不能再唱封建—浪漫主义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别人对他们的同情，他们不得不使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的声罪致讨具有维护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外表。因此，他们引以为快的是，对自己的新统治者唱唱讽刺歌，并向他低声细语地说一些不祥的预言。“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哀怨，半是讥讽；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候固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判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进程的劣根性，却常常使人感到可笑。这班贵族为了笼络人民，往往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人民每次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臀部盖有旧的封建印章，就哈哈大笑，哗地一下子散去了。”^①封建剥削是在同资产阶级的剥削完全不同的（现在已经过时了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当封建主证明在他们统治时期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便忘记了一个事实，即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那个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不过，他们很少隐讳自己那一套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恰好是说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根本推翻的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2页。

发展起来。他們責备資產階級，與其說是因为它产生了一般性的無產階級，倒不如說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無產階級。所以，在政治實踐上，他們總是參加反對工人階級的一切暴力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又不顧自己所吹噓的那一套堂皇動聽的論調，却總是毫不放过機會，拾取黃金果，不惜信義、愛和名譽，靠經營羊毛、甜菜和燒酒生意获取暴利。”^① 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被当作封建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处理。它只不过是僧侶用来滌除貴族肝火的一种圣水罢了。

《宣言》中提到的第二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主要在法国是这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具有当时的形式的这种社会主义已經不存在了，可是《宣言》对它所作的批判，今天也一点沒有过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对立越尖銳，資產階級的一切社会主义也就越集中力量去保护小資產階級、中等阶层和反集体制度的农民。“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宣言》对于小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所做的这一批判，像适用于西斯蒙第的社会主义那样适用于（也許比前者更适用于）反犹太人主义、农民狭隘性和行会习气。

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同西斯蒙第的社会主义相似，但在原則性批判的深度和强度上远远不如后者。在它提出的防治弊病的手段的动摇性方面却远远超过后者。对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仍想在現代資產階級社会里为中层等級寻找巩固的安身地盤的緊張嘗試，《宣言》先就作了如下的批判：“在近世文明已經发展的国家里，已經形成了——并且作为資產階級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經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資產階級，它动摇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但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2—493頁。

是，竞争經常把这一阶级的成员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所以他們已开始觉察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們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們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們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① 今天，这个历史过程已經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至在教授的文献中出現的“新的中层等級”，实际上主要由大企业的职员构成，旧的小工业和小商业的日益没落的殘余分子只占少数。正因为这样，这个中层等級就不像人們宣称的那样是資本主义所有制的花崗岩支柱；相反地，它却是一根弱不禁風的芦葦，旧式手工业的根即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并沒有扎在它那里。中层等級毫无疑问构成一个比无产阶级拥有特权的阶级，而且能使一些担惊受怕的人安心，因为他們当中的大部分人对于工人的解放斗争沒有了解，甚至持有敌意，而他們本身又經常受到这种命运的威胁，即随着資本日益集中，他們将由于竞争而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因此，中层等級日益分化为两个集团，其中一个較小的集团占据了較高和較好的职位，另一个較大的，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的集团则被迫降低到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第一部分人变成資产阶级的毫无节操的奴僕，从而絕對不能成为中流砥柱；第二部分人日益同无产阶级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他們大部分处于从屬地位，以至他們不能像真正的雇佣劳动者那样进行坚持的斗争，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已被《共产党宣言》看到內在本质的“新中层等級”，并不是被学者教授捧得天花乱墜的、資本主义社会的救星。新的中层等級越代替旧的中层等級，私有制的基础就越动摇，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希望就越大。

反动的社会主义的第三种形式，就是以赫斯和格律恩为代表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3—494頁。

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这种社会主义产生于德国，所以《共产党宣言》对它批判得特别详细，特别尖锐。然而并不完全公正，因为问题在于这种社会主义的当时代表者们的意图。在《共产党宣言》出版的时候，这种社会主义差不多就不存在了，但从它的历史本质来说，它决没有从德国的土地上灭绝，虽然它早就不再把法国的社会主义词藻翻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德语和伤感性的爱的幻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这种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害怕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德国特有的市侩，这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特点。不管这种社会主义怎样打扮，也不管它一会儿是偷理学文化，一会儿是自然主义美学，或是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它的外衣始终是一样的，正如《宣言》中所说，是“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辞令花彩和浸透甜蜜温情之泪的”^①外衣。在这种社会主义者中间，当然有一些精明强干的人士，比如在40年代就有莫泽斯·赫斯。随着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加剧，这些人日益趋向“横蛮破坏的”共产主义，而大多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则在相同的条件下后退、滚进资本主义的泥潭，而且是滚进这个泥潭的最深处。

正是阶级斗争不断加剧这一假说，随着本身日益变成历史现实，而使保守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结束了它们的存在。《宣言》除了批判反动的社会主义以外，也对这两种社会主义作了毁灭性的批判。《宣言》举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保守的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系统性著作，可是蒲鲁东主义甚至在它的祖国，已经沦落成为少数资产阶级人士的玩物，而在德国几十年来只找到一个古怪人物做它的孤独的信徒。保守的社会主义同它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可怜改革企图保全资产阶级，而不顾无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7页。

級；它要求无产阶级“始終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要他們拋棄把这个社会看成是一种可恶东西的观念”^①；它断言“資产者之为資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②这种社会主义不管怎样在不犯急躁的紙上高談闡論，实际上不过是过了时的笑料。

尽管在資产阶级的一切种类的社会主义当中，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为科学的共产主义作了最有价值的准备工作，可是上述批判对它同样适用。《共产党宣言》完全承认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这种功績，但是它也指出这种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是革命的思想家，而圣西門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和欧文主义者則成了反动的宗派主义者，因为他们看不见无产阶级的明显进步，死抱着他們的先师的陈旧学說不放。而今天的空想主义，在它还可以出現的地方，比如在海尔茲卡的沒有成功的探险中，与流行的反动社会主义所不同的地方，“只在于……更为一貫迂腐，更加狂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能奏奇功異效罢了。”^③

《宣言》的第四节，也就是最后一节，說明了共产党人对于各种反对派的态度。当然，在这一方面由于五十多年来的历史变革，整个情况已經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这一节里所确定的共产党人的策略原則却胜利地經受住了艰巨的考驗。共产党人为达到工人阶级的直接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他們在現在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他們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現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在所有这些运动中把所有制問題当作运动的基本問題加以強調，不管这个問題当时的发展程度如何。共产党人到处都为爭取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8頁。

② 同上书第499頁。

③ 同上书第502頁。

世界各国民主政党之間的團結和協議而努力。上述这些原理，今天仍然保持着它們的全部作用，當然要有一定的條件，即要從《宣言》的思想聯繫當中去理解這些原理，從而要把革命運動理解為經濟政治變革，而不理解為幼稚的謀殺和暴動，要把各國的民主政黨理解為無產階級的民主，當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民主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里再次破產以後，對於這一點今天就不像以前那樣可能發生誤解了。

對於各個國家來說，《宣言》建議聯合當前革命發展的激進的一端。在法國，共產黨人要聯合社會民主黨，聯合改革報派，反對保守派和激進派的資產階級，但不放棄自己對於那些從革命傳統中產生的空談和幻想採取批判態度的權利。在瑞士，共產黨人要支持激進黨人，但是不要忘記這個政黨是由一些相互矛盾的分子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國式的民主派社會主義者，另一部分是激進派的資產者。在波蘭，共產黨人要支持把土地革命當作民族解放的條件的政黨。“在德國，當資產階級還採取革命的行動的時候，共產黨就同它一起去反對君主專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動市僧。但是，共產黨一 minute 也不停止培養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確地認識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敵對情形的意識，以期德國工人能立刻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所必然帶來的那種政治的和社會的條件，作為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國各反動階級之後，立即就開始進行反對資產階級本身的鬥爭。共產黨人現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國，是因為德國正处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是因為德國將在整個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 17 世紀的英國和 18 世紀的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變革。所以，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一定要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①《宣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03—504 頁。

言》是用以下几句话结束的：“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头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①

越到后来，《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越成为现代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在《宣言》刚一问世的时候，只有先进的无产者和有眼光的思想家的小小的精锐队伍热情地欢迎它，但是这支队伍毕竟太小了，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人数，在有盟员的各国总共也不过几百人。后来，随着革命的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宣言》曾一度失踪。但是，工人运动的巨浪的再起，又把它涌上水面，像一只领航船一样，用罗盘针指出驶过波涛汹涌的海面奔向劳动的新世界的正确航程。现在，《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意义的著作，是山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在本阶级的伟大解放斗争中必须自愿遵守的共同纲领。

在资产阶级世界，《宣言》遭到了相当奇怪的命运。它以卓越的力量使迄今只靠英国和法国的残羹剩饭过活的德国政治经济学进入欧洲的一些文明国家。在这个经典文献出现的时候，还被视为德国市民的世袭财产的伟大的理论智能已经完全消失了，以至有三十多年之久 对德国资产阶级来说，《宣言》只存在于政治警察的禁书单上。可是，一个叫施梯伯的，还是从《宣言》中发现了“智慧和毅力”。1881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即哈雷的胡·艾森哈特，在德国的大学教授中第一个荣幸地发现了《宣言》的存在。艾森哈特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史》中，称《宣言》是“对巴贝夫宣言的可怜的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4页。

子式模仿”，并引证了一句他凭空杜撰出来的毫无意义的话，作为模仿的例证。这句话是：“我們希望平等，尽管一切艺术因此而归于毁灭。”从此以后，又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現在，夜猫子也学会看亮光了，他們在《宣言》中发现了“暴力革命”，从而也发现了道德憤懣用之不竭的材料。

毫无疑问，《宣言》的作者决不听天由命地等待现代的资产阶级，一俟他们的历史丧钟响起来以后，就心甘情愿地放棄自己的統治地位。但是，资产阶级本身对于这一点也有不同的意見。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谴责“暴力革命”，认为这是对統治阶级的善意的粗暴怀疑；而资产阶级的法院和警察当局，则把以和平方式宣傳自己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无产者看成喝人血的革命者，对他们判罪处刑，因为他们从不指望现代的资本家自己剥夺自己。其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欧洲的土地上就已经响起规模巨大的阶级斗争即将爆发的轰鸣，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舒服地占据了无产阶级通过推翻专制封建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暴力革命”为他们打出的地盘，可是他们一点也不感到内疚。

事实上，即使是最值得尊敬的頑固学者对于“暴力革命”发出的怨言 也没有认真討論的价值。在这个問題上需要对《共产党宣言》加以訂正和补充的意見，已經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說出来了。既然对1789到1830年的法国革命时期的研究使他们深入觀察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变革过程，那末正是这一研究促使他们十分忠实地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移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宣言》出版的时候，两位作者都还不到三十岁，他们在暮年尚且經常准备从历史的实际經驗中吸取教訓，而在年轻时候就更不可能无视这种实际經驗了。

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1年的革命斗争时，就已经明确指出

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在进程上的差别：“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花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Hic Rhodus, hic 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①

后来，巴黎公社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恩格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为例，在自己的最后一篇著作^③中再一次说明，由于历史辩证法的作用，革命的无产阶级从原则上规定和平的和合法的斗争手段时，可以长得两颊红润，好象是长生不老似的，而最适当的秩序维护者却声嘶力竭地要求“暴力颠覆”和“自上而下的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页。

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页。

③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译者

要求政变和公开的刺刀統治。

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敌人，喜欢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一个社会主义的仙人，一旦它不能屈指按日算出在今后几百年內将发生什么事情，它就是一个冒充的预言家。正直的人們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同一切奇門遁甲是針鋒相对的，它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能根据劳动力及其使用的劳动工具作出比較准确的結論。劳动力用《共产党宣言》建造了一个精神的世界强国，在当时的历史科学水平上，劳动力所能使用的劳动工具越不完备，劳动力就越令人惊異。《宣言》本身說，宣言中的各項原則的实际应用，是随时随地都要依現存历史条件为轉移的，不过不管条件怎样变化，宣言中的各項原則仍然是不可动摇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既不是为了应一年之急，又不是为了供十年之需，而是为了百年大計；有些情况在几年或几十年中似乎还同他們的看法大不相同，可是过不了百年事实就会证明他們是正确的。

他們曾經认为，德国的資产阶级革命将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在凱尼格列茨和色当会战时期①，这种看法看来是多么錯誤啊！可是，如果我們今天回顾一下历史发展的偉大进程，那末德国資产阶级革命又能成为什么别的东西呢？

① 1866年普奧戰爭期間，奧國軍隊在凱尼格列茨地區大敗。1870年，普法戰爭期間，法國軍隊在色當潰敗。——譯者

注 釋

“每一本非必須自己爭取自己的存在權利這一舊的經驗，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一部力圖合乎科學要求的歷史書來說，更是三倍正確。”這是我在五年前（1897—1898）第一次出版這部著作時寫的一段話。今天，這部著作第二次出版時（1903—1904），我可以说，它已經爭得了它的存在權利。

甚至格·阿德勒、馬·哈爾登和維·桑巴特之流對這部著作傾泻的惡毒誹謗也只是一個可喜的標誌，說明我寫這本書不是為資產階級粉飾門面，而是為了求得科學的認識。但是我怀着謝意承认，《漢堡外國人報》、慕尼黑的《總匯報》、《維爾騰堡官報》以及其他資產階級報紙通過一種切合實際的批評表示了對它們自己以及對我的尊重，儘管有許多保留，但是它們仍然承認我的這本書是嚴肅而艱苦的勞動的結晶。

它受到工人群众歡迎的情況也許使別人比我更為惊奇。早在第一次起草本書時，我就感到必須經常地、嚴峻地反對許多黨員（並不是最壞的黨員）所喜愛的一些傳統習慣和觀念。誰也不會像一個革命的工人政黨的歷史著作家這樣清楚地認識到這些傳統習慣和觀念的主觀的權利和客觀的不可避兔性，但是誰也不會像他這樣不吝惜這些東西。一部歷史著述，假如碰到任何一種還可以理解、還可以原諒的神話就小心翼翼，停止不前，這樣它自己就說明它是沒有價值的。雖然革命的工人政黨服從於戰鬥大軍的、自己創造神話和魔力的共同命運，但是它無須根據毛奇的著名的意見把這些神話和魔力作為它的紀律的不可缺少的要素人为地加以培养。對它說來，不可缺少的毋寧是不斷的自我批評，從這一點來看，我相信我也可以說，我的黨史著述已經取得了它存在的權利。

這部著作的第二版就其基本內容來說沒有什麼改動。當然在一些細節上作了不少修改，潤飾了一些生硬的句子，糾正了一些小的疏忽，弥补了這個或那個漏洞，特別是利用了五年以來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史提供的一些新的資

料。我自己有幸通过出版四卷集的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的遺著，开辟了这些新資料的一个最重要的泉源。但是我非常慎重地約束自己，不把党的这三位最偉大的先驅者的傳記中的許多細节放到党的一般历史中去。这样就可以使这两部书都不带有混杂的性质。正是因为它們在材料方面有許多接触，所以在形式上更需要互相独立。只要有一点可能，我都力图保持这两部书中的任何一部的特点，不使讀者在这本书中所謂的是他在那一本书中已經讀过的东西，或者相反。

关于下面的参考书目，我只能重复一下我在第一版中已經說过的話：它的目的不是列出一个完全的图书目录。我只举出足以檢查我的論述，并且可以給这一方面的其他研究人員一些帮助的参考书。

概 說

至今还没有一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內容广泛的历史。在海爾克勒著的《工人問題》第3版(1902年柏林版)(Herkner, Arbeiterfrage. 3. Aufl., Berl. 02) 和桑巴特著《十九世紀的社会主义和社會運動》(1896年耶拿版)(Sombart, Sozialism. u. soz. Bewegung i. 19. Jahrh., Jena 96) 中关于这一方面有初步的简单叙述。可是这些著作都沒有超出資產階級範圍，而且桑巴特还把天才的思想家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政治的“世界松鼠”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有名的区分，因而阻碍自己深刻認識問題。E. 米勞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03年巴黎版)(E. Milhaud.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allemande. Paris 03) 充滿热爱并且十分仔細地描繪了世紀之交社会民主党的生活的一幅图画；关于党史本身他只做了一个简括的叙述，而且基本上是以我写的党史的第一版为依据的。

那时研究学术的教授們談到工人运动时代的通史时，总是颦蹙肩膀表示遺憾。泰·齐格勒著《十九世紀的思想潮流和社会潮流》(1899年柏林版)(Th. Ziegler. D. geist. u. sozial. Strömungen d. 19. Jahrh., Berlin 99) 用半是儿童讀物、半是通俗小說的筆調敘述了拉薩爾对俾士麦和普魯士的幻想，同时把馬克思看作一个“不声不响地織网，異常准确地捕捉它的牺牲者的十字圓网蜘蛛”。此外还有翁肯編的弗拉特的論三月革命的文集以及翁肯本人論謀殺時期的著作。翁肯把年幼的精神病患者賀德爾說成是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旅行的社会民主党的鼓動家，而这一点在1878年的夏天遠

爱国主义的狂热病者都沒有敢捏造。胥伯尔在其論述德意志帝国建立的多卷集的著作中帶有許多害处較小、但也并不高明的虛构成分，他說“整个社会民主主义体系”失败的原因是，实行了拉薩尔的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以后，“对那些有比較复杂的技术作为前提条件才能开动的工厂來說，工人的共和制度的管理证明是不能实施的”，但是如果“在简单的企业中进行”这种管理，“原来的同志”就再“回到受到排斥的資本主义經濟”之中，并拒絕接受新助手进他們的合作社。今天这就叫做“档案-科学的”历史研究！这种历史文献的最有用的著作仍然是特賴奇克的德国史。最低限度特賴奇克是个不平常的人：他对于三月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叙述虽然也沒有什么价值，但是当对于社会主义者的憎恨沒有使他头昏目眩的时候，他对德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往往有比較正确的看法。

至于資产阶级的辞书，謝尔在宣貝克編的手册中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作的粗略的、不确切的簡述是不能算数的。孔拉特及其同志所編的国家学辞典比較詳細，但是比較有价值的也就是很少几条，那几条不是格·阿德勒写的，因为他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不了解，并且用一些謔言填补他知識的缺陷。比較起来 C. 施泰格曼和 C. 胡果編的社会主义手册（1894年至1896年苏黎世版）（C. Stegemann und C. Hugo, Handbuch d. Sozialismus, Zür, 94 bis 96）有用得多，虽然其中的各篇文章价值并不相等。J. 施塔姆哈默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参考书目（1893年耶拿版）（Die Bibliographie d. Sozialism. u. Kommunism. von J. Stammer, Jena 93）虽然在編輯中已經花費了很大精力，但是还有許多缺陷。

社会主义文献为头緒繁縝的現代工人运动史提供了一部包罗万象的参考书，即埃·烏尔姆編的人民百科辞典，共五卷（1894年至1897年紐倫堡版）（Volkslexikon von Em. Wurm, Nürnb. 94 bis 97）。人民百科辞典是一部值得感謝和推荐的著作，編得很好，我經常使用，几乎没有一次对我沒有帮助；还有附录，总是尽可能提供一些完整的、独立的論文，查找也不困难。我觉得这很好；工人们應該大力支持这种工作，这样才能使自己摆脱資产阶级拙劣文献的有害影响。

导言(第1—4頁)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苏黎世版。恩格斯《在〈人民国家〉上发表的国际性論文》，1894年柏林版(*Engels, Internationales a. d. Volksstaat, Berl 94*)。

七月革命和改革法案(第5—8頁)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815頁，1872年汉堡版。

西歐的社会主义(第9—21頁)

施泰因《今日法国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1842年萊比錫版(*Stein, D. Sozialism. u. Kommunism. d. heutigen Frankreichs, Leipzig 42*)。格律恩《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斯塔特版(*Grün, D. soziale Bewegg. i. Frankreich u. Belgien, Darmst. 45*)。实际上只有通过科学的共产主义才能认识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意义。《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反杜林論》，1894年斯图加特版。关于傅立叶：格勞伊利希《沙尔·傅立叶》，1881年苏黎世版(*Greulich, Karl Fourier, Zür. 81*)，倍倍尔《沙尔·傅立叶》，1888年斯图加特版(*Bebel, Charles Fourier, Stuttgart 88*)。关于欧文：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73、304、509、526頁；这很少几个注釋，比海爾特的关于英国社会主义史的两本书(1881年萊比錫版)中的整个一章使人对欧文有更多的了解。也可參看《歐文主义鼓動家的回忆》，載《新时代》第10卷下册第205頁(*A. d. Erinner.: e. Owenitischen Agitators, NZ① 10² 205*)。李嘉图《政治經濟学和租稅的原理》，德譯者鮑姆施达克，1879年萊比錫版。关于欧文以后的英国社会主义者：馬克思《哲学的貧困》，德譯者伯恩斯坦和考茨基，1885年斯图加特版，以及恩格斯写的序言；还可參看恩格斯給《資本論》第2卷写的序言，1885年汉堡版和《法学家社会主义》，載《新时代》第5卷第49頁(*Juristensozialismus, NZ 5, 49*)。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学新原理》，1819年巴黎版，关于西斯蒙第，《共产党宣言》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1897

① NZ 是 *Neue Zeit* 的縮写。——譯者

年斯图加特新版。关于法国农民的状况：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汉堡版。

西歐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第22—38頁)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5年萊比錫版，1892年斯图加特新版。关于英国的工厂立法問題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中有典型的叙述。《英國的宪章主义者运动》，1887年苏黎世版(*Die Chartistenbeweg. i. Engl., Zür. 87*)。現在还没有一部关于宪章运动的詳細历史，鮑利《英国史》(1864年萊比錫版)(*Pauli, Gesch. Engl., Leipz. 54*)关于宪章运动談得很不够。布倫坦諾《工人基尔特》，1871年萊比錫版(*Brentano, Arbeitergilden. Leipz. 71*)。悉尼和比阿特里斯·韦伯《不列顛工联主义史》，德譯者R.伯恩斯坦，1895年斯图加特版(*Sidney u. Beatrice Webb, Gesch. d. brit. Trade Unionism, Stuttg. 65*)。延斯累里《神巫》，德譯者N.李卜克內西，1887年柏林版(*Disraeli, Sybil, Berl. 87*)。伯恩斯坦《卡萊爾和英國社會政策的發展》，載《新时代》第9卷上冊第665頁(*Bernstein, Carlyle u. d. sozialpol. Entwickl. Engl. NZ 9¹, 665*)。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阶级斗争》，1895年柏林版。路·勃朗《十年史》，1841年巴黎版(*L. Blanc. Histoire de dix ans, Paris 41*)。保尔·路易《法国社会主义史》，1901年巴黎版(*Paul Louis, Histoire du socialisme français, Paris 01*)。勒迈尔西埃《論工人协会》，1857年巴黎版(*Lemercier, Etudes sur les associations ouvrières, Paris 57*)。S.英格蘭德《法国工人协会史》，1864年汉堡版(*S. Engländer, Geschichte der französischen Arbeiterassoziationen, Hamburg 64*)。希尔布朗《七月王朝史》，1881年哥达版(*Hillebrand, Gesch. d. Julikönigtums, Gotha 81*)。麥克西斯《法国的工会和企业主协会》，1879年萊比錫版(*Lexis Gewerkver. u. Unternehmerverb. i. Frankr., Leipz. 79*)。考茨基《劳动权》，載《新时代》第2卷第299頁(*Kautsky, Recht a. Arbeit, NZ 2, 299*)。路克斯《卡貝》，1894年斯图加特版(*Lux. Cabet, Stuttg. 94*)。关于勒魯：《海涅文集》第6卷第85頁，1876年汉堡版(*Heines Werke 6, 85, Hamb. 76*)，以及馬克思致費爾巴哈的信，載《路·費爾巴哈通信集》，1874年萊比錫版(*L. Feuerbachs Briefw.*)。

Leipz. 74)。蒲魯東《什么是财产?》，德譯者 F. 迈耶尔，1844 年伯尔尼版 (Proudhon, Was ist d. Eigent? Bern 44)。

第一 部

格·阿德勒著的《德国初期社会政治的工人运动史，特別注意有影响的理論》(布勒斯劳 1885 年版) (G. Adler, Gesch. d. ersten sozialpol. Arbeiterbewegg. i. Deutschl., m. besonderer Rücks. auf die einwirk. Theorien, Bresl. 85) 一书，附带論述了三月革命前的社会主义。这是一部粗糙的、用零碎材料拼凑而成的、毫无价值的历史著作。

封建—行会殘余(第 41—49 頁)

克納普《旧普魯士各部分的农民解放》，1837 年萊比錫版 (Knapp, Bauernbefreiung i. d. altpreußischen Landesteilen, Leipz. 87)，这本书记对于 1816 年对农民的第一次掠夺讲得很詳細，但对于 1848 年以后对农民的第二次掠夺就讲得很不够。恩格斯《普魯士农民史，为沃尔弗著〈西里西亚的十亿〉写的序言》，1886 年苏黎世版。赫塞基尔《俾斯麦伯爵傳》，1869 年比雷菲尔德版 (Hesekiel, D. Buch v. Grafen Bismarck, Bielef. 69)，該书第 168 頁談的是 1848 年致柏林報紙的臭名远揚的“来函”，俾斯麦在其中描述了他的克尼福大庄园的旧园景象。恩格斯《在德意志帝国市場上的普魯士燒酒》，1874 年萊比錫版 (Engels, Preuß. Schnaps i. deutsch. Reichst., Leipz. 74)。仰朗克《帮工协会》，載《国家学辞典》第 3 卷第 820 頁 (Schoenlank, Gesellenverbände, HSt ① 3, 820)。施穆勒《德意志小工业史》，1870 年萊比錫版 (Schmoller, Z. Gesch. d. deutsch. Klein-gewerbe, Leipz. 70)。F. 齐格勒《演說集》，1880 年柏林版 (F. Ziegler, Ges. Reden, Berl. 80) 一书，对普魯士城市的有名的自治作了詳細叙述。南德小资产阶级的状况：恩格斯《德国維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載《新萊茵报》的評論，1850 年汉堡版，也見于《馬克思恩格斯拉薩尔遺著选集》(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Stuttgart 02) 第 3 卷第 289 頁。

① HSt 是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的縮寫。——譯者

资本主义的开端(第 50—61 頁)

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第 786 頁。居利希《歷史論著及其他》，共兩卷，1830 年耶拿版 (Gülich. Geschichtl. Darstell. etc., Jena 30)。關於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家庭手工業；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第 484 頁。《德國家庭手工業，社會政治協會報告》，共 5 卷，1889 年與 1890 年版 (D. deutsche Hausindustrie. Berichte d. Vereins f. Sozialpol., 5 Bde., Leipz. 89 u. 90)，這些報告的內容相當貧乏，相反地下列兩本書內容却極為豐富：漢斯·伊曼努爾·薩克斯《圖林根的家庭手工業》，1882 年至 1888 年耶拿版 (Hans Emanuel Sax. Hausind. i. Thür. Jena 82 bis 88)，施納勃爾-阿倫特《陶努斯高山上 的五個村區》，1883 年萊比錫版 (Schnapper-Arndt. Fünf Dorfgemeind. a. d. hohen Taunus. Leipz. 83)。西里西亞的狀況：《雪恩手稿》，1875 年哈雷版 (A. d. Papieren Schöns. Halle 75)。布倫坦諾《論領主權對西里西亞麻織業的影響》，載《社會史和經濟史雜誌》第 2、3 期 (Brentano. Über d. Einfluß der Grundherrlichkeit a. d. schles. Leinengewerbe, Zeitschr. f. Soziale u. Wirtschaftsgesch. 2, 3)；布倫坦諾在這篇論文中指出了家庭紡織業的領主性質，有力地駁斥了格律恩哈根和桑巴特的論調。關於 1793 年西里西亞織工暴動，菲力浦遜《普魯士史》第 2 卷，1882 年萊比錫版 (Philippson. Preuß. Gesch., Leipz. 82)。威·沃尔弗《西里西亞的貧困和起義》，載《德國市民手冊》第 1 卷第 178 頁 (W. Wolff. D. Elend u. d. Aufruhr i. Schlesien. DB① 1, 178) 以及《西里西亞的十億》，1886 年蘇黎世版 (Schles. Milliarde, Zür. 86)，對 19 世紀前半期西里西亞的封建和工業狀況描述得最為動人。薩克森的狀況：考茨基《礦工和農民戰爭》，載《新時代》第 7 卷，第 289 頁 (Kautsky. D. Bergarbeiter u. d. Bauernkrieg, NZ 7, 289)，維克《薩克森的工業狀況》，1840 年開姆尼茨版 (Wieck, Industr. Zust. Sachsen. Chemn. 40) 以及居利希同上著作。萊茵區的狀況：恩格斯《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圖恩《下萊茵的工業》，1887 年萊比錫版 (Thun, D. Industr. a. Niederrh., Leipz. 78)；龔特爾·K. 安東《普魯士工廠立法》

① DB 是 Deutsches Bürgerbuch 的縮寫。——譯者

史》, 1891 年萊比錫版 (Günther K. Anton, Gesch. d. preuß. Fabrikgesetzg., Leipzig, 91)。圖恩同薩克斯和施納勃爾一样是个认真踏实的研究者, 而安东却带有浓厚的霍亨索倫王朝的奴性。但是他的忠誠的濃灰漿很容易被公文的十分明确的語言化开。P. 卡姆弗迈耶尔《德国近代阶级斗争史》(1896 年柏林版) (P. Kampffmeyer, Gesch. d. modernen Klassenk. i. Deutschl., Berl. 96), 詳細論述了本章及前一章所叙述的状况。

精神生活(第 62—78 頁)

梅林《萊辛傳奇》, 1893 年斯圖加特版 (Mehring, Lessing-Legende, Stuttg. 93)。让·饒勒斯在其《協定》一書(1903 年巴黎版) (Jean Jaurès, La convention, Paris 03) 中又認為必須把我這本關於萊辛的著作看作“幼稚的怪論”, 他用一種今天任何普魯士教授也不能有的熱情恢復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鬼話。關於這個問題可參看梅林《為普魯士國王辯護》, 載《新時代》第 21 卷上冊第 517 頁 (Mehring, Pour le roi de Prusse, NZ 21¹, 517)。羅雪爾《德國國民經濟學史》, 1874 年慕尼黑版 (Roscher, Gesch. d. Nationalökonomik i. Deutschl., München 74)。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第 814 頁。屠能《孤立國》, 1875 年柏林版 (Thünen, Der isolierte Staat, Berl. 75)。關於屠能見: 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第 646 頁。關於屠能為他的特洛夫農莊的工人建立的股份經濟, 可以參閱秘默爾特《利潤分配》, 1878 年萊比錫版 (Böhmert, Gewinnbeteil., Leipzig. 78)。屠能的孫子給秘默爾特寫信說: “股份把工人束縛在農莊上, 因為在農莊發達時他們也拿不到本金, 只能拿到利息。股份防止了盜竊及類似行為, 使工人晚年的生活有了保證, 同時也減少了農莊的濟貧費用。”由此可以說明, 拉薩爾到法蘭克福旅行時, 受了洛貝爾圖斯的影響所說的話: 屠能“給他的工人建立了一個小規模的協會。”薩維尼《論我們時代的立法使命》, 1814 年海德爾堡版 (Savigny, Vom Beruf unserer Zeit f. Gesetzg., Heidelberg. 14)。馬克思《法的歷史學派的哲學宣言》(載 1842 年 8 月 9 日《萊茵報》, 也見于《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遺著選集》第 1 卷第 268 頁), 談到胡果的《自然法教科書》。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載《德法年鑑》, 也見于《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遺著選集》第 1 卷第 384 頁。塞格爾《德國法學》, 載海爾維格編《來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張》, 1844 年格拉魯斯版 (Seeger, D. deutsche Rechts-

wissenschaft, in Herweghs 21 Bogen a. d. Schweiz, Glarus 44)。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康德《論持久和平》。康德的这些以及其他著作都有雷克拉姆出版社的优秀版本。費希特《閉关自守的商业国》(D. geschloss. Handelsstaat)，費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讲演》(Fichte, Reden a. d. deutsche Nation)。黑格爾《法哲学》，1821年柏林版。恩格斯和馬克思《神圣家族》，1845年法兰克福版，也見于《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遺著选集》第2卷，第103頁。恩格斯《反杜林論》，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1888年斯图加特版。恩格斯《論历史唯物主义》，載《新时代》第11卷上册第15頁 (Engels, Über histor. Materialism., NZ 11¹ 15)。拉薩爾《費希特的政治遺志》(Lassalle, Fichtes polit. Vermächtnis)。拉薩爾《費希特的哲学和德国民族精神的意义》(Lassalle, D. Philos. Fichtes u. d. Bedeutung d. deutschen Volksgeistes)。我所引用的拉薩爾的著作系根据伯恩斯坦所編的本子(1892年和93年柏林版)。弗·阿·朗格《唯物主义史》，1887年伊塞隆版 (F. A. Lange, Gesch. d. Materialism. Iserlohn 87)。普列汉諾夫《唯物主义史論丛》，1896年斯图加特版。

三十年代(第79—95頁)

蓋爾維努斯《十九世紀史》共8卷，1866年萊比錫版 (Gervinus, Gesch. d. 19. Jahrh., 8 Bd., Leipzig 66)。特賴奇克《十九世紀德国史》第4部分，1889年萊比錫版 (Treitschke, Deutsche Gesch. i. 19. Jahrh., 4. T., Leipzig 89)。《格奧爾格·畢希納全部著作和手稿》，弗朗措斯編，1879年法兰克福版 (Georg Büchners Sämtl. Werke und Handschrifl. Nachl., Frankf. 79)，附有一篇沒有文学价值的引言。几十年前，在一份社会民主党的小报上有人称毕希納是拉薩爾的先驅者，后来在資产阶级的文献中重复了这种說法。如果我們不願在极普通的意义上把法国大革命的人物理解为現代共产主义的先驅者，那么这种比較就是不确當的。因为毕希納同他当时的社会主义并沒有任何关系。施魏歇尔《秘密偵查的受害者》，載《新时代》第3卷第395頁 (Schweichel, E. Opfer d. geheim. Untersuchungsverfahr., NZ 3, 395)。恩格斯《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載《新时代》第6卷第289頁 (Engels, Schutzzoll u. Freihandel, NZ 6, 289)。罗

雪爾《國民經濟學史》。施穆勒《小工業》，我沒有特別引用普拉頓、白爾尼、海涅、伊梅爾曼、弗萊里格拉特等人的著作。谷茲科夫《回顧我的生活》，1875年柏林版 (Gutzkow, Rückblicke a. m. Leben, Berl. 75)。施特勞斯《耶穌傳》，1835年杜賓根版 (Strauß, Leben Jesu, Tüb. 35)。施特勞斯《文學回憶錄》，1876年波恩版 (Strauß, Literar. Denkwürdigk., Bonn 76)。埃希特邁耶爾和盧格《哈雷年鑑》，1838年，1839年萊比錫版 (Echtermeyer u. Ruge, Hallische Jahrbücher, Leipz. 38. 39)。《盧格全集》，1847年曼海姆版 (Ruge, Sämtliche Werke, Mannh. 47)。盧格《憶過去的時代》，第4卷，1866年柏林版 (Ruge, Aus früherer Zeit. 4. Bd. Berl. 66)。《盧格通信集》，1886年柏林版 (Ruges Briefwechsel, Berl. 86)。利奧《黑格爾主義者》，1838年哈雷版 (Leo, D. Hegelingen, Halle 38)。

手工業工人共產主義(第96—114頁)

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馬克思著〈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事件〉的導言》，1885年蘇黎世版。在恩格斯那裡，以及在資產階級文獻中都說，沙佩爾曾經參加過畢希納的密謀，但是這種說話是錯誤的。當沙佩爾參加襲擊法蘭克福哨所，後來逃出德國時，畢希納還在斯特拉斯堡讀書，沒有想到進行什麼政治鼓動工作，而當畢希納在達姆斯塔特領導秘密同盟時，沙佩爾肯定住在瑞士。有人說沙佩爾參加過馬志尼向薩瓦的進軍，這一點他自己已經否認過了。H. 施米特《在瑞士的德國逃亡者和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三六年的一次德國工人運動》，1899年蘇黎世版 (H. Schmidt, Die deutschen Flüchtlinge in der Schweiz und die erst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1833 bis 1836. Zür. 99)。費奈送《被逐者》，1834—1836年巴黎版 (Venedey, D. Geächtete, Paris 34—36)。施塔姆哈默爾說《放逐者》一共只出了六期，但是我所看的一個合訂本就有十二期，也許還不完全，這個本子同其他許多罕見的著作，都是我的年輕的朋友馬丁·布雷希爾以極大的熱情給我找到的。關於舒斯特爾（比起畢希納來，他大可稱為拉薩爾的先驅者）可以參看H. 施米特發表在《新時代》第16卷上冊第150頁上的文章。《在瑞士的德國秘密組織》(1847年巴塞爾版) (D. geheim. deutsch. Verbindungen i. d. Schweiz, Basel 47)一書中的文

草原載胡貝爾編的《雅諾斯》杂志，看來是胡貝爾自己寫的，其中有些沒有發表過的材料。維爾穆特和施梯伯《共产主義者的陰謀》，1853年柏林版 (Wer-muth u. Stieber, Kommunistenverschwörung., Berl. 53)。警察製造的臭名遠揚的作品只能在它含有同文書吻合，確鑿不移的材料時才可使用。魏特林《人類的現況及其未來》，1838年巴黎版，1895年慕尼黑新版 (Weitling, D. Menschheit, wie sie ist und wie sie sein sollte, Paris 38, n. Aufl., München 95)。魏特林《和諧與自由的保證》，1842年威維版。布隆奇里《瑞士的共產主義者，根據在魏特林那裡發現的文件》，1943年蘇黎世版 (Bluntschli, D. Kommunisten i d. Schweiz nach d. bei Weitling gefundenen Papieren, Zürch 43)。卡勒爾《威廉·魏特林》，1887年蘇黎世版 (Kaler, Wilh. Weitling, Zürich 87)。卡勒爾過高估計了卡貝對於魏特林的影響；卡貝的空想出現在1840年，而魏特林在1838年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卡勒爾說得很對，這本書已經包含了他的學說的基本內容。《費爾巴哈通信集》第1卷365頁。

浪漫主義的勝利(第115—122頁)

特賴奇克《德國史》第5部分，1894年萊比錫版。比德爾曼《德國歷史的三十年》，1882年布勒斯勞版 (Biedermann, 30 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Bresl. 82)。一八四七年二月敕令前的普魯士，見《布羅克豪斯百科辭典》第2卷第30頁 (Preußen vor dem Februarpatent von 1847, Brockhaus 2, 30)。克勞斯《雜錄》，1908年科尼斯堡版 (Kraus, Vermi-schte Schriften, Königsb. 08)。漢澤曼《普魯士和法國》，1834年萊比錫版 (Hansemann, Preußen u. Frankreich, Leipz. 34)。雪恩《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有法因的一篇後記，1842年斯特拉斯堡版 (Schön, Woher u. Wohin? Nebst e. Nachw. v. Fein, Straßb. 42)。雅科比《四個問題》，載《雅科比演說論文全集》，1872年漢堡版 (Jacoby, Vier Fragen, Ges. Reden u. Schriften, Hamb. 72)。

古典哲學的解體(第123—136頁)

布·鮑威爾《福音故事批判》，1841年萊比錫版 (B. Bauer, Krit. Ge-sch. d. Synoptiker, Leipz. 41)。路·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1841年

萊比錫版。布·鮑威爾《猶太人問題》，1843年不倫瑞克版（B. Bauer, D. Judenfrage, Braunschweig, 43）。布·鮑威爾《現代猶太人和基督徒獲得自由的能力》，載海爾維格編《二十一印張》（B. Bauer, Die Fähigkeit d. heut. Juden u. Christen, frei zu werden, in Herweghs 21 Bogen）。《德國年鑑》，1840年及1841年萊比錫版（Deutsche Jahrbücher, Leipzig, 40 u. 41）。盧格《德國現代哲學和政論界軟文集》，1843年蘇黎世版（Ruge, Anekdata z. neuest. deutschen Philos. u. Publizistik, Zürich, 43）。丁益爾施泰特、霍夫曼、普魯茨、海爾維格的詩。布·鮑威爾《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六年德國黨派鬥爭的全部歷史》，1847年沙洛頓堡版（B. Bauer, Vollst. Gesch. d. Parteikämpfe i. Deutschl. während d. Jahre 1842 bis 1846, Charlottenburg, 47）。吉伊多·魏斯《海爾維格行述》，1875年瓦格版（Guido Weiß, Nekrolog Herweghs, Wage 75）。

《萊茵報》（第137—156頁）

恩格斯在去世以前不久打算重新出版馬克思在《萊茵報》上發表的論文，我很高兴地為他收集了這些文章。可惜，在這些材料剛剛收齊時，他就逝世了。關於他第一次遇見馬克思的情形，他在寫給我的信上說：“11月底（1842年——弗·梅）我在往英國去的旅途中（在《萊茵報》編輯部——弗·梅），遇見了馬克思，我們的這次第一次見面是很冷淡的；這時馬克思已經開始反對鮑威爾兄弟，也就是反對《萊茵報》成為神學宣傳和無神論的工具，而不成為政治討論和政治行動的工具，同時也反對埃德加爾·鮑威爾的以單純的‘走得最遠’的欲望為基礎的夸夸其談的共產主義，在埃德加爾那裡，這種共產主義不久也為另一種極端的、響亮的空論所代替；因為我同鮑威爾兄弟通信，所以他把我看作他們的同盟者，而他們也對我說了馬（克思）的許多壞話。”同時我也同恩格斯就他在《國家學辭典》第4卷1130頁上關於馬克思的論文中的一些小錯誤交換了意見。馬克思不是在1843年1月1日，而是在1843年3月17日退出編輯部的，他也没有在報上發表關於摩澤爾河沿岸種葡萄的農民的文章，而事實正如我在本書中所說的那樣，在這兩點上恩格斯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他認為他清清楚楚地記得，對《萊茵報》的檢查不是兩道，而是三道，而我根據所能見到的材料估計是兩道。他要我關於這一點詳細地寫一寫，但是由於他病重這個計劃也沒有實現。我在本書中仍然寫的是兩道檢

查，主要是因为恩格斯在勃腊克的《一八七八年人民年鉴》(Brackes Volkskalender für 78) 中写的关于馬克思的文章中，也是說只有两道檢查，这就更使我认为，他后来記錯了。要进一步了解馬克思和《萊茵报》，特别是他同在柏林的青年时代的朋友的冲突可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拉薩尔遺著选集》第1卷第171頁以及《社会主义文献》，1902年6月版(DS①, Juni 02)。

《德法年鉴》(第157—208頁)

这个杂志的唯一的双刊号是1844年3月初在巴黎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文現在又重新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拉薩尔遺著选集第1卷)。費尔巴哈和卢格的《通信集》。鮑威尔《党派斗争》。恩格斯和馬克思《神圣家族》。《文学总汇报》，月刊，布·鮑威尔編，1844年在沙洛頓堡出版(Allgem Literaturzeitung. Monatsschrift v. B. Bauer, Charlottenb. 44)。恩格斯《鮑威尔行述》，載《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1882年第19期和20期(Engels, Nekrolog Bauers, ZSD② 82, Nrn. 19 u. 20)。为了使讀者对于馬克思对犹太人問題的看法，有一个尽量完整的概念，我在本书中把他在《年鉴》和《神圣家族》中关于这个問題所发表的意見归纳起来。

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209—226頁)

关于馬克思的傳記，恩格斯，上面所引著作，以及《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1883年第19期和21期。悼詞，載《新时代》第1卷441頁。拉法格的追悼文載《新时代》第9卷上册第10頁。列斯納的追悼文載《新时代》第11卷上册第780頁。G. 格罗斯《卡尔·馬克思》，1885年萊比錫版(G. Groß, Karl Marx. Leipz. 85)。这本书在許多方面都值得称赞，但它有一个最近为桑巴特所重复的根本缺点，即把馬克思区别为有刺激性的煽动家和深刻的思想家；如果说曾經有过一个不可分割的人，那就是馬克思。李卜克內西《回忆卡尔·馬克思》，1897年紐倫堡版。关于馬克思的詳細傳記材料(至1850年为止)大多載于《馬克思恩格斯拉薩尔遺著选集》共四卷。德国犹太人的資产阶级关系，現在可參看《布罗克豪斯》第1卷第133頁；犹太人

① DS 是 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 的縮写。——譯者

② ZSD 是 Züricher Sozialdemokrat 的縮写。——譯者

的宗教和文化历史运动，見同上书第 10 卷第 526 頁。梅林《威斯特华倫家族》，載《新时代》第 10 卷下册第 481 頁 (Mehring, *Die von Westphalen, NZ 10² 481*)。关于恩格斯的傳記：考茨基《新时代》第 9 卷上册第 225 頁，此外还見于《一八八八年奥地利工人年鉴》(Osterreich. Arbeiterkal. für 88)，《紐約人民日報》的年鉴，《一八九二年的先驅者》(Pionier für 92, der Kal. der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上讲得最詳細，关于埃尔門—恩格斯公司見同上著作第 2 卷第 175 頁。維也納市圖書館里有一份《前进报》，也可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遺著选集》第 2 卷。最不可信的是秘恩斯貝著的《七十五年》，1881 年萊比錫版 (Börnstein, 75 Jahre, Leipzig. 81)。关于把德国作家逐出巴黎事件見格·阿德勒同考茨基和梅林的論战《新时代》第 13 卷上册第 502, 571, 604, 693, 754 頁和第 13 卷下册第 377 頁。

无产阶级运动(第 227—254 頁)

卡勒尔《魏特林》。《布倫奇里的報告》。《德国青年的呼吁》，1841 年 9 月至 12 月的 4 期 (Der Hilferuf der deutschen Jugend. 4 Hefte vom September bis Dezember 41)，《年輕一代》，1842 年 1 月至 1843 年 5 月的 17 期 (Junge Generation. 17 Hefte vom Januar 42 bis Mai 43)，出版处不一。德国国会图书馆有魏特林的这两种杂志的全份。魏特林《一个貧苦罪人的福音》，1845 年伯尔尼版，1894 年慕尼黑新版 (Weitling. J) Evangel e arm. Sünders. Bern 45. n. Aufl. München 94)。《論瑞士的共产主义》，1843 年伯尔尼版 (Über den Kommunismus i. d. Schweiz. Bern 43)。奥·贝克尔《共产主义者要做什么？》1843 年伯尔尼版 (A. Becker. Was wollen die Kommunisten? Bern 43)。《給紐沙都州議会的关于德国秘密宣傳的總報告》，1846 年苏黎世版 (Generalbericht an den Staatsrat v. Neuchâtel ü. d. geh. deutsche Propag. Zür. 46)。馬克思《青年德意志》，1846 年萊比錫版 Marx. D. junge Deutschl. Leipzig. 46)。赫斯《伏特共和国国家立法机关关于社会問題的討論》，1861 年《萊茵年鑑》第 2 卷 (Heß, D. Verhandl. d. gesetzgeb. Staatskörpers d. Republ. Waadt ü. d. soz. Frage. RJ 2 (1), 61)。《瑞士的共产主义健啖家》，《德国公民手册》第 2 卷第 295 頁 (D. schweizeri-

schen Kommunistenfresser, DB 2, 295)。也可參閱恩格斯《論原始基督教史》，載《新時代》第13卷上冊第4頁。倫格爾克《農村工人問題》，1849年柏林版(Lengerke, D. ländl. Arbeiterfr., Berl. 49)。關於德國群眾無產階級的形成，除去《德國公民手冊》和《萊茵年鑑》以外，下面的書刊中也有許多材料：赫斯《社會明鏡》，1845年和1846年愛北斐特版(Heß, Gesellschaftsspiegel, Elberf. 45 u. 46)和德朗克談柏林的著作，1845年法蘭克福版。P. 卡姆弗邁耶爾《四十年代德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載《新時代》第5卷第502頁(P. Kampffmeyer, D. ökonom. Grundl. d. deutsch. Sozialism. d. vierziger Jahre, NZ 5, 502)。沃尔弗《西里西亞的貧困和起義》；施耐爾《論西里西亞農村織工的苦難》，1844年柏林版(Schneer, Über d. Not d. schles. Leineweber, Berlin 44)。瓦爾利普《施略費爾和萬德爾》，1845年孔斯堂茨版(Wahrleib, Schlöffel und Wander, Konstanz 45)。萬德爾《我一生中的三年》，1878年萊比錫版(Wander, Drei Jahre a. m. Leben, Leipz. 78)。維爾穆特-施梯伯《共產主義者的阴谋》以及同樣不可靠的施梯伯的《回憶錄》，1884年柏林版(Denk würdigk. Stiebers, Berlin 84)。特賴奇克《德國史》第5卷第520頁。

德國的社會主義(第255—298頁)

施泰因《德國的社會主義》(現載《布羅克豪斯》第7卷第527頁)(Stein, Der Sozialism. i. Deutschl., Brockhaus 7, 527)，對30年代和40年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遊戲論述得很詳細。古·魏斯《社會主義史》，1875年瓦格版(G. Weiß, Z. Gesch. d. Sozialism. Wage 75)。皮羽克列爾《書信集》，L. 阿辛編，共3卷，1874年柏林版(Pücklers Briefw., hgg. v. L. Assing, 3 Bd., Berlin 74)。關於噶爾見：《萊茵年鑑》第2卷第147頁，《社會主義手冊》第272頁(Handbuch d. Sozialism. 272)，R. 辛格爾《德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者》，載《國民經濟、社會政策和行政雜誌》第3卷第417頁(R. Singer, D. erste deutsche Sozialist, Zeitschrift f. Volkswirtsch., Sozialpol. u. Verwaltung 3, 417)。蓓蒂娜·馮·阿爾寧《君王必讀》，1843年柏林版(Bettina v. Arnim, Dies Buch

① RJ 是 *Rheinische Jahrbücher* 的縮寫。——譯者

gehört dem Könige, Berl. 43)。布倫塔諾《工業方面的工人問題》，載貝克編的《手冊》(Brentano, D. gewerbl. Arbeiterfrage in Schönbergs Handbuch)。塔敦—特利格拉弗《用騎士莊園謀取暴利》，1842年施泰廷版(Thiadden-Triglaff, D. Schacher m. Rittergütern, Stettin 42)。耶格爾《維·艾·胡貝爾》，1880年柏林版(Jäger, V. A. Huber, Berlin 80)。瓦蓋納《經歷》，1884年柏林版(Wagener, Erlebtes, Berlin 84)。古·魏斯《瓦蓋納先生》，1872年瓦格版(G. Weiß, Herr Wagener, Wags 72)。《萊茵觀察家》，1847年科倫版(Rheinischer Beobachter, Köln 47)。梅因《劳动階級福利协会柏林分会》，載《萊茵年鑑》第1卷第198頁(Meyen, D. Berliner Lokalverein, f. d. Wohl der arbeit. Klassen, RJ 1. 193)。該年鑑第225頁上載有《科倫的普遍援助和教育協會》一文。从本書所談到的哲学—純文学的社会主义的機關刊物中，已經可以對這種社会主义有足够的了解。几年前，曾有人多次討論過哲学—純文学的社会主义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係：司徒盧威的文章，載《新时代》第14卷下冊第4頁，伯恩斯坦的文章，載同上雜誌第216頁，梅林的文章載395頁，此外還有司徒盧威在《新时代》第15卷下冊第228頁和梅林在該雜誌第379頁上發表的文章。然後可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遺著選集》第2卷。D. 科易根《德國現代哲学社会主义史》，這本書的小標題是：《青年黑格爾主義的哲学和社会哲学史》，1901年伯爾尼版(D. Koigen, Z. Vorgeschichte d. mod. philos. Sozialism. i. Deutschl., Bern 01)。梅林《新馬克思主義》，載《新时代》第20卷上冊第385頁(Mehring, Neo-Marxismus, NZ 20¹, 385)。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年萊比錫版(Stirner, D. Einzige u. sein Eigentum, Leipz. 44)。關於施蒂納有：伯恩斯坦的文章，載《新时代》第10卷上冊第421頁和普列漢諾夫《無政府主義和社会主义》，1894年柏林版。馬卡易《施蒂納的生平》，1898年柏林版(Mackay, Stirners Leben, Berlin 98)，這本書對施蒂納沒有批判，只有頌揚，辛苦苦苦地搜集了許多私人的、无关緊要的材料。關於施蒂納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係，見《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遺著選集》第2卷。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對施蒂納所作的詳細批判，見《社会主义文獻》，1903年1月至4月。羅寧爾《歷史方法的國家經濟學講義綱要》，1843年哥丁根版(Roscher, Gründr. z. Vorles. über d. Staatswirtsch. n. ge-

schichtl. Methode, Göttingen 43)。胥勒尔《古典国民经济学及其反对者》, 1895 年柏林版 (Schüller, Die klass. Nationalökonomie u. ihre Gegner, Berlin 95), 这本值得感谢的著作令人信服地指出, “历史方法”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侵犯。洛贝尔图斯《对于我们的国家经济状态的認識》, 新勃兰登堡, 1842 年版 (Rodbertus, Z. Erkenntn. unserer staatswirtschaftl. Zust., Neubrandenburg 42)。洛贝尔图斯《标准工作日》, 1871 年柏林版 (Rodbertus, D. Normalarbeitstag, Berl. 71)。洛贝尔图斯《社会問題解說》, 1875 年柏林版 (Rodbertus, Z. Beleucht. d. soz. Frage, Berl. 75)。洛贝尔图斯《地产的信用恐慌》, 1893 年柏林第 2 版 (Rodbertus, Kreditnot d. Grundbes., 2. Aufl., Berl. 93)。洛贝尔图斯《遺著集》, 阿·瓦格納等人編, 1878—1885 柏林版 (Rodbertus, Literar. Nachl., hgg. v. A. Wagner u. a., Berl. 78—85)。洛贝尔图斯《书簡和社會政策論文集》, 路·迈耶爾編, 1881 年柏林版 (Rodbertus, Briefe u. sozialpol. Aufs., hgg. v. R. Meyer, Berl. 81)。在《遺著集》第 3 卷第 195 頁和《书簡》第 2 卷第 575 頁都載有洛贝尔图斯的第一篇論文。科察克《洛贝尔图斯—雅格左夫的社会經濟观点》, 1882 年耶拿版 (Kozak, Rodbertus-Jagetzows sozialökonom. Ansichten, Jena 82), 这本书把分散在許多著作中的洛贝尔图斯的見解綜合起来。野心家格·阿德勒, 迪策尔等人論洛贝尔图斯。关于馬克思剽窃洛贝尔图斯著作的鬼話, 恩格斯已在《哲学的貧困》序言和《資本論》第 2 卷序言中做了彻底的駁斥。对此, 阿·瓦格納在《遺著集》第 3 卷中又制造了新的武器, 他說, 洛贝尔图斯在其他社会主义作家, 特別是馬克思之前, 創立了最重要的思想, 这种說法只能证明“德国第一所高等学府的第一位国民經濟学教授”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論多么无知。在所有決定性問題上, 洛贝尔图斯和馬克思的观点都是对立的, 互相排斥的, 要想找出他們两个人的共同点, 那只能是, 他們都接受了英法两国經濟学和社会主义的文献并企图进一步發揮。洛贝尔图斯比馬克思大十二岁, 研究工作开始得早几年, 可是遭到了失败, 这是他的崇拜者所粉飾不了的。馬克思小十二岁, 研究工作开始得晚几年, 但是获得了举世皆知的成果。关于瓦格納和迪策尔利用洛贝尔图斯进行的欺騙, 見梅林《論現代洛贝尔图斯主义者》, 载《新时代》第 12 卷下册第 523 頁 (Mehring, Z. neueren Rodbertuslit., NZ 12², 523)。倍克《穷人之歌》, 迈斯納《詩

集》，雷瑙《阿耳比派》，海涅《冬天的童話》，弗萊里格拉特《信仰告白》和《撒·依拉》。海涅給馬克思的信，載《新时代》第14卷上冊第14頁。關於維爾特的傳記，恩格斯的文章，載《蘇黎世社會民主黨人報》，1883年第24期。

历史唯物主义(第299—336頁)

愛北斐特大會，《萊茵年鑑》第1卷第35頁。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弗·阿·朗格《工人問題》1875年溫特圖爾第3版(F. A. Lange, *Arbeiterfrage*, 3. Aufl., Winterthur 75)。布·希爾德布蘭德《現在和未來的國民經濟學》，1848年法蘭克福版(B. Hildebrand, *Nationalökonomie d. Gegenw. u. Zukunft*, Frankf. 48)。恩格斯《路·費爾巴哈》，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附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恩格斯《反杜林論》。拉布利奧拉《唯物主義歷史觀研究》，1897年巴黎版(*Labriola: 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Paris 97)。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同任何一種研究方法一樣，必須通過結果來證明它的正確性，所以為了對它作出正確的評價，就必須了解科學共產主義的全部文獻。在梅林《論歷史唯物主義》(《萊辛傳奇》一書的附錄)一文中，舉出許多參考書目。關於這一方面，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寫信給我說：“……在這裡主要的事實您都論述得很出色，對每一個沒有成見的人都是有說服力的。如果說，我還發現些什麼需要表示異議，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比應屬於我的功績更大的功績，即使把我也許——經過一定時間——會獨立發現的一切都計算在內也是如此，但是這一切已經由眼光更銳利、眼界更寬廣的馬克思更迅速得多地發現了。如果一個人有幸能和馬克思這樣的人一起工作四十年之久，那末他在後者在世時通常是得不到本來似乎應當得到的承認的；後來，比較偉大的人逝世了，比較不足道的人就很容易被給以過高的評價——而這種情況看來現在就正好落在我的身上；歷史最終會把一切都納入正軌，而到那時這個人已經幸福地長眠於地下，什麼也不知道了。”

此外，被忽略的還有一點，但是這一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兩人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最初是把重點放在從經濟事實中探索出政治觀念、法權觀念和其他思想觀念以及由這些觀念所制約的行動，而當時是應當這樣做的。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的緣故而忽略了形式的方面，即這些觀念等等是由什麼樣的方式和方法產

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思想家有意識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識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的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可见，他是在想像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只和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承认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梅林引文中是“过程”不是“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的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综合）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也能给这种发展以共同决定的影响，但是这种事实依照默契又被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宪法、法权体系、任何特殊领域的思想观念的独立历史的这种外表，首先蒙蔽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而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梅林引文中缺“共和主义的”一词〕《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末，这是仍然保持在神学、哲学、政治之中并被描述为这些思维领域的历史中的一个阶段而且完全不超出思维范围的一个过程。而自从另外又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之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做纯思想的胜利，不是被看做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而是被看做对随时随地都存在的事实条件的最后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黎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贸易自由，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东征，那我们就会免去五百年的贫穷和愚昧。

对问题的这一方面（这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是一个老的情况：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就这样做过，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因此，我不仅决不想为

此对您提出任何責备，——相反地，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錯，我甚至沒有权利这样做，——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而已。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們的一个荒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們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領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們也否认它們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于把原因和結果看做永恆对立的两极。这种刻板的非辩证的看法，这种对交互作用的完全的忽略。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的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梅林的引文中是“經濟事實”〕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圍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例如在您的书中第 475 頁上巴爾特讲到教士等級和宗教的地方，就是如此。”^①

在这封信里，恩格斯对于保尔·巴爾特先生的历史哲学研究还有几句評論，因为这几句话說得比較激烈，我就不引了。我并不盲目相信大师的言論，我在本书中充分表明，面对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我也保持一种独立的見解，但是我也无庸諱言，恩格斯在上面所引的那封信里对于我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論文以及关于萊辛的那本书表示贊揚，而且在他逝世以前不久，对于我撰写德国社会主义史一事表示高兴。对几个踏踏实实地在历史唯物主义領域內工作的人（不管他們取得多大的成就），嘲諷地称他們是馬克思恐怕也要否认的“馬克思主义者”，这完全是資產阶级敌人的作風。可是，誰要想认真地討論这种历史科学方法的肯定还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那就應該对这种无聊的嘲諷存有戒心。弗·阿·朗格《密尔的观点》，1866 年杜依斯堡版（F.A. Lange, Mills Ansichten, Duisb.66）。蒲魯东《貧困的哲学》，德譯者卡·格律恩，1847 年达姆斯塔特版（Proudhon, Philos.d. Elends, Darmst. 47）。馬克思《哲学的貧困》。蒲魯东《通信集》，1875 年巴黎版（Proudhon, Correspondance, Paris 75），蒲魯东致馬克思的信，載第 2 卷第 198 頁。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 337—365 頁）

《德意志一布魯塞爾報》，1847 年在布魯塞爾出版。《威斯特伐里亞汽船》，1845—1848 年，先在比雷菲尔德，后在帕德博恩出版。恩格斯《西里西亚十亿》一书的导言和《揭露科倫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导言。恩格斯《在倫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載《萊茵年鑑》第 2 卷第 1 頁。馬克思《雇佣勞

①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508—510 頁。

动和資本》，1891年柏林版。馬克思《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哲学的貧困》一书的附录。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年倫敦版 (Marx, Herr Vogt, London 60)。关于馬克思和魏特林之間的爭論，見卡勒尔《魏特林》第72頁和《新时代》第1卷第236頁。埃卡留斯《倫敦的縫紉業》，《新萊茵报》的評論 (Eccarius, D. Schneiderei i. London, Revue d. N. Rhein. Ztg.)。在倫敦的德国工人致隆格的信，載《萊茵年鑑》第1卷第327頁 (Adresse der deutschen Arbeiter in London an Ronge, RJ 1. 327)。維爾穆特-施梯伯《共产主义者的阴谋》。海因岑《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1848年伯尔尼版 (Heinzen, D. Helden d. deutschen Kommunism., Bern 48)。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关于共产主义同盟所做的一些叙述之間，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差異。但是我尽可能地对这些差異作了說明。当这一点不可能做到时，我就選擇了在記憶較新时所做的叙述。关于这方面也可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遺著选集》第2卷和梅林《党史的几个問題》，載《新时代》第21卷上册第545頁 (Mehring, Einiges zur Parteigeschichte. NZ 21¹, 545)。

《共产党宣言》(第366—386頁)

拉布利奧拉《对〈共产党宣言〉的回忆》，1895年羅馬版 (Labriola, In memoria del Manifesto dei Comunisti, Rom 95)。安德勒《共产党宣言，历史的和注釋的导言》，1901年巴黎版 (Andler, Le Manifeste communiste, Introduction historique et commentaire, Paris 01)。梅林《一个方法論問題》，載《新时代》第20卷上册第449頁 (Mehring, E. methodol. Problem, NZ 20¹, 499)。安德勒《答弗兰茨·梅林》，載1902年3月8日《社会主义运动》(Andler, Réponse à Franz Mehring, Mouvement socialiste v. 8. März 02)。梅林《一个法国的桑巴特》，載《新时代》第20卷上册第793頁 (Mehring, E. französ. Sombart, NZ 20¹, 793)。大家知道，德国唯一的蒲魯东主义者就是密爾貝格爾，他道道地地貫彻了蒲魯东主义的精神，竟然把一个普通的自由貿易派歐根·里希特頌揚为“經濟自由的自觉的代表者”；見1892年1月16日《斯图加特观察家》(Stuttgarter Beobachter, 16. Jan. 92)。艾森哈特《国民經濟学史》，1881年耶拿版 (Eisenhart,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k, Jena 81)。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柏林版。恩格斯为馬克思著《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

人名索引

a

- 阿尔勃莱希特（“先知”）(Albrecht 1788—1844)——魏特林的信徒，曾在瑞士宣傳基督教社会主义。——238, 239.
- 阿尔坦施泰因，卡尔·冯·施泰因男爵(Altenstein, Karl, Freiherr vom Stein zum 1770—1840)——普魯士財政大臣(1808—1810)及宗教、教育和医务大臣(1817—1838)。——58—60, 95, 123, 341.
- 阿基米得(Archimedes 約公元前287—212)——希腊数学家和物理学家。——73.
- 阿克萊爵士，理查(Arkwright, Sir Richard 1732—1797)——产业革命时期的一个英国企业家；多种紡紗机的設計者和制造者。——188.
- 阿尔宁，布蒂娜·冯(Arnim, Bettina von 1785—1859)——德国浪漫主义女作家，4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拥护者。——259.
- 阿尔特威尔德，雅科布·冯(Artevelde, Jakob von 約1290/95—1345)——法兰德斯的貴族，反对法兰德斯伯爵的根特起义的领袖，1338年被选为根特市长。——7.

ai

- 艾釋黎，安东尼·庫伯(Ashley, An-

- thony Cooper 1801—1885)——1851年后为舍夫茨別利伯爵，英国保守党議員，大地主；40年代，他是争取十小时工作制法案的貴族-慈善派运动的领袖。——190.
- 艾希霍恩，約翰·阿尔勃萊希特·弗里德里希(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魯士文化大臣(1840—1848)。——123, 127, 138, 216, 261, 341.
- 艾森哈特，胡果(Eisenhart, Hugo)——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1881年发表《国民经济学史》。——384.
- 艾韦貝克，奧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医生和作家，领导过正义者同盟的巴黎支部，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1850年退盟。——161, 228, 231, 232, 337.
- 爱尔維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 Claude-Adrien 1715—1771)——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論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68.
- 埃卡留斯，約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图林根的裁縫，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員，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后来参加英国的工联运动。——361.
- 埃希特迈耶尔，恩斯特·泰奧多尔(Ech-

termeyer, Ernst Theodor 1805—1844)——作家, 1838 年同卢格一起创办《哈雷年鉴》。——93.

埃尔堡, 克利斯提安·哥德弗利德 (Ehrenberg, Christian Gottfried 1795—1876)——自然科学家, 柏林大学教授。——88.

埃尔门, 哥德弗利德 (Ermen, Gottfried)——曼彻斯特埃尔门-恩格斯棉纺厂的股东。——218.

an

安西隆, 约翰·彼得·弗耶德里希 (Ancillon, Johann Peter Friedrich 1767—1837)——普鲁士政治活动家和王家史臣; 1814 年以后入外交部, 1832 年任外交大臣。——82.

安内克, 弗里德里希(弗里茨) (Anneke, Friedrich (Fritz) 约 1817—1872)——曾任普鲁士炮兵军官,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 1848 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并任该会秘书; 《新科伦报》的发行人; 曾参加 1848—1849 年的革命, 后来参加过美国内战。——341.

安年科夫, 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 (Annenkov, Pawel Wassiljewitsch 1812—1887)——俄国自由派批评家和政论家, 地主; 他在多次到国外旅行时, 同马克思相会。除了这种交往外, 他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339.

安凡丹, 巴特尔米-普罗斯比尔 (Enfantin, Barthélémy-Prosper 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圣西门最亲密的信徒之一; 同巴札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12.

安别尔, 雅克 (Imbert, Jacques 1793—

1851)——法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巴黎七月革命的参加者; 1833—1834 年在马赛出版《人民至上报》, 1846—1847 年为布雷歇尔《民主工场报》撰稿; 布雷歇尔民主协会的副主席;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紧密联系。——342.

ao

奥斯特勒, 理查 (Oastler, Richard 1789—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改革家, 托利党人; 在反对自由贸易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他主张通过立法限制工作日。——190.

ba

巴贝夫, 弗朗西瓦-诺埃尔(格拉古) (Babeuf, Francois-Noël (Gracchus) 1760—1797)——法国革命家, 空想的共产主义者, “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7, 30, 31, 268.

巴枯宁,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Bakunin, Michail Alexandrowitsch 1814—1876)——在西欧的俄国流亡者, 民主主义的政论家; 1848—1849 年参加德国革命; 后来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 马克思的敌人; 1872 年, 在海牙代表大会上,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第一国际。——132, 161, 163, 222.

巴尔贝斯, 阿尔芒 (Barbès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七月王朝期间是秘密社附四季社的领袖之一, 1839 年由于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被判终身监禁; 1848 年是制宪会议的代表, 支持赖德律-洛兰的政策; 由于参加 1848 年 5 月 15 日的行动又被判处终身监禁, 1854 年获赦, 后来流亡国外。——30, 31.

巴札尔, 圣阿芒 (Bazard, Saint-Amand 1791—1832) —— 法国政治活动家, 共和主义者, 从1825年到1831年同安凡丹一起是圣西門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 11, 12.

巴伐利亚国王 (König von Bayern 1825—1848) —— 見路德維希第一。

bai

白尔尼, 卡尔·路德維希 (Börne, Karl Ludwig 1786—1837) —— 德国政論家和批评家, 激进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 —— 63, 88—91, 97, 210, 294.

bang

邦納罗蒂, 菲力浦·米歇尔 (Buonarotti Filippo Michele 1781—1837) —— 意大利革命者, 18世纪末19世纪初曾参加法国革命运动; 空想的共产主义者, 巴貝夫的战友。 —— 30, 104, 227.

bao

鮑威尔, 布魯諾 (Bauer, Bruno 1809—1882) —— 唯心主义哲学家, 宗教史家和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1866年后是民族自由党人。 —— 129—132, 134, 135, 139, 158, 171—176, 180, 192, 193, 196—199, 202, 204—206, 214, 216—219, 274, 301, 362.

鮑威尔, 埃德加尔 (Bauer, Edgar 1820—1886) —— 前者之弟, 德国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 127, 134, 158, 197, 199, 204, 206, 218, 219.

鮑威尔, 亨利希 (Bauer, Heinrich) —— 法兰克尼亞的鞋匠, 德国工人运动有功的战士, 正义者同盟和倫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领袖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

央委员会委员, 1850年4月至5月是同盟派往德国的特使; 1851年赴澳大利亚。 —— 102, 103, 219, 360.

鮑姆施塔克, 爱德华 (Baumstark Edward 1807—1889) —— 格賴夫斯瓦耳特的国家学教授,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議会的議員(右派)。 —— 266.

bei

倍克, 卡尔·伊西多尔 (Beck, Karl Isidor 1817—1879) —— 小资产阶级詩人, 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 87, 291.

貝克尔, 奥古斯特 (Becker, August 1814—1871) —— 40年代是魏特林的信徒, 在魏特林被捕(1842)后, 领导瑞士的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运动; 著有《共产主义者是什么人?》(1844)和《共产主义者要做什么?》(1844)。 —— 84, 103, 150, 228, 232, 238—241, 362.

貝克尔, 約翰·菲力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 —— 制刷工人, 30年代和40年代德国和瑞士的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曾以瑞士軍官的身分参加反对宗得崩德 (Sonderbund) 的战争, 他是1848—1849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 他指揮巴登的人民自卫团; 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共产主义者; 60年代是第一国际的一位重要领袖, 《先驅》杂志的編輯;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 97.

貝克尔, 尼古劳斯 (Becker, Nicolaus 1809—1845) —— 《德意志萊茵》歌的作者。 —— 115.

貝凱拉特, 海尔曼·馮 (Beckerath, Her-

mann von 1801—1870)——克雷費爾特的銀行家, 著自由派資產階級的領袖之一; 1848 年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中間派右翼), 帝國內閣的財政大臣(1848 年 8 月至 9 月)。——264.

貝朗熱, 比埃尔-让·德 (Béranger, Pierre-Jean de 1780—1857)——法國民主派作家, 政治諷刺詩人。——36.

貝爾奈斯 (Bernays, F. C.)——德國新聞工作者, 1843 年以前是《曼海姆晚報》撰稿人, 1844 年任巴黎《前進報》編輯, 曾為《德法年鑑》寫過一篇論文。——165, 222, 225.

bi

俾斯麥侯爵, 奧托 (Bismarck, Otto, Fürst von 1815—1898)——德意志帝國首相(1871—1890)。——44, 79, 260, 282.

秘恩斯坦, 亨利希 (Börnstein, Heinrich 1805—1892)——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巴黎《前進報》的創辦人; 1848 年后流亡美國, 曾參加北美內戰。——221, 222, 225, 226, 342.

布舍, 菲力浦-約瑟夫-本扎曼 (Buchez, Philippe-Joseph-Benjamin 1796—1865)——法國政治活動家和歷史學家, 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 天主教社會主義的思想家, 聖西門的學生; 1848 年任臨時政府總理。——12.

布希納, 格奧爾格 (Büchner, Georg 1813—1837)——革命民主現實主義作家。——83—85, 90, 103, 227.

布爾格爾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科倫的激進政論家; 1842—1843 年是《萊茵報》的撰稿人, 共產主義者同盟科倫支部的成員; 1848

—1849 年任《新萊茵報》編輯, 1850 年任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 1852 年是科倫共產黨人案件的主要被告之一, 被判 6 年徒刑; 后來成為民族自由黨人。——139, 266, 295.

彼特森, 尼尔斯 (Petersen, Niels)——丹麥的毛皮匠, 魏特林在瑞士的信徒。——228.

bian

辯子選帝侯 (Kurfürst mit dem Zopfe)——見威廉一世。

bo

勃朗, 让-約瑟夫-路易 (Blanc, Jean-Joseph-Louis 1811—1882)——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 新聞工作者和歷史學家; 1848 年是臨時政府成員和盧森堡委員會的主席; 站在同資產階級妥協的立場上, 1848 年 8 月流亡英國, 在那裡成為小資產階級僑民的領袖之一。——32, 33, 158, 159, 216, 273, 317.

勃魯姆, 羅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萊比錫的新聞工作者和書商;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1848 年是預備議會的副議長和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左派的領袖; 1848 年 10 月參加維也納起義; 維也納陷落後被以軍法處決。——79.

博納德子爵, 路易-加布利埃尔-昂勃魯阿茲 (Bonald, Louis-Cabriel-Ambroise, vicomte de 1754—1840)——法國政治活動家和政論家, 君主主義者, 夏爾時期的貴族和教權主義反動派的思想家之一。——63.

博爾濟希, 奧古斯特 (Borsig, August 1804—1854)——柏林奧·博爾濟希機

- 車和机器工厂的創建人(1836);1841年該厂制出第一台机車,1853年开始向外国出口机車。——87。
- 波拿巴,日罗姆(Bonaparte, Jerome 1784—1860)——拿破崙一世的幼弟,威斯特伐里亞國王(1807—1813);1830年以后为法国元帅。——212。
- 波尔恩,斯蒂凡(Born, Stephan 1824—1898)——排字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員,参加过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右傾机会主义者的代表。革命后流亡瑞士,后来侨居倫敦。——342。
- 波义耳,罗伯特(Boyle, Robert 1627—1691)——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67。
- 柏拉图(Plato[n] 約公元前427—347)——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貴族的思想家。——133, 216。
-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馮(Bornstedt, Adalbert von 1808—1851)——曾任普魯士軍官,政論家,小資產阶级民主主义者;1847—1848年是《德意志-布魯塞爾報》的发行人和編輯;共产主义者同盟員,巴黎德国民主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向德国进军的义勇军就是这个协会組織的。1848年3月被开除出盟;40年代以来是普魯士政府的密探。——342, 343。
- 薄伽丘,卓万尼(Boccaccio, Giovanni 1313—1375)——意大利作家和人文主义者。——7。
- bu
- 布兰肯堡(Blanckenburg)——波美拉尼亞的容克地主,阿道夫·塔敦-特利格拉弗的女婿。——260。
- 布朗基,路易-奧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者,好几个秘密社团的創立人;1848年是法国无产阶级的領袖之一,主張通过密謀組織用武力夺取政权,并认为必须实行革命专政;被囚獄中达三十六年之久。——30。
- 布倫奇里,約翰·卡斯巴尔(Bluntschli, Johann Caspar 1808—1881)——瑞士法学家和反动政客。——235, 237, 241。
- 布阿吉爾貝爾,比埃尔(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的先驅,法国资產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創始人。——19。
- 布雷,查理(Bray Charles 1811—1884)——英国政論家;1837年发表《就集体教育告工人阶级书》,后来出版关于教育和心理学的著作多种。——16。
- 布雷,約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英美空想社会主义者,职业是排字工人,作为经济学家,是欧文的拥护者;他是1837年成立的列茲工人协会的会計;1842年回到美國。——16, 323。
- 布萊特,約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國工厂主,自由派重要的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創立者之一;60年代以后是自由党左翼的領袖;在自由党內閣中曾历任大臣职位。——26。
- 布利索,雅克-比埃尔(Brisson, Jacques-Pierre 1754—1793)——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活动家;革命初期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員,后来是吉倫特派的領袖和理論家。——37。
- 不倫瑞克公爵(Braunschweig, Herzog von)——見斐迪南。

ci

茨万齐格尔 (Zwanziger) —— 19 世纪 40 年代彼得斯瓦尔道 (西里西亚) 的麻纺织工厂主。—— 249, 250, 251, 253.

da

达尔文, 查理 (Darwin, Charles 1809—1882) —— 英国大科学家, 生物进化论的创始人。—— 67.

达乌, 路易-尼古拉斯, 奥尔施塔特公爵 (Davoust 或 Davout), Louis-Nicolas, duc de Auerstaedt 1770—1823) —— 法国元帅。—— 212.

dai

戴维爵士, 哈弗利 (Davy, Sir Humphry 1778—1829) —— 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 186.

dan

但丁, 阿利格耶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 偉大的意大利作家, 《神曲》的作者。—— 152.

de

德拉加雷阿次 (Delagareaz) —— 瑞士政治活动家, 魏特林的信徒, 邦纳罗蒂的学生。—— 227, 240.

德萨米, 德奥多 (Désamy, Théodore 1803—1850) —— 法国政论家, 空想共产主义革命派的代表。—— 35, 68, 164.

德朗克, 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1891) —— 政论家和作家, 起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是《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

后流亡瑞士, 后来到英国;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 仍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 后来脱离政治生活。—— 297, 298, 342.

德罗斯特·措·菲谢林男爵, 克莱门斯·奥古斯特 (Droste zu Vischering, Clemens August Freiherr von 1773—1845) —— 1835 年后为科隆大主教, 1837—1839 年曾被普鲁士政府监禁。—— 94.

德律埃, 昂利 (Druey, Henri 1799—1855) —— 瑞士激进的国务活动家, 1848 年联邦宪法制定者之一, 联邦委员会委员 (1848—1855), 1850 年是瑞士联邦的主席。—— 227, 240.

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 约公元前 460—370) —— 偉大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215.

di

笛卡儿 (卡儿特修斯), 勒奈 (Descartes (Cartesius), René 1596—1650) ——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物理学家)。—— 67.

狄德罗, 德尼 (Diderot, Denis 1713—1784) —— 法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 无神论者; 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 启蒙运动者。—— 159.

迪里希 (Dierig) —— 19 世纪 40 年代郎根比劳 (西里西亚) 麻纺织工厂主。—— 252.

迪奇, 安得列阿斯 (Dietsch, Andreas, 1846 年死) —— 制刷工人, 魏特林的信徒; 1844 年在美国密苏里州建立“新瑞士”共产主义移民区, 这个移民区在 1845 年就自行解散。—— 236, 237.

迪斯累里, 本札曼 (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1804--1881) ——1867年后为贝克斯菲尔德伯爵, 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作家, 19世纪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集团; 先是托利党, 后是保守党的领导人之一; 曾任财政大臣(1852, 1858—1859和1866—1868); 首相(1868, 1874—1880)。——27, 308.

ding

丁盖尔施泰特男爵, 弗兰茨(Dingelstedt, Franz, Freiherr von 1814--1881) ——德国诗人和作家, 本来是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政治诗的代表作家, 40年代中期成为宫廷剧作家, 君主主义者。——134.

du

杜勒克, 海尔曼(Döleke, Herman) ——青年德意志分子; 魏特林秘密同盟的鼓动者, 后移居阿尔及尔。——230, 231, 239, 240.

duo

多勒沙尔(Dolleschall, 1796年生) ——19世纪40年代科伦的警察顾问, 《新莱茵报》的检察官。——152.

多尔, 亨利希·威廉(Döve, Heinrich Wilhelm 1808—1879) ——物理学家、气象学家, 柏林大学教授。——88.

en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3, 114, 159, 165, 166, 179—183, 185—193, 195—197, 199, 200, 203, 204, 208, 209, 218—221, 226, 269—274, 276, 294, 296—301, 304—306, 308—313, 315, 317, 336—340.

343—348, 355—367, 369, 380, 384—386.

fa

法拉第, 迈克尔(Faraday, Michael 1791—1867) ——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67.

法赫尔, 尤利乌斯(Faucher, Julius 1820—1878) ——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 德国自由贸易的拥护者, 50年代初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197, 200, 277, 278.

fei

费尔曼(Fellmann) ——19世纪40年代彼得斯瓦尔道(西里西亚)的纺织工厂主。——251.

费尔巴哈, 弗里德里希(Feuerbach, Friedrich 1806—1880)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弟弟。——239.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 ——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36, 114, 124, 125, 127—132, 161, 163, 166, 192, 193, 198, 203, 205, 215, 218, 239, 267, 268, 269, 274, 275, 300, 301, 313—318, 338.

费尔巴哈骑士, 保尔·约翰·安泽姆(Ritter von 1775—1833) ——著名的资产阶级法学家和刑法学家, 前者之父。——65.

费希特, 约翰·哥特利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 ——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3, 69—75, 287.

费希, 约瑟夫(Fieschi, Joseph 1790—

- 1836) —— 科西嘉人, 1835 年 7 月 28 日谋刺路易-菲力浦, 被送上断头台处死。——29.
- 费奈迭, 雅科布 (Venedey, Jakob 1805—1871) —— 激进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预备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左派); 后来是自由党人。——97, 98, 100.
- 斐迪南, 不伦瑞克公爵 (Ferdinand, Herzog von Braunschweig 1721—1792) —— 普鲁士元帅。——212.
- 菲拉雷特 (Philalethes) —— 萨克森王约翰 (1854—1873 年在位) 的笔名, 曾翻译但丁的《神曲》。——152.
- fu**
- 弗兰德, 威廉·布希菲尔德 (Ferrand, William Bushfield) —— 英国土地占有者, 托利党人。——190.
- 弗来舍尔, 摩里茨 (Fleischer, Moritz) —— 青年黑格尔分子; 1843 年在卢格编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上发表过几篇文章。——131.
- 弗洛孔, 斐迪南 (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 ——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改革报》的编辑; 1848 年是临时政府的成员。——337.
-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 (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 —— 德国革命诗人; 1848—1849 年是《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50 年代脱离革命斗争。——89, 90, 135, 213, 294, 295, 296, 298.
- 弗里德里希二世 (弗里德里希大帝) (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 —— 普鲁士国王 (1740—1786)。——53—55, 74, 118, 172.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Friedrich Wilhelm III. 1770—1840) —— 普鲁士国王 (1797—1840)。——14, 77, 80, 112, 119, 124, 160.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 —— 普鲁士国王 (1840—1861)。——87, 92, 95, 116—121, 134, 135, 138, 156, 157, 160, 162, 163, 172, 222, 223, 243, 244, 259, 265, 266, 341, 346.
- 弗吕贝尔, 尤利乌斯 (Fröbel, Julius 1803—1893) —— 政论家和进步著作的出版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左派) 和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1849 年流亡美国; 后来成为自由党人。——131, 157, 227, 232, 234, 236, 313.
- 福伦, 奥古斯特·阿道夫·路德维希 (Follen, August Adolf Ludwig 1794—1855) —— 德国诗人, 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1814 年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志愿军; 1815 年后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 1817 年是爱北斐特《总汇报》的编辑。——227, 236.
- 傅立叶, 弗朗斯瓦·玛丽·沙尔 (Fourier, François-Marie-Charles 1772—1837) ——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3, 9, 10—13, 34, 68, 106, 110, 198, 203, 229, 255, 257, 258, 271, 317, 381.
- 伏尔泰, 弗朗斯瓦·玛丽·阿鲁埃·德 (Voltaire, François-Marie Arouet de 1694—1778) —— 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讽刺作家和历史学家;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为反对专制主义和天主教而进行斗争。——7, 145, 233.

ga

噶尔, 路德維希 (Gall, Ludwig 1791—1863) —— 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德国技师。—— 256, 257.

gai

盖斯克尔, 彼得 (Gaskell Peter) —— 曼彻斯特的医生, 资产阶级政论家; 自由党人。—— 311.

盖尔温努斯, 格奥尔格·哥特弗利德 (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 —— 历史作家和文学史家, 海德堡大学的教授, 自由主义者, 1847—1848 年是《德意志报》的编辑; 1848 年是预备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中间派右翼)。—— 89, 90.

gan

甘斯, 爱德华 (Gans, Eduard 约 1797—1839) —— 柏林大学法学教授, 黑格尔主义者, 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和《哲学史讲演录》两书的出版人。—— 78, 92, 123, 214.

ge

格奥尔吉 (Georgi) —— 高级法庭顾问, 1835 年是达姆斯塔特调查委员会主席, 对魏迪希牧师的死负有罪责。—— 85.

格拉赫 (Gerlach) —— 19 世纪 40 年代莱茵省的省长。—— 152, 154.

格雷, 约翰 (Gray, John 1798—1850) ——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罗伯特·欧文的学生。—— 13, 286, 320.

格罗耳曼, 威廉·亨利希·冯 (Grolman, Wilhelm Heinrich von 1791—1856) —— 普鲁士法学家, 1836 年至 1845 年

任柏林上訴推事团团长。—— 121.
格律恩, 卡尔 (Grün, Karl 本名为 Ernst von der Haide 1817—1887) —— 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40 年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者;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面貌出现; 1848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左派), 1849 年任巴登民政委员。—— 267—269, 273, 274, 318, 319, 340, 343.

哥列斯, 约瑟夫 (Görres, Joseph 1776—1848) —— 青年时代受到法国革命思想的鼓舞, 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先锋战士; 他在 1814 年创办的《莱茵麦库尔》杂志于 1816 年在普鲁士被禁; 经过多年流亡后, 1826 年哥列斯任慕尼黑大学历史教授, 并转向天主教社会主义。—— 94.

歌德, 约翰·沃尔弗冈·冯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 —— 健康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 69, 89, 90, 192, 195, 297, 343, 344, 355.

gen

根茨, 弗里德里希·冯 (Gentz, Friedrich von 1764—1832) —— 反动的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 梅特涅的亲信。—— 14.

gu

谷兹科夫, 卡尔·斐迪南 (Gutzkow, Karl Ferdinand 1811—1878) —— 作家, 青年德意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1838 年是《德意志电讯》杂志的编辑; 德累斯顿宫廷剧院顾问 (1847—1850)。—— 90, 91.

ha

- 哈勒, 卡尔·路德维希·冯(Haller, Carl Ludwig von 1768--1854)——瑞士法学家和历史学家, 三月革命前封建专制反动派的思想家。——63, 92.
- 哈登堡侯爵, 卡尔·奥古斯特(Hardenberg, Karl August, Fürst von 1750--1822)——1810年起任普鲁士首相; 为了巩固普鲁士国家, 他在1810年至1813年实行了一系列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 维也纳会议后, 护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65.
- 哈格里沃斯, 詹姆斯(Hargreaves, James 1778年死)——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人。——188.
- 哈尼, 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领袖; 宪章运动左派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民主论坛报》、《人民之友报》、《红色共和党人报》和宪章主义者其他刊物的编辑; 到50年代初期为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密切联系。——337.
- 哈特莱, 大卫(Hartley, David 1705—1757)——英国医生和唯物主义哲学家。——67.

hai

- 海涅, 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12, 63, 89—91, 95, 134, 135, 159, 160, 165, 210, 213, 222, 292—294, 297.
- 海因岑, 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激进的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9年曾短期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后流亡瑞士和英国, 1850年秋移居

美国。——347, 348.

- 海尔梅斯, 卡尔·亨利希(Hermes, Carl Heinrich 1800—1856)——德国反动政论家, 1842年是《科伦日报》的编辑之一; 普鲁士政府的密探。——146.
- 海尔茨卡, 泰奥多尔(Hertzka, Theodor 1845—1924)——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 1894年企图在英属东非实现他空想的“自由区”理想。——381.
- 海尔维格,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Herwegh, Georg Friedrich 1817—1875)——德国著名诗人,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34, 135, 137, 139, 158—160, 165, 222, 228, 294.

han

- 汉泽曼, 大卫·尤斯图斯(Hansemann, David Justus 1790—1864)——大资本家, 莱茵自由派资产阶级领袖之一, 1847年是联合会会员;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会员, 同年3月至9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 推行同反革命力量妥协的叛卖政策。——116, 120, 138, 263, 317.

he

- 赫斯, 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政论家, 《莱茵报》的创办人和撰稿人之一; 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代表, 后来成了拉萨尔的信徒。——139, 150, 155, 222, 231, 237, 267—270, 272, 274, 299, 340, 342, 344, 380.
- 荷马(Homer)——传说中的古希腊叙事诗诗人,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212.

hei

黑格爾,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大哲学家, 客观唯心主义者。——3, 36, 53, 65, 69—73, 75, 77, 78, 89—93, 126, 127, 131—133, 178, 191, 194, 198, 216, 218, 231, 267, 271, 274, 278, 279, 300, 315—317, 319, 327.

heng

亨格施坦堡, 厄斯特·威廉(Hengstenberg, Ernst Wilhelm 1802—1869)——神学家, 柏林大学教授。——92.

hong

洪堡, 亚历山大·冯(Humboldt, Alexander von 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地理学家。——88, 225.

hu

胡贝尔, 维克多·艾梅(Huber, Victor-Aimé 1800—1869)——保守的政论家和教授, 德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261.

胡果, 古斯达夫(Hugo, Gustav 1764—1844)——德国法学家, 哥丁根大学法学教授, 反对的法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64, 146.

胡德, 托马斯(Hood, Thomas 1795—1845)——英国现实主义作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多种杂志的撰稿人和编辑。——27.

huo

霍布斯, 托马斯(Hobbes, 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 数学-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人物。——66, 347.
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 奥古斯特·亨利希(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August Heinrich 1798—1874)——德国诗人和语言学家。——134.
霍尔巴赫男爵, 保尔·亨利希·迪特利希(Holbach, Paul Heinrich Dietrich, Baron von 1723—1789)——法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无神论者, 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159.

霍恩, 亨利希·威廉·冯(Horn, Heinrich Wilhelm von 1762—1829)——普鲁士将军。——60.

ji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1840—1848年操纵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28, 29, 30, 225.

ka

卡贝, 埃蒂耶纳(Cabet, Etienne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空想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1842)的作者。——34, 35, 114, 164, 216, 232, 364, 365.

卡莱尔, 托马斯(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 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英雄崇拜的辩护者; 他的观点与40年代封建社会主义接近; 1848年后成了工人运动的公开敌人。——27, 189—195, 220, 311.

卡尔, 弗里德里希(Karl Friedrich 1728—1811)——边沁伯爵(1738—1803),

选帝侯(1803—1806)和巴登大公(1806—1811)。——281.

卡尔斯塔特(Karlstadt 本名 Andreas Rudolf Bodenstein 约 1480—1551)——德国宗教改革家。——233

kang

康普蒙森·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科伦银行家；莱茵自由派资产阶级领袖之一；1847年是联会会议会员；1848年3月至6月任普鲁士首相，推行同反革命力量妥协的贩卖政策。——138, 263, 266.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杰出的德国哲学家，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人。——3, 37, 69—73, 118, 119, 128, 146, 315, 319.

ke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曼彻斯特的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曾参加许多和平代表大会，如185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代表大会；議会議員。——26, 278.

科伦大主教(Erzbischof von Köln)——见德罗斯特·措·菲谢林。

科本，卡尔·弗里德里希(Köppen, Karl Friedrich 1808—1863)——德国学者和政論家，青年黑格尔分子，1842年是《莱茵报》撰稿人。——131, 132, 139, 214.

科采布，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Kotzebue, August Friedrich Ferdinand von 1761—1819)——德国剧作家，俄国沙皇的間諜，自由主义

运动的敌人，被德国大学生协会会员卡尔·路德维希·桑特所杀。——42.

克伦普顿，赛米尔(Crompton, Samuel 1753—1827)——英国机械师，一种纺纱机的发明人。——188.

克莱斯特-雷措夫，汉斯·胡果·冯(Kleist-Retzow, Hans Hugo von 1814—1892)——《十字报》的创办人之一，莱茵省总督(1851—1858)，普鲁士貴族院保守派领袖。——260.

克特根，古斯达夫·阿道夫(Köttgen, Gustav Adolf 1805—1882)——莱茵省的画家和詩人；40年代参加工人运动；接近“真正的”社会主义。——290.

克劳斯，克利斯提安·雅科布(Kraus, Christian Jakob 1753—1807)——科尼斯堡的实践哲学和官房学教授。——117.

克利盖·海尔曼(Krieger, Hermann 1820—1850)——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40年代后半期在纽约领导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小组。——338—340.

kong

孔特，哥特洛普·约翰·克利斯提安(Kunth, Gottlob Johann Christian 1757—1829)——普鲁士国家官吏，洪堡兄弟的教师(1777—1789)。——62.

孔西得朗，维克多(Considérant, Victor 1808—1893)——法国政論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和信徒。——13, 33, 150, 151.

ku

库尔(Kuhl)——魏迪希·华希纳秘密同

腥罪的好紳。——84.

庫尔曼, 格奥尔格 (Kuhlmann, Georg 1812年生) ——驅子手, 自称“先知”, 用宗教的詞句对瑞士的德国手工业工人和魏特林的信徒宣傳“真正的”社会主义; 后来才知道他是奥地利政府的密探。——238—240.

la

拉薩爾, 菲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律师、作家, 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鼻祖。——3, 210, 241, 282.

拉馬克伯爵, 馬克西米利安 (Lamarque, Maximilien, comte 1770—1832) ——法国将军, 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是反政府的自由派的领袖。——29.

拉馬丁, 阿尔丰斯-瑪丽-路易·德 (Lamartine, Alphonse-Marie-Louis de 1790—1869) ——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40年代是温和的共和派领袖之一; 1848年是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和实际首脑, 制宪会議的代表和执行权委员会委员。——36, 158, 159.

拉梅耐, 费里西德-罗伯特·德 (Lamennais (La Mennais) Félicité-Robert de 1782—1854) ——法国修道院长, 政論家,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36, 97, 98, 101, 103, 158, 159, 233.

拉伯雷, 弗朗斯瓦 (Rabelais, François 約1494—1553) ——文艺复兴时代法国的人文主义作家。——7.

拉埃尔 (Rahel) ——見万哈根·冯·恩策。

lai

賴德律-洛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

—1874) ——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 《改革报》的編輯; 1848年是临时政府的內政部长和执行权委员会的委员, 制宪会議和立法会議的代表(山居党); 1849年6月13日以后流亡英国。——32, 33.

賴馬魯斯, 海尔曼·札米尔 (Reimarus, Hermann Samuel 1694—1768) ——德国神学家和启蒙哲学家; “自然的”理性宗教的代表人物。——91, 92.

萊布尼茨男爵, 哥德弗利德·威廉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1646—1716) ——德国数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67, 210.

萊辛,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 ——偉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7, 36, 69, 91, 127, 179, 210.

萊辛 (Lessing) ——普魯士的大学生, 反对青年德意志的密探, 在苏黎世被杀。——102.

lang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 ——德国政論家, 写过一本論工人問題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书。——311, 312, 317.

lao

勞貝, 亨利希 (Laube, Heinrich 1806—1884) ——德国作家, 青年德意志派的代表人物; 后来是維也納劇院的經理和导演。——90.

le

勒魯, 比埃尔 (Leroux, Pierre 1797—

1871)——法國政論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門的信徒。——36, 37, 150, 151, 158.

lei

雷瑙,尼古勞斯 (Lenau, Nikolaus 本名 Nikolaus Niembsch, Edler von Strehlenau 1802—1850)——19世紀奧地利最杰出的抒情詩人。——291, 292.

li

利奧,亨利希 (Leo, Heinrich 1799—1878)——历史学家和政論家,反动政治和宗教观点的辩护人,普魯士容克阶级的思想家之一。——92, 94—96, 132.
李比希男爵,尤斯圖斯 (Liebig, Justus, Freiherr von 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奠基人之一。——88, 186.

李卜克內西,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85.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 (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经济学家,1848年前上升的资产阶级的理論代表;保护貿易政策的拥护者。——63, 161, 180, 281, 299, 355.

李嘉圖,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15, 19, 63, 205, 220, 278—280, 282—285, 319, 321, 323, 325, 326, 329.

里德爾,理查 (Riedel, Richard)——德国工人,流亡布魯塞爾,他是民主协会、德国工人联合会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积极成员。——342.

里廷豪森,摩里茨 (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民主派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是科倫民主协会会员和安全委员会委员;《新萊茵报》的撰稿人;1849年是《西德意志报》的主编之一,后来是第一国际的成员和社会民主党党员。——355.

lie

列列韦尔,約阿希姆 (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者;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临时政府的成员;波兰侨民民主派的领袖之一;1847—1848年是布魯塞爾民主协会的理事。——342.

long

隆格,約翰奈斯 (Ronge, Johannes 1813—1887)——教士,德国天主教运动的发起人和领袖,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使天主教适合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要求。——362.

lu

路易-菲力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的公爵,法国国王 (1830—1848)。——28, 29.

路德維希一世 (Ludwig I. 1786—1868)——巴伐利亚国王 (1825—1848)。——87.

路德,馬丁 (Luther, Martin 1483—1546)——宗教改革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319.

路特希爾德男爵,詹姆斯 (Rothschild, James, baron de 1792—1868)——巴黎路特希爾德銀行的行長。——291.

卢梭, 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 —— 法国启蒙运动者, 民主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 159.

卢格, 阿尔诺德 (Ruge, Arnold 1802—1880) —— 激进的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4年同马克思合编《德法年鉴》;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左派), 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 93—96, 124, 125, 130—134, 140, 157—164, 199, 215—217, 222—226, 276, 277, 293, 294, 313.

鲁滕堡, 阿道夫 (Rutenberg, Adolf 1808—1869) —— 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1866年后是民族自由党人。 —— 139, 152.

lū

吕宁, 奥托 (Lüning, Otto 1818—1868) —— 医生和政论家, 1844年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 《威塞尔汽船》(1844)、《威斯特伐里亚汽船》(1845—1848) 和民主派的《新德意志报》(1848—1850) 的主编; 1866—1867年是普鲁士众议院的议员, 属于民族自由党。 —— 267, 273, 340.

lun

伦济, 科拉·迪 (Cola di Rienzi 1313—1354) —— 罗马保民官, 1347年号召意大利人进行民族团结, 1354年被贵族杀死。 —— 7.

luo

洛克, 约翰 (Locke, John 1632—1704)

—— 英国杰出的二元论哲学家, 感觉论者,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 66, 67, 210.

洛贝尔图斯-雅格左夫, 约翰·卡尔 (Röbeli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 —— 普鲁士大地主和经济学家,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中间派左翼的领袖。 —— 3, 266, 280—291, 320.

罗霍夫, 古斯达夫·阿道夫·罗胡斯·冯 (Rochow, Gustav Adolf Rochus von 1792—1847) —— 反动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 普鲁士内政大臣 (1834—1842)。 —— 94.

罗雪尔, 威廉 (Roscher, Wilhelm 1817—1894) ——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 258, 280, 281, 313.

罗泽, 古斯达夫 (Rose, Gustav 1798—1873) —— 矿物学家, 柏林大学教授。 —— 88.

罗泽, 亨利希 (Rose, Heinrich 1795—1864) —— 1835年后任柏林大学化学教授。 —— 88.

罗曾贝格, 冯 (Rosenberger, von) —— 普鲁士少校, 曾指挥军队镇压 1844 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 —— 252.

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利安·玛丽·伊西多尔·德 (Robespierre, Maximilien-Marie-Isidor de 1758—1794) ——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活动家, 1793年是雅各宾派的领袖, 1793至1794年是革命政府的首脑。 —— 141.

ma

马累·杜·龐 (Mallet du Pan 1749—1800) —— 瑞士作家, 法国宫廷和王党流亡分子的密探。 —— 287.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國牧師和經濟學家,提出人口过剩的反動理論,為資本主義使勞動人民生活貧困辯解。——185, 186.

馬拉, 让-保爾 (Marat, Jean-Paul 1744—1793)——法國革命者和政論家,在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中,是雅各賓俱樂部的最堅決的領袖之一;《人民之友》報的創辦人。——201, 268.

馬塞耳, 爱蒂耶納 (Marcel, Etienne)——巴黎商人,普瓦提埃戰役後,于1356年要求去除封建王朝的弊害,1358年戰死。——7.

瑪麗亞, 安東尼亞 (Maria Antonia 1724—1780)——薩克森選帝侯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提安 (1722—1763)的妻子。——56.

馬爾, 威廉 (Marr, Wilhelm)——青年德意志分子,魏特林的信徒。——239, 240.

馬克思, 卡爾 (Marx, Karl 1818—1883)。——3, 65, 114, 131, 139—152, 155, 157—164, 167, 168, 170, 171, 173—180, 186, 197, 199, 200, 202—227, 269, 270, 272, 276, 277, 282, 283, 292, 294, 295, 297—299, 311—328, 330, 332—340, 342—348, 350, 351, 355—359, 361—363, 365—367, 369, 380, 384, 386.

馬克思, 亨利希 (Marx, Heinrich 1782—1838)——卡尔·馬克思的父亲。——210, 211.

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父姓 von Westphalen 1814—1881)——卡尔·馬克思的妻子和助手。——212, 213.

馬志尼, 朱澤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之一;

1849年是羅馬共和國臨時政府的首腦,1850年是倫敦“歐洲民主派中央委員會”的組織者之一;50年代初企圖求得波拿巴主義者集團的援助。——101, 102.

mai

迈斯納, 阿尔弗勒德 (Meißner, Alfred 1822—1885)——德国詩人和小說家,“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信徒。——291.

迈耶尔贝尔, 札科莫 (Meyerbeer, Giacomo 1791—1864)——德国歌剧作曲家。——221.

mei

梅斯特爾伯爵, 約瑟夫·瑪麗 (Maistre Joseph-Marie, comte de 1753—1821)——法國作家,君主主義者,貴族和教權主義反動派的思想家,法國革命的凶惡敵人。——63, 92.

梅利奈, 弗朗斯瓦 (Mellinet, François 1769—1852)——比利時將軍,原籍法國,1830年比利時資產階級革命和比利時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布魯塞爾民主協會的名譽主席;1848年在里斯康土案中被判死刑,後被“寬大”改判30年徒刑,1849年9月获釋。——342.

梅克爾 (Merckel)——1845年前後是西里西亞總督。——254.

梅特涅侯爵, 克雷門斯·溫采爾·洛塔爾 (Metternich, Clemens Wenzel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奧地利政治家和外交家;外交大臣 (1809—1821)和首相 (1821—1848);神圣同盟的組織者之一。——82, 96, 102, 139.

men

門特爾, 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Mentel, Christian Friedrich 1812年生)——裁縫, 柏林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成員; 科倫共產黨人案件的被告之一; 被釋後流亡美國。——242.

孟德斯鳩, 沙爾·德·塞孔達, 布來德男爵(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1689—1755)——法國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作家, 18世紀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 君主立憲政體的理論家。——148.

蒙特, 泰奧多爾(Mundt, Theodor 1808—1861)——作家, 屬于青年德意志自由派作家集團; 1848年在布勒斯勞大學, 1850年后在柏林大學任文學和歷史教授。——90.

mi

米凱爾, 約翰奈斯 (Miquel, Johannes 1828—1901)——普魯士銀行家, 民族自由黨人; 青年時代是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 历任帝國議會議員(1867—1877和1887—1890), 財政大臣(1890—1901)。——12.

米拉波伯爵, 奧諾萊-加布里埃尔-維克多·利凱梯(Mirabeau, Honoré-Cabriel-Victor Riqueti, comte de 1749—1791)——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治活動家, 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貴族的利益的維護者。——43, 50.

弥勒, 亞當·亨利希 (Müller, Adam Heinrich 1779—1829)——反動的浪漫主義政論家, 頌揚封建制度。——63, 92.

弥勒, 約翰奈斯·馮 (Müller, Johannes

von 1752—1809)——德國保守的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 著有《瑞士同盟史》等書。——88.

mian

緬達爾森, 莫澤斯(Mendelssohn, Moses 1729—1786)——德國小資產階級哲學家、唯心主義者。——172.

min

闊采爾, 托馬斯 (Münzer, Thomas 約 1490—1525)——偉大的德國革命家、宗教改革和1525年農民戰爭時期農民和平民的領袖和思想家, 宣傳空想平均共產主義的思想。——7, 233.

mo

莫爾, 約瑟夫 (Moll, Joseph 1812—1849)——科倫的鐘表匠, 正義者同盟和倫敦德國工人教育協會的領導人之一, 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 1848年7月到9月是科倫工人聯合會的主席, 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和科倫安全委員會的委員; 1849年參加巴登-普法爾茨起義, 在牟爾克河畔戰鬥中犧牲。——103, 219, 340, 360, 362.

莫爾爵士, 托馬斯 (More (Morus), Sir Thomas 1478—1535)——英國政治活動家(上院議長), 人文主義作家, 空想共產主義的代表。——34.

na

納克勒爾, 卡爾·斐迪南·弗里德里希·馮 (Nagler, Karl Ferdinand Friedrich von 1770—1846)——普魯士郵政總局局長(1823—1846)。——87.

拿破崙第一, 波拿巴(Napoleon I. Bonap

parte 1769—1821) — 法国皇帝 (1808—1814 和 1815 在位)。 — 5, 6, 11, 43, 48, 56, 63, 89, 112, 201, 212.

nao

瑙威尔克, 卡尔·路德维希·泰奥多尔 (Nauwerck (Nauwerk), Karl Ludwig Theodor 1810—1891) — 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哈雷年鉴》、《德国年鉴》、《铁文集》和《莱茵报》的撰稿人; 他属于自由人集团; 是法兰克福国民會議員(极左派)。 — 139.

ni

尼古拉一世 (Nikolaus I. 1796—1855) — 俄国沙皇 (1825—1855)。 — 79, 112, 119, 246.

niu

牛頓爵士, 伊薩克 (Newton, Sir Isaac 1642—1727) — 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 67.

nuo

諾伊豪斯, 古斯达夫·莱因哈德 (Neuhaus, Gustav Reinhard 1823—1892) — 德国詩人, 40 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 297.

ou

欧倫堡伯爵, 弗里德里希·阿尔勃莱希特 (Eulenburg, Friedrich Albrecht, Graf zu 1815—1881) — 1842—1843 年任《莱茵报》檢查官, 后任普魯士內政大臣 (1862—1873)。 — 155.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1858) —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

3, 9, 10, 13—16, 23, 34, 68, 198, 219, 257, 284—286, 314, 320, 362, 381.

pei

培根, 弗兰西斯, 圣埃尔本斯子爵和維魯拉姆男爵 (Bacon, Francis, Viscount of Saint Albans und Baron of Verulam (Baco von Verulam) 1561—1626) — 英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 (马克思語)。 — 65, 128.

佩利埃, 卡西米尔 (Périer, Casimir 1777—1832) — 法国銀行家, 曾任总理 (1831—1832)。 — 28, 29.

配第爵士, 威廉 (Petty, Sir William 1632—1687) — 英国经济学家和統計学家,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 — 19.

pi

皮羽克列尔-穆斯考侯爵, 海尔曼·路德维希·亨利希 (Pückler-Muskau, Hermann Ludwig Heinrich, Fürst von 1785—1871) — 德国作家。 — 255, 256.

皮羽特曼, 海尔曼 (Püttmann, Hermann 1811—1894) — 德国出版家和新闻工作者; 40 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 139, 297.

pu

普芬德, 卡尔 (Pfänder, Carl 約 1818—1876) — 鐵繪画家, 正义者同盟盟員; 倫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积极的成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后来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拥护者和朋友。——360, 361.

普雷斯, 弗兰西斯(Place, Francis 1771—1854) ——英国裁缝师傅, 激进派的主要人物, 部分废除禁止结社令(1824)的鼓吹者。——24.

普拉頓-哈勒明德伯爵, 奥古斯特(Platen-Hallermünde, August, Graf von 1796—1835) ——新古典主义派诗人; 自由主义者。——63, 88, 89.

普拉特, 多米尼克·德(Pradt, Dominique de 1759—1837) ——拿破仑第一的宫廷神父, 马林(梅克林)的大主教。——86.

普林斯-史密斯, 约翰(Prince-Smith, John 1809—1874) ——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 自由贸易党的创始人, 普鲁士众议院和1871—1873年帝国议会的议员, 属于民族自由党。——277.

普鲁士亲王(Prinz von Preußen) ——见威廉一世。

普鲁茨, 罗伯特(Prutz, Robert 1816—1872) ——民主主义诗人, 批评家和历史学家, 《哈雷年鉴》和《莱茵报》的撰稿人, 1849—1859年在哈雷任文学教授。——134, 135, 139.

普鲁士王储(Kronprinz von Preußen) ——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法国政论家,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奠基人; 1848年是立宪会议的代表。——36, 37, 151, 158, 180, 204—206, 216, 239, 268, 271, 273, 274, 276, 286, 318—327, 330—336, 339, 350.

qiao

乔治三世(Georg III. 1738—1820) ——英国国王(1760—1820)。——212.

ri

日果, 菲力浦(Gigot, Phillippe 1820年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 在布鲁塞尔同马克思有紧密联系, 后来任比利时档案官。——337.

rong

荣克, 格奥尔格·哥特洛普(Jung, Georg Gottlob 1814—1886) ——科伦的陪审官, 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青年黑格尔分子; 1842年是《莱茵报》发行人之一;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左派的一位领袖; 1866年至1876年是普鲁士众议院议员, 属于民族自由党。——139, 266.

荣格尼茨, 恩斯特(Jungnitz, Ernst 1848年死) ——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文学总汇报》的撰稿人。——197, 199.

ruo

若特兰, 卢西安·列奥波特(Jottrand, Lucien-Léopold 1804—1877) ——比利时律师和政论家,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1830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7年是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主席; 《社会辩论报》的编辑。——342.

sa

萨维尼,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Savigny, Friedrich Karl von 1779—1861) ——德国法学家, 胡果的拥护者, 反动的法的历史学派的首领; 普鲁士立法事务大臣(1842年至1848年3月)。——64, 123, 214.

sang

桑, 乔治(Sand, Georg 1804—1876)——法国女作家, 著有长篇社会小说多种, 浪漫主义的人道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335.

桑特, 卡尔·路德维希(Sand, Karl Ludwig 1795—1820)——学神学的大学生, 耶拿大学生协会会员, 1817年瓦特堡大会的主要参加者, 1819年刺杀沙皇密探科采布, 被处死。——42.

sha

沙培尔, 阿(Schaper, von)——普鲁士反动官僚的代表人物; 特利尔地方长官(1837—1842), 莱茵省总督(1842—1845)。——153.

沙佩尔, 卡尔(Schapper, Karl 约1812—1870)——正义者同盟的领袖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 同维利希一起是反对马克思的宗派集团的领袖; 不久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1856年又站到马克思一边; 1865年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102, 103, 219, 228, 232, 360, 362, 364.

沙皇(1825—1855)——尼古拉一世。莎士比亚, 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134, 195, 212

sheng

圣保尔, 威廉(Saint-Paul, Wilhelm 约1815—1852)——普鲁士军官, 后来是内政部官員和《莱茵报》的特别检查官。——155.

圣西門伯爵, 克劳德-昂利·德·鲁夫洛

瓦 (Saint-Simon, Claude-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3, 9—12, 34, 36, 106, 255, 257, 317, 381.

shi

施列特魏因, 约翰·奥古斯特(Schlettwein, Johann August 1731—1802)——洛贝图斯的外祖父, 重农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1777年至1785年在吉森任政治学、官房学和财政学教授。——280.

施利希庭(Schlichting)——普鲁士少校, 曾指挥军队镇压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252.

施略费尔, 弗里德里希·威廉(Schlöffer, Friedrich Wilhelm 1800—1870)——西里西亚的工厂主, 民主主义者, 法兰克福国民議会議員(左派), 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逃亡瑞士, 后到美国。——254.

施米特, 西蒙(Schmidt, Simon)——士瓦本的制革工人, 魏特林在瑞士的信徒。——104, 228, 232.

施塔尔, 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Stahl, Friedrich Julius 1802—1861)——极端反动的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23, 287, 288.

施坦道, 尤利乌斯(Standau, Julius)——青年德意志分子, 魏特林秘密同盟的鼓动者, 后来移居阿尔及尔。——230, 231, 239, 240.

施泰因, 罗伦茨·冯(Stein, Lorenz von 1815—1890)——黑格尔主义者, 基尔大学哲学和法律学教授, 普鲁士政府的密探。——257, 258.

施泰因根斯, 斯韦特贝特·亨利希·海

尔曼(Steingens, Sweetbert Heinrich Hermann 約 1817 年生)——画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342.

施格伯, 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警察顧問, 普魯士政治警察局局长; 1852 年科倫共产党人案件的組織者和主要证人之一; 同維爾穆特合編《十九世紀共产主義者的阴谋》一书。——253, 254, 383.

施帝納, 麦克斯 (Stirner, Max 本名 Johann Caspar Schmidt 1806—1856)——哲学家和作家,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著有《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等书。——139, 274—278, 301.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哲学家和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1866 年后是民族自由党人。——90—93, 124, 125, 127, 189, 190, 214, 217.

施贝加 (Szeliga 本名 Franz Szeliga Zychlin von Zychlinski 1816—1900)——普魯士軍官, 青年黑格尔分子; 《文学总汇报》和《北德意志报》的撰稿人。——197, 199.

shu

舒克曼男爵, 弗里德里希·馮 (Schuckmann, Friedrich von. Freiherr 1755—1834)——普魯士內政大臣 (1814—1819 和 1819—1834)。——59, 60, 257.

舒尔茨, 威廉(Schulz, Wilhelm)——苏黎世的医生, 魏特林的信徒。——227.

舒尔采, 約翰奈斯 (Schulze, Johannes)——阿尔坦施泰因任普魯士文化大臣期間, 文化部的樞密顧問 (1817—1838)。——95.

舒斯特尔, 泰奥多尔 (Schuster, Theodor)——哥丁根的私人讲师, 1834 年在巴黎是被逐者同盟的領袖之一。——97—102.

si

司徒恩澤伯爵, 約翰·弗里德里希 (Straensee, Johann Friedrich, Graf von 1737—1772)——丹麦的国务活动家, 原籍德国; 在任首相期間 (1770—1772) 进行资产阶级改革, 1772 年被貴族阴谋推翻, 处死。——74.

司徒恩澤, 卡尔·古斯达夫·馮 (Struensee, Karl Gustav von 1735—1804)——前者的哥哥, 普魯士国务活动家, 1791 年后是国务大臣和间接税及关税局局长。——74.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經濟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經濟学的代表人物。——63, 117, 179, 205, 278—280, 282, 285, 302, 303, 329, 331.

斯宾諾莎, 別涅狄克特·德 (巴魯赫) (Spinoza. Benedictus de (Baruch)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論者。——67, 70, 192.

su

苏, 欧仁 (Sue, Eugene 1804—1857)——自由派政治活动家, 著有一些小市民感伤的社會小說; 立法會議的代表。——36.

苏特尔迈斯特 (Sutermeister)——左芬根的医生, 在瑞士的魏特林秘密同盟的盟員。——227

ta

塔敦-特利格拉弗, 阿道夫 (Thadden-

Triglaff, Adolf 1796—1882) —— 波美拉尼亚的普鲁士反动地主; 1847 年第一届联合议会的议员。—— 260, 261.

te

特赖希勒尔 (Treichler) —— 苏黎世的小学教员; 一个民主主义周刊 (1845) 的发行人。—— 240, 241.

ti

梯包特, 安东·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 (Thibaut, Anton Friedrich Justus 1772—1840) —— 法学家, 曾在基尔、耶拿和海德堡任教授, 是“法哲学”派的代表人物。—— 64.

梯也尔, 路易·阿道夫 (Thiers, Louis-Adolphe 1797—1877) —— 法国历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曾任总理 (1836—1840); 1848 年是制宪会议代表, 1849 年是立法会议代表; 后任共和国总统 (1871—1873), 是屠杀巴黎公社起义者的刽子手。—— 28, 29.

梯尔, 卡尔·威廉·亨利希·博斯男爵 (Thil, Karl Wilhelm Heinrich, Freiherr du Bos du 1777—1859) —— 黑森大公国的外交和财政大臣 (1821—1859)。—— 82, 83, 85.

tu

居能, 亨利希·冯 (Thünen, Heinrich von 1783—1850) —— 德国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 63, 64.

wa

瓦克斯穆特, 威廉 (Wachsmuth, Wilhelm 1784—1866) —— 德国历史学家, 莱比锡的教授, 著有《论希腊罗马时

代和欧洲史的著作多种。—— 130.
瓦瑟纳, 海尔曼 (Wagener Hermann 1815—1889) —— 德国政论家, 俾斯麦的党羽。—— 261—263.

瓦根克内希特 (Wagenknecht) —— 1844 年彼得斯瓦尔道 (西里西亚) 的麻丝工厂主。—— 251.

瓦列斯罗德, 路德维希·莱因霍尔特 (Walesrode, Ludwig Reinhold 1810—1889) —— 新闻工作者, 约翰·雅科比的朋友; 1843 年因写《恭顺的演说》一节被判要塞监禁, 1849 年以后又被处徒刑。—— 138.

瓦劳, 卡尔 (Wallau, Karl 1823—1877) ——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排字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 年是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 后来是美因茨市市长。—— 342.

瓦尔特, 约翰 (Walter, John 1776—1847) —— 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190.

wan

万哈根·冯·恩赛, 卡尔·奥古斯特 (Varnhagen von Ense, Karl August 1785—1858) —— 德国作家和文学史家, 支持青年德意志运动。—— 256.

万哈根·冯·恩赛, 拉埃尔 (Varnhagen von Ense, Rahel 父姓 Levin 1771—1833) 前者之妻, 妇女运动的先锋战士。—— 255, 256.

万德尔, 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 (Wander, Karl Friedrich Wilhelm 1803—1879) —— 希尔施贝克的教师, 主张学校自由, 不受教会约束, 1848 年号召成立全德教师联合会, 因此被撤职;

1850年赴美，后来又回到德国。——254.

wei

魏尔特，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56)——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文艺栏的编辑；革命后做商品推销员。——213, 296, 298, 342.

维陶斯(Wietaus)——《莱茵报》的检查官。——152, 155.

维特(Witt)——高级教师，《科尼斯堡日报》的主编。——138.

魏迪希，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Weidig, Friedrich Ludwig 1791—1837)——教师，后来是布茨巴赫(黑森)的校长，30年代领导黑森的民主运动。——82, 84, 85.

魏斯，古伊多(Weiß, Guido 1822—1899)——民主主义政论家，《柏林改革》和《天平》的主编。——258.

魏特林，克利斯提安·威斯(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家。——3, 102—114, 150, 161, 164, 227—241, 338—340, 359—362.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 Josef 1818—1866)——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的编辑(1849—1850)；1851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各州一边参加了美国内战；他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338.

韦尔凯尔，卡尔·泰奥多尔(Welcker, Karl Theodor 1790—1869)——巴登的法学家和政论家，自由主义者，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中间派右翼)。——150.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利(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6.

威斯特华伦，路德维希·冯(Westphalen, Ludwig von 1770—1842)——特利尔的普鲁士官吏，马克思的岳父。——211, 212.

威斯特华伦，菲力浦(Westphalen, Philipp)——前者之父，七年战争时期曾任斐迪南·冯·不伦瑞克公爵的机要秘书。——211.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国王(1861—1888)和德国皇帝(1871—1888)。——67.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43—1821)——黑森-卡塞尔的选帝侯(1803—1806, 1813—1821)。——212.

威尔特，约翰·格奥尔格·奥古斯特(Wirth, Johann Georg August 1798—1848)——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德意志论坛报》的发行人，1832年该报被禁，引起汉巴哈大会的召开。1833年威尔特被判二年徒刑。1845年他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成员。——81, 229, 230.

wen

温克施特恩，奥托·冯(Wenckstern, Otto von 1819—1869)——新闻工作者和诗人，侨居伦敦，是《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的撰稿人。——297.

wo

沃尔弗，斐迪南(Wolf (f), Ferdinand

1812—1895)——新聞工作者, 1846—1847年是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委員, 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 1848—1849年是《新萊茵報》編輯之一; 後來流亡巴黎和倫敦, 1850年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時站在馬克思一邊, 後來脫離政治生活。——342.

沃尔弗, 威廉 (Wolff, Wilhelm 1809—1864)——教師和新聞工作者, 西里西亞一個農奴的儿子, 曾參加大学生协会运动, 是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 1848—1849年是《新萊茵報》編輯之一, 後來流亡瑞士, 1851年後流亡英國, 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268, 338, 340, 363.

wu

烏爾姆 (Wurm)——瓦爾姆布隆 (西里西亞)的純木工师傅, 1845年因所謂的割肉罪被判刑。——253, 254.

xi

希尔德布兰德, 布魯諾 (Hildebrand, Bruno 1812—1878)——國民經濟学家和統計学家, 布勒斯勞、馬爾堡和蘇黎世的國家學教授;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議員。——312, 313.

席勒, 弗里德里希·馮 (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偉大的德國詩人、劇作家。——69, 212.

西斯蒙第, 让-沙爾-列奧納爾-西蒙·德 (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Simon de 1773—1842)——瑞士經濟学家和歷史学家, 从小生产者的立場批判資本主义, 并把小生产理想化。——19, 20, 205, 283, 284, 378.

xia

夏米索, 阿达尔贝特·馮 (Chamisso, Adalbert von 1781—1838)——德国浪漫主义詩人, 反对封建的反动勢力。他是法國貴族的后裔, 1790年大革命时随父母亡命德国。——117.

xie

謝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約瑟夫·馮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4)——德国哲学家, 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36, 37, 70, 123, 166, 192.

xiu

休謨 (Hume)——英國自由貿易論者, 國會議員。——24.

休謨, 大衛 (Hume, David 1711—1776)——英國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 不可知論者。——67, 69.

xue

雪恩, 亨利希·泰奧多爾·馮 (Schön, Heinrich Theodor von 1773—1856)——普魯士国务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43, 52, 56, 119—121, 341.

雪恩萊因, 約翰·魯卡斯 (Schönlein, Johann Lukas 1793—1864)——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侍医; 柏林大学教授, 君主主义者。——134.

ya

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紀元前384—322)——古希腊偉大的哲学家。——132, 216.

亞歷山大一世 (Alexander I. 1777—1825) ——俄國沙皇 (1801—1825)。 ——6, 14.

雅科比, 約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 ——科尼希堡的醫生, 政論家和政治活動家, 堅決的民主主義者; 1848年為預備議會議員和普魯士國民議會左派的領袖之一; 1849年是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和第二議院議員(極左派); 後來是俾斯麥政策的反對者, 1872年之後是社會民主黨黨員。 ——120, 121, 138, 159, 165, 210.

雅爾克, 卡爾·恩斯特 (Jarcke, Karl Ernst 1801—1852) ——天主教政論家, 《政治周刊》(1831)的主編; 是很英在奧地利宮廷中的後繼者。 ——92.

yi

伊梅爾曼, 卡爾·列貝萊希特 (Immermann, Karl Leberecht 1796—1840) ——德國作家。 ——63, 89, 91.

伊斯克羅 (Iskraut) ——法國神父, 卡貝

的同時代人和凶惡的敵人。 ——34.

伊壁鳩魯 (Epikouros, 約公元前 341—270) ——杰出的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 无神論者。 ——215.

ying

英國國王 (König von England 1760—1820) ——見喬治三世。

zai

載勒爾, 塞巴斯提安 (Seiler, Sebastian 約 1810—1890) ——政論家; 1848年是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委員和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 1848—1849年德國革命的參加者。 ——150, 228, 338.

zhu

朱尼亞斯 (Junius) ——一個英國政治活動家 (多半是菲力浦·弗朗西斯爵士) 的筆名, 他在 1768 至 1772 年發表的許多封信中巧妙地攻擊了政府和議會。 ——133.